

Essential Ethnographic
Methods: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万卷方法

民族志方法要义： 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

■ 斯蒂芬 L. 申苏尔 (Stephen L. Schensul)

琼·J.申苏尔 (Jean J. Schensul)

玛格丽特·D.勒孔特 (Margaret D. LeCompte) 著

■ 康 敏 李荣荣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Essential Ethnographic
Methods: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民族志是一种为了调查和发现社区、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文化模式与意义的科学方法。

作为科学，民族志和其他社会行为科学的调查方法的首要区别在于，民族志者要探索在他们赋予人们的行为和信仰以意义之前，人们都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这样，人们的观点就形成了建立地方性理论的基础，我们可以检验这些理论，把它们和科学文献相衔接，也可以在改造后用于其他地方。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民族志要依靠研究者作为资料收集的首要工具，因此民族志者要特别注意偏见的问题和保证资料准确性的方法。

关于民族志是什么，如何着手开展民族志研究，方法论学者们持不同观点。我们对民族志的把握以四项指导原则为基础：

- 民族志研究由理论引导并产生理论。
- 民族志研究既是定性的，也是定量的。
- 民族志研究在地方上(Local)开展的。
- 民族志研究是应用的。

参阅及发表相关评论，请登录万卷方法博客圈：

<http://q.blog.sina.com.cn/fafang>

万卷方法博客圈：

<http://q.blog.sina.com.cn/fafang>

ISBN 978-7-5624-65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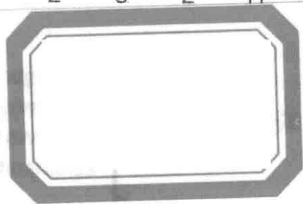


9 787562 465997 >

定价：35.00元

M I N Z U Z H I F A N G F A Y A O Y

Essential Eth
Methods: Obs
Interv
Ques



民族志方法要义： 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

■ 斯蒂芬 L. 申苏尔 (Stephen L. Schensul)

琼·J. 申苏尔 (Jean J. Schensul)

玛格丽特·D. 勒孔特 (Margaret D. LeCompte) 著

■ 康 敏 李荣荣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Essential Ethnographic Methods: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BY Stephen L.Schensul, Jean J.Schensul,Margaret D.LeCompte.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Copy ©1999 by AltaMir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2007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版贸核渝字(2007)第7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美)

申苏儿(Schensul,S.),申苏儿(Schensul,J.),勒孔特(LeCompte,M)著;
康敏,李荣荣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3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Essential Ethnographic Methods: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ISBN 978-7-5624-6599-7

I.①民… II.①申…②申…③勒…④康…⑤李… III.①民族志—研究
方法 IV.①K1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1624号

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

斯蒂芬·L.申苏尔 琼·J.申苏尔 玛格丽特·D.勒孔特 著
康敏 李荣荣 译

策划编辑:雷少波

责任编辑:庄婧卿 张志敏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夏宇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83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89×1092 1/16 印张:13.75 字数:203千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978-7-5624-6599-7 定价: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前言

“民族志者工具箱”是一套关于如何计划、设计和完成应用型民族志研究，以及如何运用其结果的丛书。习惯于比较传统的研究方式的人或许会对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感到生疏，但我们相信，应用民族志对于多数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不仅会称心如意，而且将是不可或缺的。使用类似实验或收集量化数据的标准研究方法并不能够真正回答在规划和实施项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评估问题或调查问题。情况往往是，根本没有需要被量化的资料，也没有什么需要用数字来估量其有效性的项目！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清晰地甄别出想说明的研究问题，它们还有待发掘。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志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重要方法，它可以探知在项目中正在发生着什么，也可以帮助实践者计划他们的行动。

这套丛书界定了民族志研究是什么，应当在何时采用，以及我们如何用它来证明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那些单凭传统的定量或实验研究方法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丛书是为了服务于教育工作者，专业服务机构，在教学、社会和卫生服务、通讯、工程与商业等领域从事应用研究工作的专家，以及在应用型田野场景下工作的学生。

民族志是一种奇特的人文努力。许多民族志实践者曾解释

说，民族志不同于其他研究路径的地方在于，研究者本身是收集一手资料的首要工具。也就是说，正如本丛书中的第一到四册所证实的那样，民族志者的主要资料库是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直接观察、面对面访谈和启发、视听记录、绘制人际互动发生的时空地图和网络系统——聚积起来的。因此，就像第六册书中所表明的，研究者既是科学家，同时也是人，他的个人性格和活动在研究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这点不适用于那种调查者可以和被研究人群、现象保持较远距离的研究。

“民族志者工具箱”丛书的第一册书《设计和进行民族志研究》（*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界定了民族志研究是什么，并详细说明了引领民族志方向的主流观点或范式。它为读者提供了关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的总看法，包括如何提出研究问题，设置研究方案的结构时要考虑什么，以及如何设计一个抽样计划。这本书以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还有民族志者必须解释的道德考虑作为结尾。它是这套丛书的总介绍。

第三册书《增强型民族志方法》（*Enhanced Ethnographic Methods*）为基本的民族志工具目录增添了三种不同，但都很重要的资料收集方法，每一种都是对本书中所说的基本方法的补充。这三种工具是视听技术、焦点团体访谈和启发技术。我们把这些资料收集策略称为“增强型民族志方法”，因为它们中的每一种都类似于并增强了本书中首次表述的某种策略。

视听技术涉及使用电子设备记录行为和言谈，它创建了对事件和言谈更加全面持久的记录，扩展了民族志者观察和倾听的能力。焦点团体访谈让民族志者一次可以访谈不止一个人。启发技术则让民族志者能够把个人或群体如何思考并组织对其文化世界的理解这样的质性资料或感知经验量化。

本书中所描述的基本的民族志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但是，单凭第三册书中所说的增强型民族志方法本身，则无法提供一个社区、组织、工作团队、学校或其他场景下文化生活的完整画面。读者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它们必须和本书所概

述的基本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这样做会使民族志者描绘的文化图像更加深刻，也更加准确。

在第四册书《绘制社会网络图、空间资料图和隐蔽人群地图》(*Mapping Social Networks, Spatial Data, and Hidden Populations*)里，我们补充了民族志者所使用的加强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不过，第四册书看待社群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时所采用的视角颇为不同。前几册书主要关注的是理解文化模式的路径，还有文化背景下个体之间和集体之间的互动，而第四册书关注的却是社会网络、互动模式以及我们称之为“社会地理空间”的使用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信仰。第四册书的最后一章探讨了“隐蔽人群”概念，描述了找到、接近“隐蔽人群”，并从他们那里收集资料的方法。这些个人之所以不被看见，是因为没有什么外显的东西把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或者因为他们有不想被人知道的行为。

第五册书《分析和解释民族志资料》(*Analyzing and Interpreting Ethnographic Data*)为读者提供了各种方法，以便将大量的田野笔记、观察、录像、录音磁带、问卷、统计调查、文档、地图等各种资料转化成研究结论，这些研究结论将帮助人们更加全面地理解他们的世界，并推动问题的解决。不管是叙事的质性资料，还是定量的——或者计数的——资料，所有在民族志研究中收集的资料都需要组织、修补、翻译可以翻译的部分和解释，第五册书讨论了这些方法。

在第六册书《研究者角色与研究伙伴关系》(*Researcher Roles and Research Partnerships*)里，我们讨论做民族志研究对其实践者提出的特殊要求。在整套“工具箱”丛书里，我们始终认为，民族志训练是一项系统的、科学的事业，旨在帮助人们识别和解决人性问题的应用民族志也同样是一项系统的、科学的事业，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在第1章“民族志者的角色”部分，首先说明民族志者的工作如何不可避免地要和民族志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捆在一起，和研究地点的特

殊社会文化情境捆在一起，也和民族志者在田野里承担的任务与责任捆在一起。

在第2章“建立研究伙伴关系”部分，我们承认民族志极少由研究者独自完成。我们讨论了民族志者如何组成研究团队，如何与田野中的个人和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如何与大范围的人和组织合作来解决彼此认同的问题。这一章的结尾是道德和程序上的考虑，包括发展出社会的和管理的基础结构，订立和打破契约，协商不同的组织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化解冲突。

第七册书《使用民族志资料：干预、公共规划与公共政策》（*Using Ethnographic Data: Interventions, Public Programming, and Public Policy*）由三章组成，提出总体指导方针，并以个案研究为例说明民族志者如何把民族志资料运用于拟订公共规划、进行评估干预，以及影响公共政策。

在这整套丛书里，作者们所给出的实例既来自他们自己的工作，也来自他们的同事的工作。民族志者在田野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进退两难的困境（形成系列描述），这些实例和个案研究说明了他们在工作期间以及在工作之余应付这些问题和困境的办法。

在这本题为《民族志方法要义》的书里，我们专注于开展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本书分成11章。第1章探讨由理论推动研究的重要性，探讨混合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多方检验法，探讨民族志研究的地方性质，也探讨应用民族志的目标，即产生解决社会议题和社会问题的新方法。

塑型理论是开展民族志研究的概念向导和模型，第2章给出了建立塑型理论的有效途径。在这一章里，我们解释了我们所说的理论（某项研究的概念指导方针）是什么意思，向读者表明它们如何能够沿抽象阶梯上下移动，这个抽象阶梯从在田野中被观察到的“事实”一直到第一册书里勾画的范式或理论框架。

我们在第3章思考“操作化”概念，或者说是田野中的现象要怎么样与设计研究所用的概念相匹配。我们谈到如何从塑型理

论模型中的某个概念或想法前进到田野里的观察。反之，也说明了我们如何从田野里的观察前进到某个研究模型中的变量、因素和域。操作化是民族志研究中的关键性步骤。没有这一步，许多研究者就会发现，当自己待在田野地点的指定时间结束时，虽然数以箱计的田野笔记令人不堪重负，但它们却很难被放到一块儿去。随着我们从非结构化资料收集方法前进到半结构化资料收集方法，再到结构化资料收集方法，操作化这一主题在整本书中将被反复提及，我们也会在第五册书中那些讨论项、单元和模式的识别的章节再次谈到它。

接下来的三章说的是进入研究地点并开展有计划研究的第一步，或者称探索性步骤。民族志者必须进入研究场景；辨认能帮助他们的人士；做写实性的观察；倾听谈话；开展开放式深度访谈。从事上述活动的方法是这三章的重点。在民族志的最初阶段或探索阶段收集到的资料会

- 改变塑型理论模型中的概念和关系。
- 为本阶段和随后几个资料收集阶段中关键概念的操作化开辟道路。
- 启动描述被研究总体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动力学的进程。

第4章描述了进入田野的过程，从请求批准到进入一个地区、社群、学校或医院，再到找出能够使民族志者认识田野的关键报导人。第5章分析了田野里的开放式观察或非结构化观察（包括参与观察）的含义与实践。这类非结构化资料收集标志着民族志研究的开始。我们在第5章讨论了可以比较不引人注意地进行观察的社会结果——事件、仪式和结构。我们还讨论了要寻找什么，以及如何准确地记录观察。

在第6章，我们关注的是在少数个人或群体中开展探索性或非结构化的开放式深度访谈。在田野作业的初始阶段，这些访谈一般伴有非结构化观察。我们将描述它们是什么样的，勾勒开展访谈所需的准备和技能，讨论访谈一般都和谁进行，并给出开放式访谈进度表的实例和运用了启发技术的访谈摘录。最后，我们

回顾一些已经被发现的、可以对访谈进行编码并使之便于分析的好办法。

关于半结构化资料收集的第7章使研究者进入下一个决定性的资料收集阶段。此时，在接触过大量的受访者之后，除了需要进一步详细阐述的因素以外，研究者还识别出了研究中的各个主要域。但对于到目前为止所观察到的全部事物的意义，研究者或许仍有许多疑问尚未得到解答。在这决定性的阶段，民族志者可以集中调查几个明确的领域，通过与更具有代表性的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来确认人们对问题的回答存在多大差异。半结构化访谈把非结构化访谈进度表的发现能力与量化统计调查的焦点结合在一起。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半结构化观察。我们首先界定了半结构化观察式资料收集技术的含义，然后厘清选择这些技术的主要理由，并用个案实例加以说明。

在第4章到第7章中，我们描述的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质性方法既产生了对研究地点的社会场景和社会动力学的全面描述，也产生了一系列假设，试图解释并区分被研究总体中多种亚群体的态度与行为特点。研究进程的下一步是针对被研究总体的代表性样本，检验这些有民族志情报依据的假设，检验采用的是某种统计调查工具或观察方案，它们从结构化封闭式提问和/或观察的编码系统获取定量资料。第8章讨论用于总体样本的结构化定量资料收集方法的发展，这些总体样本是从质性资料当中显现出来的，并且也建立在质性资料的基础之上，收集质性资料用的是本书前几部分描述的方法。我们把更加结构化的方法运用在取自被研究总体的样本上。

为了设计一项民族志统计调查，我们从质性资料中那些被确定的项、主题或议题中创建出封闭式的量化的选项。变量分解成项，项构成了可用于定量分析的封闭式答案。这些回答依次与研究的塑型民族志理论中的次因素、因素和域相关。

和深度访谈及开放式访谈不同，民族志统计调查是为了从地方社群的个人或状况的大量代表性样本中获取极为明确的信息。

我们首先解释了结构化资料收集方法意味着什么，并为读者介绍了系统抽样和随机抽样的不同路径。随后，我们引导读者经历生成民族志统计调查工具的各个步骤。第8章也包含了有关结构化观察方法的简要片段。

第9章讨论的是二手资料和档案资料的收集与使用，包括本地和非本地的档案及二手资源。《民族志方法要义》最后两章考察的是做好民族志的两个关键性问题：抽样方法和抽样偏差问题，还有效度和信度问题。从头到尾，我们所选用的实例都出自我们自己在美国的社群和组织中的研究，有的实例也选自其他研究者的工作。

比较不熟悉民族志研究的读者可以先阅读本丛书的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六册——它们介绍了基本的民族志原则、方法和技术，接着再阅读揭示更加专业的研究与运用领域的其他册书。那些熟悉基础的民族志方法的读者则会发现，第三、第四和第七册书的价值在于能够完善他们的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技术，以及在政策与规划背景下运用民族志资料的途径。

琼·J. 申苏尔 玛格丽特·勒孔特

目 录

第1章 指导原则	1
民族志研究由理论引导并产生理论	1
民族志研究既是定性的，也是定量的	3
民族志研究是在地方上开展的	5
民族志研究是实用的	6
第2章 建立塑型理论模型	7
理论简介	7
作为理论家的民族志者	8
选择一个范式	12
建立塑型理论或局部理论	13
生成塑型研究模型	17
建构模型的步骤	19
因变域	23
自变域	24
小 结	34
第3章 操作化	36
运用研究模型阐明研究目的、目标和假设	43
衔接研究设计阶段和资料收集阶段	47
小 结	49
第4章 进入田野	50

田野作业与田野	50
民族志者作为自我反思的调查工具	52
为便于进入而建立关系	55
 第5章 探索性或开放式观察	 64
参 与	65
观 察	67
民族志者观察什么	67
记录观察：田野笔记的语言	79
小 结	83
 第6章 深度开放式访谈	 85
何时访谈何人	86
准备访谈	88
开始非结构化访谈	93
结构化开放式访谈	94
访谈中的自我管理	98
记录访谈	101
小 结	102
 第7章 半结构化访谈	 104
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的理由	104
构建半结构化访谈进度表	107
分析半结构化访谈资料	110
半结构化观察	114
小 结	115
 第8章 结构化民族志资料收集：民族志统计调查	 117
结构化资料收集的功能	117
界定民族志统计调查	118
建构民族志统计调查的步骤	120
民族志访谈的实施	136

分析定量资料	138
综合定性资料与定量资料	139
小 结	140
第9章 使用档案和二手资料	142
档案与二手资料：定义和来源	142
本地档案资料	143
使用本地档案资料	147
二手资料的本地来源	150
二手资料的非本地来源	151
使用大规模的二手资料集检验假设并进行跨文化比较	153
二手/档案质性资料	157
小 结	159
第10章 民族志抽样	161
民族志研究中的选择方法	163
民族志研究中的抽样方法	172
小 结	184
第11章 民族志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185
效度与信度的类型	187
效 度	188
信 度	195
总 结	197
结束语	198
参考文献	200



第1章 指导原则

民族志研究由理论
引导并产生理论

•
民族志研究既是质
性的，也是量化的

•
民族志研究是在地
方上开展的

•
民族志研究是实
用的

民族志是一种为了寻找和探究社区、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文化模式与意义的科学方法。作为科学，民族志和其他社会行为科学调查方法的首要区别在于，民族志者是在发现了人们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之后，才赋予人们的行为和信仰以意义。这样，当地人的观点就形成了建立局部理论的基础，这些局部理论可以检验，可以与科学文献相衔接，也可以经改造后用于其他地方。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民族志要依靠研究者作为资料收集的首要工具，因此民族志者要特别警惕偏见的问题，要关注确保资料准确性的方法。

关于民族志是什么，如何着手开展民族志研究，方法论学者们持不同观点。我们对民族志的把握以四项指导原则为基础：

- 民族志研究由理论引导并产生理论。
- 民族志研究既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
- 民族志研究是在地方上开展的。
- 民族志研究是实用的。

民族志研究由理论引导并产生理论

与这套丛书中的其他书一致，我们认为民族志理论是循环

定义：

塑型理论既包括研究的核心议题或问题，也包括到底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中的哪些因素造成了核心问题、预示着核心问题的产生，或者与核心问题相关等想法。

定义：

研究模型是指用图表的方式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

递进地被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起初，它只是一组互相关联的理念，这些理念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定义、审视、推敲，直到最后盖棺定论，得以阐释。研究者从一个初具雏形的塑型理论（formative theory）和研究模型（research model）开始着手（参见：Pelto & Pelto, 1978; Trotter & Schensul, 1998）。塑型理论可能产生自：

- 有关被研究社团和研究主题的已知信息。
- 有关研究主题的文献。
- 研究者的经验。
- 大众和媒体。
- 某个地方社区的经验。

提出理论是研究进程的第一步。塑型理论好比一张引导研究的地图，为生成初步假设，以便与实际观察进行比较提供了可能。在整个研究期间都要持续进行修正理论的工作。对研究结果或研究发现进行了阐释，并且对最初的理论进行了再探讨，研究就结束了，但它又会成为下一项研究的起点（参见：Schensul, 1985）。

研究者最初的理论模型或概念模型可以帮助他们在研究中早早地将观察和访谈组织成单元、模式和结构，从而使看上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社会事实变得有意义。所以说，一个有理论依据的聚焦点可以帮助民族志者集中他们的观察和访谈，并帮助他们把信息组织进一个逻辑连贯的框架中。

民族志研究往往始于某个问题，比如“家长参与艺术课题项目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谁在使用针具交换项目？”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研究者总是能充分认识到着手解决初始问题的步骤，创建出至少一个初步的塑型理论。研究者应当尽量地提出一种塑型理论，这个塑型理论要尽可能精确，并且要建立在全面看待可用信息的基础上。不过，民族志不是要检验塑型理论以判断其正误，相反，民族志是为了

- 扩展和充实模型。
- 探究域或变量之间的质性关联和数量关联。
- 使来自塑型理论的预期结果与资料收集过程中获得的观察结果相匹配。

格拉泽和施特劳斯 (Glaser & Strauss, 1967) 提出, 建立理论就是对田野中出现的概念不断进行比较的过程。我们对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表述做点补充: 收集到的资料要不断地和初始模型或塑型模型进行比较, 比较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对塑型民族志理论的修正。

民族志研究既是定性的, 也是定量的

民族志学者还对民族志是否包括定量研究争论不休 (参见: Bernard, 1995; Clifford, 1988; Peltó & Peltó, 1978)。许多定性研究者认为, 不可能将信仰或行为转换成数字, 而另一些人则坚信, 只有经得起所谓客观统计分析的数字化资料在科学上才是有效的和可靠的。在本书中, 我们对民族志的总体看法和对最基本的民族志方法的研究摒弃了这两种立场。我们主张收集并综合两种形式的资料, 定性资料 (文字描述) 和定量资料 (数字的) 都是民族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有能力利用复杂的语言文法结构和意义来进行口头创作, 使用文字、句子和符号进行书面交流, 这是人类大脑独一无二的财富。研究者与被研究群体成员之间的全部交流都必须基于被研究群体自身的语言结构和意义。为了进入研究现场, 总是要通过口头上和/或书面上表明研究目的和研究目标来协商, 这是一个质性的过程。

民族志者工作的地方常常是那些语言和文化令人感到新鲜和陌生的社区, 能否有所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群体成员用来描述信仰、规则、行为和动机的语言学习得如何。这个学习过程也是质性的。

为了收集有效可靠的定性资料和定量资料, 民族志者必须谨慎地、以文化上得体的方式来设计问题。要想知道如何设计定量问题, 让它们能够被理解, 并且产生有效的定量资料, 就要求质性研究先行。不管关于知识、态度和行为的问题是要汇聚成文本资料还是数字化资料, 它们都必须使用受访者能够理解的文字、句子和概念, 用短语得体地表达出来。

尽管在说明研究结论时可能会用频率、百分比、相关性和曲线图这样的数字化形式, 但对结论的解释和传达总是需要使用质性的语言把它们翻译回观念、概念和理论。因此, 在理论上或实

践上，数字都不可能与文字截然分开。

民族志研究的重点是在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语境下理解某个地方群体。为了找准地方性经验和文化观察的位置，理解这种更宽广、更宏观的语境是必要的。背景的有些方面（如收入、婴儿死亡率、国民生产总值、出口）可以进行定量调查，但读者们对研究现场的理解主要不是来自数据或统计资料，而是来自详细的文本描述，这些描述要传达的是，同更大规模的社会及其制度相比，被研究群体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地位有何意义。没有语境的描述，数字化资料就没有多少意义。

尽管如此，数字化资料仍是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手段。数字化资料要比单纯的文字更加精确地说明参加会议的人数、药品使用的频率，或者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部印第安人举行“pow-wow”¹集会时三个时间点上的泊车数量。定量的方法要求研究者：

- 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
- 从统计学上检验数字化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 根据可以预测某个因变量范围的一组自变量来理解方差（variance）值。
- 进行各种各样的数值运算。

定义：

文化域是指被某个文化群体界定为属于同一类事项(items)、行为、信仰或事件范畴，它是意义的基本单位，限定了人们如何从概念上组织自己的世界。

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都可以进行交叉检验（多方检验法），以确保数字化资料合法有效地说明了被测量现象。此外，定量资料具有“外部效度”，可以帮助民族志研究者恰当地归纳定性资料。

正如我们在本丛书第一册中所提到的，民族志研究的焦点是文化。要判断是由哪些文化域（cultural domains）构成了一种具体文化，其中哪些又与特定的调查主题或问题相关，这需要创造性地混合使用定性资料与定量资料（Lounsbury, 1964; Spradley, 1979; Weller & Romney, 1988）。例如在一项关于饮食实践的研究中，民族志者可以使用“自由列表”法，这是一种用于引出各个文化域的调查策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请受访者列出所有“有

1 “pow-wow”（也作“powwow”、“pow wow”或“pau wau”）是北美原住民的一种聚会，人们聚集在一起跳舞、唱歌、社交。集会的持续时间从五六个小时到三天不等，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举行的集会甚至可能长达一周。——译注

助于个人保持苗条的食物”，结果应当是一张这类食物的质性清单。如果交叉对比受访者的清单，我们就可以根据食物被提到的次数和平均秩（即提及的先后次序）把它们分出等级。接着我们可以要求受访者根据相似性把被频繁提到的食物分成组（积累分类，pile sorts）。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将生成一张数量上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接着再就人们的饮食模式与食物选择进行访谈和观察，所得到的资料就能帮助民族志者解释这张食物认知地图与被询问个体或群体的体重之间的数量关系。

在这本书里，我们把质性资料的收集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料收集方法来描述它的重要性和用途。我们也表明，定性研究如何对民族志调查工具的形成有所贡献，同时有助于解释定量资料分析得出的结果。

定义：

认知地图是用图说明人们如何把他们对于某个文化域里的事项的思考组织起来。

民族志研究是在地方上开展的

使用“地方”（local）这个词时，我们表示的是从空间上定义的社区、组织、工作场所、学校和其他群体，民族志者在这些地方与研究参与者面对面交流，并收集第一手资料。民族志研究总是包含了民族志者与被研究社区之间的直接接触。民族志者必须倾听社区成员想说的话，在活动中观察他们，并通过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学习。因此，所有的民族志理所当然都是地方性的。民族志有效地建立起局部理论，即解释民族志者所研究的具体地域的事件、信仰和行为的理论。局部理论可以成为理解其他地方性社区的基础，也可以成为理解该社区随时间变迁的基础¹。

民族志者也试图理解地方上所发生的事和地区性、全国性乃至全球性事件、政策及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关联。当各式各样的全球性问题——诸如失业率升高、国际媒体中赤裸裸的色情带来新压力，以及社会动荡——出现在地方社区或邻近地区的时候，民族志独一无二的优势就显示出来，它能够增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并加以解释。民族志者可以利用在某个地方的调查提出局部的文化实质理论（Kaplan, 1964）或中层理论（Merton, 1967；

1 这些局部理论也被称为实质理论或扎根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也见本丛书第五册和本书中的第2和第3章）。

Pelto & Pelto, 1978; Trotter & Schensul, 1998），而人们可以通过在当地其他地点或世界其他地方进行的研究和干预来检验这些理论。

民族志研究是实用的

我们开展民族志研究是因为它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可以理解和改善研究参与者和其他类似情况下人们所面临的境况。最基本的民族志方法及其结果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 描述一个地方总体的某种问题。
- 有助于理解某个具体问题的缘由（从而预防它出现）。
- 协助被研究群体的成员阐明和记录自己的需要。
- 提供信息证明变化的动力来源。
- 有助于明确表达干预计划模型。
- 帮助取得干预功效。
- 修正干预措施，使之更加有效。

民族志可以缩短从知识的生产到知识转变成政策和发展规划所需的时间。这对于试点干预项目的提出、项目的过程评估（实际上民族志就是为项目服务的），以及进一步推广应用于地方的项目都很理想。这些在地方上的有效干预可以成为提出干预模型和政策指引或政策指令的基础，在别的地方或其他时候进行检验，这一过程在本丛书的第七册里会说得更详细。下一章，我们将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阐明理论架构的起点，用于引导具体田野条件下民族志基本资料的收集。



第2章 建立塑型理论模型

理论简介

民族志者试图提出某些信仰和行为的文化模式，也试图找到说明群体内部行为差异和其他差异的原因。过去的民族志者可能采取一种更广阔的视野，而如今的民族志者只是有选择地呈现几个文化域，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域和某些问题有关，而相应群体的人们也同意这些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除了被研究者以外，赞助人、同事或教授也对民族志研究者有所要求，时间和资源上的限制也决定了民族志研究者得从明确的问题和研究设计着手（Johnson, 1998, p.132）。创建一个初始焦点（initial focus）需要选择一个或几个用来组织调查的范式，也需要建立一个塑型理论。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确定一个研究问题（problem）；把它定位在某个研究范式或“宏大理论”（Miles & Huberman, 1994, p. 434）里；清晰简要地提出具体研究问题（questions）；确定一套初步的概念、预感和假设；用这个架构作为民族志研究的出发点。方法论学者托马斯·施韦策（Thomas Schweitzer, 1998）曾说过，研究设计或方法论：

包括对方法的讨论——我们该如何进行？——和对理论建构原则的讨论——调查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希望就自己的主题生产出什么样的知识？理论这一概念意味着什么？（p. 40）

理论简介
•
作为理论家的民族志者
•
选择一个范式
•
建立塑型理论或局部理论
•
生成塑型研究模型
•
建构模型的步骤
•
因变域
•
自变域
•
小结

作为理论家的民族志者

许多民族志者面临的挑战是，要把学科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框架与实地的情况联系起来，然而实际状况在他们递交研究申请时是尚不清楚的。此外，他们还要面对“只有学科中的佼佼者才能生产理论”，其他人只能应用理论的观念。最后，社会科学家是应该知晓本学科当下流行的各种理论，但如果他们不具备改进那些理论或建构新理论的技能的话，就会举步维艰。我们认为，要想使资料收集进程切合于在地方上的研究，高效地加以组织，并且轻松地对资料进行阐释，那么每个研究者都必须能够提出理论，同时形成方法论。

民族志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问题和直觉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初始理论或塑型理论，以引导资料收集和随后的资料分析工作。不过，理论已经被高度神秘化了，所以新手们总是回避理论探讨，还辩称理论既不实用也难以理解。本章的用意就是要使理论去神秘化，帮助读者和社会科学家成为理论家。

有一些对理论的定义直截了当、容易理解，这让理论在研究和干预中的功用一目了然。例如，古德和哈特（Goode and Hatt, 1952）说，“理论指事实之间的关系”（p.8），或者指事实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排序。换言之，理论就是一系列观察、陈述、事件、价值、感知和相互关系的意义。理论是胶水，把事实粘合成对某个给定时空的假设性描述，而这一描述接着又可以用于预言/解释另一个时间和/或空间的事件。由于假设多多少少都无法准确地预言另一个时间和/或空间里的事件，所以任何最初的塑型理论都要求修正和进一步检验。这在民族志研究进程中是很自然的。

实例2.1 将事实转化为理论命题

研究者们观察到，在参与社区研究学会“1998年暑期青年研究学会”的年青人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喜欢并且擅长某种艺术表现形式（观察的事实）。他们还注意到，“当表演、音乐或绘画被结合进课程时，青年们的自主性更高”。上述句子是一个低阶（low-level）理论陈述，指出了“自主性和课程中的表演、音乐或绘画”两者之间的假设关系。这样，我们就已经创建了一个预备理论或塑型理论，假设“如果艺术被引入课程，那么后进生在学校里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句子就是一个中层干预理论。

理论就相当于描述。佩尔托夫妇 (Pelto & Pelto, 1978) 指出, “描述和理论并非两种不同的逻辑过程” (p.7)。相反, “所有的”描述都“是”理论, 因为这涉及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选择, 并把它们重新组织成一系列描述, 尝试预言将来的事实。因此, 一种理论要尽量占有文本或数据资料, 用它们来描述个人或集体在特定时空下的行为, 或借助它们形成模型, 以预示人们将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在其他时间或其他地点检验这一描述或模型。

迈尔斯和休伯曼 (Miles and Huberman, 1994, p.434) 回顾了文献中描述理论的其他方式。理论可以是:

- 一张“地图, 旨在归纳人们就某一个案说出的故事或各种故事” (Rein & Schon, 1977, as cited in Miles & Huberman, 1994)。
- 一个将和实际观察进行比较的预计事件模式 (Yin, 1991)。
- 一个非等级化关系的网络, 通过界定概念之间的联系来表达 (Carley, 1991), 这个观点与创建旨在发现的研究模型密切相关, 第3章“操作化”将会讨论到。
- 一个由“一系列[使]各种关系[具体化]的相互关联的命题”构成的模型, 模型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往往是分等级的” (Reed & Furman, 1992, 转引自 Miles & Huberman, 1994), 这一观点与第3章要描述的建立关联 (association) 模型有关。

理论很重要, 因为它帮助我们判断在观察中要考虑什么, 舍弃什么。我们绝对不可能在田野笔记和记录中一网打尽, 譬如说, 不管对一个社区会议的描述有多么详细, 被忽略的部分总要比被记录的部分多。原因很简单, 对于一个乃至几个观察者来说, 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许多口头上和非口头上的交流、看起来属于怪癖的行为、两个人之间或少数人之间的互动、物体运动或身体动作, 以及情境中的许多其他方面, 在描述中都会被忽略。有时候, 研究者会捕捉到这些信息, 但由于与研究主题相对无关而被删除; 有时候, 它们会被错过 (也就是没有被看到或听到); 还有, 可能是它们被观察到和注意到了, 但没有被记录下来。

即使有可能记录下每件事 (就算是有录音、录像设备, 也绝

对做不到)，也只有那些能够解释和预言将来的社区会议或社区事件的事实才是有用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是对一次社区会议的描述也是理论性的，因为它在描述于某个地方召开的社区会议如何进行时，删除了相对无关的信息。当然，我们必须比照在同一地区举行的多次社区会议来检验这种低阶理论，以充分检验预言性陈述的准确性。

因此，理论可以帮助民族志者决定在资料收集过程中要找什么、问什么、放弃什么。研究进程是从理论开始的，理论帮助民族志者处理对田野场景中复杂的现实世界的观察；研究进程也以理论作为结束，理论促进民族志者借助概念——这些概念经由田野中的反复观察确定并检验过——对最初的塑型理论进行重构和阐释。这一过程乍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但依我们的经验，各行各业的人都能迅速掌握和运用。

实例2.2 美国青少年行为研究暑期训练营的理论建构

1998年，一些年龄在14~18岁的青少年参加了社区研究学会暑期青年研究学会组织的研究训练，他们认为，辍学是由多种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造成的。为了检验这些想法（中阶理论陈述），他们收集了与辍学有关的自尊、怀孕和制度种族主义（他们把这些归为主要的文化域）等资料。在分析资料、讨论资料和原始模型的相关性时，他们认为还漏掉了两个域，分别是：物质环境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能筛选出导致辍学或不辍学的其他因素的一组态度和情感的影响。于是他们修改了原始模型。

一个类似的青年小组在研究与低龄性行为有关的因素时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他们排除一些不相关的域，集中关注自尊和媒体对过早开始性行为的影响。

简而言之，理论是科学的工具。理论

- 限定了需要收集的资料的种类，或者说缩小了需要研究的事实范围。
- 提供了一个概念的提纲，以便把有关现象系统化、分门别类，并相互联系。
- 从事实中概括出普遍化的经验和体系。
- 预言事实。
- 指出我们在认识上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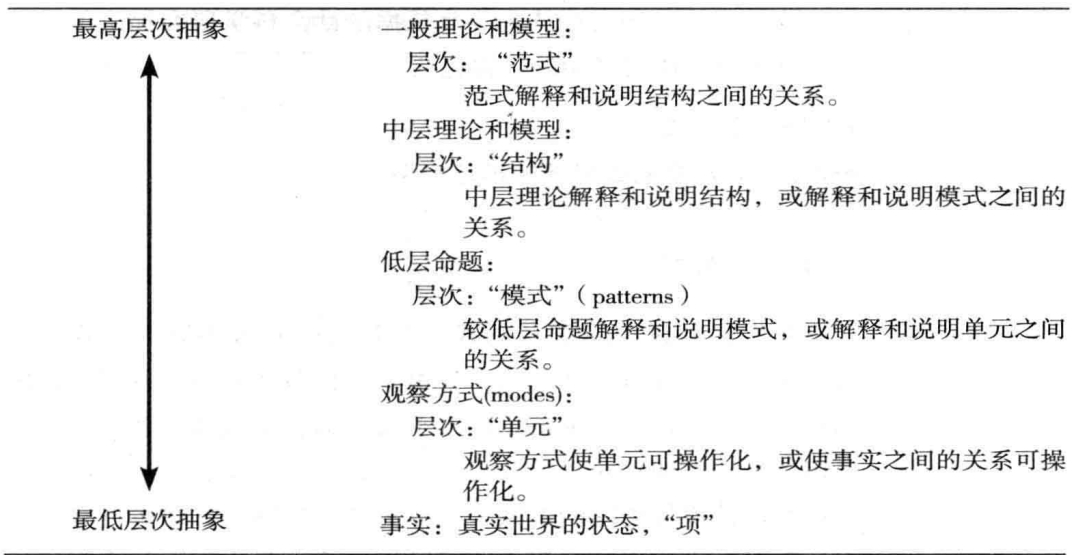


图2.1 抽象层次的连续统

众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用图式说明了不同层次的抽象，连续统的一端是研究范式（宏大的世界图景），另一端是经由研究者的视角、研究主题和初始理论模型（或蓝图）筛选过的地方性“事实”（Harris, 1968; Kaplan, 1964; Kuhn, 1962/1970; LeCompte & Preissle, 1993）。图2.1提供了思考这一连续统的方法。除了佩尔托夫妇（1978）提出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框架之外，该图还结合了本丛书第一册的第3章和第7章，以及第五册中讨论过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框架。

在上图中，佩尔托夫妇（Pelto & Pelto, 1978, pp.9-13）把“观察方式”定义为操作化的概念；把“命题”定义为对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陈述；把“理论”定义为相互关联的命题系统。勒孔特和申苏尔把观察方式定义为使单元可操作化，成为观察到的事实或项之间的关联的组织模式；把较初级命题定义为对“模式”或单元之间的关系的解释说明；把中层理论和模型定义为对结构的解释和说明，结构以模式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把一般理论定义为对结构之间的关联的解释和说明，结构又与范式相联结。作为民族志者，当我们在田野中收集资料并生成初步假设时，我们可以沿着抽象阶梯上下移动：从事实到单元、模式和结构，或者相反。

这张图为开展有民族志信息依据的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方针，说明开始的步骤包括：

- 选择一个范式。
- 建立一个塑型的或局部的理论模型。

选择一个范式

我们建议民族志者从选择一个初始范式着手研究，我们在第一册书里提到过一些范式，还有些其他范式我们没有提及，例如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 1979）或行为主义这类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对于民族志者而言，重要的是思考自己的研究与这些理论框架之间的关系，还有为什么某种范式对自己有吸引力。思考自己选择某个研究范式的理由将揭示出重要的个人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能指导资料收集，也会使资料收集存有偏见。

研究范式的选择只是一连串选择的开始，民族志者要对引导研究的各种初始模型做出选择。研究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族裔身份、性别、家庭结构和家庭动力、是否残疾、居住区域、宗教信仰状况，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会对选择什么样的研究问题、范式、研究模型、偏爱的资料收集方法有影响。我们在论研究者角色的第一册书和第六册第1章中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个话题。我们还将讨论自我反思如何会对范式和研究模型的选择大有裨益。我们认为，自我反思有助于研究者：

- 使影响研究设计的根本假设、理念和观点变得清楚明白（对他们自己和被研究人群来说）。
- 告诉研究的使用者和赞助人该研究所在的知识传统。
- 形成有助于组织资料收集的研究蓝图、研究指南和研究模型。

一旦民族志者选好初始范式，并且明确了这样做的理由，他们应当再选择一个或几个主导概念。主导概念是所选范式和局部理论或中层理论之间的桥梁。表2.1是研究者选择的范式和主导概念。



表2.1 范式和主导概念

范 式	主导概念
批判理论	污名
现象学	失败的认同
生态学	文化冲突
网络	行为风险

研究者挑选的主导概念应该和自己青睐的范式相一致。研究的下一步是创建一个塑型的或局部的理论模型。

建立塑型理论或局部理论

要将最初的一些想法表述为中层理论或实质理论和一个塑型理论模型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 使研究目标的性质更加清晰。
- 提出可以用来和经验性结果进行比较并且系统地加以修正的成套理念。

“塑型理论”（formative theory）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用它指“中层理论”？塑型理论或中层理论开始于某个地方群体（一个地方，许多次）提出的问题或质疑（Pelto & Pelto, 1978, pp.2-7; Trotter & Schensul, 1998, pp. 696-698）。我们可以称这个起点为“研究课题（research topic）”或“研究问题（research problem）”。我们主张明确起点时要有被研究群体的参与。

实例2.3 寻找研究课题

斯蒂芬·申苏尔在康涅狄格大学医学院社区医疗系的时候，他和哈特福德市一些参与卫生行动的市民组织建立起合作关系，他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应用民族志研究。其中一个市民组织是附近一个公共住房项目的承租人权利组织。他们认为普遍性的卫生问题是老鼠，他们担心老鼠会引发婴儿疾病、建筑物毁损和食品短缺。对老鼠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引发了对问题范围（如毁损的不同区域、毁损的程度大小、老鼠的数量）和对老鼠行为（鼠洞、鼠屎、鼠道和鼠窝）的疑问。于是居民们继续记录上述问题即“问题的范围”和“老鼠的行为”的各个方面或程度。这种局部低阶理论的形成使得承租人开始探究住房项目中引发大范围卫生问题的多种因素，包括医疗卫生设施的匮乏和环境污染。根据这些结论，承租人权利组织提出了一些中层理论，它

们促成了几个大型研究项目的设立，并且促成了在住房项目中成立一个社区卫生中心的决定，该社区卫生中心由联邦资助。

有许多资源可以用来提出局部理论或中层理论：

- 研究者的生活经历、兴趣、态度和价值观。
- 关于现象的流行的、地方性的或“主位的”设想。
- 对类似群体和问题进行过研究的记录文献。
- 合作机构的干预、服务或政策需要。
- 地方群体成员表达出来的观点、需要和兴趣。

研究课题和相关的中层理论的提出要求事先了解即将进行研究的社区环境或其他类似环境。这种了解可能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来获得；可能通过梳理媒体或大众对这一课题的看法来获得；也可能是在和一些研究伙伴、干预机构或社区成员讨论之后，产生出一些想法，通过反复琢磨这些想法来获得；最后，这种了解还可能来自于研究者过去的个人经验（cf. Stringer, 1996）。民族志研究应当在经历过建模过程的几个基本阶段后才开始，我们将在下面进行介绍。

一旦我们确定了研究课题，就可以朝以下几个方向前进：

- 描述。
- 关联。
- 评估。

描 述

首先，我们希望更好地、更深刻地或者以更加综合和系统的方式来描述一个研究问题（参见：Carley, 1991; Stringer, 1996, p. 93, 见图 5.1）。许多民族志研究专注于对某个具体问题有全面的、质性的理解。举例来说，父母、老师和学生设想“成长”——在9—12岁之间的前青春期——的方式都有所不同，我们希望理解这些不同的方式。他们对有关于成长的定义、价值判断、信仰和社会化实践也有所不同，我们希望理解这些不同与社会性别是不是有关联。描述的方法最适合于研究的起步阶段，此时，民族志者正在提出单个文化域的边界、特征和组成部分这样的基本问题。随着研究的推进，民族志者会想知道，这个域与被

研究群体的其他文化域都有哪些联系。

实例2.4 理解“问题”——辨识毛里求斯女青年中的性行为风险

斯蒂芬·申苏尔、琼·申苏尔和奥迪特在毛里求斯的研究主要关注在出口工业加工区工作的未婚女青年，随着她们发生性行为可能性的增加，她们也暴露于性危险当中。研究者刚开始了解性行为特征时，他们甄别出两种被他们认为有危险，但少女们却没有考虑到其危险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看上去没有危险，是因为她们还能保有童贞。青年女工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是，这些行为既不引起疼痛，也不会导致出血，而疼痛和出血是失去贞操的征兆。她们相信，只要贞操还在，任何亲密行为就都是安全的。因此，尽管研究在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贞操观念，但它关注的是可能感染性病这种危险情况下的性行为，这就要求研究团队要获取更多的关于贞操概念的信息，以理解性行为及其风险（Schensul, Oodit, et al., 1994）。

关 联

其次，除了更深入地了解问题或课题，我们还想证明是什么导致了问题的产生，或者什么与问题有关联（参见：Reed & Furman, 1992）。如果民族志研究涉及教育和其他试验项目或干预项目，且属于一般性研究，那么关联就尤其重要，因为它是理解研究问题的标志，也决定着为解决问题而设计的、最重要的干预/预防目标。例如，如果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是少女怀孕或家长参与早期教育计划的情况，那么他(她)可能会关心导致这两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们与什么有关联。

康涅狄格大学有个医学专业的学生，她的研究就是关联方法的典型。在1998年夏季，她试图了解，青少年采用语言或肢体手段解决家庭冲突的经验，和他们当前与朋友发生冲突时所采取的解决策略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Wilson, 1998）。

找到关联的另一个办法是考虑问题的潜在结果对被研究社区的影响（Stringer, 1996, p.95, 见图5.2）。例如，研究者想调查未成年人怀孕的影响，甚至可能预设未成年人怀孕有积极后果，如高度自尊和良好的在校表现。在社区研究学会组织的暑期青年研究学会，高中学生考察了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年龄（他们称为“低龄性行为”）与未来生活成就之间的关系，他们预言低龄性行为可能导致丧失自尊、辍学，还有过早生育（Schensul, 1998）。

评 估

经常有人要求民族志者开展民族志描述或项目评估。有时候，指导这些项目的中层理论是项目设计者从文献中的中层理论里挑选出来的。多半情况下，它们只是关于“事物如何运作”的不甚明了的局部理论，正是这些理论规定了项目宗旨和目标。项目宗旨和目标构成了研究的标准或底线，要求民族志者参照这一标准或底线来收集和比较他们的资料，但理论支撑却含糊不清。民族志者对项目评估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与项目人员一起工作，以生产出他们自己的项目理论（参见：Guba & Lincoln, 1989）。

实例2.5 通过评估寻找干预理论

在美国东北部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小镇上，干预者对小学四年级的膳食、营养和园艺课程进行评估，根据评估得出的民族志研究结果和数据，他们除了引入配合有课堂互动练习和家庭作业的营养课程之外，还在课堂上和暑期分别开设了庭院园艺课。有四个实验课堂引入了新课程，而另外四个对照课堂接受的是标准的四年级说教式营养膳食课程，然后将实验课堂与对照课堂进行比较。

作为民族志者和成果评估人员，琼·申苏尔收集了各种资料：课程大事记、课堂教学过程、教师指导风格、学生作品，还有用基于知识测验手段得出的事前—事后分数。研究设计希望能证明在事后测验中，实验课堂的孩子们成绩更好些。使用方差分析（ANOVA）对测验分数进行定量分析后证实，实验课堂这一组取得的预期进步明显高于对照课堂。然而，在比较四个实验课堂所取得的成绩时，申苏尔指出，有两个课堂的成绩有提高，而另外两个课堂却没有变化。研究者在对实验课堂进行过程评估时收集到一些民族志资料，对这些资料的分析表明：在那两个取得优异成绩的课堂上，指导老师采用的是互动式、合作式学习方法，开展小组作业，让学习变得更轻松；而另外两个课堂的教师则喜欢训诫式地指导和说教。当申苏尔把这些发现呈现给课程项目负责人后，他们修正了原先的课程“理论”，该理论相信：只要对孩子们的指导是建立在他们认为有趣的内容的基础上，并且采取合作式学习的方法，孩子们就会更有效地学习，并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研究的这一阶段，决定要在研究设计中采用哪些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问题表述为一个塑型理论或中层理论。

生成塑型研究模型

开展研究是为了描述具体现象，描绘它们的差异性，记录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理解它们与其他现象的关联，尝试预言这些现象并通过干预来影响它们。一切研究的起点都是清晰地把握即将研究的现象。在应用研究当中，我们往往察觉到这些现象是某种社会问题，诸如未成年人性行为、辍学、药物滥用、营养不良、吸烟、低农业产出、失业或医疗卫生设施缺乏等。

塑型研究模型是一张图表，表明了与你的研究课题有关的要素或概念之间的基本关系。在前面部分（描述、关联和评估）确定的每一种模型都会产生出一个不同的模型图（见图2.2至图2.5）。在对基本资料收集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能够生成、运用和修正这样一个展示图或模型是关键的第一步。

图2.2是对描述方法的说明：描述“在校成功（school success）”的重要因素。接下来的两张图罗列出看待关联的不同方式。图2.3说明了对在校成功议题或问题的影响因素；图2.4说明了在校成功的议题或问题的多种后果。最后一张图（图2.5）是一个民族志评估模型，它预计到结果（在校成功），但没有完全了解其影响因素。

研究模型的建构和与资料收集有关的后续操作都需要进行一系列逻辑转换。挑战在于要从抽象概念（如幸福、自尊、性风险）推进到资料收集的有效、可靠的操作。

定义：
效度指收集资料的程序可以令人满意地测量抽象概念。信度是指从此时此人到彼时彼人，测量方法都是一致的（可复制或可重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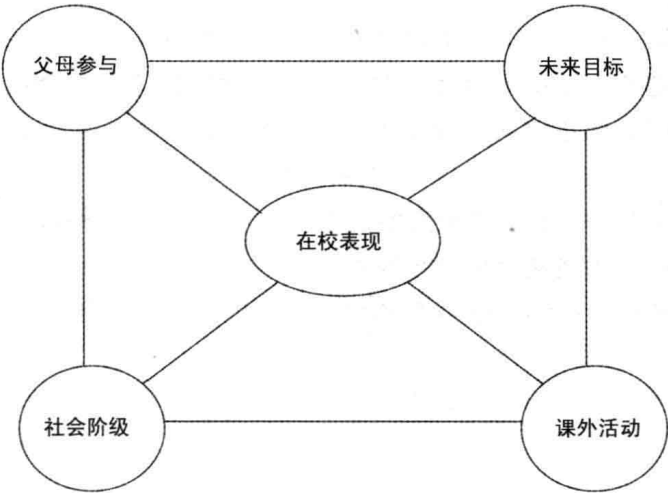


图2.2 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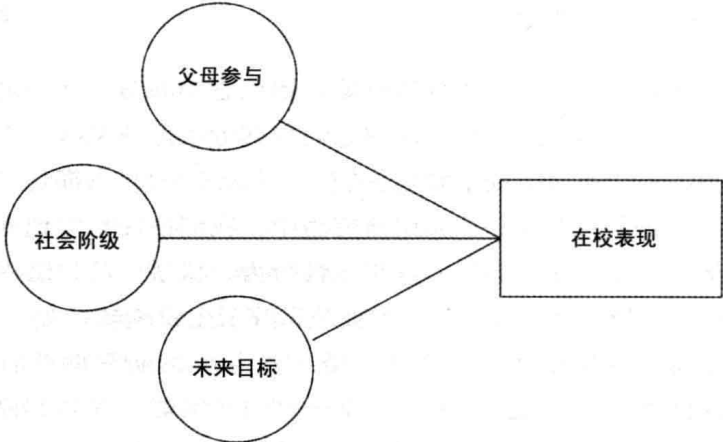


图2.3 关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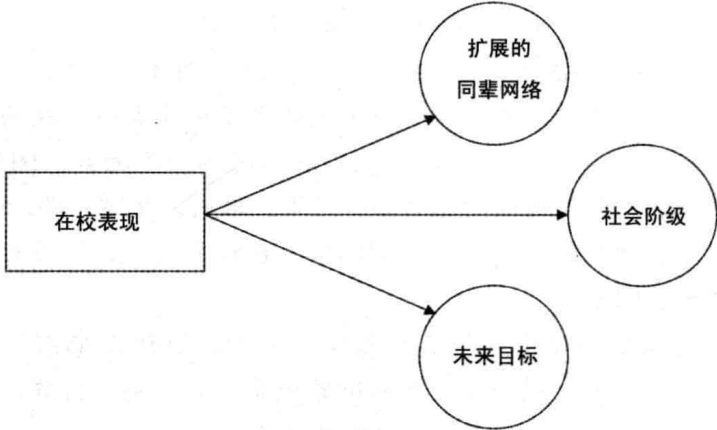


图2.4 关联(2)

在第一册、第五册书以及本书的前面部分（见图2.1），我们使用了范式、结构、模式、单元和事实等转换术语和相关术语来指示不同的抽象层次。在本书中，我们还采用与之相当的四个术语组合——域（domain）、因素（factor）、变量（variable）和项（item）——作为理论发展的基石。这八个术语构成了一张词汇表，可以描述从抽象到可操作层次的变化。表2.2说明了这些术语的交叉点，我们在这本书和第五册书里将反复提到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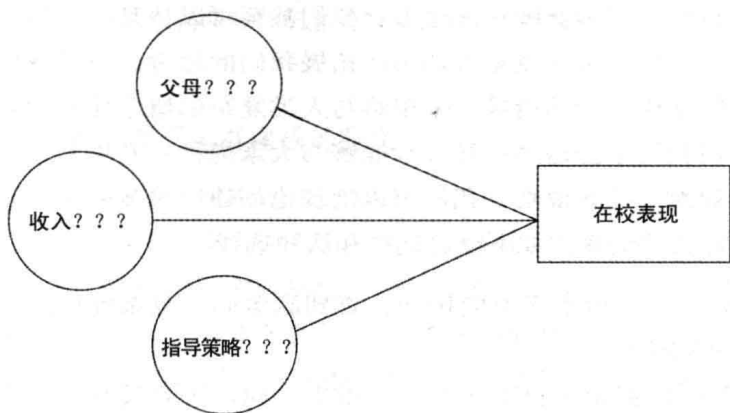


图2.5 评估：寻找理论模型

表2.2 衔接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

	结 构	模 式	单 元	项或事实
域	家庭动力； 与生活成就的关系			
因素		父母管教； 工作表现		
次因素			父母的惩罚方式； 管理雇员的能力	
变量				挨打的频率；对雇员 评价性反馈的频率

这儿的重点是，不管用哪个术语来指介入的层次，研究者都应当理解和看到诸层次之间的连接，还应当在上下层之间做适当的转化（也就是说，无论路标用的是什么语言，重要的是旅程本身）。

建构模型的步骤

模型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单线单向的过程。人类的大脑极其复杂，它可以了解一时一地的现象，生成“扎根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也可以构想人类行为动机的重要规律（参见：斯金纳和“行为主义”，或者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概念基础上的生物学发展），还可以从位于扎根理论和一般理论中间的缺口（中层理论）切入（即认为两个文化域之间可能有关联），同时对它

们进行归纳式和演绎式的思考。我们甚至可以从某一个域、因素或变量出发，水平或垂直地迅速拓展我们的思考。虽然我们在此描述的建构理论的指导方针很难与人类复杂的概念化能力相提并论，但我们希望这些指导方针能够为大家提供一套思路，作为有效的起点。这么说吧，我们可以把理论创建设想成一个复杂的矩阵，它为我们提供如下概念选择和认知选择：

- 从某一现象沿水平方向拓展，直到涵盖同一复杂性层次上的多个相关现象。
- 从较低阶概念（自下而上）沿垂直方向前进到较高阶概念（归纳法）。
- 从较高阶概念（自上而下）沿垂直方向前进到较低阶概念（演绎法）。

实例2.6 为界定文化域在同一概念层次上沿水平方向变动

奥迪特、博万和斯蒂芬·申苏尔开展过一项研究，针对的是因堕胎引起并发症而被收入医院的毛里求斯妇女，因变域是“谋求堕胎服务的类型”（自我引产、“黑诊所”、个体医生）。研究者认为，在同一复杂性层次或抽象层次上，影响所选服务类型的域包括家庭构成和避孕史（Ooit, Bhowan, & Schensul, 1993）。

实例2.7 自下而上垂直建模的实例

斯蒂芬·申苏尔参考过一项由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的蒂拉克·赫蒂阿拉奇（Tilak Hettiarachchy）教授在1996—1998年间开展的研究，研究针对的是在科伦坡市自由贸易区工厂里工作的女青年当中的性风险，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女性怎样暴露于危险之中。那些工厂用高高的围墙和带刺的铁丝网与外界隔离开，女工们生活在集体宿舍里，每个房间最多有10个人。大量的年轻女性，估计将近有60 000人，主要来自农村地区。她们成群结队地从工作场所回到宿舍，以避免那些暗藏在宿舍和工地这两个安全地带之间的危险人物。这些危险人物包括成群的小伙子和老头子，他们企图攫取姑娘们赚来的钱，还有那些开首饰店和服装店的，他们也想从姑娘们手中拿走一部分收入。

研究小组观察到，姑娘们飞快地穿过“危险地带”，路线迂回曲折，因为她们拒绝成群的男人、商店、饭馆和其他摊贩的成功程度不同，于是研究者提出了“暴露（exposure）”域。这个域被划分成三个因素：“关系”、“活动”和“在工厂和住处以外停留的时间”（即在无保护地带）。因素“关系”里被辨识出的变量是“有男朋友”和“有参与危险行为的朋友”；因素“活动”里的变量是“参加音乐晚会”；因素“安全地带之外停留时间”里

的变量是“往返工作场所和住所之间的总耗时”。事实证明，“暴露”域可以有效地预测性风险。

实例2.8 自上而下垂直建模的实例

由于全球艾滋病（HIV/AIDS）的肆虐，自1991年以来，性风险（sexual risk）观念就成了本书作者——斯蒂芬·申苏尔和琼·申苏尔开展研究工作的动力。随着我们在毛里求斯青年人当中对这个领域的钻研愈加深，我们认识到，性风险远远不止是艾滋病或其他性传染病（STDs）。事实上，在毛里求斯青年优先考虑的清单里，这些传染病是排在最后的。毛里求斯女青年在坏结果清单上添加了未婚先孕、失去男朋友、失去贞操、名声扫地、感情和心理问题、生理疼痛、结婚可能性变小、对男人反感、堕胎、其他性传染病以及家人的疏远，等等。在这项研究里，我们从因素“艾滋病的危险”开始，向上前进到“性风险”域，同时也向下回到刚才列出的其他风险。最后，这张清单被重新划分成“医疗风险”、“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等次因素，前面所列出的每一个具体的风险范畴都被归入这些次因素(Schensul, Oodit, et al.,1994)。

现在，我们要描述自上而下建构模型的过程，主要集中在域层次上研究模型的建构。模型由三类域构成：因变域、自变域、调节域或修正域。要注意，每个域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组成，而每个因素又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Variables）组成。“因变域”（dependent domain）是指随其他域的变化而变化的域。另一种说法则是指，因变域的变化是由自变域的变化“引起的”，或者受到自变域变化的影响。例如，人们相信辅导计划（自变域）会改善在校表现(因变域)；但反过来却未必正确。

根据假定的因果关系，“自变域”（independent domain）要先于因变域变化；自变域的变化独立于因变域，或不受其变化影响。例如，人们认为接触电视和电影等媒体（自变域）对未成年人的饮酒行为（因变域）有负面影响，因为媒体描绘了与喝酒相关的正面形象。然而，接触媒体的行为不太可能因为未成年人饮酒行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相反，其他因素，如父母控制电视的使用或观看电影的机会（或者录像和电影成本的提高），倒可能会改变未成年人与媒体的接触。

定义：
变量是属性或项的逻辑分组，项或属性描述的是某个人、地方、事件、态度、信仰或行为的特征或性质。

定义：
因变域是随其他域的变化而变化的域。

定义：
自变域在逻辑上先于因变域，它不随因变域的变化而变化。

调节域（mediating domains）修正、来自或影响自变域与因变域之间的一般关系或直接关系。例如，妇女怀孕前的健康状况（自变域）会影响到婴儿在出生头一年里的健康（因变域）。我们可以限定怀孕前健康状况由几个变量构成，包括体重或身高、年龄和血压。周岁以内婴儿的健康则可以限定为这样一些变量：出生体重、疾病和体重增长。我们（凭借经验和先前研究得到的充分证据）假设——或理论化：妈妈怀孕前越健康，孩子在生命中的第一年也将越健康，如图2.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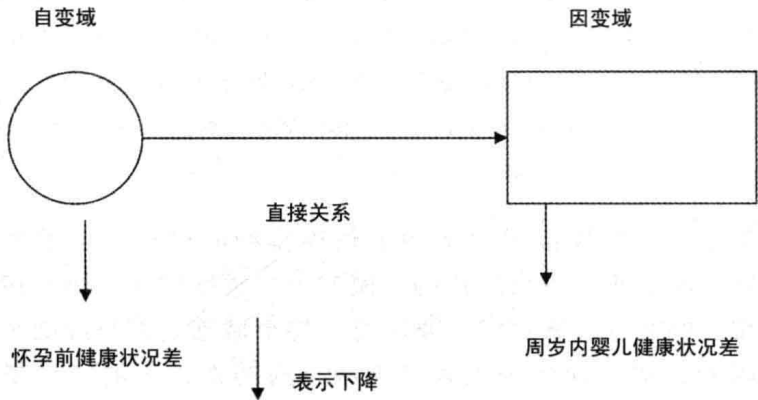


图2.6 自变域与因变域之间的直接关系：怀孕前健康状况与婴儿健康

不过，至少有一些孕妇能够享受到产前保健，产前保健也可能改善这些孕妇及胎儿的健康。事实上，我们可以假设，不管怀孕前健康状况如何，适当的产前保健将使婴儿更健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产前保健是一个调节/修正域，它影响或改变了妈妈怀孕前健康状况和周岁内婴儿健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可以画成像图2.7那样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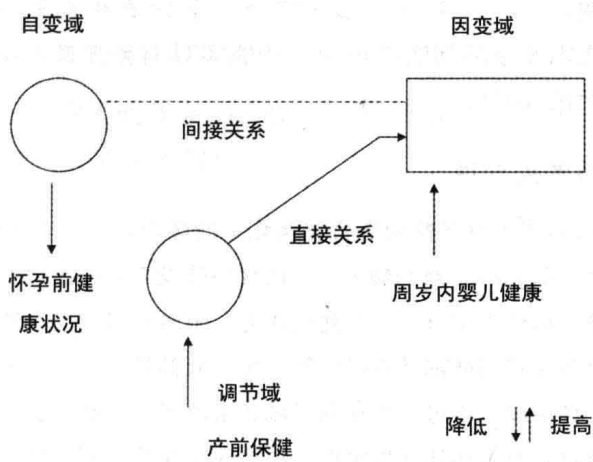


图2.7 产前保健：影响婴儿健康状况的干预域

图2.6说明了自变域和因变域之间的预设关系：随着母亲怀孕前健康状况的改善，婴儿的健康也得到改善。这种关系被描述为直接关系。增加调节域“产前保健”之后，三者的关系如图2.7所示。

在图2.7中，添加的产前保健域影响或改变了自变域和因变域之间的直接关系，减少或消除了母亲怀孕前健康状况对孩子健康的影响。这张图说明，产前保健对婴儿健康来说是一种直接关系。现在，这个假设说明：母亲的产前保健做得越好，婴儿就会越健康。

因变域

在域这一层次建构研究模型要从描述因变域开始。例如，假设我们对美国都市社区里未成年人当中的性风险感兴趣。性风险域可能包括很多种行为，但此时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反映社会焦虑，限定被研究现象，并且涵盖多种行为表现的定义域。因此，我们把性风险域界定为“两个人之间可能传播性疾病和/或导致怀孕的一切亲密接触”。尽管这一定义把接吻算作是性风险的基本要素，但导致流感病毒传播的亲吻被特别排除在外，因为流感病毒传播虽然也是亲密接触的结果，但它不是一种性传染病。知道因变域里包括什么或不包括什么，对测量和理论提出来说都是至

关重要的。

构成因变域的问题或现象应当能实具有差异性（variability），请看下面的实例。

实例2.9 识别因变域的差异性

秘鲁利马城的西北部扇形区有一些处在自然演化中的棚户区，研究者斯蒂芬·申苏尔、琼·申苏尔和塞加拉（Zegarra）对与棚户区里的住房建设有关的因素感兴趣。然而，在人们刚刚侵入公地并擅自居住下来时，住房建设作为一个因变域，找不到可以作为其中的变量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家户同样都是临时建筑。每一家都是用四张草席围成墙，一张草席盖屋顶，几根竹子支撑房屋。不过，就在利马城和市政当局批准了居民用地资格，个别家户拥有地产之后，家庭就有了居住的稳定性，住宅建设蓬勃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住房建设出现了极大的差异性(即诸家户之间有许多不同)，这种差异性可以通过是否拥有电器、自来水、厕所、玻璃窗户、耐用的（混砖）墙壁和屋顶来衡量（Schensul,Schensul & Zegarra,1985）。

因变域的选择决定着研究的调查主题，它应当合乎研究者的兴趣，合乎被研究人群的关切，也合乎研究资助者或潜在资助者的需要。图2.8是制作研究模型示意图的第一步，因变域位于示意图的右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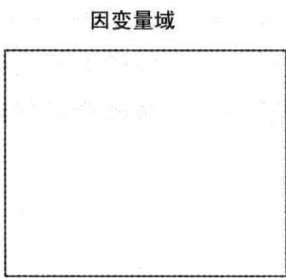


图2.8 说明塑型研究模型中因变域位置的图表

定义：

假设陈述的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变量的值是已知的，另一个变量值是预测的。

自变域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识别与因变域相关联的，或者预示因变域的变化的自变域。识别自变域的第一步是建构一系列假设（hypotheses）。在一项有关人类生殖健康的研究中，其中一个假设可能是这样的：



妇女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长短（自变量域）与她将生多少个孩子有关系（因变量域）。

这一假设没有表明关系的方向，它只是具体指出两个域之间有关联。图2.9说明了这个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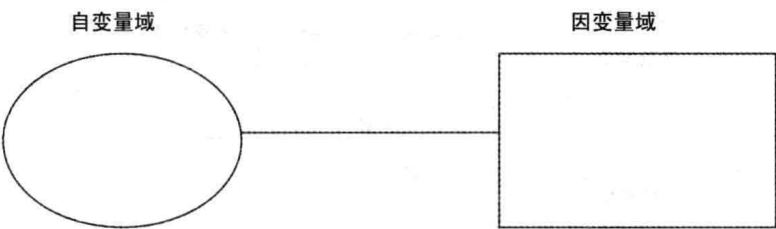


图2.9 自变量域和因变量域之间的关联

上述假设也可以用说明了关系方向的另一种形式来表达，如下：

社区中妇女的受教育程度（用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长短来衡量）（自变域）越高，她们生的孩子会越少（因变域）。

图2.10说明了自变域和因变域之间的这种反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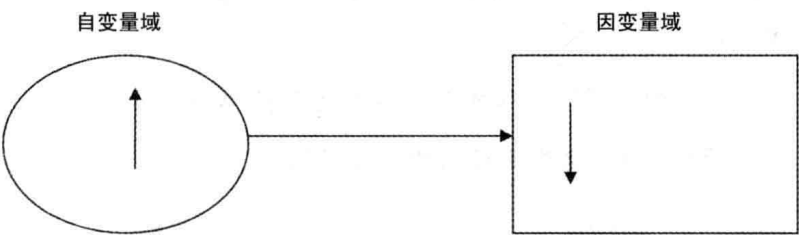


图2.10 自变量域和因变量域之间的反向关系

在这个案例中，一个妇女在整个生殖期将生多少孩子和她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反向关系预设了：受教育程度越低，孩子就越多；受教育程度越高，孩子就越少。

尽管如此，我们知道，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由多种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单个变量的结果。这种复杂性要求增加一个假设，即假定在收入（第二自变量域）和生育水平（因变量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生育水平由孩子的数量决定：

妇女及其家庭的收入越高，她的生育率越低。

如图2.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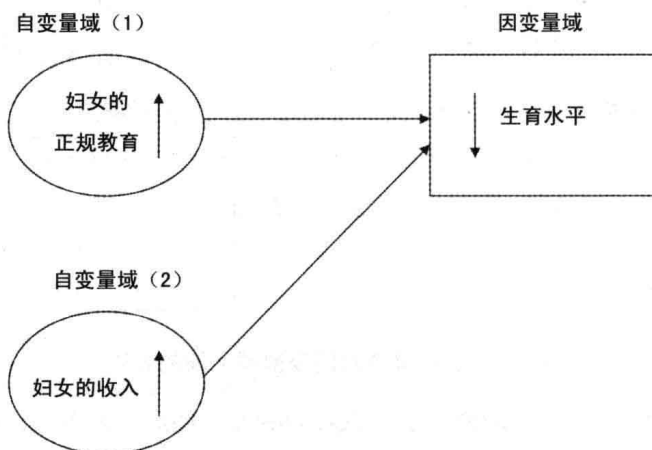


图2.11 引入第二自变量域的另一反向关系

研究者把变量之间的联结概念化为一张相互交织的网，在这个网络中，自变量不仅和因变量有关，还和其他自变量有关。按照这一构想，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假设，说明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直接关系：

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她的收入就越高。

图2.12表示这些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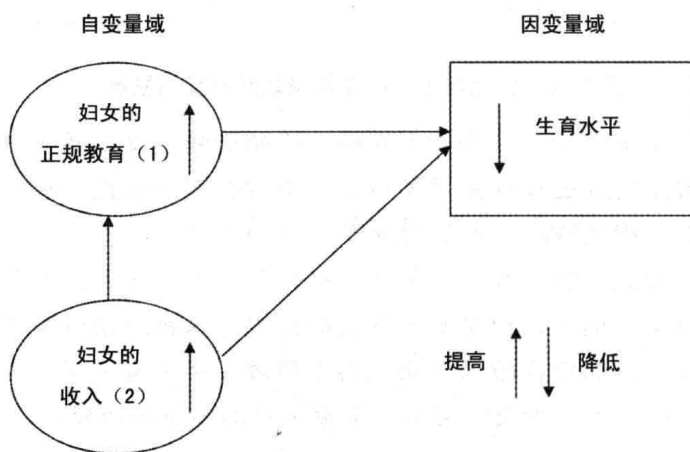


图2.12 多个自变量域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研究模型的雏形。切记，文化域“装着”（或涵盖）许多变量。一开始我们往往不知道变量域之间的关系是正向还是反向，所以，最简单的做法是只假设有关联或有关系，而不预设其方向。一个更加精细复杂的研究设计里会有许多个自变量域，它们之间的关联可能类似图2.13，该图是斯蒂芬·申苏尔和德席尔瓦研究斯里兰卡的艾滋病风险时所用的实际研究模型。

在图2.13所示的模型中，实线表示预设域和域之间有显著关系；虚线表示估计域和域之间是弱关系或没有关系。在斯里兰卡研究的塑型研究模型里有很多假设的关联，罗列如下：

- 1. 同辈关系对未成年人是否发生危险的性行为有显著影响。
- 2. 家庭变量对未成年人的同辈关系有显著影响。
- 3. 家庭变量和未成年人的性行为有点关系。
- 4. 家庭变量对未成年人的在校表现有重要影响。
- 5. 在校表现与同辈关系显著相关。
- 6. 在校表现与发生有风险的性行为之间有点关系或没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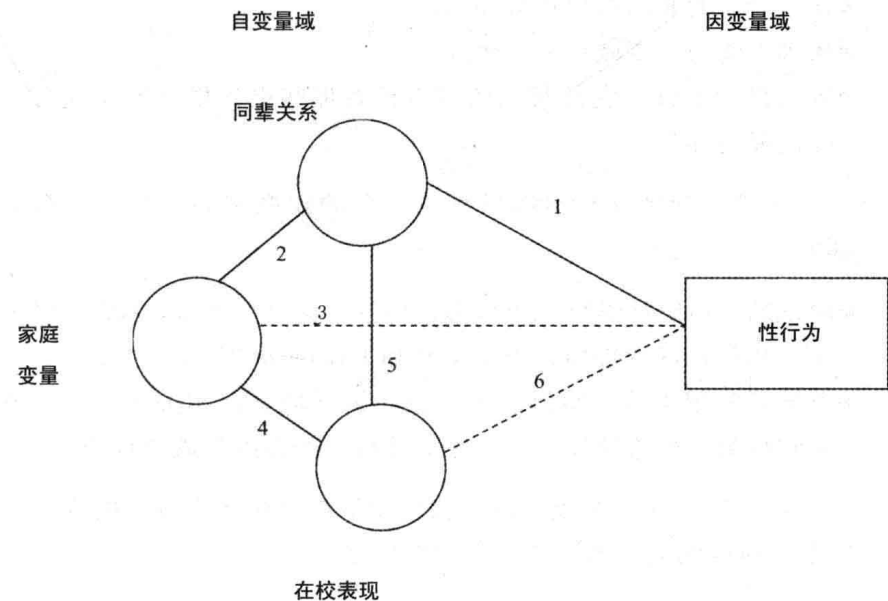


图2.13 假设自变量域和因变量域之间有强关系或弱关系的塑型研究模型

用更为叙事性的方式来说，图2.13和这六个一组的假设关系描述了一个多因素模型，它涉及未成年人的三个世界：家庭、学校和同辈关系。家庭观念会影响到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也会影响到他们与什么样的人交往。然而，模型显示，研究者估计同辈关系在有危险的性行为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其他域则非直接相关或根本不相关。

叙述、假设和图解都是研究概念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可以根据研究进程的复杂性，随心所欲地以任何次序生成。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添加域、因素和变量。例如，研究者可能有机会事先和一些未成年人进行焦点团体访谈或深度访谈，得出对情况的叙事性描述。之后，我们可以把描述转换成一系列假设，再把假设整合到一个类似前面所画的模型里。

寻找自变域

民族志研究的优势之一是民族志者有能力找出人们曾经以为与因变域无关的自变域。识别这些域的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 初级阶段的非结构化观察和访谈。
- 梳理先前与因变域有关的研究。
- 提出指导方针，它能帮助研究者检查那些更为量化的设计有可能遗漏的部分。

寻找自变域并画出提供理论信息的模型图的过程包括两个部分：

- 前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或状态，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动力学、居住社区的性质，以及学校和工作场所的特征。
- 可能既和根本原因直接有关，也和因变域直接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如避孕知识、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和避孕行为。

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内寻找自变域都是民族志方法的强项。以下实例说明的是如何确定新的自变域。

实例2.10 确定新的自变域

斯里兰卡佩勒代尼耶大学社会学系的阿马拉西里·德席尔瓦 (M.W.Amarasiri de Silva) 博士曾经在斯里兰卡南部疟疾肆虐的地区评估使用蚊帐的效果 (自变量), 该项目报告, 疟疾发生数 (因变量) 只有些许减少。

非结构化观察和访谈促使他审视这个地区的睡眠模式。大多数住宅只有一个房间, 母亲和小孩睡在一起, 父亲自己睡。夫妻俩想要有亲密举动的话, 就不得不离开他们的蚊帐, 到户外的院子里去, 而且往往是在蚊子最活跃的时候。在这个案例中, 观察揭示, 住房拥挤 (自变量) 是人们感染上疟疾的一个原因, 它比在屋里使用蚊帐更重要, 住房拥挤迫使人们到疟疾大量滋生的户外寻求私密性。

撒下一张“大网”对发现重要的自变域真的很有好处!

下面的例子来自玛格丽特·勒孔特对一所中学里的一门艺术课程的研究, 它表明学校的各个部门如何提供理论命题, 这些命题有助于引导我们形成用于评估研究的调查设计。

实例2.11 研究参与者如何能够帮助找出理论命题

勒孔特和助手在四月份开始约见中心线中学的教师、校长和学生家长, 他们想识别出参与课程的各种支持者感兴趣的可供研究的问题, 也想看看他们是否已经提出了什么理论来解释正在开展的活动为何会有效 (见表2.3)。

表2.3 艺术课程

自变量域	因变量域
“家长们”对学生进步和学生对学校的态度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 他们认为这会提高孩子们上学的积极性, 从而取得进步。 域: 艺术课程	孩子们的上学积极性 孩子们的进步
“教师们”坚信, 艺术提供了一种思维和实践能力的训练, 它会帮助学生们更好地完成日常的学校作业。 域: 艺术训练 因素: 认知训练 行为训练	提高学校作业的成绩
校长和家长都支持这项计划, 因为他们希望借此增加学校的招生人数, 同时防止学区关闭学校。 域: 艺术课程	扩大招生人数 保存学校
校长和主要的非艺术类教师也考虑到, 艺术课程强化了学校的整体氛围, 它也不干扰那些他们认为已经卓有成效的学术课程。 域: 艺术课程	改善学校氛围 保留有效的学术课程

勒孔特和她的研究团队利用这些想法提出一个评估设计方案，关注艺术专题课程对中心线中学的整体影响，她们还提出一组研究问题，既关注艺术教师的指导风格，也关注具体的艺术指导实践与学生对学校、对自身的态度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如何与知识分子观念相吻合。

有助于识别自变域的另一个办法是把所有的自变域分成两组：（a）和“组织化服务”相关的；（b）和目标人群或团体相关的。例如，（a）组自变域可能包括：

- 政府法律。
- 规章制度。
- 政府部门。
- 各级非政府组织。
- 地方的医疗服务体系或教育体系。

举例来说，如果是研究医疗卫生服务，就不仅要关注机构提供的服务（如：医院、社区卫生中心、保健机构、集体或私人诊所），还要关注那些可能影响他们如何提供服务的其他机构〔如：社会保障计划、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制度或其他公共基金的主导方针、保险公司，以及由服务人员组成的利益团体〕。在研究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时，它们“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或域。

关注人群或团体则意味着下列可能性：

- 那些有着明确的教育问题或健康问题的人。
- 那些很可能出现问题的人。
- 那些直接受问题影响的人。
- 所有面临着普遍性健康问题或教育问题的人。
- 由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和种族）界定的人群或集体。
- 职业群体（如制革工，工会）。
- 在同一工作地点的员工（如毛里求斯路易港的城市产业工人）。
- 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个人和家庭。

读者可以在第一册书里发现更多关于确认目标群体的方法的讨论。

与群体相关的域包括那些知识、态度、行为、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运动或其他类型的活动、饮食模式、食品加工以及物质

生活方式等领域。

有些民族志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和目标人群或团体有关系的自变域，却遗忘了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结构问题或政策问题，而它们在研究中可能是很重要的。把自变域分成两个类别——制度性或组织性的和社团的——就要求研究者在提出一个理论模型和塑型研究模型时必须两者兼顾。

实例2.12 在未成年人的健康和性风险研究中兼顾组织域和群体域

在斯蒂芬·申苏尔、琼·申苏尔、图尔多·席尔瓦（K. Tudor Silva）、阿马拉西里·德席尔瓦等人进行的斯里兰卡研究中（Silva et al., 1997），可能影响到未成年人性风险的组织自变域包括：

- 面向未成年人的医疗服务设施。
- 服务人员是否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需要和特点进行过培训。
- 关于性教育和生育的国家政策。
- 影响避孕用具分发和学校性教育的政策。
- 学校对待性教育的态度。

如果不考虑组织这部分，研究者在思考什么会影响青少年对性风险的态度和危险行为时，恐怕会遗漏掉上面这些域。

在青少年——研究的目标人群——当中，我们认为影响性行为风险大小，和感染艾滋病可能性的域包括：

- 青少年对保护措施的认知。
- 青少年的性知识。
- 青少年对性的态度和价值观。
- 男女朋友关系。
- 青少年中的同辈关系类型。
- 青少年和同伴一起进行的活动。

对自变域和因变域的选择支撑着研究的塑型理论，并引导着本书从第4章到第6章所讨论的探索性资料收集进程。与此同时，非结构化访谈与观察的结果让民族志者可以识别出新的域，删减原先被纳入塑型研究模型的域，也可以识别并提炼域所涵盖的变

量。通过这些手段，民族志者就能发现和考察别人可能不会顾及的那些领域。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塑型理论的形成是一个交互过程，要通过扩展机会的办法来识别出大多数有效的、适合于当地的域。

塑型研究模型的图解和建模

下一步是要把这些域组织成一个塑型研究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我们可以把域和域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关联的紧密度函数。下列指导原则是为了在图表中确定彼此相关的自变域和调节域的位置。

- 和因变域关系更密切、更直接（在时间上或逻辑上）的自变域应当放在更接近因变域的地方。
- 关联较密切的自变域应当串连在一起。
- 只有几个自变域和因变域是直接关系；其他的应该是间接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
- 只有几个自变域相互之间会有直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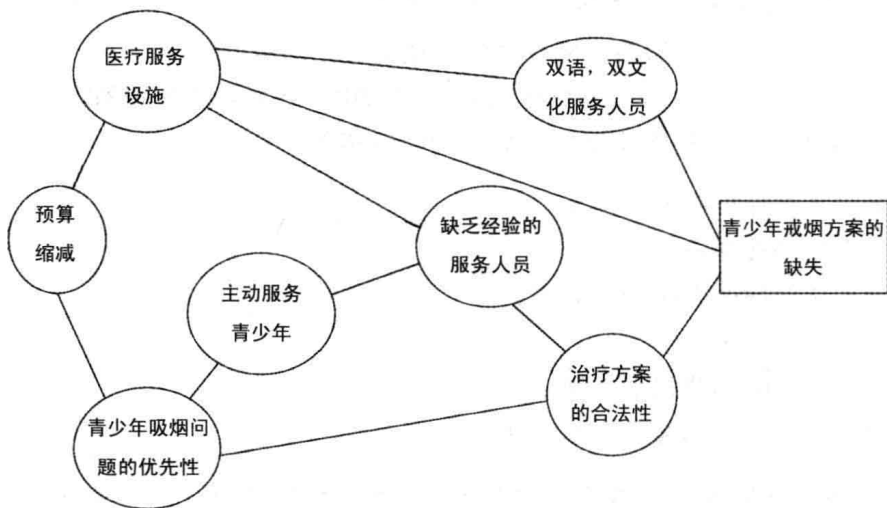


图2.14 利用与因变域有关联的组织域建构模型：青少年戒烟方案的缺失

我们可以把变量放进一个二维网格，网格最右边一（几）栏

是因变域，最左边一栏是背景域和前提域，中间几栏则包括因变量的前兆，连成串的几个域可以穿越这些栏排列。图2.14表示的就是在二维平面上组织初始模型的模板；这张图囊括了和青少年戒烟方案缺失相关联的主要的组织域。

建模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要把研究者假设的和因变域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自变域都识别出来。对于社群层面的域，研究者也应当进行同样的实践，图2.15是一个这方面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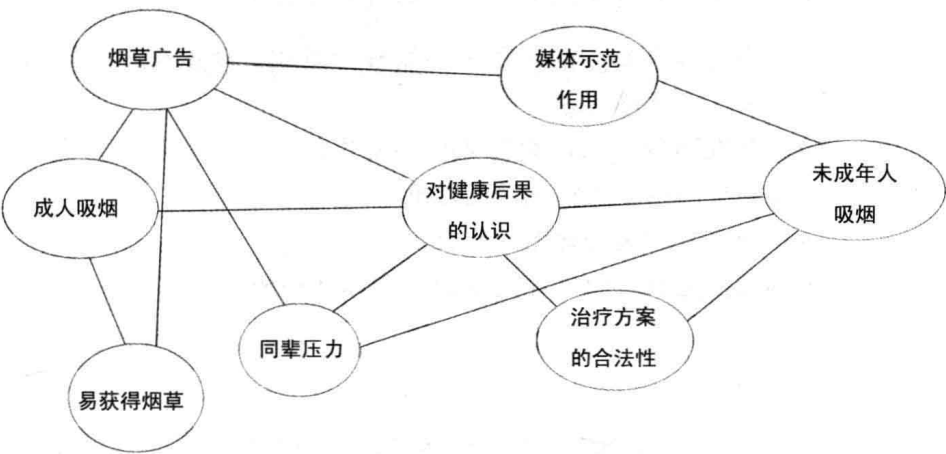


图2.15 采用和因变域有关联的社群层面的域建构模型：未成年人吸烟

创建研究模型的下一步是既要琢磨这些模型，也要找出作为调查焦点的因变量，它可能是图2.14和图2.15中所确定因变量的其中之一（戒烟方案或未成年人吸烟），也可能是一个复合域。随后，通过比较优先性和吸收/排除过程，研究中最优的自变域组合就能早一点产生。研究者应该把一项研究中的自变域的数量限制在2~5个。

在选择最贴切的自变域时，我们应当加以考虑的外部因素有：

- 过去的研究所识别的域。
- 关键报导人所列出的域。
- 根据研究者的直接经验识别出的域。
- 符合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资源的域。

在比较所选自变域哪个优先时，我们要考虑的内部因素有：

- 根据与因变量关系的远近不同进行挑选。
- 自变域是否处于中心位置，也就是说，除了与因变域直接相关。

以外，它还在何种程度上与其他自变域直接相关

- 均衡地选择自变域，它们应既来自组织分析体，也来自群体分析。

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一个塑型研究模型，即：

- 一个有关事物如何运作的初始理论范式，要根据一手资料的收集来检验和修正它。
- 对预期事物（或研究者假设会发生的）和实际观察（或研究者实际证明的）进行比较的标准。
- 指导资料收集的地图或研究设计。
- 确保研究具有效度和信度的一套标准和测量工具。

小 结

研究的概念化过程，包括范式、理论和模型的提出，总是被罩上神秘的光环。有些人以为，这个过程就是坐在摇椅上，盯着白墙冥思苦想；而另一些人认为，观察到的每一个行动和听到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来理论发现。尽管学生们都上过理论课，参加过理论研讨，但他们很少上过一门叫做理论建构的课程，所以，人们觉得要想碰巧发现一种理论难上加难。

在这一章，我们试着阐明研究的概念化过程，虽然我们描述的是一个线性过程，但是在创建模型的过程中，它们是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同时发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很特别的。

无论如何，我们尝试勾勒出一套可以应用于大多数情况，并且成功地创建出有价值的局部塑型理论和研究模型的指南。指南的关键要素如下：

创建局部理论和研究模型的指南

- 确立研究的核心——因变域。
- 识别影响因变域的自变域和修正域。
- 在二维平面上把模型制成图，以厘清对概念的思考，也让旁人能理解概念化的过程。
- 说明能够支持模型中自变域和因变域之间的假设关系的理由。
- 根据优先性、研究重心、可利用的时间和人力资源剔除一些域。
- 确定模型，使之成为申请研究基金时的提案和研究的概念起点。
- 随着资料的收集修改模型，这也要始终贯穿于资料收集与分析的过程。

我们把创建过程描述成演绎的过程。不过，我们在这一章里已经说明它也可以是归纳的过程。民族志者可以从中间开始，沿着概念的抽象阶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开展工作。理论与模型建构都是需要开发的技能，越经常实践就会越容易。我们希望这种方法能激励民族志者把自己看成理论家，也能激励他们改进用来创建局部理论和中层理论的现有方法。

运用研究模型阐明

研究目的、目标和

假设

•

衔接研究设计阶段

和资料收集阶段

•

小 结

第3章 操作化

定义：

社会现象指思维、
社会组织和文化实
践的模式。

社会科学研究的职能是解释社会现象（social phenomena）。民族志的第一步就是要界定即将研究的社会现象。举例来说，研究者必须决定，是研究导致婴儿高死亡率或婴儿高发病率的因索，还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即疾病导致死亡亦或存活)。再如，研究者可以在合作学习的前提下分别考察教师的教学技巧和孩子们的行为，或者尝试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

定义：

测量一种现象意味着清晰地定义它，并且在社会背景下前后一致地识别出来。

接着，研究者必须决定如何测量（measure）现象，也就是说，如何在社会场景中始终如一地识别出该现象。如果研究的课题是死亡率，那么测量方法就很简单，即死亡。但如果实际死亡人数和有死者的家户数量不容易得知，那么测量方法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在有些地方，死亡是不被记录的；而在另一些地方，某些类型的死亡可能既没有人报告，也没有人记录；再者，许多家庭没有地址，因此即使有全部的死亡记录，具体位置可能也无法得知。对死因的测量往往成为一个难题，因为死亡可能有多种原因，但记录却不全或不准确。况且，如果没有记录，那么研究就得依赖于对症状的回忆，而回忆极有可能是错误的。评估教师在合作学习课程中使用的教学技巧就更加具有挑战性了。研究者必须观察教师在不同时间的行为，判断哪些行为与合作学习有关，界定这些行为，并运用这些定义观察课堂上的一连串行为。认识到诸如此类的测量方法问题是开展针对社会现象的民族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务必要清楚，我们在此讨论的测量方法并

不需要机械器具，许多测量结果也不用分数或数值来表示。测量方法只是让研究者能够评估具体变量的变化。

由此，决定要研究的是哪些现象需要：

- 定义：确立边界，以便把这个特殊现象和其他现象区分开来，也便于把差别告诉其他研究者。
- 测量方法：描述或测量现象。
- 确立效度：评估测量方法代表现象的充分性。
- 确立信度：保证在测量过程中，不同时间上和不同研究者的测量活动都具有有一致性。

上述过程被称为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

佩尔托夫妇（Pelto & Pelto, 1978）把操作化界定为：

为了有更准确的观察，从而更有效地建构理论和检验理论，尽量让……研究操作精益求精。操作过程的具体化加强了对随机变量的控制，提高了基本测量方法的准确度……也为收集信息提供了框架，让研究者可以为理解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结果而追溯自己的思路。（p. 39）

经过操作化过程，研究者的描述和理论命题中的基本要素（术语）转变成短语或短句，这就使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有可能相互理解，也有可能明确他们在田野中谈论的事物。

伯纳德（Bernard, 1995）区分了“概念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概念性定义是抽象概念，用文字说明，方便理解。〔它们是〕我们在字典里看到的那种定义。……操作性定义由一套如何测量变量的指示构成〔此处请注意〕，这个变量在概念上界定清晰。”（p.6）

操作化包含逻辑推导过程和观察过程。正如我们在形成塑型理论时已经见到的那样，操作化过程可以这样开始

- 自下而上(归纳)。
- 自上而下(演绎)。
- 自中间——由出发点同时向上和向下运作。

“自下而上”（见图3.1中的（1））的意思是首先在变量层次上识别现象，然后把它们（依次）分别归入适合的次因素、因

素和域的过程。

“自上而下”（见图3.1中的（2））的意思是把一个域拆开或分解成几种组成因素，把因素分解为次因素（如果可以的话），再把次因素分解成变量。

“自中间”（见图3.1中的（3））表示的是，先识别因素或次因素，将它们归入某个域，同时识别和测量与它们相关联的变量。图3.1描绘了我们所说的这一转化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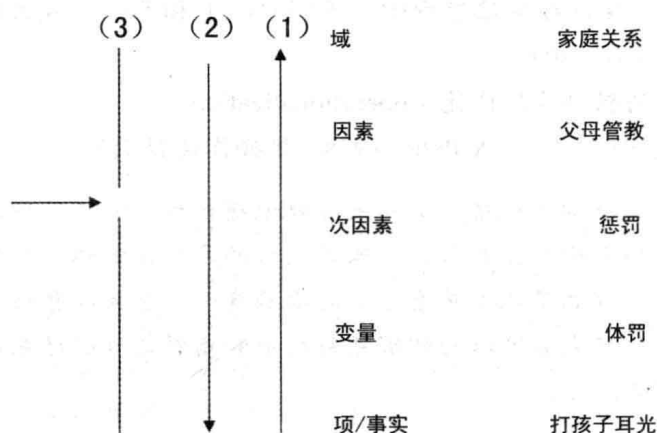


图3.1 操作化——把信息从一个抽象层次转化为另一个抽象层次

实现转化的一种途径是根据研究者的判断，把项或观察定位在一个恰当的抽象层次上。对于从概念上应该把一个项放在什么位置，研究者的判断依据各式各样：

- 过去的个人经验。
- 通过田野观察获得的对现象的总体认识。
- 由其他研究者开发出的测量现象的工具。
- 逻辑推导。
- 他人的反馈。

转化的第二种方法是基于局内人的观点，或者基于研究参与者自己采用的等级分类体系和意义的组合。我们在别的地方提到过这种方法是一种“主位”观（emic）。这些体系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启发技巧来获得：“成分分析法”（Goodenough, 1956）、“民俗分类法”（Frake, 1964）、自由列表法及其他系统的资料

收集方法 (Weller & Romney, 1989; Werner & Schoepfle, 1987) 。如果要用归纳的或自下而上的办法来发展分类体系, 我们可以请报导人确定概念或行为适宜放在哪个变量里 (比如, 在域为家庭关系的分类中, “父亲打孩子” 适宜放在其中的什么位置, 如图3.1或表2.1), 或者我们可以请受访者把连续出现的一些项 (如: 叫喊、打屁股、打耳光、用棍棒戳、停止说话、关进房间、增加家务活) 分成几组 (累积分类), 然后对这些组进行解释、命名、划分为因素或域。我们也可以请报导人“列出父母惩罚孩子的所有方法” (自由列表)。在分析质性的田野笔记的过程中, 这些分类体系也会不那么完整地出现。

我们的下一个挑战是要把项或观察放到抽象连续统里的适当位置上, 这个任务做起来要说起来更容易。在变量层次上恰当地找到项的位置再简单不过了, 我们不妨问: 准确识别的程序可靠吗? 也就是说, 它能不能被重复? 如果两个观察者同时看到一个父亲的手碰上孩子的脸颊, 他们都会同意这个行为是“打孩子耳光” (项), 并且它是次因素“体罚”的组成部分吗? 在次因素和因素层次, 研究者一定要问, 概念的宽泛性和涵盖性是否足以使它位于比变量更高 (即涵盖更多内容) 的抽象层次上。如果要把一个概念定位在域层次或者最抽象的层次, 研究者就应当有能力创建一个包括因素、次因素和变量的完整的分类结构。

民族志者运用操作化方法来组织、理解和分析质性资料; 提高所收集资料的准确性; 也为质性资料组建等级化的编码系统。操作化还有利于把各个项组织成变量, 而我们可以把变量量化为指数和量表, 用于建构民族志统计调查。

民族志者既用演绎的, 也用归纳的方法来组建描述和分析的复杂结构, 但我们现在要说说自上而下的操作化。塑型研究理论指引研究者注意到那些有意思的域及其潜在的相互关系, 这是操作化的第一步。接下来的任务是使研究模型中的每一个域都向下移动抽象层次, 逐步具体化为因素、次因素 (如有必要) 和变量, 以便有效地对域进行测量。要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发现使用绘制树状图 (tree diagramming) 的技术是最有效的 (参见: Weller, 1998)。一张树状图 (tree diagram) 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层次。图3.2说明了这种分类方法。

定义:

绘制树状图指将信息组织成有等级的分类体系, 各个项都被归入更大的范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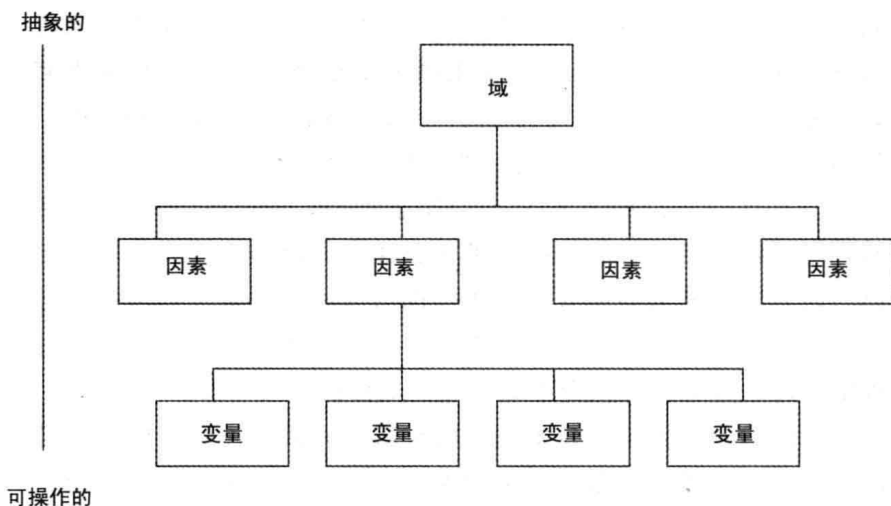


图3.2 操作化——根据概念的抽象程度或包容程度将信息按等级分类

绘制树状图方法要求回到研究模型，选择一个域（见第2章），然后把域“拆分”为抽象等级体系中的因素、次因素和变量等层次。这个过程表示的是从比较抽象的（因素和次因素）层次转化到比较具体的（变量）层次。转化的最终结果是一组可操作的或可测量的变量。在操作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任何阶段上的困难都标志着需要做进一步转化，尤其在变量层次上。图3.2告诉我们，只要三步就可以从域层次转化到变量层次，不过许多概念要完全达到可操作程度的话需要有四到五个层次。

从域层次转化到变量层次要有一些东西作为基础：

- 直觉（个人经验）。
- 先前的调查研究。
- 在民族志研究过程的每个阶段上收集到的资料。
- 逻辑推理。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民族志者在和某个关键报导人的讨论中出现了“家庭”域，那么他（她）就可以顺水推舟问：“你能多跟我讲讲这个社区里的家庭状况吗？”对该问题的回答和田野作业过程中对家庭的观察将引领我们从被研究人群的视角确定“家庭”域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民族志者要尽量引导报导人提供

“因素”层次上的信息，因为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用逻辑分类的术语来思考和言说，而这是透彻地理解某个域的内容所必需的。研究者往往必须把研究参与者提供的信息重新组织成因素、次因素乃至变量。

半结构化访谈与观察对于进一步使因素可操作化很有帮助。例如，因素“管教”可能在“家庭”域内显示出重要性。当研究者着手测量、收集管教的范围的资料时，请受访者描述其父母的管教经验的半结构化访谈将识别出最重要的几个次因素和变量，识别出的变量可能非常具体，它们甚至可以转换成统计调查时使用的封闭式选项。如果我们得知，和因素“管教”相关联的一个次因素是体罚，而体罚内的一个变量是用藤条打，那么我们就可以问一个结构化的或封闭式的问题，“有人曾经用藤条打过你吗？”——问题的答案是“是”或者“否”。在操作化过程中，每一个抽象层次都会产生出有关研究现象的有用、有效信息，它也会为我们沿抽象阶梯向下做进一步操作化奠定基础。

这种操作化方法也能让我们由具体回到抽象。我们可能先发现“鞭打”现象，在收集更多的民族志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可能把它记录下来，放在“体罚”这样更具包容性的范畴或次因素里。一旦次因素“体罚”被证明在研究中有效并且重要，“鞭打”就会成为测量“体罚”这个更大概念的量表中的一项。半结构化访谈甚或关键报导人访谈可以将引领研究者进一步识别出类似“鞭打”的其他行为，这些行为是次因素或概念“体罚”的指标。“体罚”（次因素）可以放在“家庭管教”（因素）里，也可以同样恰当地放在另一个名为“家庭关系”的因素里，这取决于民族志的语境。沿着抽象阶梯向上移动，适合次因素“体罚”的因素的位置要取决于研究最初提出的问题，也取决于我们在地方场景下把行为概念化和分门别类的方式。所以说，依照这种方法，每个数据都会有一个概念的归宿，这就让研究者可以避免孤零零的事实和信息。

最后，这种操作化方法能确立用于编码文本资料的各个范畴。

实例3.1 毛里求斯青年女工中“家庭”域的操作化

我们的一个研究项目是考察在毛里求斯工业区工作的未婚女青年中与艾滋病有关的危险行为。我们感到，家庭在这些女青年的生活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证明了“家庭”域的重要性后，研究团队便开始描绘构成它的因素。这不是为了识别每一个可能与“家庭”域有关的因素，而是要寻找并聚焦那些我们假设与因变域——有关艾滋病的危险行为——相关的部分。

图3.3说明了我们的第一步是确定那些和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相关联的家庭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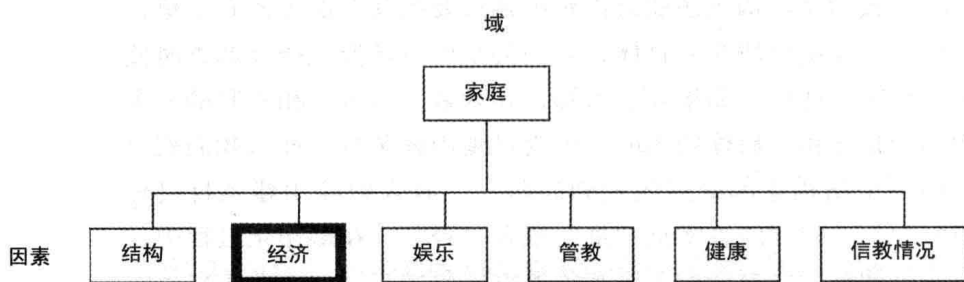


图3.3 识别和“家庭”域相关联的因素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让每一个被确认为“家庭”域的成分的因素进一步可操作化。图3.4表明“经济”因素（意指“家户经济特征”）如何被分解成几个变量，其中之一是物质产品。“物质产品”指家户拥有的物品或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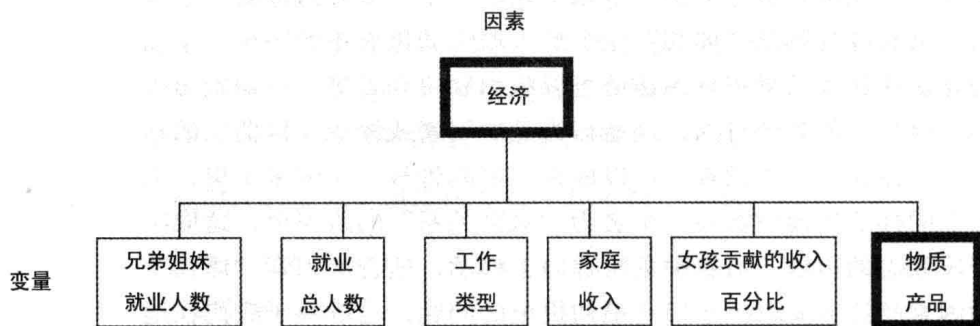


图3.4 “经济”因素的操作化

这些变量中有几个已经足够具体或者说可操作了。例如，我们可以请工业区的女青年回答这个问题：“你每月收入中有百分之几是交给家里的？”其他变量则要求进一步可操作化，譬如家户拥有的物质产品。图3.5说明了我们如何让这个变量变得可操作。图中列举出了一些可以根据家户里有或没有来进一步界定的项。在分析阶段，我们可以通过累计每个家户拥有的项的数量来得出一个家户的分数，从而把这些项综合成一个“物质生活方式（MSL）”量表。

以域为基础，我们把上一章讨论的研究模型称为“水平”模型，创建这一塑型研究模型的过程称为“水平建模”，因为它只提出一个层次——域层次上的关系。我们把从图3.3到图3.5中描述的树状图称为“垂直建模”，因为它运用了逻辑的、经验的观察，要求我们沿着连续统创建出从最抽象层次（域）到最具体层次（变量和项或者属性）的联结或关系。

在设计和开展一项民族志研究时，分类法（或树状图）为研究者提供了得以着手建构单元、模式和结构的工具。在图3.6中，我们看到，在变量、次因素和因素层次上可以揭示域和域之间的关系。它也说明了如何恰当地把大量编好码的质性（或文本）资料或数据分析联结起来，以揭示各个次因素和因素之间的关系。

概念上的工作进行到这里，已经为我们创建一个清晰的塑型研究模型打好了基础，模型又是提出研究设计、写作研究计划或研究说明书的基础，它们才能供同事、主管、评审委员会以及潜在的资助人进行讨论。

运用研究模型阐明研究目的、目标和假设

运用研究模型确立一项研究设计的第一步是陈述研究目的（purpose）。陈述应当以因变域或研究问题为基础。表3.1的几个例子要么只关注因变量，要么关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是要逐步形成一系列旨在阐明或解释自变域和因变域之间关系的研究目标，我们用树状图里的术语或概念来表述这些研究目标，如图3.7所示，它取自斯里兰卡的艾滋病风险研究，其因变域是“性行为”。家庭（自变域）和性风险（因变域）的关系是：“家庭问题与危险的性行为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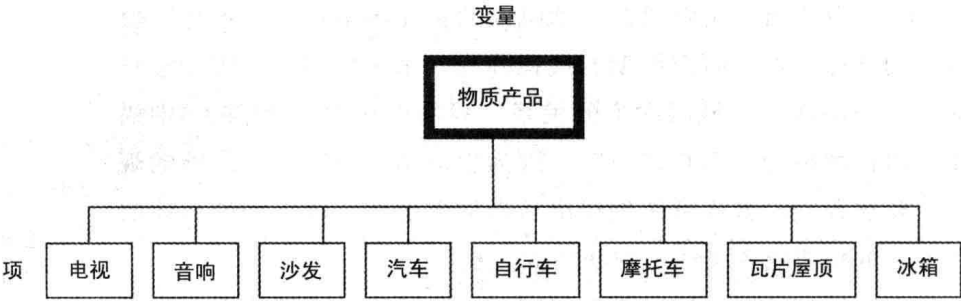


图3.5 “物质产品”变量的操作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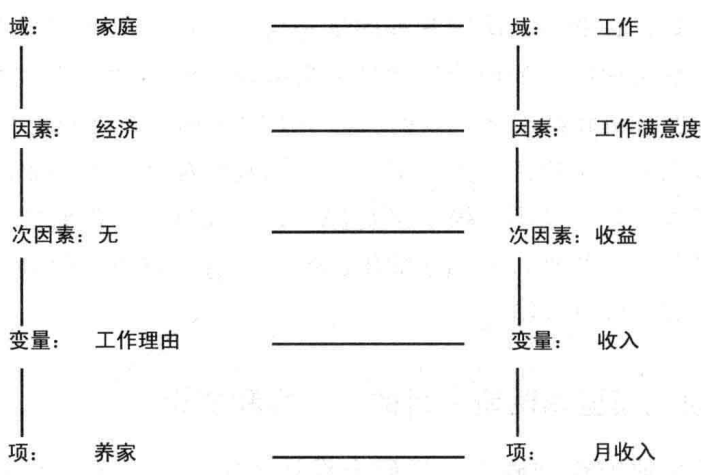


图3.6 在域、因素和变量的抽象层次上确定概念的位置

表3.1 基于理论研究模型的目的陈述

目 的	因变域	自变域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理解拉丁裔老年妇女如何解释、报告和控制糖尿病症状	糖尿病症状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识别那些导致儿童在涉及数学的活动中的表现存在差异的因素	儿童在涉及数学的活动中的表现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农业革新(因变量)在洛瓦(lowa)农村农民中的传播	一项农业革新的传播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识别影响青年人冲突解决技能的同辈因素、社团因素和家庭因素	冲突解决技能	同辈 社团 家庭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检查自尊、社会影响和媒体与未成年人离家出走的关联	离家出走	自尊 社会影响 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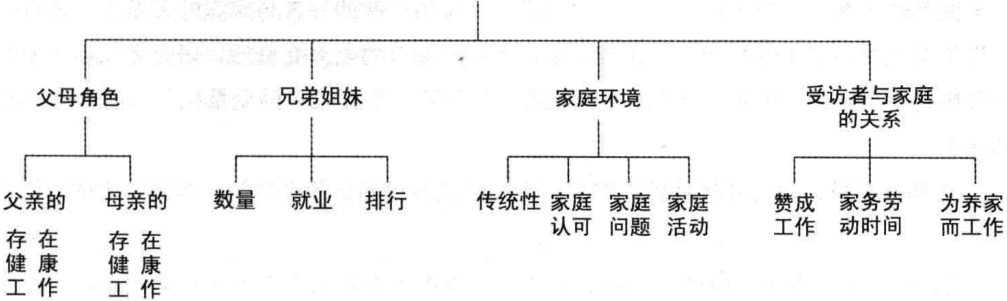


图3.7 树状图：对域“家庭”的概念分类

设计研究的下一步是生成一组具体的问题或假设，通过在因素和变量层次上思考各个域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检验或揭示这些问题或假设，参见来自毛里求斯的研究实例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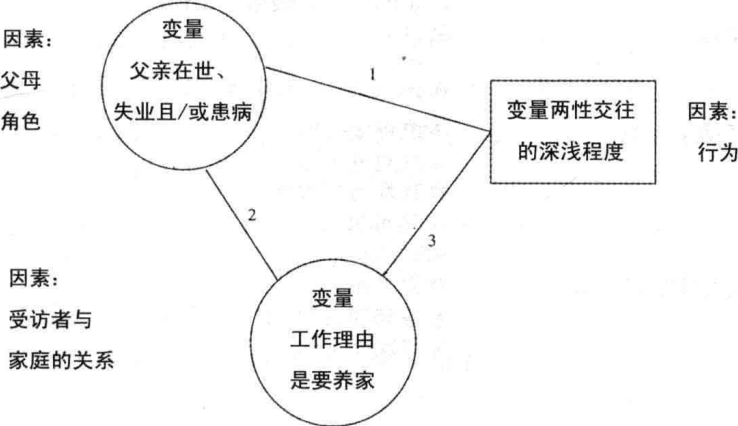


图3.8 生成变量（位于因素和域内部）之间的关系假设：毛里求斯研究，家庭域

实例3.2 运用“域、因素和变量”框架建构研究设计：来自毛里求斯的实例

- 标题：毛里求斯的女青年、工作和与艾滋病有关的危险行为。
- 目的：识别在毛里求斯出口工业加工区（EPZ）工作的女青年中影响性态度、性行为 and 性风险(怀孕、堕胎、性传染病和艾滋病)的因素。
- 目标：描述并理解出口工业加工区15到25岁女青年的社会/情境域（家庭、同辈和工作）和因素（性风险和性态度）之间的关系。

图3.8是根据表3.2里的域、因素和变量的概念分类绘制的。它选择了研究中的两个关键域（家庭和性关系），两个取自家庭域的因素（父母角色和回答者与家庭的关系），还有一个来自性关系域的因素（性行为）。在考察了各个因素包含的全部变量后，研究者从两个家庭因素中各挑选一个变量，还从性行为因素中挑选一个变量（见表3.2中的变量栏）。变量位于图3.8的圆圈里。

选择好变量，研究者接着要推测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什么样的，本研究中的方向性假设如下：

假设1：父亲再也不能挣钱意味着姑娘们不得不（不是选择）为了养家到出口工业加工区工作。

假设2：失去父亲与姑娘们有更自由的性行为相关联。

假设3：为养家而在出口工业加工区工作的姑娘们有更深度的两性交往活动。

域	因素	变量
家庭	父母角色	父亲的存在、健康、工作 母亲的存在、健康、工作
	兄弟姐妹	数量 工作 排行
	家庭环境	传统程度 家庭同意工作 家庭暴力的程度 家庭问题 家庭活动
	受访者与家庭的关系	赞成工作 家务劳动时间 为养家而工作
性关系	行为	从牵手到口交的两性行为 使用避孕套
	价值观	婚前性行为 贞操 男人
	知识	艾滋病传播 避孕套
	风险认知	失去贞操 怀孕 患性传染病 患艾滋病



表3.3运用我们描述过的建模过程，概括了研究设计的基本要素与其概念来源或灵感之间的衔接。

表3.3 运用树状图衔接研究设计的内容与概念来源

研究设计的基本要素	概念来源
目的	因变域
目标	自变域和因变域之间的关系
研究概念	树状图
假设	因素和变量之间的关系

衔接研究设计阶段和资料收集阶段

民族志研究者面临着两个最大的挑战：如何使质性资料（文本）和量化资料（数字化资料）相吻合；如何知道在某个研究环节上应该选择这种还是那种资料收集方法。我们在这一章概述的方法既为衔接概念发展的各个阶段打下基础，也为运用具体的研究方法建模提供了依据。表3.4概括了这些阶段。

第1阶段的目标是运用个人/专业经验、早期研究、对二手资料和档案资料的回顾来提出塑型研究模型。这个阶段包括识别自变域和因变域的组合，建构联结它们的假设。研究者务必记住，在进行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无论何时，塑型研究模型都仅仅意味着修正、改良和完善，同时也是修正、改良和完善的对象。

第2阶段主要是发展塑型研究模型里的域。在详细阐述域的定义和拆分域的时候，探索性资料收集手段是最有效的，如果研究者找到在逻辑上不能自然地归属于最初确定的域的单位时，那么也就发现了新的域。这个阶段要同时进行操作化的前几步。随着项的出现，它们被归入形成中的概念分类中的因素、次因素或变量。

第3阶段首先关注的是运用半结构化资料收集技术在因素层次上探索。研究者列出一张关于因素的开放式提问清单，并对一定数量的人问同样的问题，根据他们的回答寻找差异。差异存在于变量层次或单元层次。例如，研究者可能用一系列问题分别询问15个人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异同点的看法。这些人总共可能提供一张包含10种不同观点的清单，如“公立学校资源有限”、“学生在两种学校都能受到同样的教育”、“私立学校门槛高”等。这张清单为封闭式统计调查的问题提供了备选答案，



表3.4 研究设计的阶段、研究方法的选择和研究目标

概念构成	研究方法（第二、第三和第四册书）和抽样方法 （第一册书；第二册书的第10章）	研究目标
第1阶段：研究模型	综述二手资料（第二册书，第九章） ●二手数据库 ●过去在研究地点的经验 ●研究者的经历	●提出最初的一些文化域 ●选择其中几个域 ●建构假设
第2阶段：域	探索性资料收集（第二册书，第4、5、6、10章） ●访谈关键报导人 ●非结构化观察 ●参与观察 抽样：特殊个案；极端个案	●发现新的域 ●检验所选的域 ●在所有层次上开始进行操作化
第3阶段：因素	半结构化资料收集（第二册书，第7、10章；第三册书，第2、3章） ●半结构化访谈 ●半结构化观察 ●焦点团体 ●启发：自由列表与累积分类 抽样：配额抽样	●因素和变量的操作化 ●确定用于研究的语言和术语 ●找出文化共识
第4阶段：变量	结构化资料收集（第二册书第8、10章；第三册书第1章；第四册书，第1、2、3章） ●结构化访谈 ●问卷、统计调查 ●结构化观察 抽样：概率抽样或系统抽样	●变量的操作化 ●获取受访者的代表性样本 ●检验假设

也为进一步访谈提供了观点。约翰逊（Johnson,1998）在最近一次讨论研究设计和研究策略时提出类似论点，他区分了探索性研究方法和解释性研究方法，他指出：

探索性研究方法〔我们的第1到第3阶段〕用来提出假设，更经常地是用它来探究那些我们尚未充分理解的课题的范围、描述和解释 探索性研究可以是某一研究设计最根本的着眼点，也可以只是诸多成分之一。（p. 139）

在第4阶段，研究者经常（尽管并非总是）运用有民族志依据的统计调查来揭示目标群体的代表性样本中的差异范围。分析揭示和检验了基于初始概念框架的假设，还包括正在浮视的观点。约翰逊（Johnson,1998）把第4阶段称为解释性研究，认为“解释性方法一般涉及检验理论的基本要素，这里所说的理论或

许是人们已经在文献中提出过的，或者是由探索性研究提供的信息”（p.139）。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现在愿意承认，民族志既包括质性的，也包括量化的资料收集方法。形成初始模型（第1阶段）之后，研究者就应当以强调探索的资料收集方法开始工作（第2阶段）。探索对以下方面很有帮助：

- 判断因变域的效用、适当性、重要性和定义。
- 识别和选择自变域。
- 启动域的操作化（把它们分别解构或拆分成个别的因素和变量）。

在第3阶段，半结构化质性访谈和观察提供的信息有助于确定因素，识别变量。这些资料收集方式除了能让我们揭示出变量、因素和域的含义范围之外，还能帮助我们揭示可以采纳为变量或变量属性的答案或选择的范围可能有多大，这些资料在研究后期解释统计调查结果时将会派上用场。

第4阶段要检验有关代表性样本人口(最好是随机的)中的变量、因素和域之间的关系的那些想法或预感。正如我们将在第8章看到的那样，我们能够采用类似办法来分析质性资料（深度的半结构化文本资料）和量化资料（统计调查），即描述变量并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小 结

这一章，我们论述了塑型研究模型的操作化的基本步骤。大多数研究者开始于某个问题，随着他们经过表3.4所勾勒的各个研究阶段，问题得以详细阐述。最初的研究问题很快就转变成一个因变量域，或者一个适于研究的问题或课题。不过，直到研究过程的第3阶段后期，与问题相关联的域和因素可能还不会完全显现出来。一些研究者喜欢收集和分析深度半结构化访谈资料以及其他形式的探索性资料，以检验他们的研究模型并回答研究问题。另一些人则会选择用更大更多的代表性样本从数量上检验模型。研究者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一种策略，只要他们知道，如此艰苦才收集到的质性资料和量化资料将直接应用于他们在理论模型中确定的各个层面。

第4章 进入田野

田野作业与田野

民族志者作为自我
反思的调查工具

为便于进入而建立
关系

※ 在前三章，我们讨论了民族志田野调查在概念上的准备步骤。

田野作业的概念准备步骤

- 提出主要的研究问题。
- 回顾已发表的早期研究的观点。
- 检查可利用的二手资料。
- 和其他在所选地点有过研究经验的人交谈。
- 建设一个指导研究的初始概念框架。
- 确定初始的域和因素以便进一步探究分析。

完成这些步骤后，民族志者就算做好“进入”田野的准备了。这一章，我们要讨论进入的过程，或者说如何建立关系进入即将开展研究的田野地点，这些关系有助于研究计划的逐步实现。

田野作业与田野

定义：

进入是指研究者为了收集资料而出现在指定的研究场景中并建立关系的过程。

“田野”和“田野作业”的概念已经成为民族志的标志。田野作业是指在某个选定的场景或处所执行实际的研究任务。田野（field）是一种自然环境，研究者根据自己感兴趣的机构或人群，同时也根据他们在地理空间上的活动来界定田野的边界。对

民族志者而言，田野可以是任何天然的地理/社会场景或处所，他们将在那里对既定的研究问题进行研究。本丛书所描述的田野场景包括：美国哈特福德市的一个射击场；科罗拉多州的一间教室或一所学校；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或纳瓦霍族的一个校区；斯里兰卡的大学校园；利马的棚户区；毛里求斯一家城市医院里的一间精神科病房，或者是一个工厂的生产车间。

当我们说民族志研究者到田野去，我们的意思是他们离开自己的社区、习惯的环境和熟悉的行为认知模式，进入另一个即将开展研究的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需学习田野地点的居民已经通晓的当地语言、主导社会关系的规则，当地居民共有的文化模式、文化愿景和文化意义。学习这些规则、标准、界限和行为是民族志的任务。学习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关系，学习过程要借由建立关系才会发生。

定义：

田野是自然的、非人为设置的场景或处所，研究者感兴趣的活动发生在其中。

进入过程是复杂的，因为研究者必须同时学习很多东西：

- 如何在新的场景下活动，那里的语言、行为规则、标准、信仰、社会关系、饮食模式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可能截然不同。
- 如何与那些掌握着重要信息和研究的相关资源的人建立关系，如何定位这种关系。
- 如何既不显眼又高效率地在现场收集、记录信息。
- 如何区分出新的、有意思的、对研究目标可能有用的信息，尤其是在研究者遇到的每件事都很新鲜和陌生的情况下。

要想系统地处理好这些问题，我们就要经常有意识地自我反思。

大多数民族志研究者选择在他们不熟悉的田野场景或者不属于自己的社区里做研究，至少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们在第一册书中也说过，有些研究者选择研究他们拥有某种形式的成员身份的社区或环境。他们可能在这个社区里长大，或者属于他们想研究的族群；他们也可能根据性别偏好、宗教选择或个人兴趣把自己看成是被研究群体的成员。然而，不管他们的团体身份或认同是什么，没有一个研究者可以完全等同于被研究团体的成员。

举例来说，没有一个研究者可以既是男又是女，既是老又是少，既是穷人又是中产阶级，既受过教育又没受过教育——也就

是说，没有人能自始至终完全地代表着既定社区里的所有可能重要的成员或部分。民族志研究者的身份认同从来都不能与那些被研究社区或场景里的成员完全重合。

无论研究者是否把自己看作是被研究社团里的一员，当他们开展研究时总是处于某种边缘状态。民族志研究的推进要求研究者学习怎样根据“我不知道的”，或者只懂一点的言谈举止的规矩，在“非我所出”的环境中成为“非我”。民族志者同时是所研究群体的成员和非成员，他们必须为塑造和重塑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断挣扎。这种挣扎有道德涵意，因为研究者越是融入田野环境，就越容易使当地居民忘记他们正在收集资料。即使是在民族志者可能扮演着朋友、顾问、信息提供者、救助者和文化经纪人角色的时候，他们也必须随时记得自己是研究者，并向研究参与者提醒自己的研究者身份。

民族志者作为自我反思的调查工具

民族志研究从来不是自传性的。它要求研究者准确观察、有效记录研究参与者的言辞、寓意和看法，区分刻板印象、观点和判断。因此，进入不仅仅意味着“来到”（going into）一间诊所、一个可卡因交易地点或者一所学校，它还要求研究者将自己转变为基本的资料收集工具。民族志研究要求从身体上和社会上都投入田野场景直接学习。对民族志者而言，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事是通过观察，参与被研究社区成员的对话和日常活动，并记录这些观察来获得知识。

然而，记录观察中只是一项更复杂的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任务还包括：

- 审慎地、持续地反思经验的意义。
- 理解场景。
- 反思个人经验要求研究者在人格上和行为上做出的转变。

认真对待这些活动有助于民族志者的行为举止越来越接近被研究群体的成员，要想在田野中做出优秀的民族志，不显眼地（换句话说，以文化上得体的方式）进行工作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使得研究者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观察者越不显眼，

人们就越会像平常那样行事。著名的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谈到自己在特洛布里恩德岛出现的时间越长，对社区的影响越小，他说：

应当记住，[当地人]每天频繁地看到我，他们便不再因我的出现而好奇或警惕，或被弄得忸怩不安，而我也不再是我要研究的部落生活的一个干扰因素，我的突然接近也不再像一个新来者对每一个……社区总会发生的那样会改变它了。

(Malinowski, 1922, p. 8)

当民族志研究者从一个可以无意识、不假思索和不自觉地行事的熟悉环境转换到陌生环境时，这种不引人注目地进行研究的方法让他们身负重任，因为它要求研究者自觉地反思并谨慎地选择得当的新行为。这项任务既复杂又势在必行，它包括以下一些活动：

- 倾听。
- 记录并理解田野场景中所使用的语言的含义。
- 观察、记录和解释行为。
- 把信息组织起来并加以理解，这样它们就越来越能够预告将来观察到的事件。
- 思考所见所闻影响行为、态度和价值观的方式，包括行为、态度和价值观本身。

所以说，民族志者是主动地使自己面临濡化或社会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他们也对自己所发生的转变进行研究。

民族志进入的另一个独一无二之处是：民族志者一般很少为了和当地人合作而给予物质刺激，而是寻找机会来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并谈论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在田野中建立相互信任的私人关系的过程被称之为“建设融洽关系”（building rapport）。优秀的民族志者很容易建立起关系，虽然他们对周围事物很敏感，但只要能学到新东西，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提问。

有些时候，民族志者也会采用物质激励手段，比如付报酬给关键报导人（key informants）或文化专家（cultural experts），因为他们参与访谈要耗费时间。其他学者也发现，另一些物质刺激或物质交换也很有效。例如，参加艾滋病研究的民族志者一般

定义：

建设融洽关系意味着与研究场景中的人们发展出良好的私人关系，这有利于获得参加开展研究所必须的活动机会和信息。

定义：

关键报导人是那些被公认为对研究课题有特殊专长的人，文化专家是指那些有特殊的文化专长的人。

都携带漂白试剂盒、避孕套等物品，它们经得起检查，也可以留下来帮助受访者保护自己不感染艾滋病。研究教育的民族志者可以完成学校方面所需要的评估，或者构建他们需要的资料收集工具，虽然这并不是研究设计的一部分。邀请青年们参与焦点团体的研究者常常发现，为他们提供喜欢的食物会让访谈更有吸引力。

所有民族志者都应当认识到互惠在建设关系时的重要性。他们可能需要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时间、交通工具、知识、与官方的关系，或其他对研究参与者和社区有利的资源。不过最重要的是，当民族志者进入田野时，他们一定要具备社交技能、知识上的恒心、对研究课题的信念和个人的善意。

如果得知社团或组织机构里的大多数人都不太关心表面说辞或对研究项目的解释，那些正经历着进入过程中的不适的民族志者应该倍受鼓舞。说到底，更重要的不是在刚开始时如何解释研究，甚至也不是研究者的组织背景和声誉，融洽关系最终取决于介绍民族志者进入社区环境的关系，取决于研究者在田野里和居民相处得多么自如，有多么严格地保守秘密，又有多快就学会当地的习惯和规范。研究者的外貌、措词（包括幽默）、善解人意的程度、日益增长的对环境的了解，对困难或新情况的挑战的反应等，对于建立私人关系都很重要，而这是民族志进入过程的标志。

起初，当地人会让研究者在田野里拥有相当多的行动或言论自由，比方说点头是更得体的问候方式，而研究者却一见面就要握手，人们通常也可以接受。但到最后，参与者会期待研究者能学会文化上更加得体的行为。例如，西方男性和斯里兰卡妇女之间握手是可以被容忍的（拥抱和亲吻脸颊不行），但更得体的方式是佛教徒的问候方式，把双手放在胸前合十，稍稍鞠躬，并说“ayubowan”¹。在田野的最初几周里学会得体的问候方式是融入社会的重要信号。

迅速学会融入的目的是为了使民族志者尽可能不打扰群体内正常的、进行着的互动。民族志研究者必须基于自己的个人品质而不是地位和许诺来建立融洽的关系与信任。在这个意义上，进入对于田野研究者来说和一个非研究者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

1 斯里兰卡常用的问候语，有“祝你长寿”的意思，通常就译为“你好”。——译注

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差别在于，研究者需要在建设融洽关系并被接受的过程中，表明自己将记录对话、开展访谈和观察、经历个人转变（要求新的知识、新的视角、新的敏感性和非敏感性），依此阐明民族志研究进程和结果。

为便于进入而建立关系

研究者在田野调查的进入阶段就开始建立人际关系。最先吸引新外来者注意的群体成员通常是那些比较边缘的成员，他们希望通过和研究者交朋友来增进自己的利益或者提高自己的地位。虽然这些人在最开始时可能最容易接纳局外人，也能随叫随到，但他们掌握的信息可能也最少。那些更加保守、更加详细地追问研究者的工作的群体成员，起初可能比较不愿意提供信息，但后来则可能成为研究者的关键报导人。

对于任何一个被视为局外人，或者变成自己的社会群体内的观察者的研究者来说，获准参与重要社会事件，进入重要的社会场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研究时间的长短通常要受到时间和经费限制，所以进入必须进行得相当顺利和迅速，在短时间内建立稳固的、恰当的关系。那些试图全面接触研究参与者的观念、行为和社会活动的研究者必须想办法缩短完全融入该群体的过程。为了建立关系，以便使民族志研究能够顺利地进行，研究者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步骤。

进入研究场景的步骤

- 获得正式批准。
- 和熟悉地方场景的人建立联系。
- 辨别并访谈地方上的守门人。
- 从远处观察。
- 由地方守门人和关键报导人引介给调查地点的其他人。
- 在守门人或关键报导人的协助下直接进入调查地点。

获得官方批准

定义：

守门人是那些控制着信息获取，接触其他个人和进入现场的权力的人。

有些田野场所相当公开，所以没有明显的官员或守门人来批准我们进入。但大多数场所并不是这么具有流动性，所以出于对工作安全和个人安全的考虑，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就要辨认出资深官员或利益相关者，和他们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正式批准。这些资深官员包括：协会或公司的主席或副主席、社会服务机构和移民局的头头、市长或其他高级政治官员、部门领导，以及国际机构地区办事处的负责人。

那些想在国外开展研究的研究者必须取得必要的准入证，为此，获得对象国内或当地的某个担保人的支持是明智的，这样的担保人有：

- 某所大学的领导或院系领导(如乌干达的麦克罗罗大学或斯里兰卡佩勒代尼耶大学儿科学系)。
- 双边性或国际性机构〔如美援署 (USAI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或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地区办事处。
- 大型非政府组织或志愿者组织〔如：毛里求斯路易港的毛里求斯家庭计划组织、美国对欧汇业协会斯里兰卡办事处、肯尼亚内罗毕的互助协会，或者秘鲁利马的秘鲁妇女组织〕。

同时，与当地/现场的研究者取得联系总是有帮助的，他们熟悉你的课题，也可能会对它有所贡献。

下面的实例说明了获准进入墨西哥乡村的一个田野调查地点所遵循的外交礼节。

实例4.1 进入墨西哥乡村的田野作业地点的经过

琼·申苏尔想在墨西哥乡村就基础教育课程内容的变迁和“学校—社区—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她不能径直到达被她选为研究基地的自治市开始工作。首先，她需要联系墨西哥城的应用研究人员，他们曾经帮助其他北美人类学学生到伊达尔戈州的乡村田野点去。接着，根据曾经在目标区域开展过田野调查的墨西哥人类学家的建议，她和负责该地区产业发展的高级官员取得联系。在针对该地区的教育变迁做过民族志研究的其他研究者的协助下，申苏尔的第三步是约见地区公立/政府中学和小学的校长们，说明她的工作目的。然后，她会见了研究地点附近的市镇里的几个重要家庭，他们为她提供一个“家庭”基地。最后，她请求市镇里的地方教育行政官员批准她在一所小学里开展研究，这所小学就在她确定为调查地点的镇里。

另一支由斯蒂芬·申苏尔带领的研究团队想在秘鲁利马西北部的棚户区（asentimientos humanos 或 pueblos jóvenes）进行研究，他们遵循的程序类似于琼·申苏尔的经历。

实例4.2 进入利马西北部一个田野地点的棚户区的经过

为了研究幼儿发病率和社区基础设施改善之间的关系，斯蒂芬·申苏尔在他的母校——康涅狄格大学——和利马的一所私立医学院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所学院历来承担着社区和公共卫生的研究和服务。斯蒂芬·申苏尔安排康涅狄格大学卫生中心邀请医学院的校长（教务长）访问康涅狄格州，这是为了向校长展示在哈特福德市进行的社区卫生研究，并且与康涅狄格医学院全体教员建立联系。访问活动包括与大学官员和社区研究者举行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宴会，签署一份探讨联合开展研究和培训的备忘录（或者叫协议）。

几个月后，康涅狄格大学的研究团队抵达利马，斯蒂芬·申苏尔作为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立即联系这位医学院校长。校长邀请团队参加大学里的正式会议，和院系领导及感兴趣的社区医务教员讨论这项研究。校长对该项目的认可给项目开了绿灯（la luz verde）——他批准秘鲁卡耶塔诺—埃雷迪亚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医学院开展第一个合作项目，此外这也向利马的教员们发出了信号。

与此同时，会议找出了那些对该项目感兴趣的教员，包括社区医疗系和儿科学系的教师，他们要么正在利马可能开展研究的地区工作，要么可以帮助接近那个地区的社区领导人和卫生工作者。

其他研究者、资深官员、大学行政官员和院系负责人、关键社区成员之类的人都握有权力，能影响研究场景，他们控制着研究者进入现场的渠道和研究所需要的资源。如果他们理解研究项目的性质、研究的理由，以及它将如何使他们的追随者受益（除了避免伤害这批追随者以外），那么他们会成为宝贵的同盟者和财富。如果他们不理解研究的目的和目标，他们自己对研究者也不熟悉，那么他们就可能会怀疑这个项目，并想方设法地阻碍它成功。

和熟悉地方场景的人建立联系

一旦到达即将开展调查的国家或地区，民族志者必须辨别要进行研究的社区环境或制度环境，获得进入的许可。研究者应当联系当地官员以取得他们的批准和支持，那些熟悉潜在调查地

点的当地研究者和其他专业人士也非常重要，他们可以帮忙选择学校、诊所、医院、社区，或者其他符合计划的、理想的研究场所。

表4.1列出了几类熟悉地方场景的人和可能找到他们的场所（调查也很可能在这些地方展开）。

表4.1 地方资源、守门人和关键报导人

角 色	场 所	提供的信息类型和其他资源
教师	学校、会议、工会办公室	学校的普查资料，儿童的在校成绩、健康问题和家庭问题，接近儿童的机会
工厂的基层主管	工厂	生产进度表，雇工特征，工厂和车间的组织
地方政要	家里、市政会议厅、社区会议	社区接触，社区议题，组织、部门与派别，重要联系，其他守门人
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站点	顾客，路线，有特别活动的地区
旅馆招待和其他员工	旅馆、汽车旅馆、公寓	有关顾客类型的信息，顾客来自什么社区和使用模式
机构首脑和项目主管	社团	社团议题，项目或机构议题，项目使用，客户/使用者接触，关于组织、部门与派别的信息，重要联系和其他守门人的信息，客户记录
街区或其他正式社会单位的负责人	社区	关于成员的生活方式、忧虑、组织程度、需求、居住记录的信息
非正式领导人	社区，通过介绍	关于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议题、需求、活动场所、关键报导人的信息
社区卫生工作者	诊所和卫生站、医院门诊部、地方卫生局、公共卫生部门	关于社区卫生需求、入户和入户访问、村庄的地理、保健和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模式的信息
工会负责人	工会办公室、工厂车间、家里，通过介绍	关于工人、工作实效、工作和工人的卫生条件、雇佣、薪水和工资，工作的组织的信息

上述这类人可以指认出以下一些重要事项：

- 研究聚焦的人群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 与研究有关的背景信息。
- 政治约束，包括可能推动或阻碍研究的个人或形势。

- 可能有助于将研究引入社区或组织机构的具体人物。
- 介绍或完成研究时遇到的文化问题。
- 相应的抽样方案。
- 了解研究主题并且熟悉被研究社区的潜在关键报导人或地方专家。

另外，研究者可以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寻求帮助和信息。例如，在一项对海南卖淫者的研究中，研究者廖苏苏希望能够走访和访谈参与性交易的年轻妇女，然后把艾滋病预防干预介绍到农村的餐馆和舞厅。出于这个目的，她向省级部门、健康教育者、计划生育人员和乡镇官员寻求帮助（Liao, 1997）。

访谈地方守门人

地方守门人是那些控制着利用资源的权力的人，包括人力资源、地理资源、社会资源还有信息资源。为了接近某个具体环境进行研究，研究者的最佳策略是尽量找出那个必须会见的人，以便得到批准。有些守门人是一目了然的，很容易识别，但另一些却不是这样。在一所学校里，官方守门人可能是校长，但非官方守门人可能是一个教练、秘书、辅导员或学校综合大楼的监管，他们对于接触学生或得到某个特定主题——如辍学或大楼里的暴力——的信息也很重要。在一家医院，官方守门人可能是病房负责人、护理组长或医院董事，而非官方守门人可能是护士站的护士长。人事部主任、工会干事或者主管则可能是企业里的主要守门人。我们的个人经验提供了另一些例子：乌干达西南部安科莱地区的一个村长；明尼苏达州北部一座小城——莱克伍德的镇长；芝加哥西部墨西哥人社区社会福利中心的董事。这些个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有用的信息来源，但就像前面提到的资深官员一样，他们也可以加快或阻碍研究者进入。

守门人能否成为民族志研究者出色的研究伙伴和关键报导人要取决于他们的性格特征。与守门人建立关系要求耐心和开诚布公，在田野中和其他可能成为重要信息来源的人建立关系也一样。如果研究者做到以下几点，守门人将会提供很多帮助：

- 向他们描述研究项目。

定义：

地方守门人是那些控制着研究者获取所需资源或信息的机会的人。

- 请教他们的意见并请求支持。
- 请他们谈谈他们对社区、自己的角色、他们的联系、对与研究主旨有关的各种话题的看法。
- 请他们帮忙找出社区中可就研究课题提供信息的其他人。
- 经常和他们交流，确保关系持久和睦，他们的支持不会中断。

识别关键报导人

有效的关键报导人是那些对研究场景有广泛了解，或者对研究的某个重要方面有深刻认识的人。据吉尔克里斯特说：“关键报导人区别于其他报导人的地方是他们在文化中的地位的性质和他們与研究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更持久，无论情况如何变化，也更加亲密。”（Gilchrist, 1992, p.71）

关键报导人善于把他们的知识传递给研究者。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凭借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和经验、现有的关系网络、口头表达能力，以及对社区的广泛了解等优势来获得知识。这样的报导人对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知之甚详，并且比绝大多数能访谈到的人掌握更多信息。由于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的看法概念化并且表达出来，所以他们能够表达有用且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与研究课题和塑型理论模型里的各个域相关。

和守门人一样，我们不能期待关键报导人了解研究课题的全部，更何况，他们接触到的信息或个人经验可能会受其性别、年龄、社会阶级、种族或地域的局限。虽然访谈关键报导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主题，但为了保证效度和信度，就同一主题访问多个关键报导人往往会更好。因为这样做的话，从几个不同关键报导人那里得到的资料就可以汇总起来交互检验。如果民族志者从几个人那里听说同样的信息，并且/或者在不同场合几次都观察到田野里的同一种现象，那么民族志者就能更加确信自己从某个关键报导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具有合法性。

实例4.3 证实一所市区高中里的种族歧视感

社区研究学会（ICR）的研究者们曾经参与过一项长期调查，即调查阻碍市区青少年形成族际和代际关系的族裔和种族原因。ICR的暑期青年研究学会的一些青少年和一部分成年研究

人员及协助者提出一个初步假设：种族歧视是市区高中校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导致学生辍学的关键因素。然而，青少年研究者对学校的关键报导人（三个副校长）进行访谈的结果却得出了相反的信息。这个多种族（波多黎各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和西部印第安人）的副校长团队不同意种族歧视（指由于学生或职员的非洲血统、身体特征和语言文化实践而歧视他们）在学校里很重要。他们用自己的例子指出，社会性别差异更重要。来自这所学校的几个接受访问的学生领袖，包括几个非洲裔美国学生用亲身例子证实，种族歧视不是个问题，其他“主义”才是。但学生研究者们仍旧相信种族歧视是一个问题，于是他们在一项关于辍学因素的民意调查中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种族主义态度带给人们的烦恼。然而结果再一次是否定的。从两组不同的关键报导人和一次民意调查中得到信息使成年研究者和青少年研究者得出结论，种族歧视（至少根据研究和关键报导人的定义）在这座城市高中里真的不是问题。

关键报导人来自不同群体，具备研究者所感兴趣的文化域的专门知识。他们被选中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探索性信息，也因为他们能够把研究者和其他潜在的关键报导人及其信息来源联系在一起。不过，由于关键报导人不能完全代表所有重要的人口统计学分类或文化域，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和他们进行的访谈当成对全体的代表性访谈。况且，他们的知识基础一般是特殊的，即，除了在他们拥有特殊专长的领域，他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他们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甚至可能知之甚少。

可以出于探索的理由（即发现与某个已确定课题相关联的话题或新的域）或者理论上的考虑（即探究已初具雏形的理论模型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来选择关键报导人（Johnson, 1990）。无论如何，为了确保其代表性，应当从尽可能广泛的人群中来挑选。这个策略对于确保研究者在社区中的中立地位也很重要，因为与社区里的任何一部分人交往过密对研究者都是不利的，尤其是在研究的最初几个月里。

斯普拉德利指出“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报导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出色的报导人”（1979, p. 45）。一般而言，出色的关键报导人是这样一些人：

- 天生的研究者，对研究目的感兴趣，喜欢在自己周围探索问题，不管民族志者是不是和他们在一起。
- “跨界者”（boundary spanners），涉足各种不同的场景和网络，与各种派别和个人交往，并且愿意帮助民族志者与这些信息资源联结起来。

- 自我批判者，能够承认自己并不完全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或者并不完全了解他们被视为专家的那个领域，愿意承认自己和民族志者比较起来存在一些知识缺陷。
- 冒险者，不管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者的身份和意图如何，都愿意与民族志者合作。
- 能够察觉并理解针对某一主题的不同观点。
- 由于多年沉浸于研究场景而有着丰富阅历，或者对民族志者感兴趣的课题有丰富经验。

从远处观察

定义：

从远处观察是指研究者远远地观察与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相关的活动。

从远处观察是类似观众的一种观察方式，研究者不参与其中，它是为了使研究者适应，至少在表面上适应他或她应当变得熟悉的空间、人群、社会互动、装束、语言等社区的各个方面。研究者可以从远处观察生产线上的工人，在“情人巷”或公园里散步的情侣，或者在操场上与孩子们一起玩耍的母亲和教师。只有在研究者不会引起活动参与者注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远距离观察。另外，观察到的行为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在那儿，观察不会给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带来什么威胁或后果。从远处观察能帮助研究者获知地理方位；学习一般都怎么穿戴；发现在服装、打扮和空间使用上的年龄、性别和阶级差异。总的来说，这些不显眼的观察使研究者适应社区环境，并为更加系统的调查提供背景知识（Bernard, 1995）。

被引介到调查地点

到了某一时刻，民族志研究者会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在研究地点展开社会互动和调查，这或许早早发生，也可能发生在进入过程的后期。往往会由某个守门人或地方关键报导人承担介绍工作。有时，研究者在出场时需要同时向许多不同的人和不同派别描述项目。例如，1998年琼·申苏尔和一个研究团队开始研究青年人从吸食低致瘾性毒品（如大麻）到吸食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演变过程。研究者向青少年项目、母爱推广服务计划的合作者和替代性教育计划的辅导员介绍这个项目，请他们帮忙推荐研究的参与者。为研究项目写个讲稿或者简介总是有用的，因为在不同场合下，就算是对研究的表述风格有所不同，对那些针对项目的

质疑的回答也有所不同，但对研究的基本描述是一致的。

通常，如果是社区中某个德高望重的人引介研究者，那么介绍就不需要太详细。这是因为在大多数社区，关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通过一个受信任的熟人或朋友来介绍就表示由这个人作担保。不过，为了在社区中保持中立，研究者应当确保社区里有不止一个派别的代表引介自己，这样，研究者可以避免被归入任何一个派系。

一旦被引介到地方，研究者应当：通过经常性的走访来保持可见性；在某个地点或在社区里非正式地访问别人；愿意上别人家，和他们一起吃饭、购物、参加社区活动。

在民族志研究中，进入过程和研究正式启动之间的界线并不清晰，因为民族志者从他们踏进田野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收集信息了。尽管如此，田野作业的头一个月左右产生的许多印象都是不准确的，或与研究无关。随着研究者在田野里变得更加自如，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对发生在周围的事情变得更加敏锐，他们就可以开始更明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和研究有关的文化元素上。下面两章讨论的是专题式民族志研究的第一个阶段——非结构化或开放式访谈和观察。

参 与

•

观 察

•

民族志者观察

什么

•

记录观察：田野笔

记的语言

•

小 结

第5章 探索性或开放式观察

定义：

参与观察是一种资料收集技术，要求研究者在田野中到场、参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并做记录。

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指通过在研究场景中参与日常性或惯例性活动来学习的过程。参与观察标志着民族志研究的起点，这是因为：

- 它是识别和建立关系的核心，对以后的研究至关重要。
- 它除了教研究者从知识上把握事物的组织和排序方式以外，还带给研究者有关如何与他人发生关联，社会边界和物理边界又如何界定的直觉。
- 它展示了——日后还能证实——礼仪、政治组织与领导模式、社会的竞争与合作模式、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等级模式，以及那些不容易被提到的或禁止谈论的其他文化模式。
- 它使研究者在社区中的出现得到认可。
- 它为研究者提供了文化经验，这种文化经验既可以用来和研究地点的关键报导人或参与者讨论，也可以当作资料使用。

博德维克认为，参与观察还有其他好处，包括见证那些不会邀请局外人参加的重大事件的机会，以及接触到那些可能隐瞒公众的情况的机会，如某种宗教仪式、非法的或被社会污名化的活动，或者集体用来维持一种特殊认同感的活动（Bogdewic，1992）。

参 与

我们从观察和参与的定义开始讨论观察工具。参与往往被定义为研究者出现在进行观察的场合。如果民族志者生活在那些他们对当地文化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陌生社区里，一天24小时都住在那里并成为社区成员，这样来研究那些社区的生活，那么参与就意味着几近沉浸。对参与观察的传统定义就是指这种沉浸经历。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也必须不时地从田野中撤离，哪怕只是为了回到住所或私人空间记他们的笔记。否则，那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经验就不能转化成和科学资料一样可以被研究者（还有别人）阅读、诠释的文档。

民族志者和其他研究者仍然可以寻找机会沉浸于田野，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观察者并非社区生活的全程参与者。譬如在吸毒者和从事非法活动的人群中展开民族志研究，民族志者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专业上说都无法完全参与其中。参与的程度往往被表达为从“不参与到积极参与再到完全参与”这样一个连续统（DeWalt & De Walt, 1998, pp.262—263；也见Spradley, 1980）。

在第六册书里，我们描述了一些影响到民族志研究者是否容易被接受的个人特征，包括外貌、语言、阶级背景、举止、作风、年龄、身材、性别、种族和族裔。一些结构性特征，如约束男女行为与互动的规则、待人接物的规矩，都可能会影响互动的可能性。例如，在墨西哥乡村或塞内加尔，研究者独自居住或者住旅馆在文化上是不可接受的，研究者必须和一个家庭住在一起，根据这个家庭在社区里的地位和角色来体验社会生活，家庭或社区成员甚至可能给研究者起个当地的、家族的或氏族的名字。在墨西哥，琼·申苏尔的西班牙语名字是胡安妮塔。在塞内加尔，她第一次接受了一个沃洛夫人版本的名字——耶诺巴；后来，当一个传统的妇女组织的领导问她属于哪个家庭时，人们又把她当时正与之生活的那个家庭的氏族名称非正式地授予她。

和某个家庭融为一体会带来许多个人的、社会的和学术上的好处。但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期待研究者参与家庭事务，那么寻找私人时间来工作或独自旅行就会变得很困难。况且，家庭在社区中的处境可能会限制研究者获得信息和机会。与上述例子相反

定义：

参与是指当某个活动或事件正在发生时，研究者出现在那里并与之有互动。

的是，在中国，研究者可能会被当成官方的访问者，他（她）只能住在涉外宾馆或外国人公寓，他（她）的学习机会也可能被限制。

正如沃纳和斯科普夫勒（1987）所说，是否可能参与或能参与到什么程度要受环境和研究问题的影响：“住在一个波利尼西亚村子里研究要求全天参与；住在家里，每天往返消防队研究消防员则只要求部分时间参与。”（pp.258—259）

在人们希望研究者参与或研究者能够参与的活动中，参与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研究者出现在一个社区或某次活动中，除了陪伴他人、观察和提问，他并不需要做什么；而另一些时候，人们则可能期待他更积极地参与。有时候，研究者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例如：照看小孩、购买食物、修理汽车，和青少年或成年人做游戏，或者和公共卫生官员及教师一起开展一次公共卫生运动。传统上，人们期望民族志者通过实践来学习（即参与），但即使是在沉浸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场合，如宗教仪式，是不会邀请外来者或干脆禁止外来者参加的。

民族志者的参与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而遭到拒绝。这些原因或许包括缺乏信任，社区对局外人的存在感到不自在，社区成员认为可能会有危险，或者由于贫困或内战，社区不愿意或无力为一个陌生人提供持续支持。拒绝的技巧如下：

- 使用研究者不熟悉的行话。
- 符号转换（从研究者熟悉的语言变成研究者不理解的语言）。
- 当民族志者接近时改变话题。
- 拒绝回答提问。
- 把民族志者安排在听不清谈话的位置上。
- 不邀请研究者参与社会活动。

每个研究者都有可能被排除在外。对于田野调查者来说，尤其在早期阶段，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认识到自己是不是有意地被排除在外，并且判断这种排斥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的顺利进行。在民族志田野作业的最初几个月里设置参与的边界和限度，建立一套惯例，以及不时地离开田野，这是解决因长期沉浸于研究场景而带来压力和歧义的办法。



在参与和观察一段时间之后，研究者很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对方认可和接纳。这通常发生在一次不寻常的偶然事件之后，譬如帮助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家庭或群体；人们通过这种事看出研究者的确是认真为社区负责（De Walt & De Walt, 1998,p. 269）。

观察

观察总是要经过研究者的解释框架的过滤，最准确的观察是由塑型理论框架和对细节的审慎关注共同造就的。影响观察的其他因素，如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观，还有那些心照不宣的、暗含的或支离破碎的理论则毫无帮助。除了自身的偏见，民族志者在理解研究问题及其塑型理论框架时还应当小心谨慎，要尽量削弱偏见的影响而强化理论框架的作用。民族志者所观察、记录到的事实的质量及其重要性取决于他（她）的观察、文本记录和解释的技巧，还有进行观察的机会。

定义：
观察是指通过民族志者的眼睛所看到的。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民族志者观察什么，在何时何地观察，可以利用什么手段来改善观察技巧并提高资料的质量，以及如何记录观察到的资料。

民族志者观察什么

在田野的不同阶段，民族志者要观察什么是各不相同的。在田野作业的最初几天或几个月，研究者要花费时间来认识环境，对新情况的好奇心和学会如何在新情况下活动的需要推动着观察的进行。稍后，观察将变得更有针对性。

民族志者初次进入田野时，他们不会确切地知道要观察什么，特别是如果对该场景不熟悉的话。在田野作业的早期阶段，准确、具体细致地记录观察非常重要，千万不要把外在于被研究社区或文化语境的、事先确立的外部理论或概念框架里的范畴过早地强加在观察上。局部塑型理论会帮助研究者调整观察方向，找出应该看些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伴随着研究者的反复观察和不断提问，事物、行为模式、社会关系和社会事件的意义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在田野里观察到的行

为与塑型理论模型里的各个域联系起来，或者创建新的域，因为它们的含义现在已经清楚了。

为了理解田野里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崭新的视觉刺激、听觉刺激、嗅觉刺激和社会刺激，民族志者通常先做下面这些事：

- 观察场景。
- 观察、追踪事件和事件发生的顺序。
- 计数、普查、民族志绘图。
- 寻找社会经济状况差异的标志。

上述观察活动使研究者适应田野，并使他们能够对田野场景下主要的社会和文化方面进行归类。

观察场景

定义：

研究场景是发生与研究有关的行为和活动的场所。

场景是对一项研究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场所，那里可能发生一些涉及理解研究情境的行为和活动。要识别场景和处所的话，既可以通过和关键报导人进行讨论，也可以通过和当地非常了解被研究社区的研究伙伴一起工作。如果场景是公开或半公开的，那么研究者就可以不显眼地在其中进行观察。为了更加系统地进行半结构化或结构化观察，要对场景进行识别、定位并绘制地图，这可以在研究初期完成，它也有助于识别出那些重要的行为、事件和人物以便通过访谈和观察深入调查。

实例5.1 辨认青少年聚集的街道位置

为了找到合适的地方招募新人参与哈特福德市青少年转向吸食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研究，琼·申苏尔、洛里·布鲁姆霍尔和劳尔·皮诺对熟悉街道和城区的较年长的青少年进行了访谈。他们首先请这些青少年列出几种自己放学后或跳课时聚集的地方。青少年们列出了篮球场、城市公园的特定区域、街角、街道、酒类零售店、桌球室和俱乐部。接着他们在几张大型城市街道地图上用记号笔标注出他们所知道的、经常发生各种活动的场所，以及在那些地方出现的年青人的类型。这一信息使得年轻的民族志者/推广服务人员可以走访这些地点，用他们自己的观察证实这些青少年的报告，并吸收他们为新的研究成员。

接下来的案例说明的是，在利马，和当地关键报导人或专家一起工作怎样简化了确定医疗卫生场所的过程。

实例5.2 在秘鲁利马的Pueblos Jovenes（新社区）确定医疗卫生地点

在一项探讨利马的医疗卫生机构、社区组织、基础设施和儿科疾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民族志者首先和当地的儿科医师合作，找出那些提供医疗服务的社区和社区中提供服务的场所，包括较大的医疗诊所、卫生保健站、医院、社区食堂（妇女们为一部分预先支付一笔最低费用的社区居民准备饭菜的地方）、牛奶配送点和药房。研究团队可以走访每一个典型的地方，记录那里的空间安排、职工安置方式、处理的健康问题的类型、在服务时察觉到的问题、与其他医疗卫生设施的衔接、患者类型、社区健康教育规划、有没有社区卫生工作者以及社区关系。这些资料被记录下来变成田野笔记。

以下实例说明，研究者如何与健康教育者合作，识别出适合探索性观察的场所。

实例5.3 路易港青年人社会化的地方

斯蒂芬·申苏尔、琼·申苏尔、耶塔·奥迪特和同事们开展过一项研究，是关于毛里求斯产业工人中未婚女青年的性风险。在毛里求斯，人们仍然认为女性的贞操很重要，但性价值观和规范正在变化。近些年，由于年轻女性大量地加入产业劳动力大军，她们就有机会摆脱家庭监管接触到男性同伴。

研究团队首先采取的步骤是请毛里求斯家庭计划协会健康教育小组里较年轻的成员们罗列并描述年轻情侣们可以约会的场所的类型。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研究团队生成了一张场所清单，包括俱乐部、海边派对、海滨旅馆、当地的公园，还有年轻的工人们等待乘车回家的公交车站。关键报导人访问了出租车司机、俱乐部经理、海滨旅馆的接待员和生产车间的经理证实这张清单，并补充了其他一些场所。这样，研究小组的成员就可以不引人注目地亲自在这些公共场所观察青年男女之间的互动。

事件(events)

事件（events）是依次发生的活动，比某种单一的活动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也更为复杂。事件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场所，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事件有着特定的目标和意义，但不同的报导人对其意义的阐释可能不太一样。事件通常

定义：
事件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发生的系列活动。

- 有不止一个人参与。
- 有历史渊源也有历史影响。
- 不断地被重复。

可称为事件的例子有：讨论学校改革的社区会议；学习新的痢疾防治知识的社区卫生员的集会；法裔加拿大人的木雕作品艺术展；在城区里驱车射击；斯里兰卡一所大学里的“恶作剧”季（指老生戏弄新生）；由一个中学艺术项目提供的戏剧公演。

这些事件都会持续一段时间。例如，社区会议可能在下午六点开始，七点半结束；艺术展下午四点开放，一直到晚上八点结束；恶作剧季从某个周末开始，6个星期以后结束；而附近的驱车射击事件可能只持续15分钟。

典型的记者式提问可以概括为“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为何、为谁”，在描述某一事件时应当回答这些问题。请见实例5.4。

实例5.4 一家灵媒中心的酗酒治疗

许多年来，在哈特福德市波多黎各人社区中心的一条主要街道上〔何地〕，有一家灵媒中心〔何地〕提供各式各样的神灵服务、咨询服务和教育服务。每年一月，大约在三圣节的时候〔何时〕，该中心会主办一个社区集会，在集会上，马德里那（即教母）或大通灵师〔何人〕进入出神状态，扮演圣拉萨罗之灵，并和参加集会的成员〔和谁〕一起举行治疗会〔何事〕。依次进行的活动有〔何事〕：

- 社区集会。
- 正式介绍通灵术受训者。
- 在观众面前进入和结束出神状态的过程。
- 供上食物、鲜花和蜡烛等祈福。
- 圣拉萨罗之灵借马德里那之身出场，标志是雪茄烟雾的出现。

参加集会的成员要么自愿接受圣拉萨罗的祝福——由马德里那进行，要么被神灵确认为需要治疗。在整个社区的参加者和受训的灵媒〔和谁〕面前进行的治疗〔何事〕有各种不同策略，从只是祈祷到说明某个问题和某种疗法等不一而足，治疗通常包括心灵上的、家庭的和社区的支持。

有一次，圣拉萨罗特别注意一个受训中的灵媒，大家都知道他的酗酒引发了家庭暴力〔为谁〕。圣拉萨罗在观众面前非常详细地描述这些行为，并指出，传统的拉美裔男人的职责是要爱护家人，养家糊口，酗酒导致的暴力与这一角色不符。神灵告诉观众，受训中的灵媒的助手角色与一个虐待妻子的丈夫之间是格格不入的。接着，圣拉萨罗要受训者公开承诺不再喝酒〔何事〕，并表现出与传统的男子气概——关心自我、家庭和社区——相符合的举止。在这之后，受训中的通灵师进入出神状态，神灵也离开了马德里那的身体。于是，会众开始交谈、吃

东西，或者和灵媒交流。

以上描述说明，在描述某一事件时，“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为何、为谁”作为主导性元素要如何结合在一起。如果要更完整地描述该事件，还应当包括：

- 根据性别、年龄和任何可见特征计算参加人数。
- 描绘中心的布局。
- 描述中心的室内陈设。
- 描述人们在不同时间上的空间分布。
- 描写受训中的灵媒和他们的活动。
- 详细描述马德里那的行为，从扮演圣拉萨罗之灵之前到治疗活动结束。
- 每一个治疗事件的细节。

最后，单单描述这一事件是不够的，还应当补充以发生在中心的一些其他事件的记录，灵媒中心的历史，全面探究中心里的物品，那里的活动时间表，说明每一项活动。这些资料将形成描述“中心”在社区里的作用的民族志的基础。

计数、人口普查和绘图

在田野作业初期，研究者还不太会用当地语言，得到地方协助的机会也很有限，这时，要想更准确地把握社会空间里的人物、地点和事物就得靠计数、人口普查和绘图。我们可以从横向上或纵向上（longitudinally）收集这些资料以说明不同时间上的变化。

计数。计数是指罗列出各种人物、物品、场所，或者对于更加准确地定位社区中的事件、场所或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事物。例如，准确地报告“希尔赛德街和麦克多诺街之间的街区”有7座3层高的住宅楼，一栋有25个单元，仅剩3间空房的砖砌公寓大楼，一家有150个床位的疗养院，在西北角有一家小杂货店，这就让研究者可以将该街区的结构与同一条大街上的其他街区作比较，并且更准确地记录下这个街区的变化。

一个有经验的民族志者无论何时开始介入一个社会事件，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辨和清点参与这一事件的人物的社会

定义：

横向收集是指收集同一个时间点上的资料，而纵向收集是指在两个或多个时间点上从同一总体收集同一种资料。

类别（如艺术家、学生、年青人等），还要估计那儿有多少人，彼此的位置关系如何。如果族裔、性别和年龄是重要的社会差别（它们通常就是），那么训练有素的民族志者就会环顾现场以计算：

- 男性和女性的人数。
- 他们的大致年龄。
- 该事件是否不分种族（粗略估计那些从外表上可以看出其族群身份的人的数量）。

民族志者在毛里求斯的酒吧、海滨旅馆和公园里进行观察，他们计算在周六晚上一个指定时间段（通常是两个小时）内进出的青年情侣的数量，并与老年情侣的数量作比较。经过一个月的反复观察，他们用实际的情侣数量支撑自己的观察，也推断出其他时间段的情况（Schensul, Oodit, et al., 1994）。

在哈特福德市，有经验的民族志者在两条主要街道上一天三次——早、中、晚——计算海洛因吸食者的数量。这样他们就可以判断什么时间最适合发放漂白剂，最适合招募新的注射毒品使用者加入干预研究。

定义：

人口普查是对研究者感兴趣的研究场景中的某个特定单元进行百分百的抽样或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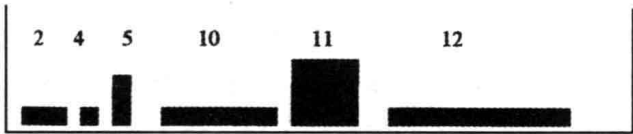
进行人口普查。人口普查（census）列出了研究者感兴趣的研究场景里的每一个人、家户单位或其他单位（如驯鹿、厕所、水泵、公共电话亭、垃圾堆）。开展人口普查在任何场景下都是有益的，即便是在大城市里。但是不可能在大城市里进行全面的普查，那也不划算，只能在城市里即将开展研究的指定区域进行人口普查。普查枚举除了为稍后的抽样目标提供一个准确的研究单位的数字以外，还要为民族志者呈现出一幅人口或物品如何分布的总画面。因此，我们在一次人口普查中只收集少量信息。

确定街道的地址之后，通常可以用一张简单的调查表或枚举清单（见表5.1）来收集家户普查资料。如果没有街道地址（比如发展中国家城市周边新兴的棚户区，或者斯里兰卡或塞内加尔的农村地区），则可以通过在地图上标出家户来进行普查枚举。地图也是罗列出其他基础设施或环境特征的有效工具。



表5.1 家户调查表

1.街道地址 _____				
2.家户人数 _____				
3.家户房间数 _____				
4.租用 _____ 自有 _____				
5.家里有没有住着16~24岁的人? 列出姓名和年龄(写出出生日期):				
(a) _____				
(b) _____				
(c) _____				
(d) _____				
6.有没有不住在家里的16~24岁的家庭成员? 列出每个人的姓名、年龄、当前住址和联系方式:				
姓名	别名	年龄	当前住址	联系方式
(a) _____				
(b) _____				
(c) _____				
(d) _____				



奥尔巴尼大街 (Albany Avenue) — “大道” (“THE A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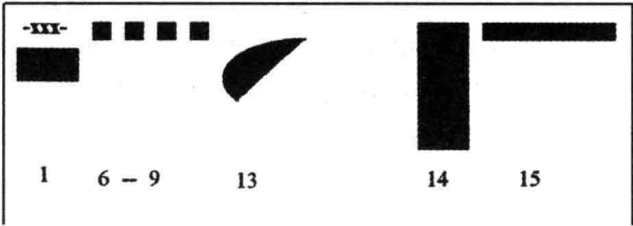


图5.1 哈特福德市北端一个街区的地图

民族志绘图。佩尔托夫妇 (Pelto and Pelto,1978) 指出：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民族志报告里往往缺少发生社会行为的地理场景的地图。其实应该用这类地图定位主要的活动场景（如球场、宗教场所、市场）、社区的社会区隔、农业区，邻近社区的方向和距离，以及重要的自然地貌，如河流、山脉和沼泽。
(p. 193)

民族志绘图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它是了解城区、农村或其他社会地理区域的首要活动。

图5.1显示的是一张街道地图。任何观察者都能画出一张这样的地图，只要他们沿着城区的一条主要街道或有住宅的街道漫步，注意建筑物的位置和大概的占地面积，留心它们的功能、外观，建筑物看起来是民用还是商用，同时留意其他任何可能和研究主题有关的东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地图上给那些建筑物都标上数字，然后对每一栋建筑物进行仔细观察。

举例来说，漫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北部的主要街道（“大道”）上的民族志者会注意到图5.1中的地图其实是位于蓝山路和宅地路之间的街区。第一个建筑物（1）是一栋办公大楼，驻有大哈特福德城市联盟和其他一些企业。对面是一所小学（2）。小学旁边是公共图书馆的一个分部（4），在它旁边是一座3层楼的公寓（5）。建筑物6—9是独立的家庭住宅；（6）和（7）的住户分别是由三四个男人组成的小群体，他们彼此认识。区域13是一个小公园，孩子们聚集在那里投篮玩，而妈妈们带着她们的小孩在临街一侧荡秋千。建筑物10—12一起构成了北哈特福德中学的综合楼。街区余下的建筑物（14，15）被木板围住，可能是要被市政拆除的标记。

符号“-XXX-”标注的街道位置有一辆汽车，它在警察的追赶下撞上了一根电线杆。群众开始围观，而司机和乘客自行逃出，并在警察追赶下沿街道一侧逃跑，只留下旁观者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张地图记录下事件的情境。事件发生在民族志者正在观察这个街区的时候，所以都被记录在民族志者的地图上。这些资料描述了最后可能在街上观察到的意外事件的重要背景。

我们可以继续标示出年轻的妈妈们购物或逗留交谈的地方；可以找到空注射器的地方；青少年闲逛和打篮球的其他地方；未成年人非法买酒的地方；居住在这个城市地区的不同族群成员（西部印第安/加勒比人、海地人、非裔美国人、古巴人和波多黎各人、多米尼加人等群体）集会的地方；母亲们陪孩子上学的路线，等等。有15个街区构成了哈特福德市北端商业带的核心，所有这些在不同时间收集积累起来的资料为建构其中一个街区的历史并描述该街区的生活提供了基石。

在图5.2a和5.2b的地图里，民族志者标出了一个正在搞卫生展览会的社区公园里人们聚集的位置。各个聚集点都用群（GP）和数字（1—5）来标记。每个群由一个摊位或一张桌子构成，人们聚集在它周围。我们可以注意到，从绘制图5.2a的时间点（早上9：30）到绘制图5.2b的时间点（下午1：30），参观展会（用x表示）的人数急剧增长。这两张图还大致表明了各个时间点上哪一个摊位最受欢迎，用不同时间点和不同摊位上的“X”的相对数量来表示。配合这张图的田野笔记说明了分群的可能原因；每一群人有何区别（如果有的话）；一共有多少人在现场；还有，观察到各人群内部的个人之间和群与群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教室也可以绘成图。如果要阐释教室里的社会关系、教师对教学技巧的选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多元化的学习方式，图中就要包括以下重要内容：桌椅的摆法；黑板；教具的类型、分布、位置和可及性；教师桌子的摆放位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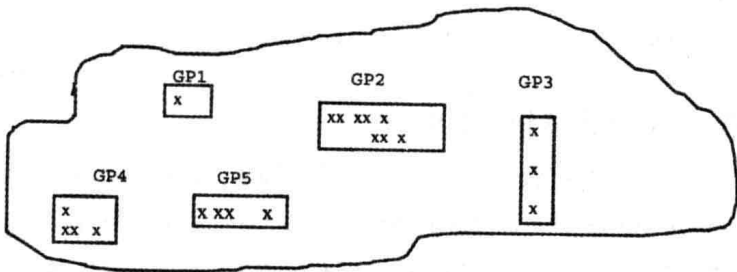


图5. 2a 社区卫生展，上午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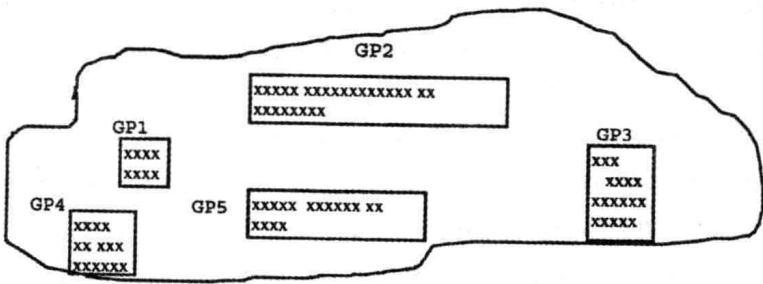


图5. 2b 社区卫生展，下午1:30

实例5.5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向儿童介绍社会绘图

有人设计了一项有意思的实验向孩子们介绍社会绘图和GIS的运用。一群四年级学生决定考察他们所在楼层的几个教室里的族裔和社会性别的相互影响。首先，他们手绘了几张自己所在楼层的教室位置图，然后把教室图转换为一个电脑化的数据文件。接下来，他们收集每个教室里的教师和学生的种族与性别的信息，并将这些数据输入另一个数据库。利用ARCVIEW（这是一个用于绘制环境地图、人口统计图和社会变量图的软件），他们可以把几个数据库衔接起来，说明不同教室的学生和教师在性别和族裔方面的变化。这一直观的展示让他们可以推断全校教师/学生符合这些变量的程度，并讨论如果不符是否会导致教学质量上的差别（伯格，个人交流，1998）。

定义： 绘制地图的活动实际上可能更具有侵略性，尤其是当它们发生在比较私密的空间的时候。在斯里兰卡的山区，从一个村落漫步到另一个村落，并且记录着房屋的具体位置，这是一件极为引人注目瞩目的事，对于那些没有见过研究者，也不知道他或她正在做什么的村民们来说，这很可疑，甚至带有威胁性。以下案例说明了绘图不仅不可能，而且还很危险的一种情况。

GIS指地理信息系统，它借助计算机，把有关空间的量化资料组织起来以说明社会模式。

实例5.6 通过观察来绘图属于危险情况的例子

勒孔特想在“平纳克尔”这个城镇进行一项为期五年的校区研究，她想完成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绘制一张社区里的主要机构的地图。许多公共场所很容易进入。开着车穿过小镇，勒孔特就知道了大多数商业企业，如几家旅馆、食杂店，一个贸易站和几家餐馆，都沿着在小镇中心相交成“T”字形的两条高速公路分布，沿途还有邮局、部落警察的办公室、州高速公路局、住房补贴办公室、每周举办跳蚤市场的一大块空地和诊所。除了小学以外（它退居一条主要叉路上，挨着印第安人卫生服务所和医院的围地），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的围地、所有公立学校的建筑物和学校的地区总部都位于南北向高速公路旁被圈起来的那一大片地里。其他标志性建筑物，如水厂和城市垃圾站，也都可以容易地画出来。

由于种族和职业的关系，平纳克尔镇的房屋非常分散。只有来自平纳克尔地区的纳瓦霍人才能在镇里拥有自己的土地，因此多数雇主在围地内为非纳瓦霍族员工和非本地印第安人员工提供住房。这种住房被安排在四个有围墙的大围地里：一个紧挨着教学建筑群，供教师和教职员居住；一个从公立学校综合楼横跨至高速公路，供印第安人事务局寄宿学校的职员居住；一个附属于医院供其员工居住；还有一个靠近公立学校综合楼，供附近煤矿的雇工居住。最后还有一个可供居住的小综合楼，位于小学的围地内。

画出这些区域的地图易如反掌，但如果想添加细节就意味着勒孔特要面对敌意。大多数当地的纳瓦霍人生活在“山上”——主高速公路西边的一个地区，这里也集中了大多数教堂、一



些小商店、社区花园和一个当地印第安男人非法聚集饮酒的地方。非本地人只在公共场所和与其工作相关的住房围地里受欢迎。勒孔特可以在学校和教师住宅附近，包括跳蚤市场在内的任何公共场所逗留。然而，即使她作为一名顾问已经在这个社区工作了许多年，但就算她是开着车来到“山上”，也会受到怀疑。人们朝她扔石头，当地人的反馈清楚地表明非本地人不当冒险离开预留给他们的区域。一所接一所房子地绘图是不可能的了，甚至是在那些有许多非印第安人生活的围地里也不行。经过连续几个月与当地教师交谈，并且在一个纳瓦霍教师助手的陪同下，勒孔特几次突然行动，开车穿越小镇，一张囊括主要道路和机构（如教堂）的地图这才被拼凑完整。幸运的是，勒孔特研究的是地区的教学实践，一张详尽的社区地图并不是研究所必需的资料。

当斯蒂芬·申苏尔、琼·申苏尔和贝拉斯克斯（Velazquez）的研究小组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霍姆斯特德市（Homestead）对生活在外来工营地里的合同工开展健康调查时，他们也遇到类似问题。居住营地属于私人所有，如果研究者没有得到业主的允许就进入营地绘制地图并调查家户，那么他们自己包括被调查者就会受到业主的安全巡逻队的武力威胁。

相反，在墨西哥农村的公开市场上计算卖主的摊位数和所售产品的种类一点儿也不会引人注目，因为在市场上买东西的人很多，而且卖主来自这个国家中部的各个地方，他们对陌生人习以为常。

定义：
社会差异被认为是
在外表、收入或生
活方式上的区分模
式，它把人们互相
区别开来，并且往
往分出彼此的等级
高低。

社会差异的社会经济指标或其他指标

社会差异（social different）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在任何社区或社会场景里轻而易举地观察到能反映“社会差异”概念的指标。社会经济差异是指个人、家庭或群体之间在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收入等方面的总体差别，它显而易见，在大多数民族志研究里也都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受访者的特征和偏好来推断个人乃至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状况差异：

定义：
指标是研究者从普
遍的可能性行为、
信仰或物品中挑选
出来，用来代表研
究中的重要概念的
元素。

- 服装的选择。
- 发型。
- 首饰的种类和数量。
- 休闲活动。
- 言谈和措辞风格。
- 电视节目的偏好。
- 汽车的选择。
- 居住地点。

在社区层次观察社会经济差异的另一个办法是看房屋或宅地在外观和结构上的差别，或者用现金购买的物品的差别。

实例5.7 在斯里兰卡农村的稻米种植区观察宅基地的差异

马哈维利发展计划是一个国际资助项目，目的是把斯里兰卡东部的大量人口从人口密度过大的高地村庄迁移到一片新近可灌溉的旱地上。包括笔者在内的一群研究者曾经参观过这一项目的C区。移民们得到一些用于重新安居的资源 and 一小块宅基地。宅基地沿着长长的灌溉渠排列，这要求住户既要合作挖渠也要保证住在渠道两端的人有水可用。家户的繁荣取决于在用水上的合作和其他因素，如除种稻以外的替代性收入，家户里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研究小组走访了几条沟渠，留意房屋的大小、围墙的成分（煤渣还是混有树枝的泥浆）、屋顶用的材料（棕榈叶还是锡板）、房屋周围清空的地块面积、有没有果树、是否养鸡和其他可以出售的家畜、有没有从商店里买的炊具。他们用这些项创建了一个量表，作为衡量家户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调查工具（Amarasiri de Silva，德席瓦尔，1993）。

在秘鲁利马的新城镇开展的研究也用到了同样的办法。研究者只要走过几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就会发现能够说明经济状况和富裕程度差异的家户结构变化，包括：

- 麦秸墙和煤渣砖墙的对比。
- 有没有屋顶和屋顶的类型。
- 有没有旱厕，是建在自家房子里还是公厕。
- 有没有木制大门。
- 有没有窗户和窗户的数量。
- 有没有储水箱，附近的街道有没有水龙头或者是自来水。
- 垃圾处理办法（堆在房屋附近、焚烧或有人来收）。
- 合法或非法（私接电线或偷窃）用电。

新手的眼睛注意不到这些标志，但是一经社区医生一一指出，它们立马就在研究者眼里变得显而易见。

即使只访问少数家户也常常能发现用可支配现金购买的物品存在不同。这些物品根据情境各有不同。例如，在发展中国家，标志着重要的社会差异的物品一般是那些用机器制造的、代表现代生活方式或城市生活方式的物品，如家用电器、电视机、摩托

车和室内盥洗室。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家里有许多这类日用品是很平常的，能够表明社会差异的符号是一些手工制作的产品（如手工编织的进口地毯、艺术品或精雕细刻的木制家具）。我们必须事先找出哪些物品是地位差异的指标。

观察者一般会有很多机会就这些物品提问，包括它们的价格、购买地点、使用情况和在家户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用物品构成衡量家户的富裕程度或兴盛水平的量化指数或量表。通过观察和访谈获得的量化资料既能够帮助我们判断量表中应当包括哪些物品，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后续研究中解释量表或指数值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联。

还有许多可以靠观察来探索和阐明的域。塑型理论有助于我们界定这些域是什么，然而，田野里的观察总是会揭示出新的个人行为、社会关系、物品和其他社会事物或社会事实，在确定它们的编码和在概念分类中的位置之前，我们必须通过反复观察和访谈来发现它们的意义。

记录观察：田野笔记的语言

现在我们已经明了，要完成令人满意的民族志研究，观察是至关重要的。研究者的下一个挑战是要把观察转变成田野笔记，形成对经验的科学记录以便日后参考。田野笔记越全面、越准确，研究者就越容易把它们当作资料来编目、编码和运用。

撰写出色的田野笔记离不开详细具体地观察和有规则地记录。如果研究者研究的是自己的社区，或者在田野待几个月后已经对环境相当熟悉，那么详尽的观察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儿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民族志者必须记住，田野笔记不只是为自己做的，而且如果记录详实，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或许就会注意到一些在片断式的观察中不很明显的模式。

做田野笔记时应牢记以下几个要点：

- 应当从行为本身，而不是根据行为对观察者的意义来界定行为。譬如，在一个会议上不停地拨弄铅笔、眼皮也耷拉着的行为有几种可能：厌倦、不赞成、不理解、恼火、受挫或为别的

事情分心。研究者应当描述行为，避免在田野笔记里赋予行为意义，除非他们知道在那个场景下该行为对其他人传达着什么意义。

- 对某个人的描述应当包括外貌、着装、鞋子、举止、个人所携带的物品的细节，还有可以说明其地位的物品的细节。例如，与其说火车站里的某个人“贫穷且衣冠不整”，不如更加精确地说那个人“穿着磨破了边的蓝色牛仔褲，身上的军用夹克背面都是污点、领子也扯破了，没系皮带，白色T恤的领子上有红色污渍，鞋子开了口，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和一个塞满报纸的纸袋”。人们在一个为当地报社编辑举行的告别晚会上或许衣着优雅，但如果民族志者没有描述大家都如何穿着打扮，那么我们会对那种氛围里的优雅的含义一无所知。
- 环境的自然状态也应当仿佛用照相机拍摄的那样来描述。可以用大量的视觉刺激来描述一间既明亮又温馨的教室，但如果描述中提到“墙壁被涂成温暖的黄色和橙色。四面墙的其中三面上挂着10到20幅照片、海报、儿童绘画和写作范文，一些范文写在有彩色纹路纸上，其他的则搭配以五颜六色的线条、边框或图画。”那么读者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场景。

佩尔托夫妇（Pelto and Pelto, 1978）提出了如下好建议：“在任何情况下，田野作业者都应当描述观察本身，而不是从观察中得出初步推论。”（p71）推论和田野调查者的个人观察、反思、直觉和情绪反应可以单独记录，要和描述事件或状况的田野笔记主干区别开。

一本便笺簿大小（5×7英寸）或更小的笔记本和铅笔或钢笔就足以帮助民族志者回忆和记录他们的观察了。观察者可以用自己喜欢的任何一种唤醒记忆的速记法来记录观察。一旦回到住处或者可以使用打字机或电脑的时候，他们应当尽可能快地把速记笔记转换成详尽的叙述。民族志者也可以利用小型录音机来记录田野中的观察。找一个私密的场所来录音很重要，因为对一些观察者来说，公开录音恐怕会惹人注意，也可能引起怀疑。虽然记忆力会随着练习而进步，但没有一个民族志者可以单凭记忆来重构田野笔记，更重要的是记忆有选择性，容易产生偏见，再说即使是那些重要的话题，24小时以后回忆也会显著消退。

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为记录观察而在田野中使用电脑，因为键盘的声音有干扰，在某些情况下，新技术也可能会让人分心。我们还要告诫大家，不要在来往田野地点的交通工具上携带笔记本电脑，除非它们是为了方便在两个访问地点之间录入田野笔记。便携式电脑以及储存在里面的田野笔记很容易丢失或被移动，这样就会造成资料的丢失，也危及保密性。

就短期研究而言，田野笔记大约只有50到100页，研究者可能会亲手对田野笔记进行分类，将它们编码成大段大段的文本。比较大型的研究则会产生页数多得多的田野笔记，特别是以民族志田野团队的形式开展研究时。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做法是将资料输入电子文本管理程序。大多数文本管理程序都设计成用标准的文字处理程序（如MS Word或Word Perfect）来阅读文本，田野笔记遵照文本管理程序下的指令统一编排格式。概言之，不管一项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我们都主张把个人观察、初步分析与观察到的事物本身区别开来。

供个人使用的一张典型的田野笔记表格如图5.3所示。

下面的实例部分展示了一组典型的田野笔记。笔记来自斯科特·威尔逊（D. Scott Wilson）进行的一次观察。斯科特·威尔逊所做的民族志研究由社区研究学会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威克斯（Margaret Weeks）领导，旨在研究是否可能把对艾滋病病毒预防的干预引入成人吸毒者吸食毒品的场所或地点。在所有的艾滋病研究中，民族志者都携带并分发可以使吸毒者保护自己不受传染的物品。观察方案要求实际地观察几次人们吸食毒品情形，了解他们有没有保护自己，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保护自己。

在下面的观察中，民族志者如实地报告各种活动，描写了一个报导人如何获得毒品，现场的当事人如何注射可卡因，同时用清洁的针具保护自己。地点是一个报导人的公寓。

观察者_____ 日期_____	事件_____
笔记	田野调查者的评论

图5.3 田野笔记记录表

实例5.8 在吸毒地点观察和正式访谈吸毒者之后记录的田野笔记

田野笔记：5-1-98，1:20 p.m.

地点：一间公寓

D. 斯科特·威尔逊（民族志者）

HRS（项目所称的“高危地点”[High Risk Sites] 的缩写）

“于是我们走进并坐下来。她蹦来蹦去地数着她的钱，看来有200美元和一些零钞。她说‘我刚叫一个男孩给我带一包来。他不会要我9美元的。我告诉他，另一个小孩想要我9美元’……

她开始换衣服，APR20 [根据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对另一个报导人的编码] 回来了，领到薪水和即将得到毒品的兴奋，使她们有些欢呼雀跃。我给JAN24带了一包香烟。JAN24和APR20离开公寓到当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等那个去取大麻的‘男孩’。

桌上有两包注射器，一个被打开了，另一个没有。桌上有三个空的大麻包，两包走鹃牌，一包泰坦神牌，还有杂七杂八的各种物品。

那个露面的小家伙已经进ICR两次了。他第一次出现是两周前，我让他下周再来……他是一个黑小子，可能至少有一部分波多黎各人的血统。他的头发剃得精光，有一嘴浓密的胡髭，手臂肌肉发达，左胳膊上有纹身。他的个头很矮，膝盖上有两个圆圆的东西，像是在裤子下面藏着两个烟盒的盖子。他走路时拄着一根拐杖。

他在JAN24不在的时候露面，我让他进来。显然他在白天早些时候曾到过那里。他对我的

出现多少有点怀疑，但最后还是放松了一些，不过一直不想和我有任何交谈……

JAN24回来了，那家伙掏出的东西实际上是可卡因粉而不是大麻……这是相当大的一罐可卡因粉。他们把可卡因粉倒在一把汤匙里。JAN24说‘对，这是支新牌子的注射器。’她取出40单位的粉末放进注射器再放在匙子里。她自己用一半，他用一半，他们就在那里注射毒品。看起来可卡因粉没有对他们产生强烈作用。”

请注意，好的田野笔记有以下一些特点：

- 有选择地准确复述一部分对话，向读者传达一种身在现场，与行动者面对面的感觉。
- 为确保匿名性和保密性，从头到尾都使用假名或独特的身份（数字/文字）。
- 观察记录按照活动发生的先后次序进行描述。
- 研究者在描述那个带毒品到观察地点的新来者的外貌时，没有对其外表的意义做任何初步推断。
- 笔记涵盖了与该事件有关的事件和人物的历史。
- 研究者把自己对事件和谈话的概括与直接引用的对话区分开来。
- 日期、地点、时间和研究者的姓名都记录在这组笔记的最前面。

在城市各个地区的成人吸毒场所或非吸毒场所进行过观察和正式访谈之后，得到的上述田野笔记与其他笔记被汇总成一个资料库。笔记的内容按照各个域、因素和变量编好码，可以用寻找各单元、模式和结构之间的关联的方式进行分析。

小 结

本章，我们梳理了在田野中进行开放式观察的技巧和途径。简而言之，参与观察在以下方面大有裨益：

- 记录下进入新的田野的起步阶段。
- 收集非操作性的或仍未界定的概念或文化域的信息，这些概念或文化域在塑型理论模型里，或者在引导研究的成套调查问题与假设中至关重要。



- 找出可以充实塑型理论模型的新的文化域。
- 提供描述性信息，支撑和完善对所收集到的量化资料的解释。

深度访谈也能实现其中一些类似目标。不过，深度或探索性访谈所采用的访谈和记录技巧，以及开展访谈的情况往往和参与观察有所不同。下一章，我们就转向深度探索性访谈的技巧及其运用。



第6章 深度开放式访谈

深度开放式访谈是最需要技巧，同时也是最具创新性和最令人兴奋的民族志访谈形式。深度是指访谈者要详细探讨某个话题以加深了解。开放式指的是访谈者要敞开心胸预备接受任何一种回答，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也不要求受访者在备选答案中做出选择。访谈目的是探索，是去发现那些我们认为对研究很重要但却知之甚少的文化域。这种开放的、探索性访谈形式使研究者能够最灵活地深入探讨任何话题，网罗刚刚出现的新主题。深度开放式访谈的主要目标有：

- 探索塑型概念模型中未被定义的域。
- 辨识新的域。
- 把域分解成因素和次因素。
- 获取有关研究和研究地点的情境与历史的导向性信息。
- 在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建立相互理解的、积极的关系。

令人满意的探索性访谈需要警觉、逻辑思维能力和出色的沟通技巧。任何时候，访谈者都必须：

- 牢记话题如何与研究提出的更大问题相关，如何能说明那些大问题。
- 判断访谈是否正在围绕主题展开，如果不是，该如何重新回到主题。
- 在讨论时，如果受访者的思路与访谈者迥然不同，要设法理解

何时访谈何人

•

准备访谈

•

开始非结构化访谈

•

结构化开放式访谈

•

访谈中的自我管理

•

记录访谈

•

小 结

定义：
深度访谈是指详尽地探索某一话题的任一方面或全部方面。

定义：
开放式提问让受访自由回答，不受访谈者提供的备选答案局限，也无需拘泥于回答的长短。

受访者的思路。

- 决定是否要跟进新的想法和思路。
- 追问一些术语的意思。
- 分辨受访者的想法何时已经表述清楚，何时还需要进一步详细说明，确保每一个阅读笔记或访谈整理的人都能理解。

正是以上这些目标和要求构成了激动人心的挑战，也需要有丰富的实践。

何时访谈何人

探索性访谈旨在拓展研究者对那些人们尚缺乏了解的领域的认识。深度访谈要遵循塑型理论框架的设计，探索研究中的主要文化域、最初的假设，以及与研究相关的情境因素。被研究者和社群成员认定为对所探讨话题具有渊博知识的人就成为关键报导人或文化专家，由他们接受访谈。没有必要为了获得某个主题的大量信息而访问许多关键报导人，但是在研究的这一阶段，有必要找到那些见多识广的关键报导人。正因为他们对于该主题所掌握的信息要比民族志者丰富得多，所以沃纳和斯科普夫勒（Werner & Schoepfle, 1987）说这些文化专家就是研究顾问。

在有关吸毒的研究文献中，普遍认为青少年开始吸食高致瘾性毒品遵循的是一条单一路径，即从低致瘾性毒品到迷幻剂再到可卡因和海洛因，而下面这个案例运用探索性访谈驳斥了这种观点，同时也证实存在其他路径，这些路径在稍后的定量资料收集得以测量和确证。

实例6.1 揭示青少年吸食高致瘾性毒品的轨迹

在一项针对哈特福德市的青少年从服用大麻、酒精到吸食可卡因、海洛因等毒品的演进过程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和研究文献的观点相反，该研究表明，当青少年开始吸食各类毒品时，他们走的道路各不相同。在同已经注射海洛因的青年进行的深度访谈中，我们问及他们开始吸食每一种毒品的时间和情况。如我们所预料，这些访谈表明，青年们演变到注射海洛因或吸食古柯碱的地步有各式各样的路径而非单一轨迹。对开始吸食每一种毒品的社会情境的探索指出，社会性别、族裔、朋友和伙伴间的关系，以及毒品的可及性对一个青年可能选择什么路径有重要影响。

研究者认为有几个主要的文化域会影响印度洋毛里求斯岛上男女青年之间的关系变化,下面的例子就说明了深度访谈是怎样提供有关这些域的信息的。

实例6.2 探究毛里求斯青少年中男女关系的社会背景

毛里求斯产业工人中未婚女青年的性风险这项研究提出的塑型理论模型认为,“家庭”、“同辈”和“工作”这三个文化域对于塑造男女关系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是很重要的。然而,即使是来自毛里求斯的研究合作者和健康教育者也不确定这些域如何构成,它们内部究竟发生了哪些可能增加男女青年之间的互动机会和亲密机会的变化。为了探索这些域,也为了辨识和研究课题相关的每一个域内部的因素,研究团队决定访谈那些非常了解家庭生活、工作情况和同辈关系的人。

在家庭这个域,他们认识到毛里求斯有三个主要的族裔—宗教群体:有非洲—法国血统的克里奥尔人和印度裔毛里求斯人是基督徒,还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这三个群体对家庭的态度和家庭关系都有所不同。为了搞清楚什么样的行为对年青男女来说是得体的,他们决定除了访问一小部分家长之外,还要访问分别为三个群体服务的、来自机构的家庭服务人员。

为了探索同辈域,研究者决定访谈一小部分样本,即三个族裔—宗教群体中各访谈20个左右的男女,以便发现他们分别与同性同辈和异性同辈参与什么样的活动;他们独自去什么地方又一起去什么地方;男女在什么时间、什么情景下约会;还有,对于这个年龄段的未婚青年来说,被认为得体的关系包括哪些。

为了理解姑娘小伙们在工作场所发生社会互动的机会,研究者打算走访首都路易港附近的几家大型工厂的车间主管。生产车间的主管要负责工人人们的行踪,他们可以告诉研究者在工作日和工作日之外,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在什么地方聚集,他们是否观察到工人之间或工人与主管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友谊或亲密关系,以及在一周的工作时间里是否有可以让男女进行社会交往的社会活动。

这些访谈不仅告诉研究者毛里求斯年轻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也为进一步调查提供了重要的次文化域。例如,在“家庭”域里,通过深度访谈辨识出“家庭关系”、“家庭活动”、“家庭经济地位和工作情况”以及“家庭健康状况”等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和一个女青年是否有经济基础、闲暇和机会与家户以外的男性发生联系相关。

在“同辈”域以下,通过访谈确定了“社会活动”(划分为同性/异性活动)、“关系类型”、“亲密约会的场所”、“亲密行为的类型”等因素。针对工作场景的访谈则揭示出另一些重要因素,包括“男女互动的社会环境”、“工作关系”和“向上流动的要求”(Schensul, Oodit, et al. 1994)。

在整个民族志研究过程中，无论何时，只要有某一个抽象层次上的域或概念需要做补充调查或澄清，就可以进行探索性访谈，这是为了发现新信息，拓展现有的认识。根据经验，一般做法是找出需要新信息的域，针对与这些域相关的话题访问当地专家。尽管深度探索性访谈不是为体现代表性，但在选择关键报导人时，民族志者也应当考虑几个主要因素，如族裔、阶级或年龄，因为它们可能和受访者的观点密切相关，这样做就保证了观点不至于偏狭。在毛里求斯的个案中，塑型理论模型决定了深度访谈将围绕哪三个域进行。为了理解家长这个域，我们从三个主要族群中各挑选一个家庭服务人员和—个16~24岁、在工业区工作的未婚女青年的家长进行访谈。家庭的族裔性在毛里求斯个案里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同群体对女性的保护规则和性行为规范都不一样。

准备访谈

在准备探索性访谈时，民族志者必须：

- 重新审视研究问题和塑型理论模型。
- 拟好一些在访谈中可能用到的一般问题。
- 预约合适的访谈时间和地点。
- 准备好记录用的工具和设备。

重新审视研究问题并拟定提问和追问问题

定义：

追问是鼓励受访者更深入、更清晰或更广泛地思考某个议题的中立性问题。

探索性访谈可能是非结构化的，但绝非毫无计划。探索性访谈要有一系列来自研究问题和塑型理论模型的开放式提问，其中每一个提问都辅以一组追问。可以激励受访者提供更多信息的一些典型的追问方式如下：

- 表示同意或认可的中性陈述（“哦，是的，我明白”；“嗯”）。
- 用提问的方式重复对方刚才说过的话（“在你把两岁大的儿子送到急诊室之前，你让你的兄弟去筹钱来支付医疗费？”）。
- 询问更多信息（“你能更详细地告诉我，亨利为什么想要一份教材修订本吗？”）。



- 请对方解释刚才所说的话里的前后矛盾（“你刚才说你不到21岁，但现在又告诉我你去了需要证件的俱乐部〔即要求不到法定年龄的顾客出示身份证〕——你到底几岁了？”）。
- 询问受访者的观点（“刚才你说那个镇的姑娘们都在纺织厂工作。你对此有何看法？”）。
- 请受访者澄清某个词的意思（“你用了‘玩玩’这个词。你的意思是什么？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你用‘玩玩’表示什么吗？”）。

接下来的实例是就一门新课程的引进，对一位课程主管进行探索性访谈的一组问题（见表6.1）：

表6.1 在探索性访谈中使用的提问

访谈者：这么说你刚刚开始 ¹ 在希尔赛德中学开设一门新的社会发展课程。进行得怎么样？（追问：谁上这门课，谁不上，它和原来的课程有什么不同，它比原来的课程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问题）
访谈者：你是怎么向教师介绍这门课的？（追问：培训过程如何，有什么技术辅助，课堂监控，教师所需的特殊帮助）
访谈者：这门课程是否提到当前的学校体系里孩子们面临的一些主要社会问题 ² 和健康问题？（追问：孩子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问题如何融入课程？相比于现在使用的标准课程，这一新课程将如何增加机会改变孩子们的行为或处境？）
访谈者：课程的开设在你的部门造成什么变化？（追问：在职员、组织、做其他工作的时间、紧张程度、活动等方面）
访谈者：课程的开设给学校造成什么变化？（追问：学校活动、教师合作、冗员流入、新规划，等等）

回到毛里求斯的例子，我们在表6.2中列出了一组探索性访谈的提问，访谈针对的是毛里求斯青年与同龄人开展社会活动的情况。

表6.2 探索性访谈提示：就与同辈的活动访问青少年

●你在工作期间、工作之余或别的时间里，有没有空闲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做些事？（追问：何时；空闲时间意味着什么；有没有缩短闲暇时间的家务；他们有没有不同的朋友圈，如果有，是什么样的？）
●你和朋友们在一起都搞些什么活动？（追问：列出一份活动清单，并详细询问其中每一种活动都包括什么，发生在何处，活动持续多长时间，多久搞一次；询问和什么样的朋友——同性还是异性——搞这些活动）
●有情侣（指男女朋友）共同参与其中任意一种活动吗？（追问：哪一些活动，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别的？）
●有没有什么活动是父母不允许你们做的？（追问：哪一些；为什么；他们是否无论如何都会搞这种活动，如果是，怎么做？）

许多事情都会干扰访谈的时间选择和进行，包括受访者生活中需优先安排的事情。受访者需要为深度访谈牺牲自己的时间（一些较大型的项目开始向关键报导人支付误时费），一些紧急事件也可能出现，或者他们可能忘记了访谈时间并安排了其他事务。如果可能，应该再次确认访谈约定，比如可以打个电话或者顺便到一下访谈地点。如果爽约，研究者绝不能自以为是关键报导人不愿赴既定的访谈约会，要假设失误是无心的，除非它毫无理由地发生了好几次。

运用地图等启发工具获取访谈资料

要从抽样的访谈对象那里获取标准化的答案时，地图、分类图表和物件（material items）通常是很管用的，实际上在开放式访谈中它们也很有帮助。近些年，绘图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技术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社会科学家普及了“社会绘图（social mapping）”概念，把它当成一种让社区人民直接参与资料收集、社区发展、农业革新等有赖社会参与的项目的手段（Chambers, 1992）。

进行社会绘图时，社区人民（通常是农村村民）要画出一张自己的村庄或邻近地区的地图，一般使用当地可以利用的材料，如用彩色粉末（在印度是蓝果丽粉¹）在平（地）面上绘制村庄地图。社会绘图通常是集体完成的，有时候参与者的数量相当可观。正如我们在实例5.6中指出的那样，务必牢记，在不确定自己所计划的绘图是否冒犯社群成员，或引起他们怀疑之前，民族志者不应当从事绘图活动。

将个人卷入地图创作，或者根据地图作答也是一项很有用的技术，适合于访谈个别报导人。人类学家拉克希米·拉马钱德拉（Lakshmi Ramchandrar）就有效地运用了绘图技术，她在报导人的指点下画出一张草图。这一技术的有效性在于，它可以启发报导人并促使他（她）专注于关键资料，同时也避免要求报导人自己画图时经历的艰难起步。在拉克希米就当地人口中的堕胎情况访问村里的保健护士（VHNs）时，绘图技术的成效尤其显著。以下摘录来自拉克希米的田野笔记，在绘制保健护士管辖地区图

1 蓝果丽是印度的一种传统地画艺术，一般用手工绘制于家门口或庙门口。——译者注

时所使用的这种资料收集技术别具特色。村里的保健护士、医生和村民的姓名都已经改成化名。圆括号内是她本人的说明。

实例6.3 运用绘图获取生殖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信息

拉克希米：“请告诉我你负责的村子都有哪些，它们如何分布。（我取出一大张纸，在上面画了一个圈。）这是为了让我自己明白，也有助于让社区一目了然。我们一起来画地图。由我来画，当然会不准确，但请你帮我在正确的位置添上信息，好吗？”

普拉哈 [Prabha]：“我有六个村子（注：我画了六个圈），所以你画六个圈，接着我告诉你这些村子的名字，你填在那些圈里。村子有：蒂如坎帕迪（[Tirukampatti] 人口3200）；分部就在这个村子里。政府已经给了我房子。”

（我把这个信息填进我已经画在中心的其中一个圈里。填完后我问普拉哈接下来应该写什么。）

普拉哈：“写肯代帕亚姆村 [Kendaipalyam]。”（接着她指着一个圈要我写上德凡纳布拉姆村 [Devannapuram]。她用手指指着下一个要我写下南伽村 [Nanja]，昆丹村 [Koundan]，布都尔村 [Pudur]，杜尔卡坦村 [Dhorkatha]，最后是帕拉尤尔村 [Palayur]。我记录信息，也就是写下村庄的名字，这样就完成了圆圈的填写。）

（接下来，普拉哈开始告诉我分部离每一个村子有多远。她告诉我，肯代帕亚姆村距离分部2千米；帕拉尤尔村距离分部是4千米。其他三个村子距离分部在1.5千米到2千米之间。）

拉克希米：“你能告诉我那些个体医生或诊所做MTP（堕胎手术）的地方或场所吗？”

普拉哈：（指着画了一半的地图——她开始告诉我她管辖区内的所有个体医生和诊所。她指向帕拉尤尔村。）“这里离帕桃帕亚姆·达路卡 [Pattaupalyam Taluka] 医院10千米；所以，在这条路上，有一连串的私人诊所。”她说：“有吉里贾 [Girija] 医生、苏巴 [Subha] 医生、普鲁肖坦曼 [Purushothaman] 医生、哈里哈兰 [Hariharan] 医生”（他们都是个体医师）。

（这条线完成后，接着她改变方向，指着帕拉尤尔村的东部。这个地区附近有另外一大批个体医生。她给了我那些医生的姓名。）“登莫兹 [Tenmozi]（个体的/妇产科医生），距离帕拉尤尔·塔兰姆代 [Palayur Taramadai] 第一医疗中心（PHC）有15千米，还有贾亚拉姆 [Jayaram] 医生（个体的）；兰加拉吉 [Rangaraj] 医生（个体的），马拉尔柯迪 [Malarkodi] 医生（个体的），还有林纳玛 [Linnama]（个体的无证从业者）。CMC [哥印拜陀医学院] 离她那儿有50千米远。”

拉克希米：“你对桑迪拉 [Sandira] 有什么了解吗？”

普拉哈：“是的，我认识她；她没有资格证书。她非法做堕胎手术，很多妇女去找她。因为我知道她没有资质，所以我不让我的病人去找她。我没有见过她，但附近的许多人已经跟我说过她。”

普拉哈听说过桑迪拉，她的生意仅限于做非法的堕胎技术。桑迪拉远离大城市哥印拜陀私下行医。她在附近地区非常有名。很多支付不起大医院或私人诊所费用的贫穷妇女都去找桑迪拉。（结果是妇女们去找桑迪拉堕胎，而没有咨询普拉哈。）

（注：访谈进行到这里，拉克希米正在笔记本上做记录。地图像一个定位系统一样仍然放在她们面前。拉克希米随时都可以回到地图上来；但此时，她正忙着把所有的事记在小本子上。）

拉克希米：“在过去的两年里，你遇到过堕胎手术后的并发症吗？”（这个问题暗指林纳玛¹以及她缺少资质。）

普拉哈：“不，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在绘图式访谈的基础上，拉克希米概括了自己所工作的区域。

“村保健护士的管辖区域有人口3 200人，不均匀地分布在六个村庄。两所政府医院位于相反的方向上：一个被间接提到的达路卡医院（Taluka）有10千米远，另一个社区行政中心是三级机构，距离分部有55千米。第一医疗中心（the Primary Health Care Center）离SC有15千米。据村保健护士说，在分部地区/村庄没有符合资质的个体医生或诊所。只有一个无资质的医生（林纳玛）是村民们容易找到的。村保健护士说她管区里的人去找林纳玛都是自己决定的。但即使是她在过去两年里没有遇到过堕胎手术后并发症的情况，她也没有建议让她的病人去找林纳玛。”[田野笔记摘录结束]

拉克希米最初使用绘图技术是为了得到一幅从村民和村保健护士的角度看待堕胎服务的微观画面。然而，她发现护士的概念地图超过了她们在个人和村庄层次上的微观考虑，在中间和宏观层面上与更大的咨询服务体系——地区和全国的医疗服务设施相衔接。而且，这些概念绘成图后，表明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交错混杂。因此，绘图技术加上访谈，为拉克希米理解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堕胎服务之间的衔接与交错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

研究者拉马钱德拉·钱伯斯曾经研究过为印度南部妇女提供就诊、堕胎和绝育服务的场所和服务情况，在对成人和儿童进行开放式访谈时，为了激发讨论，他也运用了一些启发手段。钱伯斯（Chambers, 1992, p.301）提到，印度一家发展机构的工作人员让村民们在一个村庄的复制图上，根据微缩的房屋模型或其他建筑物模型彼此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在图中恰当的位置上。以此为基础，村民们一起在房屋模型的屋顶上标注户主的名字、有

1 疑有误，林纳玛和桑迪拉似为同一个人。——译注

没有成人文盲、孩子的教育与免疫状况、有无孕妇，以及有几头牛。新的信息一出现，就被补充到模型上。最终的成果是一个永久的、绘成图的资料，它对村里的每一个居民来说都简单易懂，而且也很方便利用。

尼察·迪亚兹（Nitza Diaz）研究的是美国哈特福德市波多黎各裔成年女性和少女对体形的认知，她发现当妇女们被直接问到她们自己的身体时不大自在。于是她就根据不同体型、身高和胖瘦描绘出各种妇女的身体素描，请妇女们谈论她们对素描中的女性身材的看法。利用这种办法，访谈才得以进行（Diaz, 1998）。与此类似，社区研究学会的研究者罗梅罗和伯格发现，在和未成年少女就她们对酗酒的态度进行深度访谈时，如果让她们一边谈，一边画有关该话题的图画，访谈就会比较容易。当孩子们利用图画作为讨论的焦点时，她们对这一敏感话题的缄默就会打破（Romero & Berg, 1997）。

所有这些手段都有助于受访者在访谈中感觉自在，也能够鼓励他们谈论双方都感兴趣的事物。

开始非结构化访谈

开始探索性访谈的步骤

1. 向受访者介绍你自己和研究项目，包括负责该项目的组织。
2. 保证保密性，说明你将如何保护受访者隐私。
3. 告诉受访者，他们的观点对你和项目都很重要，要解释为什么重要。
4. 请对方允许用磁带录音和书面记录访谈。
5. 询问受访者的情况，问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家庭如何，或者通过一些文化上得当的闲聊让受访者感到放松。

除了遵循上面的步骤，研究者还应当评估访谈环境。如果周围噪音太大以至于无法录音，恐怕就有必要用做笔记代替，或者改变访谈地点。如果访谈是在某人家中进行，而其他家庭成员或来访者也在场，那么民族志者请他们离开在礼节上恐怕是不妥的，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或来访者的观点就会融入并改变访谈。

实例6.4 访谈米娜的奶奶

安杰拉·约翰逊（Angela Johnson）是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打算做查维斯夫人（Mrs. Chavez）——她的朋友米娜（Mina）的奶奶——的口述生活史（life history）。查维斯夫人年近九十，早在英国移民者建立白人学校以前，她和丈夫就是新墨西哥州山区的教师。刚刚和米娜到达查维斯夫人家，安杰拉就发现查维斯夫人的另一个女儿及其十岁左右的一对儿女也同时到访，并且正和查维斯夫人在厨房里准备饭菜。她们边聊天边做饭，米娜也加入其中。那两个孩子在房子里跑进跑出，女人们不停地大声斥责。安杰拉再没有别的机会访问查维斯夫人了，于是她把磁带录音机放在厨房的火炉旁边，开始提问。她很快发现，查维斯夫人经常忘掉回答问题时要用的英语关键词。于是她的女儿和孙女参与进来，翻译、补充单词、详细解释查维斯夫人对往日生活的描述，甚至争论起她的某些回忆。同时，磁带录音机捕捉到了烹调食物的声音、孩子们跑进跑出的声音、撞击门的声音、狗叫声，以及三个女人和访谈者之间所有重迭的对话。为了理解访谈内容，安杰拉不得不誊清全部对话，但整理录音时她感到困惑，到底自己记录的故事里有多少属于查维斯夫人，又有多少是属于她的女儿和孙女？

安杰拉·约翰逊不该这样对查维斯夫人进行访谈，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一般应当遵循组织焦点团体访谈的指导方针，这在本丛书的第三册第3章会详细谈到。

不管在什么样的困难情况下开展访谈，都要记得对受访者的时间限制和生活状态保持敏感。他们或许因此减少了工作时间，或取消再次接受访谈的亲口承诺；他们或许有影响情绪的不愿透露的家庭问题，或者家庭成员可能等着他们履行某项义务；他们或许有需要建议或支援的个人问题，而民族志者对这一问题可能有能力、也可能无力帮助解决……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访谈的质量和气氛。如果民族志者感觉到情况会导致访谈的质量不高，那么重新安排访谈时间可能是明智之举。

结构化开放式访谈

开放式探索性访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看似漫无边际。这是因为，当访谈者为受访者提供机会谈论他们认为重要的一些事情时，受访者总是会想到许多其他的话题，他们本人对这些话题可能很感兴趣，但研究者却不太感兴趣。开放式访谈其实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无拘无束，一个好的民族志者会为这类资料收集做充分准备，并且在访谈之前提出一整套引导受访者的普遍性问题。

深度访谈是一种特殊的对话。它要求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是互利平等的关系，即除了要遵循理想访谈的规则之外，还要尊重特定文化环境下人们通常要遵守的良性对话的规则（Levy & Holland, 1994）。所以说，要完成一次令人满意的深度访谈，访谈者必须充分了解当地文化，以避免冒犯对话的基本礼节。例如，在有些场合，打断别人的谈话不仅是可接受的，甚至还是受期待的；而在另一些场合，打断则是对说话者的不敬。有些文化要求好的倾听者要在句子中间以点头、“嗯”或“是的”（或其他相当于“是”的意思）认可说话人的观点，这是为了确保思维顺畅。如果忽视这类习俗就可能导致民族志访谈误入歧途，或者一无所获。

要想让受访者循序前进，民族志者就必须牢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的次序，并且在有礼貌地等待受访者说完离题的话之后回到问题的次序上来。可以帮助谈话者回到主题的话有“正如你刚才说到的……，”或者“记得我们几分钟前正在谈什么吗？”或者“刚才你告诉我（发生的某事）。你能多说一点吗？”这些提示有助于转移谈话者的注意力，使他们专注于接下来的话题。

以下三种引导开放式访谈的提示可以帮助报导人继续话题，同时又不打破访谈的自然流畅。

引导开放式访谈的提示

1. 分辨并回到信息不明确或不完整的话题加以澄清。
2. 要求列出事物清单以界定文化域。
3. 要求叙述经历。

分辨并回到不明确或不完整的信息

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应该要做笔记，以便记录自己不明白的术语、观点和想法。可以把感到迷惑的地方注在笔记本的空白处，或者用别的记忆设备记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稍后的访谈中重新审视它们。有助于回到不明确或不完整信息的提示语如下：

1. 你用“comadre¹”这个词表示什么意思？
2. 请你解释一下chenna农业？
- 3 那是哪一种大米？
4. 轮滑和滑冰有什么区别？
5. 村政府（municipio²）和村庄（village）一样吗？
6. 你能再重复一下顺序吗？我忽略了你对为何制作奶饭（milk rice³）以及如何制作的解释。

要求列出事物清单以界定文化域

访谈者可以用列清单来作为详细了解那些重要的文化域的好办法。列清单时应当随时补充上受访者对各个项目的定义和解释，因为这些民族志资料是理解域的关键。列出清单的提问实例如下：

1. 孩子们都在这附近做些什么游戏？
2. 成年人聚集在这周围的什么地方？
3. 这个社区里有哪几种青少年团体？
4. 这个镇里的人们都关心些什么问题？
5. 克利夫兰市（Cleveland）的掌权者是些什么人？
6. 佩勒代尼耶市的主要就业资源有哪些？
7. 这个城镇里最常见的儿童疾病是什么？

诸如此类的问题所引出的清单可以成为追问的基础，要了解清单上每一项的含义、场所、参与模式、持续时间等其他特征。

要求叙述经历

叙述和讲故事的方式可以让受访者谈谈不同情况下的经验，而这些情况能证实研究的重要观点。研究者运用叙事的方法获悉报导人看待情节经过的视角。要求受访者叙述的提问可以是这样的：“请告诉我你上一次生病的经历。起初发生了什么？”如果研究者追问这样的问题——“接着发生什么事？然后呢？”，

1 西班牙语，有干亲、教母、接生婆等意思。——译者注

2 在许多拉美国家的农村，由几个村庄或村社组成的村政府。——译者注

3 斯里兰卡的一种传统食品，由大米和椰奶（或牛奶）制成。——译者注

叙述就能得以继续，而补充的追问则会鼓励谈话者回忆出更多内容，譬如，问题在哪里，有什么人，叙述者和其他人如何阐述问题，他们是否利用媒体，向谁征求意见，等等。下面的例子是访谈对象的口述史（life history narratives），研究者采用了要求叙述

经历的方法来了解研究感兴趣的具体行为的历史和发生次序。

实例6.5 开始酗酒和吸毒经历的叙述记录

项目：路径

访谈：“Joey”（化名，转录）

日期：9-22-98

访谈者：洛里·布鲁姆霍尔（Lorie Broomhall）

L：你现在吸食什么毒品？（筛选性问题）

J：我吸大麻，抽提纯可卡因。

L：哦，你吸大麻和抽可卡因。好的，我想谈什么呢，我想回到从前。

L：所以，把我带回到你什么毒都不沾的那个时候。告诉我是怎么开始吸毒的。

J：好吧。我可以回到11岁。嗯，毒品根本就不在我的生活里。但在一个生日全都发生了，在一个生日。那个，嗯，我的一个朋友，他习惯抽大麻，那个，嗯，他就像，要知道，这是你的生日。我的12岁生日，实际上。他就像，对，我要让你沉醉，是的。于是我们到了那个小公园，其实就在这条街上，在南街，是一个小公园，好像靠近假释局，它就像个小公园。我们坐在那里，他把大麻卷起来，我们就抽。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抽烟，我非常兴奋。我是说，它让我觉得，你知道，晕忽忽的，仿佛我都没办法走路或做任何事。这似乎是我的第一次。我回家后，就倒下来，但对我来说最主要的东西是酒精，那是个很小的年纪，我13岁开始喝酒，我喜欢酒，因为正是它改变了我的整个心情。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是说，当我喝酒的时候，我是一个大人物，没人比我更强大，我说我想说的话，我不在乎你想什么。当我喝酒时，它就是我一的一切。你现在可能闻到我的呼吸里有些味道。我刚喝了点巴卡弟¹（Bacardi）。嗯，对我来说，酒，它就像是一种能量。要知道，当我喝酒的时候，仿佛我就是只鹰，是的，我就这样开始了，我开始喝酒，同时我还继续抽大麻。

L：在你的房子里，在你家里，有酒或大麻吗？

J：唔，我妈妈什么也不管。她偶尔会喝酒，但我有一个阿姨就住在隔壁，她注射毒品。她最近死了，对，不是最近，大概四年前她死于……（咕啞）。她注射，什么都做。她习惯服用那些迷幻剂。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嗯，和我很不一样，我是大麻和酒精。很小，13岁。

1 一种古巴的兰姆酒。——译者注

L: 你经常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喝酒，吸毒吗？

J: 是的，对。我是说，如果我到商店里，我不得不先找个什么人给我酒，因为我还小，你知道。接着，嗯，我通常，对，和某个人一起喝，和某个人一起抽。这种事情你不会想独自做。要知道，你必须，当你兴奋起来，你必须有交流。你要做些什么？难道你愿意独自兴奋，仅仅是头晕目眩地呆在黑暗里？要知道不可能是这样的，懂吗？唔，直到16岁左右我一直都那样。

L: 那么你喝酒和抽烟的频率是怎样的呢？

J: 哦，哇！每天160到200盎司，或许240到280盎司。大概这样吧，嗯——

L: 一天240到280盎司？

J: 是的。一天240到280盎司。至于大麻，大麻，13岁的时候大概是，大概是每天一到两包，我开始喝酒的时候，酒精的确减少了大麻的量，我爱喝酒。但等我到了16岁，那时我开始做买卖。

L: 买卖？

J: 买卖。

L: 和谁？

J: 任何想买的人。

L: 你买卖什么？

J: 我买卖可卡因。粉末。不是现成的“岩石”。过去，回到我16岁的时候，只有粉。哈特福德这儿没有提纯可卡因（reddies），它是真正的可卡因粉。你不得不自己提炼可卡因。

这段引用表明了一个有经验的民族志访谈者在首次和一个年青的吸毒者进行访谈时，如何获取该青年最初开始接触酒和毒品时的信息。人类学家布鲁姆霍尔有次序地提出开始酗酒和吸毒的问题，并且用追问的方式来探查与吸毒有关的新话题，如毒品贩卖。

访谈中的自我管理

如果研究者遵循以下三条简单的原则，他们就能获得高质量的访谈资料：

访谈中自我管理的提示

1. 保持受访者的叙事流畅。
2. 保持积极的研究者—受访者关系。
3. 避免访谈者的偏见。

保持受访者叙述的流畅

访谈者可能由于改变或限制了报导人正要说的内容而不经意地影响了讲述的流畅，这有最常见的七种情况：

- 把一个疑问表达成陈述（例如访谈者把报导人只是暂时提到的某件事复述成一个事实）：

报导人：因此我们住的地方有点像城郊。

访谈者：所以你们住在一个农村地区，对吗？

报导人：是的，嗯，没错。

在这种情况下，不好说报导人是真的住在农村地区，还是仅仅为了避免矛盾而同意访谈者的话。

- 没有注意到报导人已经对访谈者提问中的说法给出了另一种意思。访谈者有可能真的没听见这另一种答案，也可能忽视或重塑了替代性答案：

报导人：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如何评估艺术类学生的问题，所以……

访谈者：你们采用某些测试，对吗？

报导人：不，我们正在考虑用作品选辑。

访谈者：你们采用哪种测试？

- 为受访者完成句子，尤其是访谈者非常肯定自己知道受访者将要说什么的时候：

报导人：我当时快要开始研究生学习……

访谈者：你母亲去世了。

报导人：是的，接下来的难题是……

访谈者：你必须照顾你的弟弟妹妹。

- 不能阐明语境中意思唯一的术语指什么，如是指原料（stuff）、物品（things）还是废旧料（junk）：

访谈者：你创作一幅拼贴画都需要哪些材料(materials)?

报导人：胶水、彩纸、各种原料（stuff），对，还有其他东西（things），你知道我指什么……

- 错误地假设俚语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

报导人：真是phat！（在英语中发“fat”音，但意思是有魅

力的)。

访谈者：(对自己说)这样说某个人可不太好(想当然地认为对方表示的意思是“笨重”)。

- 过早地断定叙述中情节的始末，这表现为打断报导人正在说的话。
- 提那些报导人不理解的问题，或者以这种方式让报导人停止谈话。

研究者要尽力去理解报导人自己是如何调整故事节奏，并把各个情节串在一起的，他们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创作出一个适合于研究的连贯叙事，这很重要。

保持积极的研究者—受访者关系

一般文化礼仪与刚才说到的各种交谈礼节同样重要。我们已经指出，一些行为对保持交谈流畅是必要的，如恰当地回应、得体地发问，还有注意受访者的需要及其个人处境，等等。民族志者要想确保交流的通畅，还应当注意以下事项：

- 避免对受访者所说的话发表意见或做判断，不管自己对该话题有多么强烈的感受。研究者的判断(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会影响到受访者的想法和答案。
- 不管个人看法如何，都要避免表现出惊讶、厌恶或其他强烈情绪。
- 如果得到盛情款待，就欣然接受。大多数文化里的大多数人在接受访问时都会提供食物或饮料，拒绝款待有可能羞辱你的东道主。研究者应当接受并至少吃一点主人提供的食物或饮料，除非安全是优先考虑的问题，或者自己有饮食或酒精方面的限制。
- 留心报导人的总体情况。如果他或她病了，醉了，或心烦意乱，那么提供的信息的质量可能就不会是最高。

避免访谈者的偏见

上面所列的法则有助于保证交谈的进行，避免访谈者偏见则要求注意另一些方面。设计深度访谈是为了获取受访者的观点，

任何干扰这一目的的事情都有害。最严重的偏见或许来自访谈者本身，但幸运的是，访谈者的偏见是最容易掌控的。访谈者的偏见主要表现在：

- 提的问题带有导向性。
- 不能跟上或忽略受访者引入的话题。
- 改变故事的方向或打断它。
- 没有意识到受访者对访谈者的个人特征的反应，这些特征包括穿着、年龄、种族、性别、身材或外显的社会地位。
- 提出的问题包含或暗示了想要的答案（如，问题这样开头“你不认为……”）。
- 使用非语言暗示（如头部、脸部和身体动作）来指出问题的“正确答案”或研究者认可的回答。
- 就某个议题发表看法。研究者应该绝对避免主动提出观点，如果不得不表明观点，也应当等到访谈结束以后。

记录访谈

访谈可以用三种办法来记录：文字、磁带和录像带。最典型的记录访谈的办法是简要地记下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答案。这种办法物美价廉，因为它不依赖于可能失效的电子设备，而且由研究者控制着转录的进程。做笔记的主要缺点是访谈者在与受访者进行开诚布公的直接交流时会分心，另外，要快捷明了地记下报导人说的每件事也很困难。

访谈往往需要录音。录音最大的好处就是记录准确。然而，磁带录音有几个不利之处。首先，对访谈进行录音的成本很高，它要求高质量的磁带录音机、空白磁带、电池或可用的外接电源、花在录音整理上的时间和金钱。访谈录音往往很长，每一个小时的访谈录音需要三到四个小时的转录时间。其次，如果访谈是在嘈杂的环境下进行，录音质量可能很差。最后，设备可能失灵。一些研究者对自己的笔记进行录音，以减少遇到技术问题的风险。然而，将田野笔记的录音转录成文字的挑战仍然令人畏。

在深度访谈中一般不采用录像，因为它的成本高，整理访谈录像也不便。再说录像资料的保密性更加难以保证，因为受访者的脸和其他身体特征都很容易被认出来。我们不主张在深度访谈中录像，除非访谈是为了制作有关研究课题的音像产品。

小 结

在第5章和第6章，我们讨论了两种基本的民族志资料收集方法：探索性观察和探索性非结构化访谈或深度访谈。之所以说它们是探索性的，是因为它们：

- 事先是相对非结构化的。
- 是为了让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之间有开放的交流。
- 帮助研究者深入地探索感兴趣的领域、文化域或问题，而不预设任何具体的答案或结论。
- 很可能揭示出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新观点、新方向和新想法。

尽管我们说它们是非结构化的，但它们绝不是毫无计划。有效的探索性访谈与观察要依循：研究设计和基础研究问题、塑型研究模型、研究者针对需探究的某一主题提出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访谈和观察的进程要由对文化模式、社会关系和事情为何恰好那样发生的初步假设或直觉来进一步引导。因此，在从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料收集活动时，研究者也进行了低层次理论塑造，这种理论将和塑型理论模型以及田野中出现的新资料加以对比，反复检验。

民族志的目标是用其他社会科学家和被描述群体都能理解的语言来描述一个或多个文化域，也就是说，要创建一个既是情境中的大多数行动者都认可的，也能用世界性或学术性概念来解释的文化局部理论。观察和访谈是民族志者完善形成中的民族志理论的两种重要活动，它们提出解释性问题，观察那些习惯性的或无意识的行为。由于行为是习惯性的或无意识的，行动者不太可能自行用语言加以描述。

我们在此提到两个目的：（a）建构意义、阐释和关联（理论），要符合实际，得到田野中的行动者认可，并且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b）建构立足于学科或跨学科概念框架的意义、阐

释和关联（理论）。实现这两个目标，我们必须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事件、关系、措词和活动，以及它们对实地参与者的意义。同时，我们必须能够把这些基本材料组织成更大的单位、模式和结构，让人明白我们正在看见的事相比于在别处开展的类似研究有何意义。这种双重目的对观察和访谈来说有不同涵义。

就观察而言，我们要努力捕捉在具体细节中看到的重要方面。首先，我们可能不确定自己正在看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无法赋予它地方性意义。于是，我们要尽可能多地描述翔实而具体的细节，我们并不十分确切地知道这些细节意味着什么，或者哪些细节是重要的。稍后，我们才能有充分认识，才能更加系统地挑选观察场景，并把观察集中在对研究主题有直接意义的行为或事件的单元上，或者关系上，这些单元和关系得自于我们过去的经验和与研究参与者的讨论。

就访谈而言，顺序是一样的，但有另一个好处，即能够用参与者自己的语言来理解他们如何看待、相信和报告某个具体问题。当然，在我们求知的过程中，他们的描述或报告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提问和追问顺序的影响，同时，参与者或报导人也会就如何以及为什么这样设计自己的故事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决定。出于这个理由，我们指出，研究者在访谈时可以采用各式各样的技术来引出更加有效可靠的信息。在第五册书，我们将梳理质性和量化资料的精减之术。

民族志的最终目标是简化社会与文化现实，以生成对某种社会状态的连贯描述。探索性或深度访谈和非结构化观察是资料筛选和精减过程的第一步，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掌握影响议题的因素的范围。

本章为读者提供了在田野中为探索而进行深度开放式访谈所需要的工具。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深度访谈是对研究者的巨大挑战，因为它们是不可预知的。但恰恰是这种不可预知性使它们成为研究早期阶段适于探索的激动人心的工具。在研究后期也是如此，当初步结论显现，需要在社区中加以确认时，深度访谈也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下一章，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半结构化访谈，它选取的受访者的代表性样本更多，范围更大，但开放式探索的话题范围却要集中得多。

开展半结构化访谈
的理由

•
构建半结构化访谈
进度表

•
分析半结构化访谈
资料

•
半结构化观察

•
小 结

第7章 半结构化访谈

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的理由

定义:

半结构化访谈由与研究者所关注的域相关的预先确定的问题构成,它针对有代表性的受访者样本进行,以此来确认研究域,并辨识统计调查中所分析或使用的因素、变量以及变量的项或属性

半结构化访谈融合了非结构化、开放式访谈的灵活与统计调查工具(survey instrument)的按部就班,可以在因素层次上生产出聚焦的、质性的文本资料。引导半结构化访谈的问题是事先规定好的,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开放的,访谈者与受访者可以将其充分拓展,亦可通过追问丰富这些问题。

有的研究者仅仅区分了非结构化访谈与半结构化访谈(Fontana & Frey,1994),另一些研究者则意识到半结构化访谈在提出探索性模型与准备更系统的调查形式中起了重要作用(Weller, 1998)。约翰逊(Johnson, 1998)在探索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之间作了有用的区分,他指出,“探索性研究方法用来提出假设,更经常地是用它来探究那些我们尚未充分理解的课题的范围、描述和解释”(P.139)。在约翰逊开展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中,“探索性研究可以是某一研究设计最根本的着眼点,也可以只是诸多成分之一”(P.139)。

探索性研究包括了半结构化访谈,它为可以检验理论直觉或命题的统计调查以及其他形式的解释性研究提供了基础(Boster & Johnson,1989; Goldin,1996; Koester,1996; Koester, Booth, & Zhang, 1996)。

在我们所提出的大纲中,半结构化访谈最适合于探索及描

绘因素与次因素，而民族志统计调查（ethnographic surveys）（本书第8章将讨论）则是通过在变量层次得出并联结定量信息来检验理论。

半结构化访谈用于实现以下目标：

- 进一步阐明研究中主要的域和因素。
- 把因素变为可操作的变量。
- 提出初步假设。
- 形成民族志统计调查架构的质性基础。

阐明研究的核心域与因素

塑型民族志理论的建立与建模的基础是：确定主要的自变域和因变域，预设域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域的最初确定来自以往对相关主题的研究、报导人的知识以及研究者的经验。探索性访谈与观察可以提供新洞见，确认域与因素。半结构化访谈则进一步确认或否定该研究的域的效度，增加新出现的域。

实例7.1 确认域与确定因素

在毛里求斯与斯里兰卡进行的艾滋病风险研究的主要域是家庭、工作和同辈（自变域），以及性、知识、态度和行为（因变域）。在针对每个域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半结构化访谈提供了重要信息，告诉我们域的目录是否需要增减，以及这些域内所确定的哪些因素可能相互关联。

把因素变为可操作的变量

半结构化访谈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确定塑型模型的各个域内作为因素与次因素构成成分的变量。因此，半结构化访谈的提问是在因素层次进行组织。例如，在关于毛里求斯艾滋病风险的研究中，我们所关注的是“家庭”域与“性风险”域之间如何关联。深度访谈几位女性的过程中，我们就家庭域提问。在这些访谈中浮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家庭管教”。在一份访谈了90位年轻女性的半结构化访谈进度表上，“家庭管教”因素被表述为一个可以引出更多信息的问题：“请告诉我你家里的管教方式”。回答包括讨论与协商、体罚、行动受限等几个类别。“体罚”成为一个变量（参见本书表2.1和丛书第五册中表8.1），而

半结构化访谈则产生了变量的要素或属性，即一系列不同的“惩罚类型”。

提出初步假设

至研究者决定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之时，他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衔接各个域的假设。半结构化访谈资料所产生的信息可以使各个域内部的因素和变量相衔接，也可以使分属不同域的因素和变量互相衔接。例如，在毛里求斯开展的研究中，接受半结构化访谈的几位女性受访者说，她们一加入产业劳动大军，父母的管教就随之严格起来。

假设1：更严格的父母管教（“家庭”域里的一个独立因素）与在工业部门就业有关系

受访者也说，她们的工作时间越长，例如加班时间越长，所面临的家庭管教就越严格。

假设2：更严格的管教（因素“家庭管教”内的一个变量）与更长的工作时间（因素“工业部门就业”内的一个变量）有关系

形成民族志统计调查架构的质性基础

通过创建能在统计调查工具中转变为项的域、因素、变量和变量属性的概念分类，半结构化访谈为有民族志依据的统计调查（参见第8章）的建构确立了一个坚固的质性基础，也为文本资料和统计调查数据确立了编码体系。

生成半结构化访谈指南的第一步需要从民族志研究的非结构化访谈和观察阶段所确定的域的编码范畴开始，这些域和范畴构成了半结构化访谈提前打下的基础。继而，从对问题的回答中所得到的质性资料成为变量的主要来源，变量又是民族志统计调查的基础。

在毛里求斯的研究中，对“工作”域的分析确定了下列因素：

- 工作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 工作对社会关系及家庭关系的影响。

- 在出口工业加工区工作的原因。
- 工作态度。
- 工作单位的性质。
- 与男同事的关系。
- 与女同事的关系。
- 通勤方式。
- 对企业或工会（业余）社会活动的参与。
- 与主管的关系。
- 工作场所的医疗与计划生育服务。

接着研究者将上述工作域中的每个因素表述为1至5个问题（如果认为在因素与变量层次之间必须考虑次因素的话，则可以提出更多问题）。

构建半结构化访谈进度表

拟定访谈问题的步骤

半结构化访谈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根据域来分析整理好的深度访谈来自于非结构化资料收集阶段的观察资料。域引出确定的因素，因为它们在文本资料中反复出现。资料不足以提前告诉我们这些因素究竟有多重要、它们在总体中的分布有多广、它们意味着什么。不过，半结构化访谈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访谈要围绕着这些因素或次因素展开。社会科学研究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说明如何在不同类型的访谈中设计出好问题（Babbie,1995; Sudman & Bradburn,1982）。半结构化访谈问题的设置应遵循如下指导方针。

设置半结构化访谈的好问题的指导方针

- 确保受访者理解提问所用的术语和措辞。
- 问题尽量简短；切记追问有关键作用，通过追问，次因素与变量进一步可操作化。
- 使用与受访者所用语言、文化背景、年龄、性别、知识程度及其他相关特征相适宜的术语。

- 避免暗示了答案的问题和带有偏见的问题。
- 避免使用了正关联或负关联的问题，例如“你关于人口控制的观点与特里萨嬷嬷的观点有多接近？”“你怎么看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省纳粹般的种族清洗？”。
- 避免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问题的问题，例如“你喝可口可乐和咖啡的频率是什么？”或“你最后一次听音乐会或观看芭蕾舞表演是何时？”。
- 尽量避免带有否定性措辞的问题，例如“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下述观点：‘教师不应该根据语言水平考试来对学生能力进行分组’？”
- 除非必要，否则应避免在半结构化访谈中请受访者对信息排序，因为排序要求复杂的说明，而报导人往往会误解这些说明。
- 避免要求执行几项任务的问题，例如，“在这张写有10项阅读项目的清单上，先画出你最常参加的3项，接着在你喜欢的那一项后面写上×。”
- 如果你期望获得的信息是尽可能长的描述，就不要使用可以回答“是”或“否”的问题。
- 对与访谈问题相关的文化背景或社会意义保持敏感。

在访谈中将问题排序

不论是在半结构化访谈还是结构化访谈中，研究者都需要考虑如何排列问题的顺序。通常而言，问题应该这样排序：

- 按照时间排序：从较早的事件到较晚近的事件。
- 按照复杂程度排序：从较简单的话题到较复杂的话题。
- 按照主题或者域排序：把同一个主题或相似主题下的所有问题分为一组。
- 按照域内的抽象层次排序：从最具体的问题到最抽象的问题。
- 根据危险程度排序：从最不敏感或最不具危险性的问题到最敏感或最具危险性的问题，把最敏感的问题置于最后。

有的方法论学者提出，调查者应该用一些有趣且无伤大雅的问题激起受访者的兴趣，接下来再开始更具挑战性的提问。但是，究竟什么才算是一个具有危险性的或敏感的问题存在很多分

歧。在美国，人口统计问题通常不具有危险性，访谈者常常以这样的问题开始。然而，包括性别和收入在内的某些类型的人口信息对有的受访者来说可能是相当敏感的话题。此外，某一种文化内并不敏感的话题可能在另一种文化内相当敏感。在压制性的社会里，泄露有关族群或宗教从属关系的信息可能存在危险；在强行控制人口的地方，告诉访谈者一户人家有几个孩子可能会招致报复。而在其他一些社会，透露自己的名字或亲属的名字则是一种禁忌。

另一些调查者则指出，最重要的信息应该最先问，这样，如果受访者厌倦了访谈，调查者至少也能在报导人闭口之前发现最重要的信息。

实例7.2 展开一次半结构化访谈

在毛里求斯的研究中，研究者一共选取了120位工人（90位女工、30位男工）参加半结构化访谈，男女两性均在印度裔印度教徒（Indo-Hindu）、克里奥尔裔天主教徒（Creole-Catholic）和印度裔穆斯林（Indo-Muslim）三种民族—宗教群体中平均分布。研究者在岛上五个最大企业的餐厅进行访谈，人事经理为工人安排了时间，访谈平均持续45分钟。

七名访谈者接受过访谈以及记录田野笔记的训练，并且备有大多数训练材料中均有的一套说明，即：

- 向参与者解释研究性质并获得口头同意。
- 首先询问人口统计信息。
- 随后询问与工作相关的问题。
- 避免因记录你还未提问受访者就已说出的答案（即使答案是前面的问题的一部分）而带来的重复。
- 尽可能使半结构化访谈指南中的各个主题或域井井有条，这样它们就会随着谈话的展开自然而然地出现。
- 避免脱离研究主题或者域太远。
- 由于时间只有一小时，不要觉得所有的问题都需要问完；相反，要突出那些受访者最愿意谈论的因素。

表7.1 毛里求斯研究中使用的半结构化访谈进度表中的工作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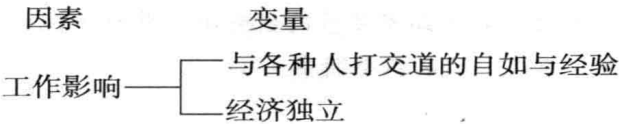
第II部分	受访者对职业女性的看法
2.1	你对毛里求斯职业女性的看法是什么？
2.2	你认为女性比较适合哪种类型的工作？
2.3	你觉得毛里求斯职业女性的生活方式有哪些主要变化？
2.4	你认为职业女性与非职业女性在生活方式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5	你怎么描述职业女性与其(a)家庭、(b)男友/丈夫、(c)女性朋友的关系？
2.6	你的家人如何看待你的工作？
第III部分	关于受访者的工作的问题
3.1	你为何就业？（追问其原因——金钱或其他原因）
3.2	你以前是否有工作经验或是否为现在的工作受过培训？
3.3	在这份工作之前你做什么？（追问上一个工作的离职原因）
3.4	你怎么看你的工作？
3.5	请描述一下你的典型的工作日。
3.6	你加班吗？加班频率如何？你怎么看待加班？
3.7	目前的工作有夜班吗？你怎么看待夜班？
3.8	你所在部门（工厂部门）有多少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
3.9	你一个月收入多少？（询问报酬方式，例如计件工资、月薪或周薪）
3.10	你能告诉我工作对你的生活有何积极/消极影响吗？

表7.1举例说明了毛里求斯研究中所用半结构化访谈进度表的一部分。问题来自“工作”域，并与深度访谈或探索性研究阶段出现的工作维度（因素、次因素）相关。

分析半结构化访谈资料

定义：在毛里求斯的半结构化访谈所生成的文本资料被录入ETHNOGRAPH。我们为域、因素、次因素创制了编码名称，并把各编码联系起来。这些编码随即被运用到资料之中（下文加下划线部分将举例说明其中一些编码），并按照域（“工作”）和因素（WEFFECT，如工作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进行编码。下文选出的文本片断阐明了体现WEFFECT的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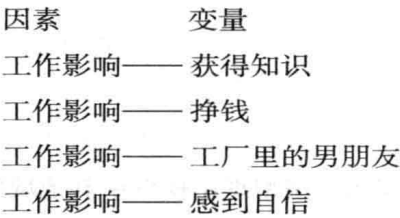
“工作还帮助她获得了经济独立，并帮助她的家庭度过难关。从她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并与这些人产生过不同问题或冲突。现在她已经能应付自如了。”



“由于她有工作，她发现与男孩交朋友更容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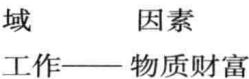
“她挣到了钱，现在她在厂里还有一个男朋友。她说自己现在发现工作比以前更有趣了。尤其是她的男朋友也在同一家工厂上班。Ooma说，现在她在工作，她感觉自由，觉得自己不傻。她能与人们交谈，她觉得自己是快乐的。”



“按照Faeza所说，职业女性忽视了她们的家庭。在另一方面，职业女性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她们可以为家庭购买所需物品。她可以穿着体面并为自己购买衣服。她认为女性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独立。很久以前，不工作的女性呆在家里，她们是家庭主妇，所知范围不超过家里的四堵墙和邻居。今天，她们比以往更自由、更自立，她们有自己的朋友并且心胸开阔。职业女性与其家庭之间的关系更加开放。”



“她认为工作对生活的影响是积极的，因为她可以拥有所有她想要的（物质的）东西。”



类似的方法也运用在了斯里兰卡的研究中。非结构化访谈与观察确定了属于“家庭”域的各个因素：

- 母亲。
- 父亲。
- 兄弟姐妹。
- 家庭构成。
- 经济。
- 物质财富。
- 家庭关系。
- 共同的家庭活动。
- 父母管教。
- 家庭问题。
- 扩展家庭。
- 在中东就业。

上述每个因素都被设计成问题（塑型理论模型中其他域所包含的因素也如此），并运用于对156名青年男女的访谈之中。这156名受访者中有人来自佩勒代尼耶大学，有人则来自康提市的低收入社区。

对编码为“家庭问题”（因素之一）的片断进行分析，揭示出以下次因素或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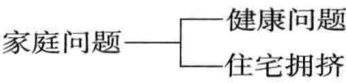
“他在康提市蓬家萨尼帕德拉学校（一所公立高中）一直学习到9年级，因为那一年家中有四人去世，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他不得不中止学业。”

家庭问题——
 └─ 家人去世
 └─ 经济

“她感到忧伤的主要原因是另一个家庭与她们一起生活。当我问她家里是否有什么困难时，她说她不想住在家里。”

家庭问题——家里拥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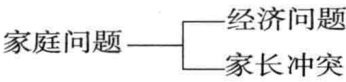
“因为恐怖主义，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土地和住所，搬到租来的房子里。她母亲患有关节疼痛。家庭中多数成员都居住在他们的房子里，屋里空间有限。”



“每逢周五他们都要斋戒。她的父母严格遵循宗教礼仪。他们非常严格地为子女挑选伴侣。他们不允许她参加晚上的聚会，有时也不允许她去朋友家中串门。她非常听父母的话。约束很重要，她觉得自己的父母是在履行他们对子女的职责。不过，子女有时也不得不在择偶和其他类似事情上打破规定。”

家庭问题——打破有关男女伴侣关系的家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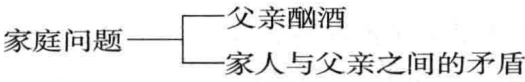
“我父母经常吵架，他们一吵架就不吃东西。我想父母之间缺乏相互理解，是经济状况导致了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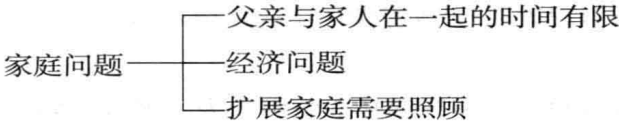
“他们（她父母）有很多经济问题，这迫使她母亲到中东当女佣。”

家庭问题——父母缺位

“她父亲酗酒，还呼朋唤友地来家里喝酒。如果家人不给他钱买酒他就大打出手。”



“说起家庭问题，她说她父亲既不喝酒也不吃猪肉。但多数时候他并不在家。他太忙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而且，她父亲的两个妹妹是寡妇。根据他们的宗教规定（伊斯兰教），父母去世后长兄有责任照顾妹妹。因此，她父亲不得不挣钱养活家里所有人，家里面临经济问题的困扰。”



以上分析引出了一个家庭问题的清单，其中每一项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变量或者变量的一个项或属性。

- 经济问题。
- 健康问题。
- 住房条件差（居住拥挤）。
- 与照顾扩展家庭的成员有关的问题。
- 父母缺席。
- 酗酒和吸毒。
- 家庭冲突。
- 父母—女儿的矛盾。
- 男女关系。

半结构访谈进度表中囊括的每一个域的所有问题都应该遵循上述步骤来确定变量和项或者属性。

半结构化观察

在调查那些研究者观察得到，但由于人们意识不到而难以讨论的行为时，半结构化观察进度表是很重要的。进行观察式调查所遵循的模式和通过访谈收集民族志资料所遵循的模式相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即：

- 从开放式和探索性资料收集（如本书第5章所述）开始，到——
- 收集定义更谨慎且系统、同时又具开放性的资料，再到——
- 运用统计分析技术来构造观察进度表，用以量化观察所得，并检验假设。

观察进度表聚焦于所观察的行为。半结构化观察进度表聚焦于有规律地发生的可观察的行为。半结构化观察的目的与访谈目的接近：(a)确定与域相关联的因素，(b)确定与因素相关联的变量，(c)确定可以根据有/无或程度而系统地记录的变量的项或属性。

医生、流行病学家和医学社会学学者为了解母亲如何照顾腹泻或患有上呼吸道疾病的儿童而开展半结构化观察，他们也通过观察人们如何购买、准备、分配食物及如何进餐来了解人们的饮食摄入。半结构化观察需要一个与半结构化访谈相似的观察方案，方案中要列出研究中重要的域和因素，并在某种程度上加以

界定，但研究者需要识别并详细记录重要的行为。半结构化观察也能在学校和教室里进行，那里的行为模式比较有规则，研究者既可以观察重复的模式，也可以观察越轨的行为模式。越轨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握应对指定情形的行为的变化范围。

进行半结构化观察时记住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 观察可能会干扰他人，尤其是在家里或教室内进行观察时；半结构化（以及结构化）观察要求有规律地在场，往往还需要使用影像记录设备。在进行半结构化观察之前有必要培养与研究对象的和睦关系。
- 对复杂的社会互动的观察难以单独进行，因为一名观察者难以把握一次较大事件或一间教室内所有参与者正在进行的所有活动。例如，观察者不太可能既观察采用合作学习方法的教师，同时又观察参与式学习活动中的学生小组。为了获得充足的令人满意的资料，或许有必要与同事合作进行这类观察。
- 半结构化观察与其他形式的资料收集一样，都需要反复思考、事先了解以及分解已经汇集起来的文本资料，研究者必须提前做准备。
- 毋庸置疑，要观察的行为必须是可观察的。在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研究者可以在年轻人约会的地点进行观察，甚至可以在公园和情人巷等公共场合观察特定形式的情感表达，但他们无法观察到将年轻女性置于性病传播危险之下的亲密行为。另一方面，阿里森·宾厄姆在一个疟疾流行的地区对疟疾感染的时间—地点进行分析时发现，农夫们每天晚上从田间回到家中的这段时间里完全有可能（尽管危险只是潜在的）被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叮咬（Bingham, 1998）。

小 结

半结构化访谈和观察可能是质性资料收集的结束。我们以开放式访谈和观察开始调查，它们的代表性最小，探索的可能性范围最大。当我们知道了要寻找的是什么时，就要增强代表性并缩小我们可以探索的主题和次一级主题的范围。半结构化访谈和

观察为我们提供了最系统地收集质性资料的机会。一个民族志研究项目可能会止步于以探索性或描述性资料写就的报告，或者，它也可能进一步将从性质上界定的因素和变量转换为经得起调查研究检验的量化指标。这种调查研究采用的统计调查技术是一种系统的、结构化的和标准的资料收集方法，在大规模样本中随机取样，通过统计分析来检验假设。下一章，我们将使用相同的结构——塑型理论与研究模型、域、因素和变量——来指导民族志统计调查或自答式问卷的建构。

第8章 结构化民族志资料收集： 民族志统计调查

结构化资料收集的功能

民族志尝试从所研究的社会场景的参与者的视角出发来理解社会与文化现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民族志方法用质性手段建立了概念模型，然后再从质上和量上对其加以验证和检验。结构化的民族志资料收集能够将探索性资料与半结构化资料转化为工具，用以从量上测量文化域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用总体中的一个代表性样本检验这些关系（关于这一过程的图表参见Babbie,1995,第51页、第55页）。

在第5章和第6章当中，我们探讨了探索性资料或非结构化资料收集方法在揭示民族志的关键域与因素中的作用。第7章检视了半结构化资料收集方法，尤其是半结构化开放式访谈的重要贡献，它们能充实叙述，界定文化团体或组织在变量（单元）和项（事实）层次上的知识、态度、信仰、行为、社会组织以及模式化的事件序列的变化范围。

本章将探讨结构化资料收集方法在民族志研究中的作用，主要关注统计调查工具(survey instrument)的建构，这是从被调查者总体的代表性样本那儿收集资料的最典型方式。除了统计调查过程中的自我报告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结构化资料收集，包括在特定时间点对行为的无干扰测量（参见Bernard, 1995）（例如对急诊室使用模式的同步定时观察，或者是对受携带病菌的蚊子

结构化资料收集的
功能

•
界定民族志统计
调查

•
建构民族志统计调
查的步骤

•
民族志访谈的实施

•
分析定量资料

•
综合定性资料与定
量资料

•
小 结

影响的个体的时间—活动记录)。与民族志统计调查相似,对行为直接、系统地观察有助于避免碰运气式地从事参与观察时不可避免的偏见(Johnson & Sackett)。在这套丛书的第三册中,邦尼·纳斯塔西(Bonnie Nastasi)在有关民族志研究中资料收集的视听方法部分详尽讨论了可量化的观察资料的系统收集技术。

结构化的民族志资料收集使得民族志者超越了对文化共识和结构性叙述的信息收集,迈向对自变域和因变域之间关系的检验。使用结构化资料收集方法的目的在于:

- 在域和因素内选择变量进行测量。
- 依据塑型民族志模型对嵌套于因素和域中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和检验。
- 寻找原先假设的变量和新的、意料之外的变量间的关联,可以在已有的质性资料库或补充的民族志研究中找到对这些关联的解释。

即使是最均质的社群、机构和工作场所,其成员的知识、态度、信仰与行为也会千差万别(Pelto & Pelto, 1978)。诸如教育绩效、未成年人怀孕以及日常生活的行为这些域在任何人群之中也都不是平均分布的。结构化的民族志资料收集使我们能够从量上检验由塑型理论得出的假设(该理论在收集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资料的过程中得以建立并细化)。

结构化的民族志资料收集与标准化统计调查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民族志者以基于地方的塑型民族志研究作为其定量研究的基础。相反,非民族志的定量研究往往先验地以调查者自身的经验为基础,或者以另一位研究者运用针对其他目的和人群的工具而得出的理论视角为基础。(关于传统的统计调查建构方法参见Andy, 1989;关于标准化统计调查工具的运用参见Gay, 1985)

界定民族志统计调查

我们用民族志统计调查(ethnographic survey)这个术语来表示收集定量的民族志资料的封闭式方法和观察进度表,它具有如下特点:

- 紧随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观察与访谈，并以这些观察和访谈为基础。
- 以项为基础。正如我们在本书第2章说过的那样，在地方性背景下将文化域转换成因素，再将因素转换成变量，变量就引出了项。
- 从在当地进行的先期调查（prior investigation）中获得效度与信度。
- 使研究者可以比照定量分析结果和质性资料进行多方检验。定量分析采用双变量和多变量的统计数字，质性资料则是运用可比较的编码范畴产生的。
- 不能单独存在，而是要与其他资料来源相结合，它们才能提供地方性场景中被关注现象的完整图像。
- 产生的结果要求进一步收集与分析定性资料，以便消除定性与定量资料之间的矛盾，或是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出现了可观察的定量关系。

民族志统计调查并非——

- 研究项目中首先进行的资料收集工作；它们最好是研究中的最后一个步骤。
- 研究者仅基于自身经验而设置统计调查选项的产物；相反，选项产生于对质性资料的系统分析。
- 要复制在其他研究中使用过的和/或针对全国性样本验证过的标准化指数（如“控制点”或“抑郁”量表）；相反，其长处正在于调查的变量和项是在地方性情境下出现的。统计调查的地方性根基增强了其效度。
- 仅仅是发现过程的一部分；相反，它们是为了确定在对有限的选择性样本进行深入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概念、信息和结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到整个总体。因此，变量不应该有开放式答案或者选择“其他”类别的机会。如果这些选项是必要的，那么质性资料的收集对统计调查来说就是不充分的。

民族志统计调查具有其他类型的统计调查所共有的很多特性

- 它们可以面对面地进行（结构化访谈）或自己完成（调查问卷）。
- 设置调查问卷时使用相同格式（例如排序、评级、是/非判断等）。
- 它们需要试点测试（pilot-testing）来确保目标群体可以理解问题，并确定对每一个变量的回答的充分性及分布范围。
- 它们通常使用概率选择与抽样方法，特别是随机选择与抽样方法。

民族志统计调查与其他类型的定量统计调查也有很多不同。首先，民族志统计调查的设计要立足于田野经验。它们可能会借鉴其他研究中的方法和问题，包括全国性调查验证了的方法，但它们的长处主要是在民族志语境下描述地方性文化要素的意义与差异的能力。因此，它们要以验证中层理论或局部理论为终点。民族志统计调查量度那些被研究群体理解并视之为相关的，并且包含于理论模型之中的概念。仅当民族志统计调查的问题及结论与来自于同一个田野点的质性资料相联系，并融入理论模型时才有意义。

建构民族志统计调查的步骤

民族志统计调查来自民族志资料的系统收集与分析。民族志资料被归入不同的域，继而域可操作化为因素、次因素和变量。利用这些资料来设计统计调查的研究者需要从大量的因素和变量中进行选择，将其纳入统计调查工具。

如前文所述，资料收集是在塑型理论指导下始于域这一层次上的非结构化访谈与观察。民族志研究者通过运用这些资料、文献以及研究参与者的洞见来勾画新的文化域、确定因素，并删除那些已被证明没有预想中那么重要的域。

沿着抽象阶梯向下，因素成为半结构化方法中提出问题的基础。半结构化访谈使研究者有机会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提出具体问题与重点问题，这些问题能够促进研究者与众多受访者之间的交

流。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及为进一步澄清答案的后续追问，产生了作为定量统计调查之基石的变量，还有作为变量构成成分的项或属性。图8.1是该过程的图示，实例8.1则展示了实践中的该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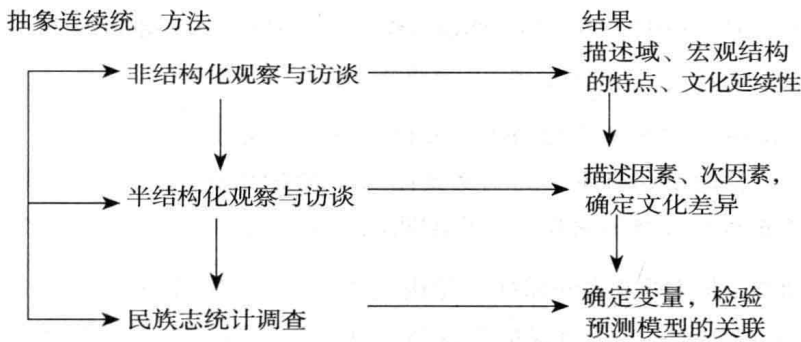


图8.1 与抽象连续统相关的资料收集方法

实例8.1 从非结构化与半结构化访谈资料中提炼因素与变量

在毛里求斯的研究中，“工作”域被确定为塑型理论模型的构成要素之一。在非结构化访谈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年轻女性成为劳动力的原因”。在半结构化访谈进度表中，为了探究这一因素，研究者以克里奥尔语（每个毛里求斯人都说的语言）提出问题：“是什么原因让你在出口工业加工区工作？”答案被放入“工作”域中，并使用ETHNOGRAPH的文本搜索程序将其编码，编码名为因素“WHYWRK”（为什么工作？）。通过分析因素“为什么工作”范围内的文本内容，识别出了女性为什么成为劳动力的五种原因：

- 为了经济上的独立。
- 为了养家。
- 为了离开家。
- 为了和工作的朋友们在一起。
- 因为家庭问题。

由于多数女性都提到了多种原因，所以变量“为什么女性成为劳动力”就转变成了民族志统计调查中的排序式问题，格式如下：

“这里有女性为何就业的五个原因。请根据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为其打分（用1~5分表示，1分表示最重要，5分表示最不重要）。”

出于资料分析的需要，每个回答都根据李克特量表被当成一个独立的定序变量。得到每个问题的总分和平均分后¹，结果显示，被选择得最多的原因是“养家”（平均分为2.03分），

“经济独立”（平均分为2.61分）排在第二位。

就与男性的关系以及性行为而言，那些为了自身发展或个人兴趣（原因1、3和4）而加入“出口加工区”劳动大军的女青年，同那些出于家庭原因（原因2和5）而加入劳动大军的女青年之间存在很多明显差别。

这个例子阐明了图8.1中的要点，即每一层次上的方法都可促成：

- 该层次上特有的一套结论。
- 进一步可操作化的基础和逐步聚焦的研究方法。
- 同一议题内不同答案之间的交叉比对（多方检验）。
- 可以依赖的后续步骤和进一步阐明的结论。

如实例8.1所表明的那样，建构民族志统计调查的第一步是分析来自半结构化访谈与观察的资料。这些资料以文本形式出现，来自对受访者回答的记录和打印成稿的田野笔记。为了便于设计民族志统计调查，需要对这些文本资料进行分析，搜寻并确定使因素可操作化的变量，同时也要寻找在总体中表现出来的构成变量的属性或项。因此，在对半结构化访谈中“你觉得在出口加工区的工作怎么样”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搜寻编码WAST（工作满意，一个因素），随即辨识出两组受访者：那些对工作生活感到满意的人，以及那些感到不满意的人。进一步分析编码WAST下的问题的回答，就辨识出许多次因素和变量，包括：

- 与同事关系的好坏。
- 与主管的关系。
- 工作培训时间长短。
- 疲劳程度。
- 职业病。
- 薪水的多寡。
- 上班时的休息时间。
- 下班后的自由时间。

就操作化过程而言，我们是依下面的形式推进（参见图8.2）：

1 如丛书第五册第9章所记，严格地说，不应该加总定序变量（在不同层级之间没有固定值的打分）的答案，不过，将定序变量视为定距变量或定比变量则是研究中的普遍做法，该研究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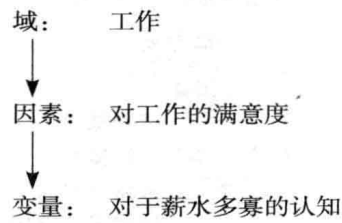


图8.2 从域到变量层次的概念变动

为了使这一转换过程更为容易，我们的研究小组把几个扩大的模型裱在几张海报或新闻纸上，然后贴在一大面墙上。一条标准的经验法则是在统计调查中选择二到五个自变域，一个（不超过两个）相关的因变域。就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研究而设计的民族志统计调查包含三个自变域——“家庭”“同辈”与“工作/社区”，一个相关的因变域——“性行为”。在哈德福特市所做的关于演变至高危险性吸毒的路径的研究包括自变域“家庭”“学校”“同辈”“暴力”和“社会网络”，因变域是“高危险性吸毒”。图8.3说明了不同域之间的关系。丛书第五册中所描述的对艺术课程的研究也运用了同样的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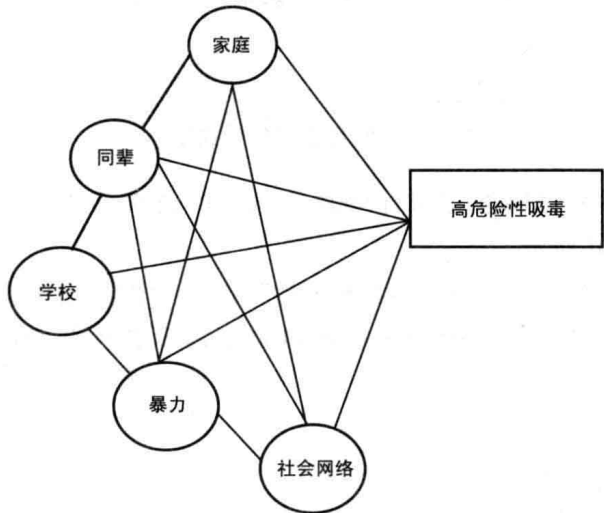


图8.3 展示统计调查工具中包含的自变域与因变域

建构统计调查的下一条经验法则是回顾已经分析过的二手以及一手（深度及半结构化）资料，以便在每个域中确定四到五个因素，以及每个因素中最多可达六个的变量。这些可以以分类法的形式单独写在一页纸上并贴在墙上，如图8.4a所示。

家庭域	暴力域
因素	因素
社会经济状况	遭受暴力
主要监护人的教育水平	实施暴力
父母出生地	毒品与暴力
迁移史	被捕或涉案史
家庭成员吸毒	
同辈域	社会网络域
因素	因素
同辈的人数	社会网络的规模
与同辈一起活动的次数	社会网络的构成
与同辈一起吸毒	社会网络的密度
同辈涉案的历史	危险网络的密度
同辈吸毒	自我中心
吸毒与酗酒的同辈压力	
学校域	吸毒域
因素	因素
在校表现的历史	吸食过的毒品数量
在校接触毒品	频率
在校接触酒精	
与吸毒有关的校规	

图8. 4a 域与因素的分类法

接下来是把民族志统计调查工具中的备选因素放进概念模型，如图8.4b所示。

最后，图8.5以“社会经济状况”因素为例，说明变量是如何被纳入模型的。下面列出在该研究中指示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量：

- 家庭收入。
- 物质生活方式。
- 户主的职业。
- 家庭就业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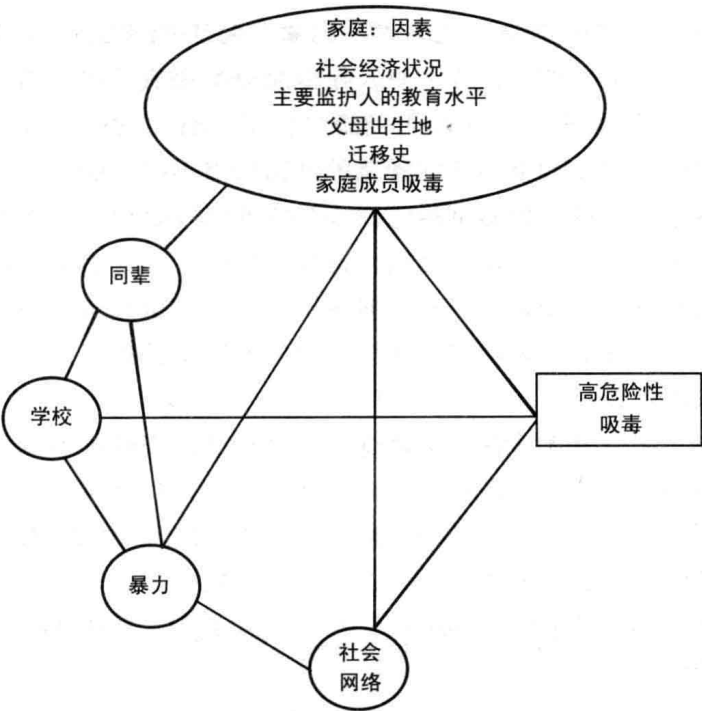


图8. 4b 建构统计调查的因素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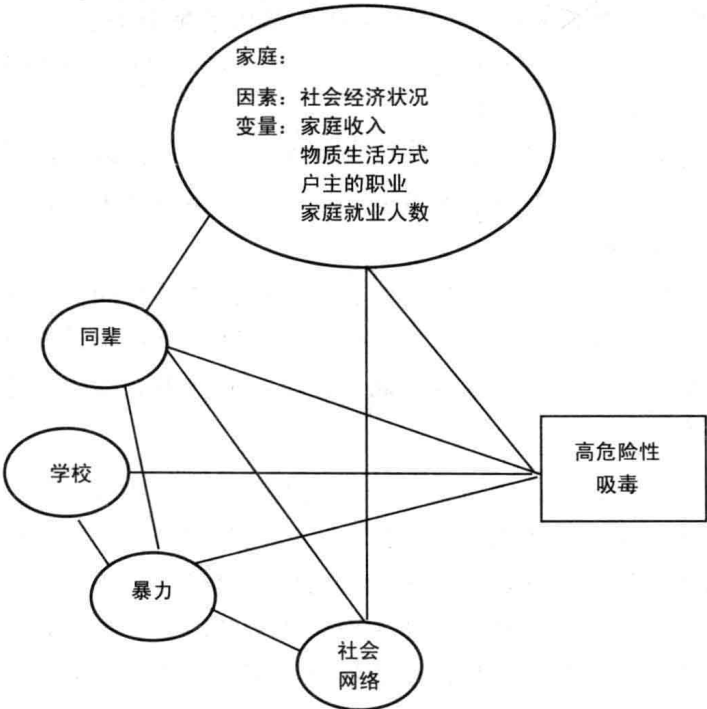


图8. 5 “家庭”域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因素下的变量的分类

将六个域分别分解成为六个因素，每个因素又各自分解出可多达七个的变量，这样一来，在概念分类法或树状图的最后一行，我们就得到了200个以上的变量。乍一看，这些变量的数目令人望而生畏，如果用不同颜色的纸张代表不同的层次（域、因素和变量），那么色彩鲜艳的“办公室壁纸”恐怕会令不熟悉其意义的来访者大吃一惊。然而，这张“壁纸”大致表明了各因素和域内所确定的变量的分布，显示出哪儿的变量分布不均匀，哪儿存在待弥补的知识缺漏，这样就能保证统计调查充分涵盖了每个相关主题。

由于研究者无法在一次调查中塞进自己关心的对因素或变量的所有提问，所以在设计民族志统计调查工具时就需要在因素与变量层次上小心谨慎地选择。按照理论模型排列一份因素与变量的完整清单，会让选择/取消选择更系统、更明了。

利用挂在墙上的那些纸张，我们形成了如下一些选择与取消选择的标准：

- 任意一个域内是否有尚未被充分操作化的因素？也就是说，是否有缺乏足够变量的因素？如果同一个域内的其他因素皆已完全可操作，那么未充分操作化的因素就可能被取消。
- 是否有包含了太多变量的因素？如果是，就可以找出并删除多余的或相关性不足的变量。
- 因素与域之间是否平衡？指出现有资料中没有足够的因素来体现从而对于研究来说不太重要的域，这样明显的不平衡就可以指导删减过程。
- 考虑到样本规模、受访者动机、以及研究持续时间，访谈是否存在时间和资源上的限制？这些限制有助于决定统计调查工具可以容纳多少域、因素和变量（虽然它们并不必然决定实际上要选择哪些）。

更困难的是为应该选择哪个变量提供具体的指导方针。难以格式化的变量或许需要被删除掉，冗余也是拒绝某项变量的好理由，除非就同一因素提出更多问题可以提高信度。出现疑问时，研究者必须信赖研究负责人或主要调查者的决定，他们将在重新思考概念模型的基础上做出最后选择。树状图能让研究小组中更

熟悉民族志资料的其他成员就民族志统计调查的设计提出意见。

这里所描述的方法要求的是编辑在民族志文本以及其他补充性资料中确定的变量，而不是发明变量。编辑过程越自觉，目的性越明确，统计调查工具的建构就越没有那么神秘。最终选定变量之后，研究者就可以将这些变量转化为统计调查工具中的问题了。

变量的建构

变量由不同的属性（或项）构成。阶段1与阶段2的民族志资料收集协助我们界定属性，将它们组成变量，最终决定变量如何建构。

变量的建构有几个重要特点：

建构变量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 属性应该是穷尽的。
- 属性应该是互斥的。
- 属性与提问应该避免使用两个或多个名词或动词。

穷尽性 构成变量的属性或单元应该是穷尽的。也就是说，对变量的每一次观察所得都应该能归类为某一属性，不应该出现属于某个未包括在变量之内的属性的回答。可以用添加“其他”“非上述任何一项”以及“不知道”等类别的办法使属性达致穷尽。然而，研究者也应该记住对“其他”项的回答进行编码，以留待稍后再用，并且要尽可能避免这一类别。

实例8.2 民族志统计调查中建构封闭式回答时选择项的穷尽性

1 考虑辍学的主要原因：

- ___来自教师的烦扰
- ___来自学生的烦扰
- ___成绩差
- ___需要全职工作以补贴家用
- ___有了孩子

___其他

2 未来的教育/职业道路。将来你最有可能选择哪一种教育？只能选择一项。

___参军

___上大学

___上技术学校

___参加职业培训

___不知道

3 你在哪儿第一次尝试毒品（不指酒精）？

___从未吸毒

___与朋友们在一次聚会上

___与朋友们在车上

___一次公众场合（音乐会、游戏、舞会等）

___学校上学期间

___与朋友或家人在家里

___独自一人（在家或其他地方）

互斥性。属性必须是相互排斥的，即在备选答案中，针对同一个变量不能同时选择两种属性。例如，“你多数时候居住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包括一个人可能居住的所有地方，并且应该要求回答者选择自己多数时候居住的唯一一处居所¹。

下面的例子用于说明测量“职业”的变量问题设计中的瑕疵。

实例8.3 民族志统计调查中一个问题设计的瑕疵

你当前的就业状态如何？

___全职工作

___兼职工作

___失业

上述提问是有问题的，因为答案并不互斥。受访者可能同时选择前两项答案，因为他或她既有一份全职工作，也有一份兼职工作。为了纠正这个问题，研究者有以下几种方案：

¹ 问题可能读为“当前你住在哪儿？”在此情形下，有多处住所的受访者可以选择任意一个答案。不过，问题应该结构化为具有多个而非一个变量的形式。每一个变量可以是一个要求回答“是/否”的处所（例如纽约、休斯敦、科罗拉多、哈特福德、艾塞克斯和圣米格尔阿连德）。

- 把兼职工作放在大类别“就业”之下，并且仅提供两项答案：就业或失业。但这种方案可能导致错失一些资料。
- 让受访者做单项选择，这将使得受访者选择最突出或最重要的一项答案。但这种策略可能导致资料不准确，因为同时有全职工作的人可能会因为选择“兼职”更有利可图而只选择“兼职”。
- 提示全职工作优于兼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没有全职工作的人才会选择兼职工作这一答案。但这同样会导致资料不完整，因为全职工作者也有可能兼职，但却没有机会在统计调查中说出来。
- 不对问题进行任何改变，待获得足够的信息之后才发现选项的确是互斥的。
- 提两个或多个问题，用于得出结合了全职与兼职工作的全部可能性。

我们建议研究者认真考虑以下一点：避免含有两个主语或动词的模棱两可的问题。经验不足的研究者有时会在统计调查中提出含有两个或更多主语或动词的问题，例如“酗酒或吸毒有没有导致你参与非法的或暴力的活动？”这是一个很差劲的问题，因为不论是受访者还是研究者都不知道答案指向的究竟是主语中的哪一个——酒还是毒品？指向形容词中的哪一个——非法的还是暴力的？提问应该拆分为两个问题，每个问题包括两个变量：

酗酒曾使你参与

- 一次非法活动？
- 一次暴力活动？

吸毒曾使你参与

- 一次非法活动？
- 一次暴力活动？

具备上述基本特征的问题设计可以得出有关变量的明确信息。但是，至此我们也仅仅是将这些基本特征运用于需要受访者在诸多答案中进行单项选择的那些变量上。受访者也有可能被要求比较不同的属性，换句话说，确定属性之间的关系。例如，他们可能要从高到低或根据各个属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排序（第一、第二、第三等）。受访者也可以给各个属性打分。由于资料分析程序随所用变量类型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研究者设计变量时务必要对自己选择什么变量，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个变量而不是那个变量了然于心。

变量或测量的类型

- 定类测量。
- 定序测量。
- 定距测量。
- 定比测量。

定义：

定类测量是指具有穷尽性且互斥的属性的变量，这些属性存在质上而非量上的差异。

定类测量。定类测量是指其属性穷尽且互斥的变量。它们根据性质而非数量而有所不同。定类变量具有类别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它们是根据名称或标签而不是数量来区分。例如，一次国际性的培训项目召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这些成员可以依国别来分组，变量就是“来源国”。所有来自津巴布韦、爱尔兰、秘鲁和印尼的成员都可以根据一个特征来区分，即“来源国”。所有来自津巴布韦的成员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来源国为津巴布韦。与此类似，还可以依照性别（男与女）、饮食取向（素食与非素食）、房屋所有形式（房主与租户）或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或缺席）等变量来对人们进行分类。不过，这些属性之间的差异无法排序，它们仅仅是类别或性质上的不同。

定义：

定序测量是指其属性可以排序的变量，不同序位之间的差别仅是相对的，不能用标准化的计量单位测量。

定序测量。定序测量指的是其属性可以排序的变量。排序意味着不同的属性具有相对多或少的变量含量，但差别并不以绝对条件来测量。例如，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受教育程度的排序，让受访者从下列项中选择一个。

- 小学毕业。
- 初中。
- 高中。
- 大专。
- 获得本科学位。
- 研究生教育。

这些选项相互排斥并且根据“受教育程度”排序，不过，它们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受教育量，比如按课程或年份测量。不同的水平之间的距离仅有“多于或少于”的意义。要求受访者按其倾向或意见从1（最高）到5（最低）进行排序的李克特量表就是定序测量。



格特曼量表是展示了属性或项的逻辑发展的定序表，也就是说，它们表明了一组相关的项之间存在着前后高下之分，这种排序在不同文化或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差异。

定距测量。如果排好序的属性之间的差距的意义可以用标准的计量单位测量，这种变量就是定距测量。在社会科学研究里，要找到起点不为零的真正的定距测量变量是很困难的。有些专家给出了智商（IQ）或其他智力分数的例子，其中，100分同120分之间的距离被认为与90分同110分之间的距离相等。然而，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起点不可能是零分，换句话说，没有哪个活人是根本不具备智能的。

定比测量。定比测量以零为起点。实际年龄、用货币单位计算的绝对收入、个人社交网络里的人数、英里或公里等空间单位都是定比测量。

定义：
定距测量是指用标准的计量单位测量属性之间的序位差距的变量，该计量单位并不以零点为起点（例如，恒温器或智商的计量单位）。

通过选择或创造不同的项来转换变量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要把一个变量拆分为项或属性，还要把这些属性重新组成将在民族志统计调查工具中出现并且用于测量变量的问题。实例8.4展示了某个变量与某个变量层次上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如何重构问题以得到对项或属性的回答。

实例8.4 变量与项之间的关系

变量：在毛里求斯出口加工区工作的理由
半结构化调查问题：为什么女性在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工作？
答案或属性（项）：女性选择就业的五个原因

- 经济独立。
- 养家。
- 离开家。
- 朋友也在工作。
- 家庭问题。

民族志统计调查问题：这里有女性为什么选择就业的五个原因，请你根据其重要性从1到5进行排序，1表示最重要，5表示最不重要。

___ 经济独立

___ 养家

- ___离开家
- ___朋友也在工作
- ___家庭问题

设计统计调查问题的建议与指导方针

下面我们列出设计与建构统计调查问题的一些建议。我们想传递给研究者的基本信息是：要确保问题表述得简洁明了，避免误导受访者，设计研究参与者容易理解的问题。

设计统计调查问题的建议

- 选择一种提问格式或陈述格式。
- 避免开放式问题。
- 确保说清楚所有的项。
- 确保所有的选项互斥。
- 避免陈述中出现以名词或动词形式出现的联合（和/或）。
- 确保受访者能给出答案。
- 确保问题与研究课题相关。
- 使问题和选项尽可能简短。
- 避免同一个量表中交替出现否定项和肯定项。
- 避免会混淆问题的具有隐藏含义的问题和选项。

对与变量类型相关的统计调查问题进行格式化处理

当研究者把变量转化为项时，可以在很多问题模式中进行选择。统计调查问题的典型模式如下：

- 填写——受访者填上正确的答案。
- 多项选择——受访者从多至15个选项中选择一个答案。
- 李克特量表——受访者按照3分制、4分制或5分制从高到低为选项分级。
- 语义差异——受访者确定一个文化域在一对对由相反形容词组成的选项之间的位置。
- 排序——要求受访者在一份不超过10项的限制性清单中排出各项的次序。
- 分级——要求受访者根据各项的重要性为其定级，通常从1到10。
- 类属——要求受访者从两个或多个截然不同的类属选项中选择一项。

表8.1总结了这些问题模式，以及提问实例和测量类型。

表8.1 问题模式表（附例子）

问题模式	例子	测量（定类、定序、定距、定比）
填写	你现在有几岁 准确年龄____	定比
	你是__男性__女性	明确类属
多项选择	请选择一项答案 我认为这个社区的女性： ●应该留在家中照顾孩子，不 应该外出挣钱 ●应该从事传统的女性工作来挣钱 （缝纫、出售食品等） ●可以和男性一样工作	定类
利克特	你认为今后5年内你被 艾滋病感染的风险有多大？ （1为最高，5为最低） __1__2__3__4__5	定类
语义差异	你会把“应用研究”放 在下列天平上的什么位置： 有用 __ __ __ __ 没用 富人 __ __ __ __ 穷人 无力 __ __ __ __ 有力	定类
分级	根据下列选项对你的重要性给 它们分级，1为最高， 4为最低： ____汽车____电脑 ____电视____音响/CD播放机	定类
排序	根据下列选项对你的重要性给 它们排序，1为最高， 4为最低： ____汽车____电脑 ____电视____音响/CD播放机	定类
肯定/否定 （是/不是）	你希望今后5年都住在 这个地区吗？ ____是____不是	明确类属

表8.2说明了研究者如何创建和格式化能代表同一因素和域内的各变量的问题。在此，我们选择了“家庭收入”这一因素。在 我们对毛里求斯艾滋病风险的研究中，家庭收入位于“家庭”域之内。表内所有问题都与“家庭收入”相关，它们代表七个不同的变量，每个变量都指示着有细微差别的文化建构，并且有不同的测量方式。哪种模式更适合要取决于变量的性质、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和经验（二者都会影响到受访者正确回应的能力），以及预测的结果。

表8.2 对“家庭收入”因素内的变量进行不同的格式化

模式	问题	变量	文化建构	量表或测量
肯定 / 否定——是/不是	请指出您的月收入是 —— 少于600美元 —— 多于600美元	估计月收入	人口统计	定类—明确类属
填写	您的家庭月收入是多少？	准确的月收入	人口统计变量	定比—连续的
多项选择	您的平均月收入是多少？选择最接近的一项： —— 100~499美元 —— 500~999美元 —— 1 000~1 999美元 —— 2 000美元以上	估计平均月收入	人口统计变量	定类—明确类属
利克特	您对月收入的满意度？1表示最高，5表示最低： 1 — — — — 5	收入满意度	感知	定序—连续的
语义差别	您如何看您的月收入？请在适合的位置打勾。 高 — — — — 低 足够 — — — — 不够		态度	定序—连续的
分级	请对明年你用月收入可能购买的商品进行分级，用1到10表示（1表示最有可能，10表示最不可能）： 电视机 微波炉 汽车 客厅沙发 摩托车 收音机 音响 室内盥洗室	购买MSL物品的可能性	期望	定序—连续的
排序	请根据购买顺序从1到6为以下物品排序： 电视 微波炉 汽车 客厅沙发 摩托车 收音机	MSL物品的重要性	态度	定序—连续的

试点调查与前测调查 (piloting and pretesting survey)

测试一项民族志统计调查需要分两步进行：在一个小样本内就工具进行试点调查，以评估问题的清晰度并计算操作所需时间；对一个较大样本进行前测调查，以评估工具的效度以及变量与量表设计是否充分。

就工具进行试点调查。研究者应该从被研究群体中选出一组受访者来检查统计调查工具的安排顺序、流畅性反跳跃方式、用词、可理解性及长度。检查可以通过焦点团体进行，也可以通过个人访谈进行，或者两者同时进行。受访者可以在一个接一个地回答问题期间或之后，提出任何有关工具的建构、概念以及流程的问题。接下来就应该修改工具用于前测。

就工具进行前测调查。研究者需要从目标群体或邻近的相似群体中选出一个规模在60~80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就工具进行前测。并且，要在两周之内，用相同的统计调查工具对20%~50%的已受访者进行再次访谈，以检查两次操作中的答案是否一致。如果第一次的答案与第二次高度一致，就说明工具是稳定的，也就是说，问题是结构化的，因而从同一个受访者那里得到相同答案的可能性较高。出于同一目的，从规模较大的试点调查中收集到的资料与第一阶段的试点调查同样有用，不过这些资料还有其他重要用途：

- 通过对相似问题进行交叉列表来看它们是否相关，可以检查内部信度和一致性。
- 检查稳定性。
- 创建高信度的量表。
- 使研究者能够评估变量的差异是否足以检验假设。
- 使研究者得以删除不足以反映差别的变量（例如所有答案都一样的变量）。
- 使研究者删除不具备测量效用的量表选项。

不论问题来源如何，所有工具都应该在与研究有关的地方性群体中进行前测。前测可以防止出现效度和稳定性问题，也可以使研究者用全国性样本中的测量变量及相同方法在地方性环境中检验量表在信度和效度上的满意程度。

定义：

跳跃方式是让访谈者遵循统计调查工具的逻辑从一组问题转移到另一组问题的指令。

定义：

稳定性是指在短期内使用同一套统计调查工具询问同一个受访者前后所获答案一样。

如果包括量表所测变量在内的多数变量都来自于田野调查，而不是来自全国性调查所验证了的工具，那对该工具进行前测就显得尤为重要。前测使研究者在将工具运用于更大规模的样本之前，就可验证工具的有效性并确定它在田野中的信度。

抽样问题在民族志统计调查中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差不多要花一整章的篇幅来描述民族志统计调查中的系统抽样和概率抽样。

民族志访谈的实施

研究者应该面对面地访谈受访者。面对面访谈之所以更为可取是因为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时常会有一些额外评论，这些额外评论构成了民族志资料，它们有助于理解受访者的生活，或许还能丰富研究的全部资料。直接访谈可以在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建立起和谐气氛，并带来更有效的回答。此外，我们还相信，面对面的访谈以及直接的知识获取能够赋予研究者理解受访者答案的更好直觉。

民族志统计调查当中面对面访谈的条件类似于从焦点团体访谈中获得好信息所必需的条件。访谈应该在一个安静的、私密的地方进行，较少或没有干扰。能够避开会直接影响受访者观点的受访者家人或社群成员是最理想的，（参考第6章所描述的安杰拉·约翰逊的困境）但这并不总是可能做到，尤其是在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较低的社群，或者是在习俗上要求其成员（尤其是女性）需要时刻有人伴随左右的社群。在这种情况下，访谈者应该告诉其他在场者，他们可以在稍后接受个人访谈时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告诉他们正在接受访谈的受访者的观点是最重要的，由此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人对受访者的影响。

长时间的访谈会使受访者疲惫不堪或紧张不安；小孩或家务活等也会影响到受访者；此外，受访者身体不适、残疾或毒瘾等也是影响访谈的因素。访谈者可以在访谈完成之前中止本次访谈并约好下次访谈的时间。研究者也可以判断访谈本身是否持续时间过长而难以一次完成，从而需要分为两次进行，但由于分两次进行访谈费时费力，研究者最好尽量避免。

面对面地进行民族志统计调查有助于避免因受访者没有受过教育、阅读理解力较低、语言混杂等带来的问题。不过，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找到合适的受访者，确定访谈地点，并且在不受家庭成员、朋友和个人事务干扰的情况下完成访谈。

解决办法之一是采用自答式工具(self-administered instrument)。创建自答式工具或许需要较长时间，因为研究者必须确保所有的问题都一目了然，即任何可能参与这项研究的人都能完全理解。另外，自答式工具仅适用于受过教育的人群。在受访者出于各种目的常常聚集的地方相对容易开展，例如教室、成人学习中心、候诊室、等待兑现支票的队伍、年轻人的课后活动场所等。当然，事先必须与上述场景中的工作人员约好。

实例8.5 斯里兰卡以大学生为对象的自填式问卷调查

在斯里兰卡的一项有关青年人与性风险的研究项目中，研究者把受访者——都市年轻人和大学生——分为6~10人的小组，由研究小组的成员进行监督。每组监督者成批检查问卷。整个小组的受访者完成一段自填式问卷之后需要接受指导，再开始下一段问卷。如果年轻人遇到不懂的地方，监督者负责澄清问题。多数被研究的年轻人已经完成11年级或以上的教育。当问卷提交上来时，监督者进行检查，提醒受访者查缺补漏。

尽管存在用电管制和其他后勤问题，这种方法仍旧能在三周内收集到600份以上的完整的调查资料。

另一种可行的办法是邀请许多受访者集中到某地完成调查问卷。此时或许需要准备好奖金、食品、宴会或抽奖等，这些活动通常需要准备交通工具，负责照看婴儿或儿童等。为此，研究者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维系社会关系，建立把人们召集起来所必须的信任关系。

实例8.6 在哈特福德市以母亲和女儿为对象的自填式问卷调查

“都市女性反药物滥用”(UWASA)是一项干预式研究，测试在女孩9~12岁期间，改善母女沟通是否能预防过早发生与毒品和性有关的危险行为。该研究设计要求招募40名女孩以及她们的母亲进行三次每次为期一年的测试，并将每个周期中的9个月的干预结果与对应的控制组中的母女组合相比较。女孩及其母亲(或相当于母亲的人)使用自答式工具进行测试是在基线期(干预周期开始之前)及以后的三个时间点，即干预开始之初、干预6个月时、干预15个月时

以及干预24个月时。在第二个和第三个周期内，由于几个周期的资料收集时间重叠，因此最多时需要大约同时对120对母女进行评估。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评估小组决定举行“测验聚会”（testing parties）。处于各个周期的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母女被邀请到社区研究协会参加自己的特殊活动。她们被分为两组，母亲一组，女儿一组。项目职员监测每一组，发放英语或西班牙语问卷，保证人们明白所有问题，当问卷完成时负责检查并提醒问卷受访者查缺补漏。至少有一名评估人员能为无法阅读英语或西班牙语的母亲提供帮助，在这种情形下，评估人员把问题和备选答案念给受访者听，受访者自己选择合适的答案。

每一位母亲和女儿都会得到一份奖品。此外，她们还可参加一次抽奖活动。测验完成之后，母女们还可参加一次招待会。年幼的儿童有专人照看，项目成员和项目所雇佣的司机负责接送参与者。项目成员以此方式可以同时测验每组人群中的50%~75%的人，仅有小部分人需要上门收集资料。这种方法可以缩短评估人员60%以上的调查时间。

尽管有潜在的支出，自填式问卷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便利。对于执行者而言，其支出更少、耗时更短、在能够较好阅读和理解问卷的多数受调查者那儿行之有效、并且提供了扩大样本规模的现成机会。与此同时，就算是有物质激励，部分受访者也可能从未出现在集聚场所，研究者因而可能无法获取研究的整个样本。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能在完成资料收集和分析之后，才能发现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模式化误解，换句话说，统计调查期间无法发现这样的误解。因此，自答式工具需要更多的准备工作来保证收集到有效资料。

分析定量资料

定义：

频数是指每个项或属性出现在描述变量的问题的答案中的数量和次数百分比。

由于民族志统计调查数据的分析要遵循塑型理论模型以及域、因素和变量的概念分类法所设定的指导方针，所以它实际上可以比其他类型的统计调查资料的分析更系统、更结构化。在此我们将略述定量资料分析的步骤，详细的叙述请参考丛书第五册中的第8章和第9章。

定量资料分析的第一步要求得出研究中每个变量的出现频数。SPSS、SAS或EPI-Info等计算机分析系统可以提供每个变量的总计信息（例如出现频数、均数、区间等），这有助于研究者描述变量并解释结果的意义。统计调查通常包含大量应该被简化以

便进一步分析的变量。以不同方式把变量结合起来可以“处理”（简化）资料。一旦资料能够用于分析，它们也就能够用于验证假设。为了验证假设，研究者需要重返最初的研究模型，用这些资料来检验各个域、因素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对假设的验证包括比较样本内两群人的变量方式，或者同时检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之间的关联。用统计方法联结两个变量被称为双变量分析（bivariate analysis），用统计技术联结一组或两个以上的变量被称为多变量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研究者在资料分析的过程中会提出很多新假设，这些新假设既基于最初的模型，也基于与资料互动所产生的新观点。研究过程中已经收集到的质性资料有助于解释这些新假设的意义所在。分析的最后一步是报告、解释结果，决定哪一个尚未回答的问题将引领下一次研究。

综合定性资料与定量资料

多方检验资料以证实结论，以及综合定性定量资料都是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民族志者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综合这两种资料分析的结果，以使它们互为补充、相互支撑。综合要求回到建模和操作化阶段，它们构成了民族志研究中定性和定量资料收集以及分析程序的基础。

来自于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资料被编码为域、因素和变量，并借助文本管理软件以计算机化的形式储存。定量资料则以再现相同的变量、因素和次因素的量表和指数的形式被储存。这两套参照资料在因素和次因素层次上的汇合为多方检验和综合提供了可能。

我们发现，最有效的编码质性资料的方法是概念分类法或“树状图”。根据分类中的不同层次，文本资料被编码为域、因素和次因素¹。如果用基于文本的计算机管理软件（例如ETHNOGRAPH）查询“工作”域，它会检索“工作”域中所有因素和次因素的编码，以及同一批文本中被编码的其他域和因

1 我们不建议在变量层次编码文本资料，因为编码相当耗时，编码者一般也不能有效地记住概念/编码分类法中次因素之下的所有信息。

素。于是，研究者可以检查这一批文本中与概念模型相符合的域、因素和次因素之间的关联。再者，文本管理软件允许研究者检索包含任意两种或更多特定编码的文本。这是研究者搜寻文本资料中域与因素之间的关联的第二种方式。

定量资料分析在同一域和因素之内，或者跨越不同域和因素探究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联，其方式与研究者寻找相关联的文本丛一样。以理论模型为指导，民族志者可以在定性与定量资料中探究相同的关联，他们也能用一种类型的资料来确认、解释和质疑另一种类型的资料。

实例8.7 毛里求斯女性、工作与艾滋病研究中定性与定量资料的综合

对毛里求斯青年女工展开民族志统计调查所得到的定量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与研究者的观念相反，同辈较少提供有关艾滋病知识。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家庭和工作场所为女青年获悉艾滋病的性传播可能性方面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我们的民族志资料，我们很难理解几乎不提及性话题的毛里求斯家庭如何为其女儿提供有关艾滋病的知识。重新审视质性资料后显示，父母们认为在出口加工区工作是导致男女关系脱离监控的危险因素。文本资料表明，尤其是父亲会以艾滋病的风险来劝阻自己的女儿不要与男性发生性关系，他们希望能够减少女儿们与男同事的接触。

小 结

本章涉及了有民族志依据的统计调查或调查问卷的建构、实施与分析的主要注意事项。我们所展开的方法是将统计调查从概念模型系统化地表述为问卷，它同时提供了资料分析的结构，涉及从域内分析到跨域分析。最后，通过建设与概念同行的两种类型的资料收集，我们所主张的方法简化了定性资料与定量资料的综合工作。

规划民族志统计调查的几个步骤

- 分析来自于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资料收集阶段的质性文本资料。
- 通过增减域、因素和变量，运用分析来修正塑型理论模型。
- 建立一个包括了所有已确定的域及其相关因素和变量的完整的树状图或概念分类法。树状图为谨慎地选择和删除变量提供指导。

形成和完成调查的后续步骤是：

- 运用多种问题格式提出问题。
- 在小群体内对调查工具进行试点。
- 用一个较大的样本进行前测，生成量表并删除没有显示变化的变量。
- 完成统计调查工具的定稿。
- 在系统抽样或概率抽样的受访者当中实施统计调查。
- 为分析定量资料提供一种结构化的方法。
- 综合定性资料与定量资料。

抽样是民族志研究的关键议题，它向非结构化、半结构化和系统或结构化资料收集提出了诸多挑战。我们将在本书第10章和第11章讨论确保民族志调查的效度和信度的方法时，再一起讨论这些议题。下一章将讨论如何以二手资料或档案资料补充访谈、观察和统计调查资料，这是完成民族志者最终要讲述的故事的资料收集的最后一步。

档案与二手资料:

定义和来源

•

本地档案资料

•

使用本地档案资料

•

二手资料的本地

来源

•

二手资料的非本地

来源

•

使用大规模的二手

资料集检验假设并

进行跨文化比较

•

二手/档案质性资料

•

小 结

第9章 使用档案和二手资料

收集一手资料需要付出相当多的人力、时间、金钱、设备和资源。任何可以缩短过程、增加重要信息并节省宝贵资料的资料收集与分析途径都是民族志者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利用他人收集的资料和信息便可服务于此目的。同时，使用档案和二手资料也能进一步扩展资料收集的全面性、深化对结论的认识、并提升结论的跨文化及跨国家的可比性与普适性。本章旨在界定并描述民族志研究所能获取并利用的档案和二手资料，明确如何获得并分析这些资料，演示在民族志工作中它们如何与其他形式的资料收集相结合。

定义:

档案和二手资料是为研究和服务，为研究者、服务组织及他人出于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目的而收集存储的定性资料和定量资料。它们以收集时的格式存储或转化为计算机可读资料存储。

档案与二手资料：定义和来源

档案与二手资料可被界定为是为了政府、研究、教育或服务为目的而收集，并且可为研究者获得的，以有用的原始资料形式和格式出现的定性或定量资料。“原始”是指这些开放的资料或资源未经分析或解释（个案记录、问卷、申请、表格，或经过编码及格式化进入计算机可读数据库的数字或文本数据），它们按照最初的取样框架和单位来组织和储存（例如，以个人、家庭、班级、社区和国家为单位的个案）。

在有的书本里，“档案”和“二手”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但我们认为需要对它们作如下区分：档案资料是为行政、服务或管

理目的而收集并转化为研究数据的资料；二手资料是其他研究者为自己的研究目的而收集的资料，民族志者既可以通过公共途径也可以通过个人协商来获取这些资料。

我们也区分了本地二手资料与非本地二手资料。本地二手资料来自于其他研究者对被研究人群的研究，它们可用于增强研究者对当地情形的理解，且有助于研究设计和塑型理论的形成以及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非本地二手资料来自于对其他地方具有可比性的人群所进行的相似主题的研究。

这些资料使研究者可能在进入田野之前建立研究模型、检验初步假设，并得以将从当地获得的资料放置在具有类似人群的环境或更大的数据库中思考。这些资料也有助于研究者验证研究中出现的新假设，澄清单个社区研究中的特殊因素。

全国性数据库是由对地方性描述具有意义的非地方性二手资料构成，在地方或社区开展的民族志研究可从这个数据库中选取资料。研究者在进入田野之前便可从诸如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人口普查或者其他类似资料那儿获取有关被研究人群的人口、健康、住房等重要信息，这些资料可以成为一手资料收集的有益补充。

研究者可以从各种报告、实录和地图那儿获得有关当地社区的诸多信息。以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为例，研究者可以获得为新居民提供的人口统计实录、当地商会对商业活动的总结、哈特福德公立学校系统教育状况的报告以及儿童健康报告等。这些被图书馆员贴上“临时文献”标签的报告不能通过一般途径，如大学、图书馆、情报交换所和研究中心等而获得，研究者通常需要从制订这些报告的机构那儿获取。关键报导人、在本地做研究的其他研究者（尤其是政策研究者）、法律助理等有时也可以提供如何获取这些资料的信息。这些资料是他人对档案或二手资料进行分析的产物，因而并不符合我们对档案或二手资料的定义。尽管获取这些资料存在一定的难度，它们仍是描述性信息的重要资源，民族志者应该在研究初期尽可能地获得它们。

定义：

档案资料是最初为官僚体制或行政目的而收集，后来被转化为研究资料的材料。

定义：

二手资料是其他研究者出于自身目的而收集、且民族志者也可获取用于其他目的的原始资料。

定义：

本地二手资料指那些由其他研究者在被研究人群中采集的资料。

定义：

非本地二手资料指那些从在其他地域进行的相关课题或相关人群的研究中所获取的资料。

本地档案资料

被研究社群或地区的一般性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料，以及研究

者所关注群体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资料都是可以获得的本地档案资料。下面我们将讨论如何找到并使用两种形式的本地档案资料。

有关社区一般特点的本地档案资料

用于列出人口清单,从中获得相关社会与地理信息的本地档案资料包括:

- 可以辨识乡村或城区中的地貌、道路、住宅区以及其他建筑物的地区图和地形图。
- 有关出生、婚姻、死亡、房地产转让、电话、汽车、物业等内容的市政记录。
- 可在各个村庄和城区获得的人口普查、税收和选举人名录(例如,斯里兰卡最基层的官员(gramasevana)持有辖区内所有18岁以上具有投票资格的人员名单)。
- 有关水利、土壤、气候、农业生产等的专门调查。
- 来自健康、社会福利和教育组织等服务体系的记录。
- 法庭记录与判例。

佩尔托夫妇(Pelto and Pelto,1978)指出:“政府及其代理机构握有各种有关人口规模、出生与死亡、犯罪、婚姻及其他社会统计的记录……田野工作者应该尽一切可能获取这些资料”(第116页)。这些档案资料可以用于描述自然环境、确定被研究人群的构成、选取样本、安排观察场景、描绘社区与人口变迁以及其他相关的人口发展与变动的议题。

实例 9.1 在秘鲁利马的城市社区(PUEBLOS JOVENES)研究中使用档案资料

研究者S.申苏尔、J.申苏尔和塞加拉在利马西北部发起了一项探究儿童健康问题与社区演进之间的关联的研究。这项研究以社区作为分析单位。

由于来自高地、丛林和沿海的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秘鲁利马市在过去20年里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张。中心城区有限的房屋以及昂贵的地价和房价导致了人们有组织地侵占城郊没被围起来的公地或私地。

职业组织者与50~1 000户家庭联合起来在夜间夺取一块土地继而永久占有。这些有组织的“新社区”建起了临时住宅并寻求官方承认,这样他们就能获得投资建设永久性住宅所要求的地理稳定性。在寻求承认的过程中,居民们也以街道、街区、社区为单位组织起来满足自身的

健康、社会和教育需求。

研究小组在利马西北部展开研究，该地区位于一个较为狭窄的峡谷地带，毗邻安第斯山脉。新城镇或者说社区(pueblos jóvenes)沿着峡谷一字排开，从离利马中心区最近的地方一直延伸到远方。有的社区位于峡谷中部较为平缓的地方，有的社区则分布在陡峭的峡谷两侧。靠近利马市的社区得到了官方承认而成为自治市，这些社区相对成熟，发展较为完善，并且居民对土地具有所有权。远离利马中心区的社区尚不成熟，缺乏组织，住宅都是临时的，也没有什么基础设施。比起位于谷底的社区，位于峡谷陡峭两侧的社区还面临着诸多经济与自然方面的不利因素。

首先，研究者从城市规划部门那儿获得了两份地图：一份峡谷（坎图格兰德，Canto Grande）的地形图，一份将要展开研究的峡谷地区各社区的边界图。关键报导人提供了官方地图上所没有的新社区的边界，以及官方地图尚未增补的官方对现有社区的扩展。

调查表明，这些地图对于研究小组确定被调查社区，界定可能与儿童健康相关的社区间地理差别和其他可见差别相当关键。这些地图也有助于研究小组理解社区变化与发展的空间维度。康涅狄格大学地理学系的地理学家艾伦·克罗姆利（Ellen Cromley）对这些地图作了数字化处理，制作了一份可显示各社区海拔的峡谷三维图，以及一份坎图格兰德的底图，它可以为了进行比较而覆盖上社会、经济、政治等各种社区层次上的资料（Schensul, Schensul, & Zegarra, 1985）。

关于特定域的本地档案资料

研究者亦可通过本地档案来了解他们所关注的特定地域或领域。下述三种信息来源是研究健康、教育和惩治问题的研究者通常能够获取的。

学校与教育。当地的学校系统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库，储存着有关学生个人及其家庭、各个学校以及整个学校体系的质性与量化信息。这些资料涉及学生的人口统计特征、学业和考试成绩、学生行为、家庭经济与人口状况，以及教师的业绩与行为等。

实例 9.2 利用当地学校档案收集有关儿童活动的信息

研究者申苏尔、迪亚兹和沃利想收集哈特福德市两所公立学校内的7~10岁儿童的信息。该研究排除了那些由于行为或学习问题而接受任何形式药物治疗的儿童和患有哮喘的儿童。为了获取被诊断为具有行为或学习问题故而需要服药的儿童的人数、性别和族裔信息，研究者会见了负责学校记录的教育中心委员会的代表。虽然儿童个人的记录是保密的，代表们却能提供相

应班级的总计信息。这样，研究者就能选出男孩和女孩人数充足、族裔代表性广泛、多动症儿童人数较少的班级（Schensul, Diaz & Wolley, 1996）。

下一个实例所讲的是利用来自学校和报纸的历史文献来记录家长对待教育的态度。

实例 9.3 利用来自学校和报纸的历史文献说明拉美裔父母参与教育的历史

鲁本·多纳托正在研究1910—1940年间科罗拉多与新墨西哥地区拉美裔人口接受教育的途径。他利用了学校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出席记录、课程文件、学校董事会选举统计以及白人和拉美裔学校的支出记录。在此之前，多纳托在洛杉矶展开了研究，意在挑战拉美裔没有参与子女教育的观点。他利用报纸文献表明，拉美裔对教育话题的关注和积极参与具有历史的连贯性。

医疗服务。医院、流动的公共医疗中心、私人诊所等医疗服务设施以及非传统的医疗服务（例如生命吠陀医学、针灸和顺势疗法等）都保留有患者的记录。尽管这些记录在完整性和准确性上可能大相径庭，它们涉及的也仅是使用服务的患者记录，因而不是较大社区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但它们依然是有关服务使用者的特征、记录在案的发病率以及疾病治疗方案的无价的信息来源。

实例 9.4 在秘鲁利马圣胡安·鲁力安切地区的公共诊所收集临床资料

为了探究利马北部新社区的社区发展水平与儿童医疗问题模式之关系的假设，研究者S.申苏尔、J.申苏尔和塞加拉收集了社区儿科疾病数据。他们对服务30个社区的医疗中心的记录进行了全面回顾。一个名为“健康儿童(Niño Sano)”的项目保存了有关母亲与儿童健康状况的全面资料，内容包括身高与体重、家庭信息、母亲与儿童的健康问题以及家庭的社会人口信息等。在诊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研究小组在该地区的每个新社区里收集了至少30名儿童的样本，大概共有1 000份记录。在不可能收集到第一手健康数据的情形下，诊所记录是样本地区儿童健康状况的重要信息来源（Schensul等，1985）。

法律、刑罚和法院体系。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事与刑事法庭都保留着案件的质性记录（qualitative record）。这些案件资料库提供了有关社区争端、犯罪、刑罚、警察和判例等内容的重要记录。例如，萨拉·布莱费·赫尔迪利用旧金山湾区的遗嘱和遗嘱查验记录来评估继承模式所反映出的儿子和女儿被赋予的不同社会价值。警局记录也是有关家庭纠纷、枪支暴力、吸毒、性工作

者等群体与议题的重要信息来源（Needle, Coyle, Genser, & Trotter, 1995）。实例 9.5 说明的是在确定艾滋病高危人群样本时本地档案资料所起的作用。

实例 9.5 为毒品与艾滋病预防项目招募毒品注射者而从警局获取信息

研究者威克斯、辛格和申苏尔在过去12年来一直参与有关艾滋病与毒品的相关性研究，这项研究主要在哈特福德市进行。研究的多数内容都需要招募毒品注射者和其他高致瘾性毒品吸食者，并把他们纳入不同类型的干预项目中，或纳入有关如何采取最佳干预措施以降低他们本人、伴侣及家人面临与吸毒和艾滋病相关的危险的研究中。

从大街上、废弃的建筑物或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招募这些人员困难重重。为了招募足够的人员和更具代表性的样本，可行方法之一是明确这些人最有可能集中活动的地理区域。

虽然没有什么档案保存人们吸食毒品的记录，但是，可以把不同的管理记录系统所记录的其他信息结合起来，建立一份“高危地区”地图。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可以获得的定位信息资源包括犯罪、射击、凶杀、袭击、抢劫、拘留卖淫者、拘留毒贩以及废弃建筑物的位置等方面的记录。社区研究学会的资料管理人员从警局管理数据库中获得这些信息，对这些分散的信息进行编码，并使用电脑绘图系统（MapINFO）在地区的地理信息系统（GIS）中进行再加工。上述活动最集中的地区就是招募人员的目的地。

使用本地档案资料

多数社区都有大量档案资料可供使用。研究者与各种机构和组织建立适当联系或访谈关键报导人皆可发现这些信息。不过，研究者并不总能幸运地得到已经整理清楚并立即可用的定量或定性资料库。资料通常存放在档案柜或文件夹里，有时还很混乱，为了加以利用，研究者必须将它们集中起来进行编码，甚至还要录入电脑，汇集这样的资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民族志研究者来说，为了有效地重新组织材料，进行抽样操作，给这些资料编目，选取最有可能与研究相关的资料非常重要。下面是收集本地档案资料的两个个案。在第一个例子里，大量的时间被花在收集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本地档案资料上；在第二个例子里，档案资料的收集则对研究有直接用处。

实例 9.6 在乌干达西南乡村地区复制有关法律纠纷的档案资料

斯蒂芬·申苏尔在乌干达农村地区进行研究，考察村民迁往坎帕拉当薪资劳工的社会经济影响。在研究的起步阶段，申苏尔从当地一位首领那儿得知，当地法庭保存有犯罪个案和民事纠纷的记录。他假设那些前往坎帕拉工作的个人或许更可能涉足犯罪活动，并且，由于拥有更多的经济和财产资源，他们可能卷入大量闹上法庭的民事纠纷当中。因为在他做研究的社区没有复印机可用，他不得不连篇累牍地抄写法庭记录。在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后，他却很少发现移民比非移民更多地涉案的证据。虽然材料是有趣的，但却与研究的重点不甚相关（Schensul, 1969）。

实例 9.7 利用本地档案资料获得有关纳瓦霍人食品获取模式的信息

多拉·戴利（个人交流，1995）在她关于纳瓦霍人保留地饮食消费实践的研究中发现，从当地杂货店和贸易站所保留的收银机收据里收集和记录食品与非食品购买的资料这种做法既有用又高效。针对家庭离开保留地到更大的镇上购物时都买什么的访谈补充了这些资料。

希望得到、记录并使用当地档案资料的研究者应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 资料的鉴别。
- 找出档案资料的不足。
- 决定收集档案资料所需资源的分配。
- 储存和分析档案资料的步骤。

资料的鉴别

必须鉴别资料所处位置和内容。鉴别通常需要得到被研究群体内部及外部的关键报导人的协助。鉴别步骤包括：

- 明确谁控制着资料的借阅。
- 确定并实施获取资料所必须的正式和非正式程序。
- 如果资料描述个人情况（成年人、未成年人、家庭），需要获得或保证知情人同意。
- 选用一种记录/复制资料的工具，诸如机器复印、录入录音机或电脑录音程序，而后为资料形成编码格式，或者直接扫描资料进入电脑。

找出档案资料的不足

对于研究而言,档案资料可能存在不少缺陷,因为它们是为完全不同的目的而收集的。为了避免浪费宝贵资源,在详尽地记录它们之前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显得很重要。项目不全以及文献缺失是档案资料的明显缺陷。没有什么档案可以完全代表被研究群体,例如,门诊资料只记录了接受诊断者的情况,而没有记录该疾病的所有病例。这些相同的资料来源所记录的信息对于研究来说也可能并不精确(尽管相同的记录对于管理目的来说是恰当的)。患者的病情记录和账单表格可能是为了记账而记录一次诊断,而不是为了记载如何处理病情而记录两次或三次诊断;或者也可能把特定的病情记录在一个更广的领域之下(例如,有时把肺炎归入上呼吸道感染一类)。

记录系统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艾滋病的定义改变时,病例较之过去数量大增,这看起来就好像流行程度和影响范围急剧扩大。

决定收集档案资料所需资源的分配

一旦确定档案资料有用,研究者必须明确是否有获取或记录资料的可用资源,还需明确这些资源将如何分配。检索资料的时间和资源的分配决定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 明确进入档案信息保存地需要多长时间。
- 明确记录资料需要多长时间。
- 明确获取资料所需的与档案管理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的合作量。
- 决定是否获取全部记录或者仅是记录的一个样本。

储存和分析档案资料的程序

在花时间记录本地档案资料之前,研究者需要考虑到储存和分析资料的问题。通常而言,由于田野环境所限或研究资源有限,研究者不得不手工复制档案资料。不过,如果能设法将资料直接录入定性或定量的计算机数据管理与分析程序,研究者便可以节约不少宝贵时间。有关资料储存、管理和分析的决策包括:

- 选择文本搜索、文本管理或定量数据管理与分析的相关程序。
- 决定分析步骤。
- 决定何时运用以及以什么方式（为模型生成、情境描述、多方检验或检验收集一手资料后的假设）运用资料。
- 如何用其他档案的、二手的以及一手的定性和定量的民族志资料对资料进行多方检验。

二手资料的本地来源

如前文所述，二手资料是其他研究者为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创建的原始资料。在得到创始研究者的同意之后，民族志者便可使用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可能来自过去对该社区的研究，包括把当地选为调查点的全国性研究。

过去对同一社区的研究

幸运的研究者或许能够利用过去对当前被研究社区的研究所收集到的质性和定量资料。斯蒂芬·申苏尔和玛丽·比玛尔曾于1968—1976年间在芝加哥西边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做研究，在此后的20年里，格温·斯特恩和其他人类学家也在该社区继续开展研究。

实例9.8 坐月子(Cuarantena)：芝加哥西侧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的产后习惯

1969—1974年间，（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西部医学联合体（the West Side Medical Complex）的社区精神卫生项目的社区研究单元（CRU）记录了墨西哥传统对于初来乍到的墨西哥人适应芝加哥生活的作用。其中一项传统是坐月子：产后40天之内，产妇可以免除家务活的劳累，几乎足不出户全身心地照顾婴儿，而亲戚、朋友和邻居则帮忙照顾该家庭。

1974年，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提供的资金使得斯蒂芬·申苏尔和格温·斯特恩能够就坐月子对拉美裔产妇的健康与精神卫生的影响展开研究。社区研究单元过去关于传统健康习俗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对于促进母婴健康而言，坐月子习俗与产期保健一样重要。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代墨西哥女性移民比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更有可能遵循坐月子习俗。研究还发现，那些期待实践坐月子习俗的女性比起那些不希望这么做的女性较少有怀孕问题以及产后的身体和情绪问题。最后，研究还表明，实际上遵循坐月子习俗预示着更好的母婴健康。斯特恩及其同事利用这些研究结果来支持一个新组织的形成：拉美女性在行动(Mujeres

Latinas en Accion)。这些数据也为一个项目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该项目旨在帮助孕妇（尤其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女性）建构一种可以和传统的坐月子习俗相媲美，又适合芝加哥都市生活方式的社会支援体系和产期保健实践。新项目为收集关于母婴健康的额外资料提供了基础，增添了关于西部墨西哥裔社区健康与社会福利问题的定性和定量资料（Gaviria, Stern, & Schensul, 1982）。

人类学者琼·申苏尔、斯蒂芬·申苏尔、梅里尔·辛格和玛格丽特·威克斯的研究丰富了多元族群社区和地区的健康、社会与文化问题的资料库。过去20年来，这些人类学者及他们的同事通过西班牙卫生委员会（1978年至今）和社区研究学会（1987年至今）一直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合作展开民族志与流行病学研究。上述两个组织保存了关于母婴健康、药物滥用、艾滋病、青少年健康、中年人健康以及各种类型的健康服务等超过35项研究的所有原始资料，并且定期为新研究提供基础。健康方面的社会科学家与佩勒代尼耶大学、斯里兰卡康提市的跨部门社区卫生研究中心合作，储存了斯里兰卡中部及东部乡村与城市社区自1981年以来的健康与发展方面的资料。大学与社区的这种合作带来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学院系以及地方社区之间的长久关系。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疾病控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等资助者的鼓励，以及疾病控制中心对这种合作关系的促进都寓示着，本地二手资料库的数目将在未来十年大幅增长，这将使得民族志研究者能够在对以前收集的大量文本和数字资料进行再分析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地方性研究。

二手资料的非本地来源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调查为取向的世界里，人类行为的每个方面几乎都被调查过了，尤其是在工业化国家。因此，美国及其各州都有数以百计可供公众搜索的资料库，从美国的人口普查到工作、教育、健康、性、青少年以及其他各种议题的调查数不胜数。与此类似，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有包括人口普查在内的人口统计资料和专题调查资料；有由健康、规划、教育、农业及其他部门所做的调查；有由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双边组织（美援署、加拿大国际开

发署、德国技术援助机构)促进的调查。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宏观国际(Macro International)执行的“人口与健康调查”(DHS)是全球最大的调查项目之一。自1987年以来,DHS使用相同的基本设计和问题从64个国家收集资料。24个国家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类似机构通过避孕普及率调查收集了过去30年来关于生殖健康与避孕的跨国资料。就美国和国际上而言,人口学家已经在大规模的全国性或跨国性资料库的开发、收集与分析上领先。

民族志研究者通常对州、国家以及国际性的数据库利用不足,没有意识到它们也是获取当地群体信息的重要来源。多数资料涉及社会、经济、就业、健康、教育、社会人口统计与流行病学等内容。在这些资料当中,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最为人熟知也最为常用的。此外还有一些全国性的专题调查,例如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染病、孕产妇健康、吸毒、婴幼儿健康,以及农业生产等的调查。经过再分析之后,这些资料都可为地方性研究所用。

实例9.9表明涉及性传染病的州流行病学数据库如何有助于规划一个地方性干预项目。

实例9.9 为干预计划利用州二手资料

作为康涅狄格州卫生局项目的一部分,斯蒂芬·申苏尔和梅里尔·艾森伯格关注导致康涅狄格某市性传染病迅速增多的相关因素。研究的早期步骤之一是绘制该城市性传染病的空间分布图,并报告给公共卫生部门。从理论上说,所有淋病和梅毒病例都必须上报,但在实际上,上报的仅是一部分病例。不过,研究小组仍然相信,了解病例在该城的地理分布有助于确定性传染病集中的高发地区,从而提出开展更深入的民族志研究的地点。

利用州数据库绘制性传染病地图的结果表明,55%的病例来自于该城的两个人口统计区。聚焦于这些高发区使得研究者将定性与定量研究锁定在这些人口统计区,并在同一地区集中规划干预项目(Schensul, Eisenberg, Glasgow, & Huettner, 1994)。

下一个实例表明相关课题的全国性研究如何为提出研究的理论框架提供信息。

实例9.10 利用对全国性二手数据库的分析来夯实某研究的塑型理论

这项研究的塑型理论的生成基础有两个:一是毛里求斯计划生育协会行政工作的直接知识和经验,该协会在工业区提供健康与计划生育服务;二是研究者斯蒂芬·申苏尔和琼·申苏尔的直接知识与经验,他们熟知世界上其他地方工业区的艾滋病危险情况。

联合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萨丁杜尔·拉格巴是毛里求斯大学的教师。她回忆了该校对产业工人做过的两次调查。在田野调查展开之前，研究小组搜索并获得了原始资料，这使得研究小组得以对资料库中所有15~25岁女性的个案进行分解。有关工作、同龄人、家庭等领域；族群；健康；工作经验之间的关联的假设得到了探究。

1989年，毛里求斯大学展开了一项关于“出口工业加工区工人健康、营养和产量”的全国性调查。样本规模是2 500名出口工业加工区的工人，其中1 217人为女性，女性中的689人是15~25岁的未婚女性。虽然调查焦点是其他一些健康话题，人口统计的数据使得我们可以考察族群及家庭结构与工作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假设。这些分析使我们第一次确定了出口加工区年轻女性家庭组织里的几个关键的区分因素，也使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年轻女性是被迫来到出口加工区工作的，因为死亡、离婚、分居、体弱或酗酒等使她们的家庭失去了男性家长。

第二项调查是毛里求斯大学与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于1990年合作开展的“艾滋病知识、态度、信念与行为”（KABP）的全国性调查。全国性的样本超过2 000人，根据出口加工区人员就业、婚姻状况、年龄、性别进行分解之后，样本包括79名15~25岁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未婚女性。我们将这一组女性与另外一组具有同样指标但未就业的女性进行比较，以此考察工作状况与“艾滋病知识、态度、信念与行为”（KABP）之间的关系。统计调查工具也有助于编制艾滋病与避孕套知识的量表项目。于是便有可能将这次研究所采用的调查结果与全国性艾滋病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

使用大规模的二手资料集检验假设并进行跨文化比较

“地方性地收集资料、全球性地比较”之可能性是民族志的强项。然而，方法的多样性、研究的地点所在，以及我们致力于地方性研究和理论发展为比较增加了难度。由国际及双边机构资助的一种比较方法是使用可比较的定性与定量资料收集方法来组织多点研究与干预项目（Pelto & Gove, 1992）。这样的研究耗资较大，需要多点之间的协调，通常并不多见。第二种途径是就焦点议题——如青少年营养状况、女性与艾滋病——组织民族志式的基础与干预式研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跨文化比较。采取此类途径的例子有国际妇女研究中心资助的妇女与艾滋病研究，第一阶段（1995）与第二阶段（1997）的总结已经形成系列报告（ICRW, 1995/1997）；另一个例子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关于新迁入者与老住户之间的互动的多点研究的结果（Lamphere, 1992）。

另外一种途径民族志者运用得并不充分，它利用来自对全国

性抽样人群进行统计调查所产生的不断增多的资料集。从全国性资料集抽出的地方资料经分析后可用于检验本地质性资料收集过程中提出的假设。全国性资料集可用于提出指导地方性研究的问题、假设和观点（就此话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第2章与第3章）。最后，这些资料集还可用于检验地方性研究中提出的假设。下文描述的是运用全国性与国际性资料集检验在地方上形成的假设的步骤：

运用国际性资料集的步骤

- 描绘地方性民族志研究的关键结果。
- 确定与分解合适的资料集。
- 检验有民族志材料依据的假设。
- 探索资料集以发掘因变域所具有的其他关联。
- 生成一个新的和扩展的模型。

描绘地方性民族志研究的关键结果

地方性民族志研究提供了有限时空内的信息，以及可以用其他人群来检验的假设。大规模的全国性与国际性资料集为检验这些出自地方的假设提供了基础。

实例9.11 检验在斯里兰卡提出的社会不平等与初次性行为相关的假设

梅隆基金会于1997年资助了一项探讨社会不平等与初次性行为之间的关系的跨国研究。研究者申苏尔和德席尔瓦提出利用“青年与性风险”资料集（de Silva et al., 1997）来探讨这一主题，并且为之充实了大量的有关初次性行为的新的访谈资料。

1998年1月，研究者斯蒂芬·申苏尔、德·席尔瓦和P.维帝辛格在斯里兰卡康提市跨部门社区卫生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回顾了有关初次性行为的新资料的初步分析，并重新分析了以前研究的定性与定量资料集。两项研究的结果都指出了第一次性关系时没有采取保护措施的大量证据，研究者便思考如何将这此结果组织起来以反映并解释上述性关系发生时出现危险的状况。因为女性几乎不提性活动，基于性别的分析并不可能。研究小组推断，“年龄失衡（不是性别失调或行为失调）是解释风险性行为差别的重要因素。

研究者们将“年龄失衡”定义为“受访者与其性伴侣的相对年龄差”。年龄失衡体现了年龄较大者与较年轻者在性经验、情感与身体成熟度、社会经济地位、权力以及有效的风险预防

沟通上的力量不平衡。当受访者比其性伴侣年轻时,其“年龄失衡”指标为正;当受访者比其性伴侣年长时,其“年龄失衡”指标为负¹。研究者在初次性行为中发现了大量这两种类型的年龄失衡的例子。通过对这些资料集进行分析,研究者提出了初步假设,即初次性行为中年龄失衡预示了今后面临有风险的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

对科学文献的回顾很少能显示出相关信息。出于这个原因,研究小组决定对关于青年与生殖健康行为的可用的全国性资料与国际性资料进行二次分析。分析的目的在于验证上述假设,并为斯里兰卡年龄失衡与危险性行为的更广泛研究辨识关键的征兆(域、因子和变量)。

确定与分解合适的资料集

用大规模全国性和国际性资料集检验地方性经验所支持的假设的普适性的下一个步骤是确定可能有用的资料集。一旦确定下来,资料分析员必须根据目标群体(由年龄、性别、族群、收入水平或地理位置等来界定)以及适合于研究目的的变量来分解这些资料或将其置于子集之下。研究者应该意识到这些操作的复杂性并避免让新手完成。

实例9.12 为斯里兰卡的一项年龄失衡研究选择和拆分合适的大规模资料集

在有关年龄失衡的CICHS研究中,我们利用了“人口与健康调查”(DHS)资料集中的子集和选定变量。该调查就健康、生育、死亡、营养等主题,以及与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相关的性行为、知识及态度等内容,在六个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贝宁、中非共和国和科特迪瓦——收集资料。该资料集没有涉及婚前伴侣的信息。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调查”²研究通过考察影响社区青少年的行为与人口统计因素来测量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该资料集包括6 503例个案,其中有3 356例女性个案,3 147例男性个案,所有个案皆为7~12年級的青少年。研究者能够获得关于三名伴侣的年龄、性别和其他特点的信息,因此,关于受访者与其伴侣年龄差别的信息有可能是准确的。

避孕普及率调查(CPS)已经在近30个国家进行过,但它并不像其他资料集那么公开。要获得每一个国家的资料必须与该国特定的卫生部门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项目官员协商。由于

1 这里的“正”与“负”并不代表好与坏。它们指的是伴侣相对于受访者的年龄。

2 “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调查”(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简称 Add Health。它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综合性、纵向性的青少年调查项目,旨在探究7~12年級青少年学生健康相关行为的原因及在青少年时期这些行为的结果。——译注

与两位来自牙买加的参与者合作，我们获得了牙买加的避孕普及率调查资料，并从中抽取了年龄在15~24岁的未婚男女青年。这包括970位年轻女性和1041位年轻男性。男性资料更加详尽，包括了性教育、当前的性行为以及艾滋病知识；女性的资料则仅限于人口与避孕方面。

检验有民族志材料依据的假设

使用与手头研究相关性不大的调查资料集的主要困难之一，是找到可用于检验主要假设的合适的变量。一旦找到或建立了这些变量，研究者便可在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寻找关联。下述实例描述了这些过程。

实例9.13 思考年龄失衡与风险性性行为之间的关系

承接上述实例，研究者最初在每个资料集里建构了“正年龄失衡”与“负年龄失衡”变量。接下来，他们在与将被验证的主要假设相关的可用资料集里确定了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发生第一次性行为时的年龄”，与风险性性行为、情绪健康、符合文化价值、生活调试等相关的几项结果。

资料集普遍证实了初步假设以及相关的二级假设。结果如下：

对未来风险性性行为的感知。正年龄失衡及第一次性行为发生较早与预计某人将感染性传染病或艾滋病相关。

避孕。避孕（包括避孕套）知识有限与第一次性行为时采取避孕措施/避孕套的低概率、较早开始性行为及过早婚前怀孕相关。

性风险。年龄失衡及第一次性行为发生较早都与高风险性行为（接连不断的更多性伴侣、性传染病高发生率、卷入性暴力的更大可能性）相关。

药物滥用。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第一次性经验与年长者发生都与几种药物滥用有关，包括烟草、酒精、可卡因和其他非法毒品。

情感问题。对于女性而言，第一次性经验与年长者发生与缺乏自尊相关。对于男性而言，第一次性行为发生较早与缺乏自尊、自杀念头和尝试、较多地卷入斗殴等相关。

未婚怀孕/父亲身份。对于女性而言，初次性行为发生较早以及负年龄失衡（性伴侣年长）都与更高的未婚怀孕几率相关。

探索资料集以发掘因变域所具有的其他关联

除了研究者在最初的假设形成中考虑要进行跨国检验的那些变量外，大规模的资料集还包括其他变量。因而，利用大规模资料集的优势就在于，它们提供了考察新域内变量关联的可能性。

实例9.14 检验新假设

在同一项研究中，我们也探究了位于“家庭”“工作”“学校”“同辈”和“人口统计因素”等域中的年龄失衡关系的先兆，结果如下：

人口统计。较早发生性行为与居住在乡村（与都市相比较）社区、受教育年限短、经济状况差、失业以及远离家庭工作（指女性）等相关。

家庭。第一性行为中的正年龄失衡（即伴侣年长）与不愉快的家庭关系、离家愿望、缺乏家庭成员的关心以及家庭活动较少等相关。单亲家庭对于女性来说与正年龄失衡相关，对于男性来说则与第一性行为发生较早相关。

家庭问题。以在家里酗酒为代表的家庭问题与第一性经历中年龄失衡相关。严格的父母惩戒和监督与第一性行为发生较晚相关。

同辈。对于男性来说，较早发生性行为与参与男性同龄人的负面活动相关。也就是说，较早发生性行为的男青年更有可能和同龄人一起吸烟、酗酒、与性工作者发生关系。

学校。年龄失衡与较早发生性行为都与学业窘境（例如休学、开除）和负面的学习经历有关。

生成一个新的扩展模型

大规模的资料集可用于确定新的域、因素和变量，它们将是形成一个新的塑型理论模型的基础，此模型可以使得民族志者“回到田野调查点”进行补充性的民族志调查。

二手/档案质性资料

至今还很少出现民族志者分享或共同生成一套的田野笔记的例子。多数民族志者并未将他们的田野笔记提供给其他研究者使用。民族志者将其文本资料（观察和非正式访谈）视为田野调查经验的个人记录，通常而言，他们并不是为宽泛的读者群书写田野笔记。民族志者的田野笔记在质量上和完整性上可能大不相同。由于田野笔记对人物及地点的描述往往较为详细，如果没有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其他研究者可以轻易地知道笔记所记的人物是谁以及事件发生在何处，因而田野笔记的保密性是个问题。最后，个人的田野笔记可能没有经过系统地编码。

随着对基于计算机的文本编码、处理和搜索程序的运用的增

多，上述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申苏尔、威克斯和辛格在这套丛书的第六册中描述了民族志研究小组发生这种变化的几个实例。这些实例反映的是有所重合的几个研究小组在同一个田野调查点进行比较课题的民族志研究。他们将符码数目和独特的标示符分配给关键报导人和场所，用指定给次一级项目的独特代码生成一套共同的编码体系和编码本。任何参与进来的民族志研究小组的研究者都可以得到任何研究的所有编码笔记的复件，他们可以对之进行重新编码以符合自己的研究目的，而这并不需要篡改共同的编码资料集。希望将田野笔记用于出版的研究小组成员邀请曾经收集资料的民族志者作为合作者加入他们。经过格式化处理后，这些资料集就能被存储下来，最终成为二手的定性资料集。

如果有恰当界定的编码范畴（概念分类法），初次访问这些资料集的研究者就能从自己感兴趣的特定角度出发重新编码这些田野笔记。二手资料分析者可以同笔记作者直接合作，或者独立工作——只要作者的贡献得到承认。

促成文本资料具有更广泛公共用途的技术进步已然具备。时至今日，有关共享田野笔记或公开田野笔记对研究质量与内容的影响的伦理讨论并不多见，这些话题有待探讨。同时，民族志者依赖于由已经处理过的资料构成的质性档案资源，它们以民族志的形式组织进资料库。

目前有三个资料库包括了大量的叙述性民族志。这些资料库里的分析单元被命名为文化群，被进一步识别为队群、部落、王国和其他有边界的群体。资料库包括：

- 世界文化地图集——1 264部民族志以及862部被评价为“叙述完善”的简化版民族志（Murdock,1967）。
- 标准民族志样本——包括285种社会或文化（Naroll & Sipes,1973）。
- 人类关系区域档案样本——收录了360种文化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样本是这些资料库中唯一一个提供民族志文本的；其他的仅提供编码文本资料库（Ember & Ember,1998）。

乔治·彼得·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k）——跨文化研究的领导者——在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集全球努力编辑了一套民族志选集，该选集使得学者能够比较世界文化。他的主题分

类（编码）系统不仅运用于民族志，也运用于大量的以文化为主题的其它研究。R.恩伯和M.恩伯全面描述了跨文化民族志数据库，指出他们所引用的资源从1994年开始便可通过CD的形式或互联网来获得（Ember & Ember, 1998）。与报告一样，这些民族志资料对于准备研究模型与研究设计，以及将来自于地方性民族志研究的结果置于全球背景中皆有用处。

小 结

民族志研究者在提出局部理论以及将研究置于地方性或全球性背景下时，都可以很好地利用二手和档案资料。我们在本章已经看到这些资料有利于最初的概念化，也有利于民族志研究的实质性资料收集。它们为在国家及国际层面检验产生于田野点的假设提供了机会。

民族志方法与视角已经成为国际性卫生与发展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生产了地方性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恰当地执行项目来说是必需的。这种在实地（in-the-field）的取向是民族志的一个方面，它让被边缘化群体发声、修正自上而下的项目、促成专家与社区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也有人批评民族志过于地方化，所产生的数据可比性不强，缺乏跨国场景收集的资料所证实的综合理论。但有人会说，过去那种全球的和比较的人种学已经让位于应用型民族志，后者并不追求跨文化的规律与模型。

利用新近可得的大规模的全国性与国际性资料集或许可以为这种全球的民族志—人种学困境做出部分回答。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致力于人口普查以及其他诸如避孕普及率、计划生育等主题的调查。国际和双边机构越来越多地促进比较研究工具的发展与使用，这些工具既包括基础问题，也包括符合每个参与国的兴趣与需要的问题。

这种进路要求民族志者利用科学文献与在地方上开展的民族志研究来提出假设，这些假设可通过分析较大的二手或档案资料来进行验证。它也要求通过在地方的田野情景中收集补充性的定性与定量资料，来说明和阐释这些统计分析的结果。未来，基



于计算机的文本搜索程序可能会为我们探究与比较大规模的质性资料集提供机会。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一手的、二手的以及档案资料之间的相互影响能够带来建立在民族志传统与优势之上的全国性与国际性比较。

第10章 民族志抽样

民族志研究中的选
择方法

民族志研究中的抽
样方法

使用样本的要求及
注意事项

小 结

就其历史而言，民族志试图研究整个总体（entire populations）。总体通常由人构成，但也可以是社区、组织、项目、动物、地方、事物、时间段、文件、字词、短语、访谈文本或手稿中的句子或段落、特定行动或行为，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单位。民族志者曾经研究的总体被认为是未和外界接触过的、有边界的小群体，通常位于群岛、偏远的村庄或其他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在此情形下，接触并深入被研究群体中的每个成员或单元（unit）并不是件难事。然而，当前的民族志实践则往往涉及对较大群体的研究，且该群体又嵌入其他群体、组织、活动或场景之中，他们甚至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地点。在此情形下，研究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就变得不再可能，研究者必须抽样。

研究者既研究总体，也研究样本。当他们关注的总体过于庞大或难以处理而无法研究时，他们便研究样本，这通常是由于进行大规模调查所需的资源、时间及人员有限。研究者从一个较大的总体中抽选样本时有几种策略可用。抽样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尽可能准确代表总体之特征的小群体。不过，某些抽样方式——尤其是使用概率法从完整的总体清单上选取单元的方式——要其他方式更准确。样本从中抽取的目录被称为抽样框。有时，研究者并不能创建一个完整的抽样框——因为他们无法识别并逐一清点某个总体中的所有成员。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采取其他系统策略来选择被研究人群或单元。

定义：

抽样是指在大规模的总体中辨识出一个既具备总体的特性又便于研究者管理的较小规模群体的过程。

定义：

选择是指建立选取研究总体的标准的过程。

定义：

抽样框是一个包含有总体中的所有成员或单元的全面的清单，而样本即从该清单中选出。

选定研究总体之后，研究者还必须考虑选择的问题以及抽样对于将要研究的特定现象来说是否合适。选择是一个有概念依据和理论依据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开始对某个特定议题、现象或人群感兴趣，接着便开始为实际的研究项目建立一套鉴别反界定该议题、现象或人群的准则。本章将要指出的一点是，对某些课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不应该使用样本。总体规模很小时，也没有抽样的必要。现象还未知时，抽样也不合适。例如，关于智障孤独症的病因与症状的初期研究是以每个已知的孤独症病例的临床研究为基础。这些病例是作为整体而被依次分析的，以此构成对这一障碍的全面描述。抽样可能会遗漏掉包含在未被选取的病例中未被记述的微恙的重要信息。即使总体的特征已为研究者所知，某些类型的抽样也不合适。我们要指出的是，好的抽样框要求每个成员，或者至少是每类成员都得到代表；如果没有清晰地甄别出所有类别，抽样就可能导致研究者在不经意之间遗漏总体的重要部分。例如，艾滋病在美国最初被确认为成年男同性恋所患的一种疾病，研究者并未研究异性恋的男女是否会被感染。此外，由于缺乏可靠的化验方法，研究者漏掉了很多被感染的个体，这是因为在感染与症状发作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

定义：

便利样本是指研究者容易访问到的、并且可以合理地假定为具备与研究相关的特性的任何群体。

很多研究者使用便利样本，之所以有此称谓是因为它们选自研究者可以方便地进行研究的群体。例如，青少年行为研究可以在离研究者办公室最近的一所高中进行，这样的研究通常要提示该研究总体可能并不能代表该社会的所有青少年。只有在研究者进行探索性研究时，或者总体内的特定变化几乎不影响被研究的现象时，研究者才可以使用便利样本。例如，最近的一项关于还未开始学习阅读的幼儿如何在学前班使用书本的研究就采用了便利样本，该样本选自研究者本人4岁的女儿所就读的幼儿园（Cumbo, 1998）。

不管是否用到样本或总体，研究者必须以精确的、操作性的术语来界定他们计划研究的总体和抽样单位。精确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研究者必须明确知道从哪些群体中进行抽样，接着，他们必须从给定的总体中确定不连续的个体或单元来进行观察、提问、访谈或计数。

有时，选择和抽样的第一步涉及界定待研究总体或领域的

边界——在其边界未知的情况下。例如，对斯里兰卡性工作者的初期民族志研究揭示出在不同场景中工作的三种女性群体：在旅游观光酒店居住和服务的女性；居住在家中或与朋友居住，在当地小旅馆或住宅工作的女性；住在街上并在更公共化的场所工作的女性。这三个群体加起来构成了斯里兰卡城市地区性工作者与艾滋病风险关系研究的总体，样本将从中抽取。总体一旦确定，接着就得界定分析与抽样的单元。下面是界定单元的一些简单法则：

- 它们必须是可数的。
- 它们必须是可测量且可观察的。
- 它们必须是可定位的。
- 它们必须是个别的和可以区分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能够辨识其起点与终点，并且清楚地区分开每个单元。

本章首先谈论民族志者根据特定的选择标准定位和选择总体成员的方法，接着描述民族志研究中使用概率或随机方法的策略，最后讨论运用抽样方法的要求与注意事项。

民族志研究中的选择方法

民族志研究涉及在一个社区或群体之内寻找文化模式。研究者知道，如果他们能够辨识某个文化场景中的核心、单元和结构在不同时空或群体中体现出的相似性与系统差异性，他们就已确定了民族志的模式和结构。要证明这些差别或相似就要求研究者选择最有可能在其中发现他们所寻找的模式的研究总体，这样就涉及在研究初期基于某个标准进行选择（有关基于标准的选择和抽样方法的更详细讨论，参考LeCompte & Preissle, 1993, 第3章）。研究者通过基于某个标准的选择来选取他们想要研究的总体或一套单元。首先，他们确定自己感兴趣的理论、概念或主题；接着，他们要决定哪种类型的总体最适合于探究其兴趣。这些决定基于一定的标准，即特定总体如何以及为何符合研究者的理论或描述兴趣，或者总体如何有助于回答研究者的问题。例如，对研究某社区有多少学生未能从高中毕业感兴趣的研究者可

定义：

基于标准的选择指挑选研究参与者或研究单元，因为他们具备与研究的核心问题相关的特性。

能打算研究辍学学生。然而，由于总是很难找到辍学学生，他们可能需要限定一个不同但相似、并且更容易接近的替代性总体，比如说潜在的辍学学生。

实例10.1 在平纳克尔研究潜在的辍学学生

在勒孔特和她的助手在“平纳克尔”学区所做的关于教育失败（school failure）的研究中，选择标准是所有9~12年级的，在上学期至少有两门主课（数学、文学、科学或社会研究）不及格的学生，特别是那些有三门或更多主课不及格的学生。使用此标准的研究者推论，如果没有深入的且高成本的田野调查，要想找到那些已经退学的学生接受访谈会非常困难；那些主课不及格的学生则面临着由于远远落后而不能与同学一起拿到毕业证的危险——此即导致辍学的因素之一。

勒孔特决定研究潜在的而不是实际的退学者。由于学区存有符合勒孔特所确定的标准——至少两门主课不及格——的所有学生的记录，研究者便可以获取潜在辍学者的抽样框。切记，基于标准的选择策略并不运用概率论技术来形成被研究群体；因此，基于标准的选择并不会生成随机样本，在进一步研究或与其他研究结果（参考下文有关“参照个案的选择”的讨论）进行仔细比较之前，也不允许研究者将研究结果运用于一个更大的总体。

最常见的基于标准的选择方法有：

定义：

极端个案是指最大限度地代表了被界定的总体连续统的那些个案。

- 极端或两极个案的选择。
- 典型个案的选择。
- 集中个案的选择。
- 特殊个案的选择。
- 著名个案的选择和链式提名选择。
- 示范或理想个案的选择。
- 参照个案的选择（LeCompte & Preissle, 1993）。
- 有针对性的选择。

不论使用哪一种类型的基于标准的选择方法，研究者应该尽可能选取一个以上的人、活动、项目或单元来研究，并将每一个所选对象都置于相同的议题下进行探究。这是因为单个人或一个单元的经验或特点不足以建立由相似个人或单元构成的整个总体的经验或特点的模式。毕竟，民族志的目的是确定模式，确定变化的存在，并在被研究群体中绘制变化范围图。缺少变化证实了模式的存在，而变化则要求对变化范围作进一步的和更系统的民

族志考察。

测定总体差异的选择

当研究者希望探究某群体内变化的特定类型，或者期望测定总体内成员间的差异时，往往采用前四种基于标准的选择方法：极端或两极个案的选择、典型个案的选择、集中个案的选择、特殊个案的选择。

极端或两极个案的选择。极端或两极个案的选择要求研究者首先界定自己感兴趣的特点，接着创建一个量表或连续统，根据总体内的各个成员含有多少特点把他们排列在量表或连续统上：从很少或不符合特点到最符合那些特点。例如，如果以成绩来度量，高中生学习成绩的连续统会从 F 排到 A。如果使用定性测量，研究者可以请教师把学生沿着连续统排列，从他们认为最差的学生排到他们认为最好的学生。极端个案是指总体中最符合或最具备研究者希望研究的特点的那些成员或单元。极端个案的例子包括天才、音乐神童、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者精神病患者等，他们当中的每个人或是高智商，或是高创造力，或是患有精神疾病。极端个案的选择通常只涉及位于连续统一端的个体，而两极个案的选择则要求从连续统的两端选择个体。例如，关于毛里求斯最富裕家庭和最贫穷家庭（社会经济连续统的两端）里年轻女性的社会关系的研究就属于两极个案研究。

典型个案的选择。与极端个案的选择相反，当研究者希望研究普通人或普通单元时便采用典型个案选择法。研究者首先必须界定某个总体的普通或平均特点是什么，然后找出具有普通特点的那些个体。例如，对美国教师的典型个案选择可能要选取 32~50 岁，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欧美裔已婚女性，因为统计表明这些描述符（descriptors）刻画了北美教师的一般形象。

定义：
典型个案的选择指
基于总体的均值的
选择。

基于高密度场所的集中个案选择。基于地理学方法的集中个案选择假设，具有相似行为方式的人们倾向于在一起生活、工作和休闲。因此，研究者可以在这些活动发生的地方轻松地找到他们。集中个案选择法可用于考察行为与地理位置重叠的任何文化域。如果发生在这些地点的行为是研究的主题，那么这些地点本身就可以被视作观察和分析的单位。例如，研究青年文化的民

族志者可以在当地公园（行为发生的地理位置）的篮球场（鉴别总体的行为）找到，并且从中招募非洲裔美国高中生（关注的总体）。如果在女性支取福利支票（总体行为）的银行（总体行为出现的地点），带着孩子等待医生治疗（总体行为之一）或领取营养补充剂（总体的另一个行为）的公共候诊室，那么辨识低收入的都市女性（关注的总体）就较为容易。这种方法可用于这样的研究：被研究个体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地区活动，例如街角、操场、购物中心、运动会、空地、餐厅、汽车站、出租车站台、舞蹈俱乐部或麦当劳餐厅等，研究者可以从这些地方招募访谈对象。民族志者应该注意，虽然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但对总体的假设为基础的操作却可能是刻板印象的（“所有非洲裔美国男青年都打篮球”或者“所有低收入女性都依赖福利或利用公共门诊”），可能会遗漏总体中没有上述行为从而很少出现在民族志者招募人员的地方的部分人群。

定义：

特殊个案的选择意味着选择研究某个不可重复的个人、事件或情形。

特殊个案的选择。典型个案选择所界定的是总体内最为常见的活动、事件或个体，与之相反，特殊个案寻求的则是最不常见的个案或事件，即偏离主流或难以复现的个案或事件。诸如火山喷发或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就是特殊事件，意料之外的移民涌入社区也属于特殊事件。例如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附近一个小社区的几所学校里，注册学生中来自柬埔寨的移民突然剧增，这对教育系统造成了明显影响。柬埔寨移民家庭倾向于选择比邻而居，如果丹佛市多数柬埔寨移民居住的大型公寓关闭，整个社群便会随之搬迁到附近社区的其他公寓。这意味着丹佛市为柬埔寨学生准备的双语教学班会突然失去生源，而那些教育部门尚无准备的小社区又不得不容纳大量涌入的学生。

用于进一步探索研究问题的选择

其他类型的基于标准的选择可用于探究文化模式或文化主题在一个更普遍化的总体中存在的程度，或用于考察具体创新或干预能够成功的条件/环境。这些形式包括：

1.著名个案的选择¹。

1 著名个案的选择与链式提名选择通常被称作网络抽样（因为它们积累了由朋友、家庭网络等构成的被研究群体，或者说积累了由关键人物所持有的联系），或者被称作滚雪球抽样（因为被研究群体最初只有一个人，随之不断增加，就好像从雪山顶滚下的雪球越滚越大）。

2.链式提名选择。

3.示范个案的选择。

著名个案的选择。著名个案的选择要求研究者得到社区专家协助以确定适合的被研究人群或单元。研究者首先必须确定自己想要研究的个体或单元的类型。接着,请社区专家告知属于该类型的众所周知的最佳例子。例如,研究者或许会请医院管理者为其指出谁是该社区医疗体系内最称职的管理者。与此类似,研究者也可以请汽车销售商和机械师告知谁是最有经验的机械师。研究受人信赖的毒贩(由吸毒者和其他毒贩来鉴定)、有天赋的音乐学生(音乐教师来鉴定)以及不合作的精神疾病患者(医生和医务机构职员来鉴定)等都可以采用相同方式。

链式提名选择。链式提名选择与著名个案选择相似。在链式提名选择中(Diaz, Barruti, & Doncel, 1992),每位最初的研究参与者基于研究者预先制订的标准推荐下一位或下一批要联络的人。链式提名中的起点或索引受访者(index respondents)是根据其符合已知标准而中选的。研究者访谈他们并请他们指出符合标准的其他人。例如,他们的同龄人、具有相同行为的人(玩乐器或球迷)或者具有相同特征的人(高中辍学者)。索引受访者所提名的个人遂被访谈。这意味着研究总体内的所有人不仅具有一个或几个对于研究而言重要的特征,而且他们还以某种民族志能够刻画的关系与索引受访者相联,或者根据共有的其他文化特征而与之相联。

链式提名对于研究隐秘人群尤为重要。研究者曾采用此法研究毒品亚文化,例如荷兰的可卡因吸食者(Bieleman, Diaz, Merlo, & Kaplan, 1993);墨西哥的多种毒品吸食者(Medina-Mora, Ortiz, Caudillo, & López, 1982);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毒品注射者;亚特兰大和波多黎各的青年网络以及不同地点的帮派成员(Moore, 1991)。

实例10.2 采用链式提名法选取难以发现的年轻的药物滥用者

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研究者无法识别出充满危险的青年吸毒者群体,因为这些人要不就不在学校上学,要不就不参加课外活动,并且没有正规工作。此外,研究者无法获知哈特福德有多少年轻人介于16~24岁,又有多少人符合研究标准,即经常喝酒或吸大麻,并且正在尝试至少一种其他毒品。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目标抽样计划,他们在六个社区(参考本章后文对

定义:

著名个案的选择是指请熟悉研究者关注标准的社区专家或参与者来推荐人选参与研究。

定义:

链式提名选择方法请求某个活动的参与者、或者具备某些特定特性的人来鉴别他们所知的参与同一活动的、或者具备同样特性的人。

定义:

索引受访者指符合研究标准,并且是研究者首先访问以产生研究总体名单的个人。

目标抽样的讨论)各自识别出了一些索引人。研究者继而请这些索引人列出他们寻求社会的、情感的和经济的资助,并且在过去六个月内曾与之一一起吸毒或发生过性关系的所有亲近者。研究者下一步就将访谈索引者提到的所有符合研究标准的个人。研究者还请索引者将他们提名的人带来,并为此提供经济奖励。在哈特福德市有关毒品和艾滋病的研究中,研究者曾经成功使用此策略。

链式提名方法包括用访谈索引受访者的问题访谈被提名者。研究者接着请这些被提名者以相同的方式列出其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人,并用相同的工具对之进行访谈。如同任何非随机性选择方法,链式提名选择可以保证被选择用于研究的群体符合研究者希望研究的特点;不过,在缺少其他确定资料的情况下,被访谈个体在代表自身之外,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特定总体则难以确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将得自链式提名法的研究结果与同一个总体或类似总体的其他资料进行比较(参考下文对参照个案选择的讨论)。

链式提名选择可以在网络研究中使用,用以辨识参与类似活动的一群人,并确定信息或特定行为如何通过网络而扩散。如为“民族志学者工具箱”撰文的罗伯特·特罗德(Robert Trotter)所表明的那样,这些信息对于干预和叙述来说都是有用的。

链式提名可以和随机抽样技术相结合(参见本章后文对概率抽样技术的讨论),以此增加研究结论适用于另一总体或人群的普适性。例如,如果索引者提出的具备适合研究特征的关系人或“替换者”的数目超过了一位民族志者力所能及的研究数,民族志者就可以采用随机抽样法从中选择深入访谈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志者有理由相信,从随机抽取的样本那儿获得的信息能够体现出索引者提名的所有关系人(不论他们是否都被研究)的特色。

定义:

示范或理想个案是指那些可以从中发现研究者期望的最优观察条件的个案。

示范或理想个案选择。理想个案是沃尔夫所说的“不足为奇”的个案(Wolf,1999)。例如,研究创新数学课程的博尔科和佩雷西尼(Borko and Peressini)选择了多所学校进行研究,这些学校的教师受过最好的训练且有最好的设备,并且学校的行政官员最支持创新(私人交流,1998)。在这样的情况下,课程的成功“不足为奇”;实际上,如果课程失败了才真的会令人吃惊不已,因为这与人们的期待截然相反。一旦初期的田野工作已确定

恰当的干预策略,示范或理想个案选择就尤其适合于考察干预效果,因为它最近似实验研究设定的受控的实验环境。虽然民族志研究无法控制自然场景内将会发生些什么,但通过选择不会出现问题 的个案来进行研究,理想个案的选择可以尽量避免对干预结果的混淆。

跨越个案或地点描述变量或模式的选择,或追求代表性的选择

参照个案的选择。民族志者通常不能设置允许建立多个完全一致的个案的实验环境,并在其中研究特定的活动、事件或人群。不过,他们却能寻找多个非常相似的个案,从中研究他们感兴趣的结构、模式或主题的稳定程度,甚至跨越场景或人群而存在的程度。有时,那些个案非常匹配,尤其当个案研究的是个人或同样的创新项目时。

定义:

参照个案是因其尽可能地显示了研究所关注的特定属性而被选择的。

在其职业生涯里,研究者往往选择在不同群体、不同背景下研究一种类型的现象。如果结果具有系统可比性,这些研究可以称作是参照个案研究。与此类似,研究者选择某个地点进行研究,可能是因为该地点与他/她或者其他研究者以前曾经研究过的地点相似或具有可比性,或者因为研究者希望更细致地或以不同方式再次探讨第一次研究的主题。多点民族志也被认为是参照个案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一个或一组研究者尝试同时研究相似场景中的相同现象,或至少弄清楚不同场景的差异在哪儿、差异的程度有多大。这套丛书中的第一册和第五册中所描述的勒孔特(LeCompte 1974, 1978)的“学会工作”(learning to work)的研究就属此类研究。另外一个早期实例是探讨20世纪60年代末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废除种族歧视期间学校发生了些什么的一系列民族志研究。在人类学家墨里·马克斯(Murray Max)指导下的这些研究关注的是同一个现象:废除种族歧视对于社会互动模式、师生之间以及社区内部的冲突的影响。研究者使用类似的研究策略,提出相似的研究问题。不过,虽然多数研究都是在高中进行的,但每项研究是由不同的研究者操作的,并且研究地点也各不相同,甚至遍布全国不同地区,这是一个明显影响族际冲突的环境因素(Holland, Eisenhart, & Harding, 1976; Schofield, 1982; Wax, 1979)。

在其他实例里，民族志者可以对在不同地点、甚至不同时间分别完成的民族志研究展开民族学分析或二手分析。在这种情况下，要找的资料是提出了研究者所关注主题的研究的报告，不过，那些研究是以略微不同的方式，在略微不同的群体，或者在具有一定差异的环境中提出该主题。民族志者的任务便是分析这些差异对于被调查主题的影响。这个过程类似于一系列受控实验，研究者每次实验时变换一个不同的因素，以评估对结果的不同影响。这个过程有时被称为元分析（meta-analysis）¹。

配额抽样。配额抽样并不是随机的，但它的确尝试从一个总体内的所有已知部分或范畴中选择代表。它要求辨识总体的主要特点，或辨识对于研究问题而言突出的总体特点。接着研究者要选择一定数量或比例的、体现了每个特点的个体进行研究。例如，关注投票行为的研究者知道性别、族群、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等会影响人们如何投票，他们往往选择具有上述五项变量的人群来进行研究。类似地，希望探究总体内的变化的研究者需要在样本中纳入该总体内所有相关部分的代表或配额。

配额抽样在研究的初期阶段尤为有效，因为它有助于研究者识别总体内所有的行为、态度和观点，而无需从每一个成员那儿获取信息。因此，它是确定参加焦点团体以及半结构化访谈人员的恰当策略。

实例10.3 采用配额抽样法研究毛里求斯的风险性性行为

在毛里求斯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中，配额抽样法被用于界定生活史和风险性性行为的变化范围。研究者假设，风险性性行为随族群与性别而变化。在选择半结构化访谈的受访者时使用了下述选择框：

族 群	男性	女性
印度教徒	10	30
穆斯林	10	30
基督教徒/克里奥尔人	10	30

1 元分析又称整合分析、综合分析等，在统计学上是指将多个研究结果组合的统计方法，这些组合后的结果有助于证明或推翻某一类别研究的假设。——译注

配额抽样并不是体现某群体的人口统计学比例或态度特点的精确方式,但它却是捕获文化变化范围的非常重要的策略。

如果总体是有偏斜的,有的群体便会比其他群体大很多,配额就可以是“权重的”,这意味着研究者可能会从有较多成员的总体内的特定范畴中选取一个较大的配额。或者,如果总体内的某些部分与研究问题的相关性更大,那么就会增大这些群体的配额以招募更多的研究参与者,并确保研究者完全理解这些群体的特点或动力学。

有针对性的选择(targeted selection)。有针对性的选择是接近于从单元或人员的总体中进行选择的策略,即使总体自身的规模或特点未知。就此而言,它与配额抽样(见上文)一样,准确程度接近概率抽样,后文将对概率抽样进行讨论。仅当研究者可以获得多个描绘其所关注的总体的二手资料的来源时,才可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抽样;接触多个来源有助于确保研究者识别被研究总体的主要分类或范畴,并且从各个分类或范畴中有系统地选择成员(Watters & Biernacki,1989)。二手资料来源通常包括犯罪率、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被捕原因、关于建筑与民居的信息(例如,弃用的或用木板隔断的建筑、计划拆除的建筑,所有这些建筑都有可能作为都市吸毒研究招募参与者的地点)、警局记录、健康与社会服务资料、民族志观察、行为监测数据,或者与研究相关的任何信息。一旦这些资料可用,就对它们进行多方检验,以创建以地理为基础的有针对性的抽样地区。

定义:

有针对性的选择到用多个资料来源辨识出高优先级的区域,并从其中选出一个被研究的群体。

实例10.4 对毒品注射者的有针对性的选择

根据哈特福德市卫生部门的估计,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有7 000~12 000名毒品注射者。因为有人无家可归、有人与朋友合住、有人在亲戚或朋友家之间搬来搬去、有人住在收容所、有人睡在大街上,研究者很难将他们固定在一个地方并统计其人数。对于研究目的而言,这些人群的总体是未知的。不过,街道扩展服务项目(street outreach programs)和民族志研究者提出,不论其人数为多少,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某几个城区。

由于哈特福德市收集了逮捕毒品吸食者、毒贩、卖淫者的信息,各类犯罪(例如抢劫、卖淫、窃贼、偷车等)信息,房屋状况、虐待儿童、婴儿死亡率等各种问题的资料,这些资料可以结合起来,界定为“暴露于风险之下”的测量标准。社区研究学会和西班牙裔卫生委员会在城市各机构的协助下,汇总、整理了这些资料,并根据各地区风险的高、中、低程度绘制地

图。高危地区遂被定位为招募干预研究的参与者的所在地。这样一种根据风险水平而给城区排序的方法也使研究者得以对每个风险类别进行权重配额抽样。

民族志研究中的抽样方法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基于研究者所感兴趣的特定标准而从界定的总体中选择研究参与者的方法。民族志者开始是在基于标准的群体（criterion-based groups）内进行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观察与访谈，探究最初的研究问题，接着缩小研究的关注范围。

一旦他们完成了对这些小群体的深度研究，研究者便可判断所得的研究结果是否也适合于整个总体。为此，民族志调查（本章已经讨论过）采用概率抽样法是必要的。如本章开篇所述，样本是来自更大群体的小群体，概率或半概率抽样方法旨在确保小群体的特点非常符合它所代表的大群体的特点。

概率样本的建立必须谨慎小心，因为其目的在于较方便地代表更大的单元或成员总体。如果它们不具有代表性，研究者就无法自信地将总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普遍化。根据从样本当中获知的信息，研究者或许想就斯里兰卡首都所有的三轮车车夫作些评论。正如本章后文以及第11章将要指出的那样，如果样本建立得不好，就会导致不正确的普遍化，也会导致结论无效的研究。

我们所描述的几种基于标准的选择方法并不以统计概率为基础；相反，它们关注的是运用其他方法来获知代表性或者代表整个总体的能力。有针对性的抽样以及特定类型的链式提名选择致力于接近概率或统计学抽样（的效果）。如果不可能满足下文所述的概率抽样的所有条件，便采用它们。

概率抽样的形式

定义：

普遍化是基于从样本中得出的研究结论而做出关于更大的总体的推论的过程。

社会科学研究者采用两种类型的概率抽样：系统抽样和随机抽样。很多教材都详细描述了抽样步骤；我们在本章结尾处列出它们以作为补充性资源。在此，我们仅简要描述最常见的步骤。

系统抽样。由于它的要求并不严格，并且在田野研究中通常能够满足，系统抽样是最常见的抽样。

如何建立一个系统的样本

为了建立一个系统的样本，研究者首先要明确选取什么作为样本以及研究需要多少样本。例如，关注大学生吸烟行为的研究者可能会选择一个附近的大学，并断定在总数为 662 人的学生整体中，他们可以对其中一半进行调查。接着，通过将实际的或理想的总体量除以期望的样本量，计算出合适的抽样区间（sampling interval）或“ n ”。由于吸烟研究的样本量为学生总数的一半，抽样区间就是2。研究者接着从整个总体的名单中每隔2个选择一个作为样本。在吸烟研究中，研究者可以使用一份列有所有学生名字的目录，每隔两名学生选择一人作为样本。如果他们打算调查25%的学生，他们的抽样区间就是4，他们便会在学生名单上每隔4人选择一名学生作为样本。

系统抽样并不要求被抽样的每个单独的单元都提前确定并位于名单之上。实际上，多数关于诸如社会互动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行为——它们无法被清查并列清单——的系统研究都采用系统抽样。例如，在斯里兰卡研究人力三轮车车夫的研究者决定其抽样区间为5分钟，他们在车站观察，每隔5分钟便记录下观察到的所有行为。在一种更结构化的方式里，例如研究戏剧艺术课程指导的研究者决定关注学生排练期间所练台词。由于学生们不仅在正式的课堂上而且在小教室里、走廊上、甚至操场上进行练习，研究者便整整一周跟踪一组戏剧学生，拍摄他们在教学日期间的互动。接着在观看录像时使用3作为抽样区间，每隔3次台词排练便记录下一次。

系统抽样的一个局限在于抽样区间武断地忽视了总体或研究情境中令人困惑的变化或波动。例如，如果上文所述的大学生总体中包括了大量来自越南的学生，而他们最常用的名字是Ngoc和Nguyen，从按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上每隔2人进行抽样就会导致样本过多地代表越南学生，而他们的吸烟行为可能迥异于其他族群的学生。如果研究者选择跟踪录像的那周恰好是学校主要剧目上演前一周——学生比平时更多地练习，或者如果他们选择跟踪那些最为活跃的作为表演者的学生，而不是舞台的全体人员或背景设计者，观察到台词排练的可能性就要大于他们选择普

通的一周或更多元的学生群体。

随机抽样。随机抽样是概率抽样中最常提及也最易理解的形式，尽管它不是最常用的。简单的随机抽样要求：

- 事先知道整个总体的特点。
- 识别出总体中的每个成员或单元，并从第一个成员到最后一个成员在成员名单标上序号。
- 总体中的每个成员或单元均可接受研究者的研究。

之所以有这些要求是因为简单的随机抽样要保证总体的每个成员都有相同的机会被纳入样本；从而，采用这种抽样方法的研究者可以确定其样本完全复制了其所源出的总体的特点。由于不存在潜在的不规则事物或因素来打乱样本匹配总体的程度（如上文关于系统抽样的描述），简单的随机抽样可以使研究者有效地概括总体。

如何建立一个简单的随机样本

要想建立一个简单的随机样本，研究者首先要判断研究所需样本的规模并选择一个抽样区间，用该区间来划分总体以产生样本的理想数目。接着，他们从计算机程序或统计教科书中获得一个随机数字表，并从中随机选择一个数字。接下来，研究者在总体清单上找到与随机数字表中的数字对应的数字，以此为抽样起点。接着，研究者用抽样区间在随机数字表中选取随后的数字。选择随机数字涉及以抽样区间为间隔——在大学生研究的个案里就是2——选取随机数字列。根据总体成员在名单上的序号是否与随机数字表中得来的随机数字相匹配而进行选择。随机数字表中的数目通常要大于研究总体的规模，因此，研究者首先必须注意总体规模的位数（在上文所述的662名大学生的个案中位数为3）；他们仅使用每个随机数的从右边开始数的三位数。例如，如果从表中选择的第一个数字是29384132，研究者便把这个数字划分为29384和132；第一个被选为样本的人就是名录上的第132号。利用计算机软件选定总体可以简化整个过程，该软件（如果研究者手头有此软件）可将随机数表应用于已读进计算机的名单。

简单随机抽样与系统抽样的变体

如果研究者感兴趣的总体当中包含独立的亚群体，或者总体是由特定的群体集结而成，研究者可能会采用随机或系统抽样的变体。这些抽样方法被称为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和整群抽样（cluster sampling）。

分层抽样。分层抽样需要在总体内辨识显著的各部分或各群体，继而分别从每个部分进行抽样。例如，对城市、郊区、农村男孩与女孩的性态度的研究便可进行分层抽样：分别建立城市、郊区、农村男孩与女孩的名录，然后分别在每个名录中采用系统或随机抽样法。分层抽样有利于比较，它还可以确保总体内各部分的样本具有均衡的代表力。当总体中某些部分明显大于其他部分时，分层抽样就显得特别有用。例如，美国公立学校的注册学生当中，美洲土著仅占相当小的比例；普通的系统或随机抽样方法往往忽略了这部分学生。希望将美洲土著学生纳入其研究样本的研究者便使用分层抽样法；通常，研究者加权土著学生的样本，这样被包括进样本的美洲土著学生的比例就大于其他族裔学生的比例，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保证这个非常小但又非常多样的群体被充分代表。

定义：
分层抽样是指从总体中每个事先辨识出的部分分别抽样。

整群抽样。整群抽样涉及辨识发现总体的天然群体或场景，并以列表的形式把它们显示出来，接着对这些群体或场景而不是个体进行抽样。于是，分析单位变成样本中特定群内的所有个体。对于分组稳定的总体而言，例如教室里的学生、小区的住户、社区医疗机构的患者，整群抽样就显得特别有用。研究者可以建立教室、小区、医疗机构的样本，研究这些被选单位中所有的学生、居民或患者。

定义：
整群抽样指从天然群体或场景中、而不是从个体中进行辨识及抽样。

实例10.5 运用分层整群抽样法研究是否遵照要求鉴定语言上的少数学生

1984年，勒孔特和她在休斯敦公立学校校区的助手被要求监测教师是否恰当地对拉美裔和移民学生进行测验和筛选，以便向那些还不会讲英语的学生提供的服务。勒孔特的助手建议，考察该学区全部232 000名学生的一个简单的随机样本记录。由于学区保留着所有学生及其住址的完整名单，这种方法是可行的。然而，该学区仅有35%的学生可能是语言上的少数族裔；对其余65%的学生进行抽样将会浪费资源且不能回答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此外，语言上的少数族裔学生倾向于集中居住在特定的几个社区。因而，勒孔特设计了一个分层整群抽样法：该学区

的学校被分为两层，即拉美裔及移民学生占学生总人数50%以上的学校；拉美裔及移民学生占学生总人数50%以下的学校。她的助手选择了拉美裔及移民学生占学生总人数50%以上的学校的一个50%的样本，并推论说如果筛选存在问题，被排除在必需指导之外的学生人数最多的就是这些学校。接下来，他们每隔5个学生文件夹选择一个作为样本，这样考察了有20%的学生的系统样本，以此来判断这些学校的学生是否接受了恰当的测验并得到正确的指导。

上述程序使样本饱和度最大化，也就是说，它所聚焦的学校可能发现最大比例的目标学生。它也使研究者得以有效地普遍化发生在这些深受拉美移民影响的学校的实践。勒孔特决定集中关注这些学校，而把那些较少有学生不能享受服务的学校留待以后资源充裕时再做研究。

实例10.6 对斯里兰卡三轮车¹车夫进行抽样

在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三轮车是公共交通的主要形式之一。三轮车及其驾驶者在性交易中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联系：维持性工作者、顾客以及性交易发生的场所之间的联系。三轮车车夫必须在市政部门注册，并被分配到“站”——他们可以停车等候顾主的地点。站点位置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注册名单不是最新的，但每个三轮机车车夫都必须注册并被分配到某个站点。名单提供了大、中、小站点的总体情况，但只有在每个站点进行清点才能获得各个站点所有车夫的完整名单。

在一项关于三轮车车夫的性风险的研究中，一个由斯里兰卡和北美研究者组成的小组绘制了三轮车站点的地图。对车夫进行的民族志访谈使得研究者可以根据站点规模以及车夫参与性交易的估算比例来划分站点。基于这些分层标准，研究者选出了一个样本，对之进行深度调查并正式计算分配到该站点的车夫人数。随后选出一个根据年龄来划分的随机样本进行民族志统计调查。

横断面研究、趋势研究、定群调查和追踪调查

多数样本是为横断面研究而建构的。这是在某个时间点进行的研究，并且其结果仅运用于该段时间内。不过，研究者有时也想纵向地或随时间推移而了解某个事件或现象。趋势研究、定群研究和追踪研究便服务于这样的目的，但这样的研究开销不菲、难以操作，并且可能需要大量的后续工作。

1 三轮车是人力出租车，结合了自行车和手推车(cart)的形式。通常被称为pedicab(三轮车)。

趋势研究。趋势研究是这些难以展开的研究中最容易的一种，研究者只需在指定的时间周期内重复进行几次相同研究便可。例如，勒孔特可能在五年里每年都监测同一批学校，来看对遵照要求的执行是否随时间而变化。然而，由于所取的场景甚至场景内的人群会随时间而变，趋势研究也有其缺陷。例如，移民和拉美裔学生向被选取学校的流动可能会停止，这可能导致学区范围内的遵照数据不准确，因为最受影响的学校不再进入抽样框。

定群研究。定群研究解决了一些麻烦。定群研究首先界定所关注的总体，接着分几次研究相关人群。勒孔特可以选定“50%以上的注册学生是拉美裔或移民的学校”作为抽样框，每年仅选取学区内那些符合条件的学校进行调查，而不论它们是否位于此前的研究之中。定群研究可以区别历史带来的影响与日常生活周期或发展带来的影响；不过，与趋势研究一样，它们也受到场景与人群随时间流逝而变化的不利影响。

追踪研究。追踪研究消除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追踪研究选择一个特定的样本、人群或单元，追踪调查它们。如果勒孔特采用了追踪研究法，她就会只连续监测那些第一次调查时考察过的学生。这样做意味着她必须每年都能找到这些学生，而不论他们是否转学到同一个校区的其他学校（不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或者离开了休斯敦（一个人员流动的麻烦问题）。此外，追踪研究还存在损耗问题。被追踪的成员可能会搬家、死亡或拒绝继续参与，从而改变了样本的构成，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必须给出解释。追踪研究对于疾病、健康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研究来说尤其有效。例如，追踪研究断定，完成高中学业的美国人的比例远高于学校所显示的数据，因为只有长时间追踪才能确定很多人是在离校后通过非正式渠道或成人教育项目获得的高中学位。采用追踪研究法也曾极大地促进了关于艾滋病进展和心脏病患者的治疗的研究。

使用样本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为了抽样，研究者需要：

- 精确界定总体和抽样单元。

- 熟悉社区或研究场景。
- 具备有关总体特征的知识。

精确界定总体和抽样单元

总体的界定、分项与枚举对任何形式的概率抽样来说都是关键的，尤其是探索性调查或民族志调查，其总体是已知的，但个体单元或成员并没有因为选样的目的而被分项或列出清单。有的场景可以得到其成员的完整名单，例如学校、公共住宅、诊所或工会等。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名单并不存在。研究者必须确认总体的所有成员并计算人数，自己创建一个名单。

枚举是指访问或观察以及列举总体中的每一个单元或成员。例如，关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小区的一项人口学研究中，5个社区组织的职员根据人口密度而排序，从13个住宅区里多组街区中随机选取了一组街区，并逐一清点被选街区中的每个住宅单位。枚举需要访问所选街区的每栋建筑和住宅单位，确定是否无人居住，有多少人居住以及他们自我认同的主要族群/种族类别。以枚举步骤为基础，研究者选出每个指定街区住宅的随机样本（参看本章稍后对随机抽样的讨论）。此前提到的斯里兰卡三轮车车夫研究涉及枚举随机选取的站点或站台样本内的三轮车车夫，根据他们参与性交易的规模和程度分类或分层，而这又需要由先期的民族志观察和访谈来确定。

不过，对人群或单元进行定位以便列出目录假设了人们是一个已知的或者确定的、并可定位的总体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指出，建立一个天然发生的行为精确总体是不可能的，就未知的、隐藏的，或难以企及的总体进行精确界定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民族志研究者试图通过把界定的一套地理范围及包括/排除标准加于被研究群体之上来接近精确。

所谓研究者界定的地理范围，是说由研究者指定在特定的时空内生活或在特定场合发现的成员作为目标群体。例如，三轮车车夫的总体被界定为那些常常出现在特定站点或站台的人；研究者拉马钱德拉(参见第5章)所调查的乡村一级的护士总体包括了特定地区内所有的乡村一级的护士；表演艺术研究者研究的总体则界定为某一周内所有的表演和对台词。

所谓包括与排除标准，指的是将个体界定为研究目标的特

定的品质、行为或限定性特征。例如，在关于三轮车车夫的研究中，与性交易无关的车夫就未包括在研究之中。

由于界定这些范围的决策是由研究者做出的，因而它们是专断的，但并不是捏造的。确切地说，它们来自谨慎的先期田野作业。田野作业形成了对可观察的行为、文化意义、信仰、价值、期望与共识的描述；获得了目标群体的成员如何认同自身的信息；以及对具体社会情景的认识，包括地点、背景、有社会意义的场合和事件，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群体的活动。上述选择策略为招募研究参与者划定了范围，但它们也有足够的灵活性，研究者可以基于新信息改变纳入规则。这种对灵活性的需要反映了民族志者所体验的持续张力，即一方面怀有控制研究的所有方面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是不断进入田野与得到反馈的现实。

熟悉社区与研究场景

熟悉社区与研究场景有助于研究者决定是否应该抽取一个简单的随机样本，或是应该对抽样框进行分层以恰当地把握总体内的变化范围。它也有助于确定样本大小。例如，如果研究者想在一个多元族群的地区收集其中一个族群的资料，简单的随机样本就不能保证目标群体被包括在内，尤其是当目标群体人数较少或处于隔离状态时。族群通常影响人们选择在哪儿居住，对一个多元族群地区的简单随机抽样可能会漏掉目标人群所居住的街区。

实例10.7 在一个多元族群城区就家户单位进行抽样

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避难山（Asylum Hill）区是15个城区中最多元的一个，生活着14个大族群。然而，对各街区人口普查的分析却表明，该区作为一个整体是高度隔离的：拉美裔人群居住在某些街区的租来的房子里，非洲裔美国人居住在其他街区的私有或住户共有的房子（condominium housing）里，西部印第安/加勒比海人、非洲人和欧洲裔美国人又居住在别的一些街区。为了获得关于家户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研究者必须使用分层整群抽样，建立一个根据族群分布组织并按人口密度排序的街区名录。排序名录接着就分组为高人口密度、中人口密度和低人口密度的街区。这些街区的家户单位被枚举出来，以街区密度加权的家户单位的随机样本随之被选出来进行面对面的调查。访谈者被告知需要回访八次以确保样本名单上的所有家户均被访谈到（Berg, 1992）。

有关总体特征的知识：偏差与代表性问题

定义：

偏差是指会使研究结果向某个特定方向扭曲的影响或因素。

我们已经指出，研究者抽样时必须注意确保所抽样本正确地代表了样本所取自的总体，或者说，如果可能的话，研究者要能够解释代表性不足的原因，并描述它为何存在于研究之中。缺乏代表性会给研究带来偏差(bias)。特定类型的代表性不足并不是研究者所能控制的。例如，就因为样本不是整个的总体，样本误差(sample error)带来的偏差就会存在；即使是在抽样过程中采用最严谨的数学程序，来自同一个总体的样本之间也会存在微小变化。

不过，不具代表性的其他形式却是研究者应该尽力避免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抽样偏差(sampling bias)。在聚焦于识别相关文化域和有效研究策略范围的初步调查或探索性研究中，抽样偏差并非主要关注点。这些研究的目的是要达到信息饱和点，也就是说，包括访谈和观察在内的更多的资料收集不再产生有关文化域、次文化域(subdomain)或因素的新信息的转折点。这也是达到“富余”(Trotter & Schensul, 1998)的点——回答开始重复并且不再生产新信息。

实例 10.8 就未成年人吸毒访谈机构职员

在一项关于青少年从吸“低致瘾性毒品”(大麻、酒和香烟)过渡到吸“高致瘾性毒品”(可卡因、海洛因和药丸)的研究中，哈特福德市社区研究学会的研究者决定访谈该地区年轻人服务机构的一些职员。第一个受访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年轻吸食者往往接触酒和大麻，但就他所知，多数人并不吸食其他任何毒品。这些资料与其他关于青年吸毒者的信息来源并不一致，因此，研究者继续访谈该城不同地方的其他四位一线的青年工作者。他们都提供了相同的信息，确定酒与大麻相当普遍，但城里的年轻人并不吸食其他毒品。因为可以预见到相同的答案，研究者决定不再继续访谈机构职员。他们决定直接访谈年轻人，询问其吸食毒品的模式。

实例 10.9 就未婚男女之间的社交机会访谈工厂基层主管

对于希望接触毛里求斯、斯里兰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工人的研究者来说，工厂基层主管是个关键。他们负责管理工人并在工作期间监视其行动。对男女工人约会契机感兴趣的两国研究者决定访谈几位工厂基层主管，大家公认这几位主管对工人约会的态度持友好态度。访谈者制作了一个契机列表，其中有工作年度里正式的社会活动、工会会议、午间餐厅、公交车站、工厂庭院等。经过几次访谈之后，没有再发现新的契机，研究者断定他们已经访谈至饱和点，通过访谈工厂基层主管已不太可能扩展契机列表。

饱和或者说富余形成了一整套的域、次域和因素，但它并未告诉我们有关这些域和次域在总体的不同部分的分布信息。如果研究者想要确定具体的性质、行为以及看待域、因素或实践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总体成员的特征，实现样本的代表性就是关键所在，而这就要求尽可能地排除抽样偏差。排除抽样偏差的注意事项有：

- 研究者界定适合研究目的的目标群体的精确程度。
- 从诸多地点收集资料的谨慎程度。
- 消除类别偏见(categorical prejudices)。
- 发现目标群体的隐藏部分。
- 确保总体的所有部分（即使他们不是隐藏的）的可及性，或能够轻松招募参与者。

毋庸置疑，缺乏对目标总体的精确界定会导致有偏差的抽样。例如，北美和欧洲的研究者认为女性和同性恋的男性不易遭受艾滋病的侵害，因此，在关于艾滋病的调查中忽略了这部分人群的早期病患者。类别偏见也会带来样本偏差。它们是不同形式的社会歧视的产物，这些歧视影响到研究中谁被容纳与谁被排斥。例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受教育程度的研究往往有不少水分，因为报告中没有受教育程度低的女孩。只有男孩的教育才被认为是重要的，女孩则通常被排除在统计之外。相似地，多数医学调查以男性为总体；研究者以“女性的生理学太复杂”为由使这种实践正当化，认为男性则是所谓的相对简单的。当然，反过来说的话也是一种偏见。

与此类似，如果研究者不是从一个大范围区域而是在一个有限区域内进行抽样也会导致抽样偏差。例如，从体制化了的人群中所取的样本就不能准确地反映非体制化的个体的行为。虽然在美国进行的年度调查表明12年级的学生吸毒人数在减少，但这样的研究并没有把退学的同龄青少年纳入样本之中，而后的吸毒比例可能相当高。最不可能遵循医嘱控制其病情的哮喘病患者是那些不去诊所的人，而诊所却是疾病调查时招募参与者最方便的场所。从而，聚焦于诊所患者的哮喘病相关行为的变化研究所得的结论就只适用于光顾诊所的患者，而不能推广至整个哮喘病患者人群。

定义：

由于总体的某些部分未被抽取而使样本的属性与总体的属性不相匹配时就会出现抽样偏差。

最后，样本如果没有包括难以接近的人员——或者因为他们远离主流群体，或者因为与之接触并招募他们可能对他们自身或研究者来说是危险的，或者因为围绕着他们的社会禁忌或习俗在研究者与他们之间设置了屏障——也可能导致偏差。在有的社会，有健康问题的人群可能会被社会隔离（例如肺结核、麻风病或艾滋病），被污名化的性取向也属于这种类型。例如，对美国学校教师使用电脑和接触网络的研究倾向于提出较高的使用比例；然而，多数这样的研究并未包括偏远地区或乡村地区。麦克伦南（McLennan, 1997）发现，虽然偏远乡村学校有教师参与到鼓励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互联网的活动，这些活动有大量的资金支持且广为人知，但他们不仅没有使用互联网，而且无一例外地不能在学校登陆网络或收发电子邮件，究其原因乃是学校缺少足够的设备、电话线或地区服务商。

生活在危险地区的人群也不大可能被选为样本，这是因为接触他们可能给访谈者带来危险。与此相似，深闺制度下的穆斯林女性不能与外人尤其是非家庭成员的男性接触，她们也可能被遗漏在样本之外，这或许是因为研究者无法获得表明其存在的记录，也或许是因为没有什么途径可以见到她们并获取信息。

样本应该有多大

尽管我们觉得这并非研究设计最重要的方面，但研究新手常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样本应该有多大？”这恐怕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在目标总体的规模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例如，究竟需要访谈多少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才能代表旧金山所有（一个未知的规模）无家可归的年轻人？要评估一门艺术课程对于不具有艺术敏感或创造性的儿童（经常规测试测定的不具有这些特质的儿童的整个总体）的影响，多少个青春期前的孩子才算是充分？简单的几句话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得在考察总体的特质、研究者能调动的资源以及调查目的中发现。研究者在选择一个恰当规模的样本时需要考虑：

- 总体当中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或多样性。
- 研究者计划采用哪种统计方法以及达到什么样的显著性水平（level of significance）。
- 研究者所能获得的资源有多少。

一个简单的经验是样本应该大到能够充分体现群体内的变化。这意味着我们要求样本规模达到400个，不仅是为了呈现多样性，而且也是为了要执行最一般的统计步骤（Bernard, 1995: 79）。不过，恰如下面的讨论所要指出的那样，这过于简单而不成规则。

一般而言，样本规模与目标总体内已知的异质性相关：异质性越显著，所需样本规模就越大，唯有如此才能代表总体内所有的变化。如果某个总体的特质完全是未知的，对之进行抽样便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可能遗漏掉构成总体的重要成分。另一方面，如果总体的特质是共享的，即总体内不存在或很少存在变化，那么一个个体也就足够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就假设存在这样的情形，该计划的目的在于确定人类的所有基因，而全人类又具有相同数目和类型的基因。

资源也会影响抽样。研究一个400人的样本可能面临着时间、资金或人员紧张的问题。在丛书的第一册当中，我们已经详述了研究的设计应该如何围绕着可用资源，并与后勤准则、界定准则及概念准则相符合。后勤准则（logistical criteria）与时间、资金、行程，以及招募并跟踪样本成员所需的沟通过程相关。界定准则（definitional criteria）是指群体的边界将如何划定以及谁将被包括在内。例如某项测量儿童能量消耗的研究以年龄和族裔为依据决定入选资格，但实际上谁被纳入样本还可能与儿童住所离研究者的远近相关。概念准则（conceptual criteria）是指实际上能否找到足够的目标群体的成员。对康涅狄格一个郊外小镇的毒品注射者的不安全行为的研究或许很重要，但要找到使研究值得进行的足够多的吸毒者却不太可能——这不仅与小镇的规模有关，也与社会禁忌导致目标群体生活在暗处有关。研究者尤其是民族志者必须抑制自己的热情，使抽样程序符合田野地点的现实以及调查时限和预算。

最后，研究者还需要考虑打算在分析时采用的统计方法。有时，这些方法受限于特定的资金来源；有时，统计方法需要回答研究的问题。不论哪种情况，多数统计方法都要求被研究总体内单元之间或类别之间的平衡，并且，对被调查的每个类别或单元有最少实例要求；而诸如百分比、均数、众数、分布等简单的

描述性统计则没有这样的要求。为了从诸多的统计方法中进行选择，研究者应该充分认识样本的特点和出于分析目的而使用的变量的特点。

获知具有适当代表性的样本量有赖于总体的特点、积累样本可用的资源和将要查明的现象的规模（cf. Bernard, 1995: 74）。代表性基于概率值（样本统计不正确的程度）和置信度（样本统计实际上有多不正确）。在10%的置信区间中，显著性水平为0.1表示，在99%(100%-0.001)的情况下，变量的统计是正确的，其置信区间为10%。如果研究目的是比较预先指定的群体，研究就会采用效力分析（power analysis）。关于决定代表性所必需的样本量的效力计算（power calculations）的更多信息，读者可以参考祖德曼（Sudman, 1976）和耶格（Jaeger, 1984）。

小 结

本章提出了民族志研究中对人群或单元进行选择和抽样的一些关键问题。我们也指出了研究可能出现偏差或导致无效推论的问题所在之处。本书最后一章将讨论民族志研究的信度及效度等重要议题。

效度与信度的类型

•
效 度

•
信 度

•
总 结

第11章 民族志研究的效度与信度

本章将提出评价研究质量的主要标准。关于效度与信度的常用标准来自实证主义以及实验研究的要求。它们将信度界定为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及其可被其他研究者复现的能力；将效度界定为研究者是否的确发现了其所宣称的发现，以及从其研究获得的认识能够运用于其他群体的程度。近来的科学文献充斥着大量不可信的，但却被广为宣扬的研究，这些研究要不就是不能被其他科学家复现，要不就是因其研究方法不同寻常而不能用于他处，研制冷聚变以及克隆动物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无效研究是被研究人群认为其结论不能真实反映他们从而予以拒绝的研究；因遗漏了总体或场景的重要部分而被判断为不准确的研究也属无效研究。其他一些研究可能是有效的但却用处不大，这是因为其结论仅适用于被研究的那一小部分人群，也就是说，它们不是普适性的。

数十年来，民族志者一直挣扎于信度与效度的实证主义标准，因为民族志研究的研究方法、田野状况以及目的都未曾为研究者提供诸如临床研究、实验和流行病学研究、甚至标准化调查和人口学研究所能实现的超然以及对研究的控制。后面这些研究具有控制偏差来源和避免实地受干扰的方法；他们也关注保持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之间的距离，而考虑到民族志者与研究参与者之间长期的亲密关系，与研究参与者保持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些民族志者并不理睬这个认识论上的争执，提出效度尤

定义：

信度是指研究结果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人群以及不同研究者情况下的可重复性。

定义：

效度是指研究者的发现与他们自认为研究结果所表明的结论之间的匹配程度，以及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可适用于其他人群。

其是信度的规则并不适用于民族志。另一些人宣称不同的研究范式要求不同的质量标准，他们提出了自己觉得更适合于民族志的替代性的信度与效度（相关评论参见Eisenhart & Howe, 1992以及Lather, 1986; Lincoln, 1990; Smith, 1990）。这些标准包括“信誉” (credibility)、 “善意” (goodness)、 “可信度” (believability) 和“催化效度” (catalytic validity); 或者说，这些标准指的是研究不仅能促进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理解，还能促使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向着消除社会压迫的方向改变（Lather & Smithies, 1997; Whyte, 1991）。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了中庸的、调和的、变化的、修正的实证主义准则，使之适用于民族志实践，同时又关注民族志研究的特殊性质和它对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影响（LeCompte & Goetz, 1982; LeCompte & Preissle, 1993, Schensul, S., 1985）。后面这种方法最令我们感到满意，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科学事业——包括民族志在内——都必须对调查质量予以高度重视。

我们的讨论首先要指出影响民族志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信度和效度标准的几个特点。我们既使用常用术语来描述这些对效度与信度的威胁，也使用我们认为更准确地描绘了其起源的描述。在我们看来，这当中没有哪一点危及了民族志研究的信誉、有用性和真正的价值，也没有哪一点削弱了民族志所生产的知识的严谨。下文列出民族志不同于更具可控性和标准形式的其他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

为什么民族志偏离效度和信度的标准规则

- 民族志最重要的资料收集形式是参与观察，研究者本身在此过程中也是“工具”。
- 民族志者不能把严格的实验室控制强加于研究之上，因为他们的关注点是人类事件随时间推移的自然发生。

作为工具的研究者

在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是主要的资料收集工具。如我们在这套丛书的第五册中所说，所有收集而来的信息都经过了概念工具和研究者主观意见的过滤。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研究都包含这

样的过滤，但民族志研究尤为明显。研究者是谁、他们对被研究人群或组织的态度、研究计划中的议程以及研究者带入田野地点的任何人员的、专业的或学科的偏见与视角都有可能影响研究所提出的问题、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以及对结论的解释。

缺乏对田野状况的控制

在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无法像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甚至横断面调查或流行病学研究那样控制环境。民族志者必须准备好随时面对意外——有时是不愉快的意外，期待的事件没有发生，意料之外的事却发生了。事实上，民族志者往往与自己希望在田野里发现的每一件事失之交臂；或者这些事与原本所想大相径庭。除了民族志者研究的是从不停歇且不能复现的事件流这一事实，“凌乱的”田野状况也正是使得民族志研究结果不可信——就传统的研究意义而言——的原因。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不能复现并不影响民族志研究的价值，事实上，通过对田野状况、研究者的行动以及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的细致说明可以调和这一点。本章我们讨论效度与信度问题，并阐述民族志研究是如何考虑这两点的。

效度与信度的类型

效度和信度具有多种类型，所有类型都影响到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评定为有信誉的和高质量的。通常而言，效度关注的是工具与观察的准确性与可靠性（Krueger,1988：41），研究结论为被研究人群所理解和分享的程度，以及研究结论适用于其他人群的程度（cf. Coetz & LeCompte,1984：10）。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是指科学观察和测量（例如统计调查与访谈）如实再现被研究人群的生活现实的程度，或受访者的回应正确地反映了受访者对被访问题的感受和思考的程度（Krueger,1988）。结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是内部效度的另一种形式，虽然它也与研究者在访谈时所提的问题有关，但尤其与测验、问卷、访谈指南等工具相关。结构效度是指问题或测量标准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测量到它们打算要测量的目标。例如，美国所使用的评价所有本科以

定义：
内部效度是指测量与田野情形的现实之间的一致性。

定义：
结构效度是指调查工具是否能测量打算测量的东西。

定义：
外部效度是指代表性对其他群体的适用性。

定义：

内部信度是指概念与资料集之间的匹配程度。

定义：

外部信度是指结果在使用同样方法的重复研究中的可比性。

前的教育项目的标准化测验中就缺乏结构效度，因为这些测验实际上仅仅测验了阅读、写作和算术的熟练程度，缺乏测验诸如美术这样的课程的结构效度，如用什么来教导艺术技巧。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是指代表性可适用于其他群体的程度。

信度关注的是使用相同研究方法的其他研究者能否得出相同的研究结论。内部信度(internal reliability)是指其他研究者以同样的方法能够将以前研究所生成的概念与特定的资料集相匹配的程度。外部信度(external reliability)关注的则是在相同或相似的研究背景下，独立研究者能否发现最初研究者所发现的现象或能否生成相同的概念(cf. Goetz & LeCompte, 1984: 210)。在讨论研究者主体性、抽样方法、形成调查工具以及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解释时，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些问题，在这套丛书中的第一、三、四、五、六册以及本书第9章中都可找到。本章将详细讨论民族志者所关心的效度与信度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效 度

多数方法论学者都同意，效度是民族志研究的主要长处。效度的建立要求研究者评估自己设计的概念是否表现或测量了人类经验的范畴。它也要求明确结论事实上代表经验现实(包括最初的调查地点范围内外)的程度。下面我们将从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两方面分别讨论这些问题。

内部效度

不难理解，民族志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这是因为：民族志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与被研究者生活在一起，与他们的关系逐渐熟稔，可以对资料进行持续分析，并有可能以确保科学范畴同参与现实相符合的方式使研究构想精致化。民族志者有时间学习当地语言、特殊字词的用法以及报导人说话的方式，因而访谈能够接近报导人的言谈方式，或使用报导人的言谈方式。与此类似，较之于实验研究或准实验研究中策划的、操纵的或受控的场景，由于参与观察是在自然呈现的场景中进行，它能更好地反映报导人生活经验的现实。最后，如丛书中第二、五、六册所述，

民族志资料的分析与解释包含着自我监督与反思的成分，这就要求民族志者不断地内省其行动与解释，并不断地质疑与重估研究的所有阶段。所有这些特点都有助于民族志者把被研究者所生活的世界说明白，也有助于被研究者理解。

尽管有这些长处，民族志研究中依然存在着效度问题，只是它们在研究的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而已。与选择和访谈关键报导人相关的效度问题不同于与提出并执行民族志统计调查相关的效度问题。在探索性或半结构化研究阶段，研究者期待不同的受访者就相同的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的确，探索性研究涉及对变量的搜寻，受访者做出不同回答就显得尤为理想，因为研究者能因此全面认识目标群体内的答案范围。从最初的资料收集到民族志者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一致模式且有意义的文化写照，中间有很长一段距离。因此，对于所有科学研究而言都很关键的效度概念在民族志资料的特定阶段是一回事，而在实证研究和实验研究所收集的资料中又是另外一回事。经常被忽视的效度的另一方面是，效度也取决于研究设计的适当性，这既包括对研究环境的设想，也包括对调查所用问题的设计。例如，如果研究者计划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例如团体访谈）所要求的互动形式，或透露与传递信息的方式在该文化或研究环境中是不恰当的，其结果就不会有效。

实例11.1 在斯里兰卡青年当中就男女关系问题进行混合性别与相同性别的焦点团体访谈

对斯里兰卡某城市地区青年之间的性行为与关系的研究表明，男青年所说的性词汇相当丰富，而女青年所说的性词汇则相当有限，她们甚至不愿与同为女性的斯里兰卡访谈者面对面地讨论与性有关的话题。斯蒂芬·申苏尔和琼·申苏尔、图尔多·席尔瓦、邦尼·纳斯塔西、切利亚·希瓦由格拉坦等研究者对联合讨论（joint discussion）的可行性持不同意见。青年焦点团体访谈表明，在性别混合的小组中讨论此类话题是有问题的。

因此，塑型研究阶段之后的小组干预就分别在男青年小组与女青年小组中进行。女青年的小组干预在室内进行，门外有一位女性研究者守卫，以确保没有男性听到讨论内容。关于“关系”“生殖健康”和“性行为”的讨论不再尴尬之后，女青年才同意在性别混合的小组里讨论并解决与性决定相关的困窘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求解问题的讨论之后，男女青年都要求在干预之前举行联合会议（joint meetings）。干预者在干预早期小心

翼翼地维护女性的隐私，为后来对这个敏感文化领域的研究拓宽了道路。过早地进行性别混合的小组讨论则会导致资料的遗漏和参与者的退出，从而削弱这项研究的内部效度。

对内部效度的威胁

下面叙述民族志研究中对内部效度的几种主要威胁以及预防办法。

对内部效度的威胁

- 民族志者研究的文化情景不具有稳定性；被研究群体会长大变老、搬迁、死亡，尤其是很多民族志研究历时较长。
- 参与者可能会隐瞒消息或者说谎；他们的言行与他们对研究者是谁、希望了解什么、如何与社区互动以及与谁互动等的认识有关。
- 研究可能会遗漏部分人群或场景。
- 研究者的报告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过早下了结论。

文化情景及其栖居者经历变迁。这些对内部效度的威胁通常是与历史、成熟(maturation)及耗损有关的问题（Campbell & Stanley, 1963）。历史指的是整体社会情景中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成熟指的是个体的前进性发展。耗损指的是研究者所研究的群体由于死亡、搬迁或受访者退出所带来的人口的减少。所有这些都是秉持实证主义观点的研究者要严肃对待的问题。这些研究者力求控制研究的所有方面，包括时间流逝与对象耗损。然而，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恰是民族志者研究的事项。他们致力于区分某个文化或群体中不变的与变化的人和事。他们通过记录历史变迁来记录历史后果。成熟不是探索性研究的关注点；在多数民族志研究中，成熟被认为不仅是人类生命的一个正常部分，也是研究本身的一个有趣话题。长期在场且置身于田野的多样性环境中，以及对有关个人发展或成熟的本土定义的运用，都有助于民族志者辨识出其研究中历史与成熟的含意。当民族志者开展半结构化或界定性研究和民族志统计调查时，成熟便成为了他们的关注点。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进行访谈和观察就涉及这一点。民族

志者也认为耗损是人类生活中的正常方面，在探索性或描述性研究中不成问题，因为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获取关于某个主题的新信息。如果关键报导人或者信息来源消失，民族志者只需找到信息的其他来源即可。但如果被观察的单元或个体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时，耗损就的确成问题了。在第一次访谈或观察与第二次访谈或观察期间失去足够的个案会影响干预的结果或对未来行为的预测，也就是说，将很难区分干预结果或人们的态度与行为的实际变化与由于某些特定个体缺席而出现的变化。要防止耗损导致对效度的威胁，最佳策略是充足的时间与资源准备，以及足够普遍的取样，以此实现个案消耗或丢失的最小化。

参与者可能当着研究者的面提供错误的或误导性的信息。对内部效度的这种威胁通常被视为观察者效应（observer effects）。这是由于人们得知自己被他人观察时倾向于采取不同于未被观察时的行动。观察者效应是任何研究都存在的问题，但由于民族志者是显著的观察者，这样的效应不容小觑。民族志中减少观察者效应的关键是报导人和社区居民对研究者的信任与放松程度，以及研究者影响该场景中行为或信息的正常流动的程度。有时，被研究人群对研究者的看法取决于他们过去与其他研究者的关系；可能由于上一个研究者对待他们的方式有误，从而使他们不再相信现在的研究者。

民族志者通常在田野地点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以提高他们自身的放松度和受访者的信任度。他们会为受访者安排舒适的环境、提供食物或其他社交活动、协助解决交通问题或其他日常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民族志者也会使用翻译。他们还会从受尊敬的社区成员那儿获得支持，以打消参与者对研究者是否可信的疑虑。

在诸如民族志访谈和观察等更结构化的资料收集，民族志者需要尽量考虑到（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控制）使观察者效应最小化的各种因素：

- 受访者与研究者的熟悉程度和自在程度。
- 研究者呆在田野地点的时间长短。
- 参与者怎么看待研究者。
- 与参与者和研究主题相关的研究者的性别。

- 研究课题是否是参与者乐意在公共场合讨论或与陌生人讨论的话题，或者是参与者根本不愿意谈及的话题。

民族志者可以采取一系列的策略来提高内部效度，减少访谈过程中的观察者效应。他们可以注意：

- 对提问进行试点调查确保参与者明白。
- 确保受访者在访谈环境中舒适自在。
- 确保田野调查小组的成员是受访者信任或感觉舒服的人。
- 在适当的场所进行访谈。
- 阐明问题中存在的任何含混不清之处。
- 在发表或公布解释性评论之前向参与者求证研究结论。

参与者之间如何相处既可能受研究者在场的影响，也可能不受其影响。除了民族志田野调查场景中观察者对参与者的影响，观察者效应可能还包括参与者之间潜在的相互影响。社群之间有其自身不受研究者在场影响的互动状态，但它们最终会对研究者观察到什么产生影响。如果研究者引入的话题是有争议的，报导人之间的互动或研究者与报导人之间的互动就有可能受到指责，因而小组讨论或小组活动的成员便会不自在、偏离正常方式或变得鲁莽，甚至转身离开。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应该改变话题、结束讨论或进行其他转换。

影响资料的内部效度的观察者效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研究者使用不恰当的或陌生的问题与语言，或从理论框架与概念中抽取与研究参与者没有直接关联的术语或行话。其后果就好比研究者对着社群说外语。如果研究者做到下面这几点，便可以提高内部效度，此即：对文化背景有深入认识；对研究有充分的理解；在展开更结构化的访谈和观察之前，应用焦点团体访谈来生成并检验问题与域；试点检验观察结果，确保它们是与研究问题和访谈问题相关的、可理解的、具有文化一致性且可接受的行为。

此外，正如戈茨和勒孔特(Goetz & LeCompte, 1984: 224)所指出的那样，研究者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所使用的研究工具，以及从其民族中心主义和学科及个人偏见中创造而来的理论。内省过程和我们在这套丛书的第五册和第六册中所描述的“学科主体

性”(disciplinary subjectivity)有助于做到这一点,用田野中的其他资料来源多方检验最初印象和资料的所有来源,以及从其他场景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搜寻资料等也有助于此。

谨慎地按方法运作使同一项研究中的多位研究者更能够就观察到什么形成共识;观察者之间的这种共识是内部效度的最好证明。提高共识的一些有用方法包括:

- 获得受访者的逐字解释。
- 记录详尽的田野笔记,记录不同观察结果之间的差异。
- 编码田野笔记时利用研究团队,力求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情形下获得高水平的相互评定的信度。
- 借助田野顾问和关键报导人来验证观察结果,并用作调查者初步结论的真实性检验。
- 参照其他研究者的发现思考研究结论。
- 使用摄像机和录音机等电子或机器设备记录资料。

总体或场景的某些部分可能会被遗漏。由于这种遗漏而导致的对效度的威胁被称作选择(selection)和回归(regression)效应。如第10章所述,对总体的不完全代表或选择(抽样)偏差会歪曲调查结论,使之有利于被代表人群,从而影响内部效度。虽然民族志者不可能总能从目标群体中获得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参与者样本,但应该确定究竟是谁被代表,忽略谁的理由也应该陈述出来。以前的民族志研究可以帮助民族志者鉴别研究中应该代表和记录的所有部分,还有田野应该搜寻和访谈的所有部分。我们建议,在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者从所有关键报导人和参与者那儿获取人口统计资料,以使得样本中的成员人数与目标群体相匹配。

研究者可能得出错误的或误导性的结论。传统的研究者将这种威胁称为虚假结论(spurious conclusions)的可能性。在田野作业的初期,满怀激情的民族志者基于并不充分的资料而过早地下结论并不罕见。田野作业初期,研究者会注意到那些最常反复出现的非同寻常的、有争议的、表面的模式。如我们在本丛书中的第六册中所说,研究者与之建立关系的第一个人可能是非典型的,且不能准确代表社区视角。民族志者可以通过在一段时间之后验

证结论、检验自变量域与因变量域之间的关系、访谈多个小组并相互检验结论、寻求因果关系或历史关系的本土解释、实地观察因果联系等方式纠正这个问题。当研究者对事件及其发生缘起的观察与当地人对因果的解释不符时，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实例11.2 某学区关于“麻烦”的竞争性解释

在纳瓦霍人那里，对为什么“事情变糟”的常见解释是巫术，没有以恰当的文化模式敬畏自然和尊重其他人类。在勒孔特工作的学区，对洪水或屋顶漏缝这样的自然灾害，和某个受欢迎的高中有学生自杀或太多学生不及格这样的人类问题的解释，与研究者和学校管理者的更“理性”和更官僚化的解释并存。归咎于以次充好的建筑、恶劣的气候、不健全的家庭以及导致很多学生错过上课——从而考试不及格——的公交车时间表，这些本土的和其他的解释都需要纳入学区政策的考虑之中。

外部效度

外部效度既指一项研究所得结论对于其他人群而言的真实程度，也指一项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定义和调查技术是否能为其他研究者用于类似研究。有研究者认为，民族志研究非常独特，不仅其结论还有其技术都不能用于他处。他们倾向于提出独特的术语来描述在调查地点所发现的特定情景。然而，这却威胁到了其研究的科学价值，因为出色的研究的标志之一就是增加了我们对人类生活的普遍认识而不是对特殊小群体的认识。因此，我们倡导既要承认民族志者所研究的文化的独特性，又要使其他研究者能够利用其结论。戈茨和勒孔特(Goetz and Lecompte, 1984)主张，要确保民族志者所得结论以一种能与其他研究所得结论进行比较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意味着有可能的话，要使用为学科所熟知或有历史的，并且明确界定的或可操作化的术语与解释，本书第3章已对此有所叙述。在不可能如此做并且必须创造新术语的情况下，研究者应该谨慎界定并阐明理由。

戈茨和勒孔特(1984)进一步指出，研究所用的理论、概念与方法应该是可译的。这意味着它们必须能被人理解且表述清晰；与术语或结论的情况相似，背离常规的做法也必须解释清楚，这样才能使其他研究者评定其价值与恰当性。

对外部效度的威胁

- 使用对于被研究群体而言不恰当的概念、工具或方法，因为它们是为研究迥然不同的其他群体而提出的（选择效应）。
- 以一种非常独特或与众不同的方式描述用于某个群体研究的概念、工具、方法或结论，使之不能为任何其他群体的研究所用（概念效应）。
- 未能记录被研究群体或文化的特殊历史经验，如果它们严重影响到研究所得结论时尤其如此（历史效应）。
- 研究者与报导人的关系，或研究者在社区内的角色严重影响场景或结论（观察者效应），但没有仔细记录那种关系及其影响是什么。

研究场景的特点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被研究人群与文化的特殊历史经验会使得概念的跨人群比较失效。在此，族群/文化、社会、种族和性别构成都是重要因素，但研究者也应该清楚记录都市化、涵化和其他历史过程创造的特殊情景。

此外，研究者可能会以一种改变被研究文化情景的方式与被研究场景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群互动。在有的情形下，尤其是在应用型民族志研究中，这样的互动是恰当的，因为研究者与社区紧密合作，研究者引入的变化甚至得到研究参与者的支持。调节这种效应的最佳方式是清楚地描述所有场景、场景—观察者的互动、研究者的行动及其影响，并且由受过训练的多名观察者在多个场景中进行观察。

细致的预调查和试点调查(prior fieldwork and pilot testing)可以解决概念效应的问题，尤其是当研究者计划采用或改编的工具来自于以不同人群为对象的其他研究时。民族志者往往从事这种实践，但只有在注意到上述防范事项的前提下才会是恰当和高效的。所有这些策略提供的信息，都让外行读者和其他研究者可以评定研究的质量与效度，它们也可用于检验手头研究是否存在偏差。

信 度

信度提出了研究结论能否被复现的问题。信度在民族志研

究中比较不受关注，尤其是在研究过程的探索性或界定性阶段。跨越群体复现研究结论并不是探索性探究所期望得到的结果。相反，这些访谈的目的在于提供探索性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引导理论的表达，生成更有效的工具并对定量结论做出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差异比发现相似更重要。不过，悉心培训访谈者、团队访谈、严谨的笔记和视听记录，以及事先考虑探索性研究所用问题的结构等，都有助于确保其他研究者接近研究过程——尽管不一定是结论。使用其他资料来确证探索性及界定性民族志研究的结论是保证结论信度的另一种方式。

提高外部信度的其他方式还有：

- 说清楚研究者与被研究群体及地点的关系的性质和背景；根据研究者在社区所处位置的不同，他们可能从不同角度观看并做出不同解释。
- 澄清和阐明关键报导人是谁，他们所代表的群体是哪些，以及他们在被研究社区中所处位置。
- 阐明观察如何进行以及在哪儿进行。
- 提供关于配额和其他抽样方法、工具建构与检验的详细信息，以便读者可以辨识并复制研究所用信息的主要来源。
- 清楚界定研究的社会背景和情况，包括进行民族志统计调查的条件；这增加了复现的可能性，并使得读者可以辨析资料收集过程中的局限与空白，这些局限和空白可能会影响调查结果及对它们的解释。
- 清楚地界定概念(concepts)、理论(constructs)、域、因素和变量（在所有层次上进行可操作化），以此避免特殊的解释和有限的可复现性；在可以提出编码范畴和编码文本数据时，建立交互评定信度。
- 阐明分析民族志资料的方法与程序，以便他人能够重复研究；如戈茨和勒孔特(Goetz & LeCompte, 1984)所说，“由于信度取决于后续研究者重构最初分析策略的可能性，所以只有那些充分说明了分析策略的民族志报告才是可以复现的”。（第217页）。

清楚描述民族志研究的所有步骤，包括资料分析与解释环节在内，是保证研究的外部信度的关键。

总 结

本章介绍了评判研究结论质量的主要标准的最重要原则。如本章开头所述，这里所讨论的准则或多或少地是传统的，对于专业人士和普罗大众来说都是最广为人知的。因此，它们既是民族志者工作中最常依据的准则，也是资助机构、评价人、受托委员会和其他研究者往往质疑研究的那些准则。我们认为，“民族志学者工具箱”的读者应该熟悉它们，从而对这些质疑胸有成竹。

我们也相信，关于效度的较新的一些定义尤其与应用型民族志研究者的研究相关，包括这套“工具箱”丛书的使用者。应用型民族志者很快就能明白，在社区进行研究意味着对于任何特定问题很少有真正“正确的”答案，也从来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的唯一的、完善的程序。相反，找到可用的和恰当的解决方法需要批判理论家和后现代研究者所提倡的协商、分权以及联合决策。实现这种分享过程的研究的确是有效的，对于社区来说如此，对于调查者来说亦如此。此外，促进地方社区和群体发现并解决自身问题的研究的确是“催化性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本章开头部分所说的“催化效度”（Lather, 1986）。最后，如果理论、方法、分析步骤和结论在地方性语境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信度和普适性亦随之增强。



结束语

民族志者常常面临着收集、分析和解释来自自然场景中的资料的方法问题。这些问题通常与民族志的三个特点有关。民族志是地方性的，民族志研究的结论不能轻易地适用于其他场景。民族志研究是在天然场景内进行的，研究者并不能控制事件的发生，而是必须努力观察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它不是实验室里的科学。最后，民族志者是资料收集的主要（往往还是唯一的）工具，在此意义上民族志与众不同。本书尝试着展示了民族志采用科学方法以适应具有上述特点的田野调查的各种途径。

提出清晰的研究问题与理论模型是增强民族志研究严谨性的重要的第一步。将方法与研究问题和模型联系起来则是第二步。获得当地人的支持对于好的民族志研究来说相当重要。民族志者增强对其研究结论的信心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回答以及不同类型的资料来交叉互证正在获得的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民族志研究都要求进行统计调查。然而，本书已经指出，对于希望在研究中运用定性与定量资料的民族志者来说，提前思考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料如何衔接与分析、相互支撑是多么地重要。

民族志拓展了为解释和预测而倾听、提问、观察、分析和建立理论框架的技能，这些技能是在任何文化或社区场景内学习、生存及成长的重要成分。每个人都具备一些民族志技能，但好的民族志研究需要将这些技能系统地运用于探究某个研究问题之中。优秀的民族志者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即使答案看上去显而易

见也能够提出问题。

我们承认，多数民族志者带着问题开始研究。民族志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研究者在研究早期便抓住机会探究问题。不过，我们已经有意识地推动早期或塑型理论的建设，因为此过程对于澄清研究问题，认清资料收集与分析方向非常有益。如果研究者运用本书第2章和第3章概述过的建模方法，我们相信就可以很快设计出塑型理论模型，在研究过程中，该模型与资料相互作用，逐步深化且变得更为复杂。

计算机技术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民族志方法的严谨性。有了文本及特殊数字资料处理程序，民族志者现在可以系统化编码方法并创建文本资料库，它们和定量数据库一样成为科学质询与批评的对象。将我们的访谈和观察资料直接输入以文本为基础的查找程序，分析在田野中得到的原原本本的资料，在田野中几近即时地把资料呈现给合作伙伴，我们距离这样的能力已不遥远。这些技术手段——资料处理与分析软件、笔记本电脑、投影仪、语音软件以及高速的调制解调器——已推动民族志者使其理论、方法和分析进路更加清楚明白。即使民族志者实际上并未利用这些新技术，对它们的考虑也会提高基于社区的研究的质量、效度和信度。

尽管理论建构、研究方法、研究技术日益复杂精致，但最终而言，民族志事业仍然取决于人际互动。和睦、互惠与移情的建立是民族志的基石，因为它们是获得优质信息以及加深理解的根本。质性研究中的技术进步只有在它们缩短了，或至少没有增加民族志者、研究参与者、研究合作者之间的社会距离的前提下才有用。

我们已经说过，民族志是实用的科学。民族志将研究者带往社区、机构、家乡，并在自愿合作者的帮助下学习。那些关键报导人或文化专家帮助研究者从当地视角理解世界。建立牢固的研究合作关系的良好基础是，要提出那些困扰我们所研究的社区或邻里的棘手难题。

参考文献

- Aday, L. (1989).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health surveys: A comprehensive guid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Amarasiri de Silva, M. W. (1993).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primary health in a rural Sri Lankan distric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Babbie, E. (1995). *The practice of survey research* (7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Bandura, A. (1979). Self-efficacy—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191-215.
- Berg, M. (1992). *Rapid Sociodemographic Assessment project (RSA)* (11 mono-graphs). Hartford, CT: Institute for Community Research.
- Bernard, H. R. (1995). *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o ethnographic research* (2nd ed.).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Bieleman, B., Diaz, A., Merlo, G., & Kaplan, C. H. (1993). *Lines across Europe: Nature and extent of cocaine use in Barcelona, Rotterdam and Turin*. Amsterdam: Swets & Zeitlinger.
- Bingham, A. (1998). *The malaria ecosystem in southern Mexico*.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Bogdewic, S. P. (1992).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B. F. Crabtree & W. Miller (Eds.),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Boster, I. S., & Johnson, J. C. (1989). Form or function: A comparison of expert and novice judgements of similarity among fish.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 866-889.
- Campbell, D. T., & Stanley, J. C. (1963).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 Carley, K. (1991). *Textual analysis using maps*. Pittsburgh, PA: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Decision Sciences.
- Chambers, R. (1992). Rapid but relaxed and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Towards applications in health and nutrition. In N. S. Scrimshaw & G. R. Gleason (Eds.), *RAP: Rapid Assessment Procedures: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of health-related programs* (pp. 25-38). Boston: International Nutritional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FC).
- Clement, D. C., Eisenhart, M. A., & Harding, J. R. (1979). The veneer of harmony: Social-race relations in a southern desegregated school. In R. C. Rist, (Ed.), *Desegregated schools: Appraisals of an American experiment* (pp. 15-6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umbo, K. (1998). *The meaning of books and reading in a preschool classroom: A focus on peer contex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 DeWalt, K. M., & DeWalt, B. R., with Wayland, C. B. (1998).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Diaz, A., Barruti, M., & Doncel, C. (1992). *The lines of success? Study on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cocaine use in Barcelona*. Barcelona: Laboratory of Sociology, ICESB.
- Diaz, N. (1998). *Perception of body image among Puerto Rican pre-adolescent gir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PA.
- Eisenhart, M. A., & Howe, K. R. (1992). Validit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M. D. LeCompte, W. L. Millroy, & J. Preissle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pp. 643-68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Ember, C. R., & Ember, M. (1998).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647-690).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Fink, A. (1995). *How to ask survey ques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ontana, A., & Frey, J. H. (1994). Interviewing: The art of scienc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361-377).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owler, F. J., Jr. (1984).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Fowler, F. J., Jr., & Mangione, T. W. (1990). *Practical sampling*. Newbury Park, CA: Sage.
- Frake, C. O. (1964). How to ask for a drink in Subanu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Pt. 2), 127-132.
- Gaviria, M., Stern, G., & Schensul, S. (1982). Sociocultural factors and peri-natal health in a Mexican American community.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74, 983-989.
- Gay, L.R. (1985).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measurement: Competencies for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2nd ed.). Columbus, OH: Charles E. Merrill.
- Gilchrist, V. (1992). Key informant interviews. In B. F. Crabtree & W. Miller (Eds.),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70-92). Newbury Park, CA: Sage.
-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 Goetz, J. P., & LeCompte, M. D. (1984). *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1st ed.).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Goldin, L. R. (1996). Models of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Anthropology*, 1-2(6), 49-74.
- Goode, W.J., & Hatt, P.K. (1952).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McGraw-Hill.
- Goodenough, W. (1956). Componential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f meaning. *Language*, 38, 195-216.
-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9).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 Harris, M. (1968).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 Henry, G. T. (1990). *Practical sampling*. Newbury Park, CA: Sage.
-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1995/1997). *Women and AIDS research program, Phase I and Phase II research report series*. Washington, DC: Author.
- Jaeger, R. M. (1984). *Sampling i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Longmans.
- Johnson, J. C. (1990). *Selecting ethnographic informants*. Newbury Park, CA: Sage.
- Johnson, J. C. (1998). Research design and research strategies.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131-172).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Johnson, A., & Sackett, R. (1998). Direct systematic observation of behavior.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301-332).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Kaplan, A. (1964). *The conduct of inquiry: Methodology for behavioral science*. Scranton, PA: Chandler.
- Koester, S. (1996). The process of drug injection: Applying ethnography to the study of HIV risk among IDUs. In T. Rhodes & R. Hartnoll (Eds.), *AIDS, drugs and prevention: Perspectives o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action* (pp. 133-148).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Koester, S. R., Booth, E., & Zhang, Y. (1996). The prevalence of additional injection-related risk behaviors among injection drug users. *Journal of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s and Human Retrovirology*, 12, 202-207.
- Krueger, R. A. (1988). *Focus groups: 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2)
- Laio, S. (1997). *A pilot intervention among sex workers in Hainan: Final report to WHO*.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 Lamphere, L. (Ed.). (1992). *Structuring diversity: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immigr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ther, P. (1986). Research as prax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6, 257-277.
- Lather, P., & Smithies, C. (1997). *Troubling the angels: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Boulder, CO: Westview.
- LeCompte, M. D. (1974).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teacher sty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 work nor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 LeCompte, M. D. (1978). Learning to work.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9, 22-37.
- LeCompte, M. D. & Goetz, J. P. (198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2, 31-60.
- LeCompte, M. D., & Preissle, J. (1993). *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2nd ed., pp. 267-277).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Levy, R. I., & Hollan, D. W. (1998). Person-centered interviews,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333-364).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Lincoln, Y. S. (1990). The making of a constructivist: A remembrance of transformations past. In E. Guba (Ed.), *The paradigm dialog* (pp. 67-87). Newbury Park, CA: Sage.

Lounsbury, F. G. (1964).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kinship semantics. In H. G.

Lunt (Ed.),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ics* (pp. 73-93). The Hague: Mouton.

Malinowski, B.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New York: E. P. Dutton.

McLennan, S. (1997). *Teachers, Internet and schools: Case studies of challenge and chang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Medina-Mora, M. E., Ortiz, A., Caudillo, C., & López, S. (1982). Inhalación deliberada de los disolventes en un grupo de menores Mexicanos. *Revista Salud Mental*, 5, 77-81.

Merton, R. K. (1967). *On theoretical sociology: Five essays old and new*. New York: Free Press.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method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28-444).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ore, J. (1991). *Going down to the barrio: Homeboys and homegirls chan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Murdock, G. P. (1967). Ethnographic atlas: A summary. *Ethnology*, 6, 109-236.

Naroll, R., & Sipes, R. G. (1973). Standard ethnographic sample, 2nd ed. *Current Anthropology*, 14, 111-140.

Needle, R. H., Coyle, S. L., Genser, S. G., & Trotter, R. T., II. (1995). Introduction: The social network paradigm. In R. H. Needle, S. L. Coyle, S. G. Genser, & R. T. Trotter (Eds.), *Social networks, drug abuse, and HIV transmission* (NIDA Research Monograph 151, pp. 1-2). Rockville, MD: USDHHS.

Oodit, G., Bhowan, U., & Schensul, S. (1993). *A study of women admitted to hospitals with complications due to abortion*.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Reproductive Health Sec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Pelto, G., & Gove, S. (1992). Developing a focused ethnographic study for the WHO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ARI) Control and Programme. In N. S. Scrimshaw & G. R. Gleason (Eds.), *RAP: Rapid Assessment Procedures: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of health-related programs* (pp. 215-226). Boston: International Nutritional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FC).

Pelto, P. J., & Pelto, G. H. (1978).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he structure of inquiry* (2nd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ed, D. B., & Furman, G. C. (1992, April). *The 2 x 2 matrix in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d theory gene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Rein, M., & Schon, D. (1977). Problem setting in policy research. In C. Weiss (Ed.), *Using social policy research in public policy making*. Lexington, MA: D. C. Heath.

Romero, M., & Berg, M. (1997). *Indicators and precursors of alcohol use in preadolescent girl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r for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annual evaluation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Rossi, P., Wright, J., & Anderson, A. (1983). *Handbook of survey research*.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Schensul, D. (1998).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The Summer Youth Research Institute*. Senior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chensul, J., Diaz, N., & Woolley, S. (1996). *Measuring activity levels among Puerto Rican childr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Puerto 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San Juan, PR.

Schensul, S. (1969).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Northern Minnesotans and Southern Ugandan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chensul, S. (1985). Scien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anthrop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9(2), 164-185.

Schensul, S., Eisenberg, M., Glasgow, J., & Huettner, J. (1994). Translating state data into local health programs: Targeted research for intervention plann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4, 671-672.

Schensul, S., Oodit, G., Schensul, J., Seebuluck, S., Bhowan, U., Aukhojee, J. P., Rogobur, S., Koye Kwat, B. L., & Affock, S. (1994). *Young*

- women, work and AIDS-related risk behavior in Mauritius. Women and AIDS Research Program, Research Report Series, No. 2.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 Schensul, S. L., Schensul, J., & Zegarra, M. (1985). *Pediatric health and the evolut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in Lima, Per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85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 Schofield, J. W. (1982). *Black and white in school: Trust, tolerance or tokenism?* New York: Praeger.
- Schweizer, T. (1998). Epistemology: The nature and valid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39-88),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Silva, K. T., Schensul, S. L., Schensul, J., de Silva, M. W. A., Nastasi, B. K., Sivayoganathan, C., Lewis, J., Wedisinghe, P., Ratnayake, P., Eisenberg, M., & Aponso, H. (1997). *Youth and sexual risk in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Washington, DC. Phase II Report Series.
- Smith, J. K. (1990). Alternativ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the problem of criteria. In E. Guba (Ed.), *The paradigm dialog* (pp. 167-188). Newbury Park, CA: Sage.
- Spradley, J. P. (1979).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Spradley, J. P. (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Stringer, E. T. (1996). *Action research: A handbook for practitioner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udman, S. (1976). *Applied samplin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udman, S., & Bradburn, N. M. (1982). *Asking questio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Trotter, R., & Schensul, J. (1998). 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Watters, J. K., & Biernacki, P. (1989). Targeted sampling: Options for the study of hidden populations. *Social Problems*, 36(4), 17-18.
- Wax, M. L. (Ed.). (1979). *Desegregated schools: An intimate portrait based on five ethnographic studies*. Unpublished report t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iles of the Editor,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MO.
- Weller, S. (1998). Structured interviewing and questionnaire construction.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365-409).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Weller, S. C., & Romney, A. K. (1988). *Systematic data collec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 Werner, O., & Schoepfle, G. M. (1987). *Systematic fieldwork: Ethnographic analysis and data management* (Vol. 2). Newbury Park, CA: Sage.
- Whyte, W. F. (Ed.). (1991).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Wilson, D. S. (1998). *Fieldnotes*. Hartford, CT: Institute for Community Research.
- Wolf, S. A. (1999, April). "No excuses": School reform in exemplary schools of Kentucky. In *Images of reform: The effects of a high-stakes, performance-based state assessment on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instruction*.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 Yin, R. K. (1991).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Newbury Park, CA: Sage.